



反對新戰爭的煽動者

維辛斯基

聯合國大會演詞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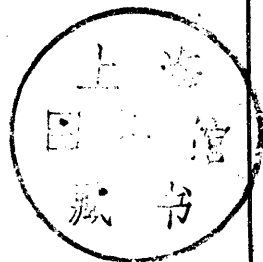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23 0541B

史迪文指云

蘇聯外次

維辛斯基

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



蘇聯大使館新聞處 編印
一九四八年四月 南京

正誤表

頁	行	字	誤	正
二 三	五	十	主義	主席
三 一	十	四一	目前。	目前，
三 四	十七	四五	蘇蘇	蘇聯
三 七	六	八	他說	因為
三 八	十六	四二	截軍	裁軍
四 〇	八	十四	應當	應當提到
四 〇	八	十九	我	他
四 五	五	七	篇	遍
四 五	六	三五	編	邏

目 錄

一、爭取各民族和平與友誼，反對新戰爭的煽動者	一
二、在紐約記者招待會上的聲明	三三
三、關於希臘問題	四七
四、政治委員會如何通過希臘問題的解決	七九
五、保衛聯合國的基本原則	八六
六、論希臘問題	九九
七、反對新戰爭的宣傳和煽動家	一二九
八、在聯合國大會政治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詞	一五〇
九、在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上的演詞	一七三
十、在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上的演詞	一九五
十一、在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上的發言	二一九
十二、在聯合國大會上關於常設委員會的發言	二二八
十三、在美蘇友好協會慶祝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週年宴會上的演說	二四七
十四、在聯合國全體大會上關於一致協議原則的演說	二五五

爭取各民族和平與友誼，反對新戰爭的煽動者

一九四七年在九月十八日在聯合國大會全體會議上的演說辭

自從第一屆大會以來，已經過去了一年。現在必須回顧一下在這期間所經歷的道路，分析一下聯合國機構在這期間所完成的工作，歸結一下某些結論，並且略說一下可能的前途。每一個代表團，每一個聯合國的會員國，都必須不偏不倚地，而且自覺到它在這種事情上的責任，來克盡這義務，這需要徹底的光明，公平，並且至高尊重無上的真理。

回顧過去，蘇聯代表團不得不指出：在檢討中的這一期間，聯合國機構的工作標誌出嚴重的缺點。這些缺點必須堅決而且一貫地揭露出來而且指明出來，這些缺點，主要地在於捨棄奠定這個機構之基礎的最重要的原則，而且在若干情形中，甚至在於直接違背大會若干重要的決議。這些缺點，大部份起因於像美國和英國這些聯合國中有勢力的會員國，竭力想爲它們狹隘的集團利益來用這個機構，而將基於憲章所規定之原則的國際合作的利益置之不顧。

若干國家爲它們自私而偏狹的利益來利用這個機構的政策，致使這個機構威信喪失，猶如悲慘記憶中的國際聯盟的情形一樣。

另一方面，聯合國中對於它的威信有着不利影響的令人不滿的事態，乃是這一事實的結果，即：上述的國家忽視這個機構，並且企圖在聯合國機構之外而且在它之上採取若干實際的行動。

我們必須注意：聯合國機構，由於這種與憲章原則，與聯合國家在組織這個機構時所規定的方針與目標毫不相容的政策的結果，所面臨的危險。

一、美國與英國反對裁減軍備

在聯合國機構活動的最重要的缺點中，我們必須首先指出：在實現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關於普遍裁減軍備之決議方面，工作之令人不滿的進展。去年大會所一致通過的普遍裁減軍備的決議，符合那些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後，依然肩負着戰爭費用以及因為不斷增加軍備而造成之無限痛苦的負擔的人民大眾的重大利益。大會關於普遍裁減軍備的決議，同是也是愛好和平各國人民對於建立持久和平及國際安全之願望和要求的表現，乃是迫於他們所經歷的痛苦以及他們所作的犧牲而提出的要求的表現。正是因為這個緣故，全世界的人民才非常滿意地接受這個決議，並且希望它能迅速而且全部地予以實現。

然而，這個希望却沒有實現。

正當安全理事會和一般軍備委員會企圖規劃實際的步驟，以實現大會關於普遍限制及裁減軍備之決議的時候，美國和英國的代表，却提出了裁減軍備的條件，這種條件勢必破壞上述大會決議的實現。一般軍備委員會中英美代表團的一切活動證明：美國和英國拒總裁減他們的軍備，拒絕解除武裝，攔阻解除武裝，這引起了愛好和平國家的驚愕。貝文在南港所作的聲明，大意說他不願幫助裁減軍備，這對於關於實現大會裁減軍備的決議之令人不滿情形的原因問題，提供了一個有力的答覆。杜魯門最近在彼得羅波利斯所發表的演說，也洩露了同樣的意見，當時美國總統強調說：美國的武裝力量必將保持原樣，而且沒有一個字提到聯合國國家按照大會決議所負有實現裁減軍備的義務。

正如我們已經說過的，英美對於裁減軍備的態度，以及在實現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決議所規定

的任務方面沒有積極的結果，證實了這種驚愕以及對於我們所已開始的事業的成功發生憂慮，是正當的；這種憂慮，尤其因為軍備競爭，包括原子武器在內，以及因為某些擁有極大軍事與經濟力量的國家從事類似戰爭的準備，而加劇。這破壞了對於歷次和平宣言，以及關於決心使未來一代避免戰爭災禍的聲明所發出的信心。

二、美國破壞禁止原子武器的工作

千百萬的普通人民特別因為關於禁用原子的和其它具有集體毀滅性的主要武器方面令人不滿的情形而覺得驚愕。這驚愕，更其是正當的，因為原子武器是一種攻擊的武器，侵略的武器。原子委員會工作了一年半以後。大會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的決議所規定給它的任務，沒有一件完成，而且在實現這些任務方面，也沒有一點進步。

蘇聯政府方面會採取若干步驟，來幫助積極地解決這個問題。為補充并發展它的關於簽訂禁用原子的和其它有集體毀滅性的重要武器的國際公約的建議，蘇聯政府會提出關於國際管制原子能之原則的建議，以供原子委員會考慮。然而，這個建議却遭到主要是美國方面的抵制。希望保持它在原子武器方面的獨佔，美國反對一切想說服它毀滅原子彈儲藏，并且禁止繼續製造原子彈的企圖。同時，它始終在擴大這種炸彈的生產，在原子委員會的基礎上所發生的這種歧見，阻礙了委員會的工作，并使一切針對着有效解決委員會所負責的這個問題的努力都歸無效。

然而，如果某些代表團，包括美國代表團在內，以公正的方法來處理這個問題，許多歧見無疑是可以消除的。例如，因為蘇聯代表團所提出的，關於在禁用原子武器的公約生效以後，毀滅已造成原子炸彈貯藏的建議而發生的歧見，就可以消除。大家都知道，委員會中大多數人都同意毀滅原子武器貯藏，

以及僅爲和平目的而利用它們所包含的原子核燃料的原則。祇有美國代表團堅持反對毀滅原子武器貯藏，因而使委員會中大多數人所同意的關於這個問題的決議不能通過。

因爲監察制度而發生的情形，也值得注意。一直到最近，美國代表團都是強調監察制度之特殊重要。在蘇聯代表團的建議中，監察制度是作爲在禁用原子武器以後的一項根本的措置而出現的。可是，目前，美國代表團突然開始渺視監察制度的意義，并且把其它的問題提到前面來，例如，將原子工作廠機構所有問題，管理問題，發給執照問題等等。

美國代表一面這樣地幹，一面就拒絕考慮那些反對國際管制機構擁有生產原子能工作具有的資格。科學家們的意見，例如，團結着科學界名人的英國原子科學家協會理事會備忘錄中所說的意見，大家都知道，在這個備忘錄中，英國科學家強調指出：「如果把照通常意義來解釋的生產工具的全部所有權交給這個機構，這就會引起許多困難，因爲這將授權原子能管制機構來決定：某一特定的國家是否有權建立能的工廠，是否有權阻止應用這些工廠所出產的能，或是規定供應這種能的條件。」這些英國科學家批評美國代表自巴魯區活躍的時候所主張的原則，理由正當地說：「這種限制，將造成一種機會，可以干涉每一國家經濟生活到防止爲毀滅目的而應用原子能所不必須的程度。」這是一羣從科學進步利益的角度來考慮這個問題的科學家們的呼聲，這與某個集中化的國際機構對追求和平目的，發明并增加供應之目的的科學研究實行無限制的管制，是毫不相容的。這就說明：爲什麼英國原子科學家的備忘錄提出一種方案，這種方案將提供一種保證，不得原子能管制機構的許可不得貯藏危險性的原料，同時也將使一切國家可以在它們個別的領土上建立生產其它力源以外的原子能的工廠方面，表現優先權。

三、蘇聯贊成禁止原子武器，贊成嚴格的國際管制

爲着鞏固普遍和平的利益，蘇聯會提議簽訂一項在一切情形中禁用原子武器的公約。蘇聯的這個提案，得到一切國家廣泛的響應和支持。英國科學家協會的備忘錄說：「這樣的公約，似乎是最合理的，並且說：英國和美國不願意這個公約，這是很難被認爲正當的。」論及蘇聯對毀滅已造成之原子武器貯藏及停止生產原子武器的要求，英國科學家們寫道，這個要求，在他們看來，是非常可以理解的。

蘇聯同意嚴格的對原子能工廠的國際管制，然而，這却不能變爲那些原子能無關的國民經濟部門和事情的干涉。在這裏，英國原子科學家也是對的，他們在一月二十三日所發表的備忘錄中表示希望：「監察權必須儘可能加以限制，而且一定不可以成爲對合法工業和其他活動表示過份好奇的工具」。

英國科學家在他們八月間所發表的備忘錄中再度指出確立監察權一定限度的必要，這種監察權不可以爲有組織的經濟與軍事公報的目的服務。這個備忘錄指出：必須設法使美國和其它擁護巴魯區計劃的人提保證，確保這種局勢，即：沒有一種監察計劃可以變爲過密設計的偵探制度。

從上述的組織國際管制（我再說一遍，應該是強有力的，有效的管制）的原則出發，蘇聯代表團認爲：必須對監察機構確立一定的限度，約束它們的權力與限於真正管制原子能，並且防制管制機構有被利用來對國民經濟任何部門橫加干涉的可能，甚至不顧這一事實，即：這種的干涉，只有暗害而且破壞任何國家的國民經濟。美國代表團以及某些擁護它的代表團，特別堅持：凡是生產危險數量的原子原料的工廠，都應該歸國際管制機構所有和管理，這樣，這個機構就變成了一個將爲該機構大多數會員國的利益而行事的主人，而蘇聯却不能盼望它會有善意的態度。但是，這正是那些環繞着美國代表團，並且根據它的指示而行事的代表團所想達到的一種局勢。上面引用過的英國科學家的備忘錄，公開了這個事實，即：美國的原子能管制計劃，規定了若干措施，這些措施可以被解釋爲美國保持在原子能領域中的

霸權。蘇聯代表團，現在和將來都要反對這樣的局勢，並且將堅持：國際管制機構一定不可以由任何一個國家獨霸，而是它所有的參加者在這個機構的一切活動中享有平等權。

關於這一點，應該喚起回憶，原子委員會中的美國代表，頑強反對原子生產的各階段，從提煉原料到製成出品，同時實行管制。美國代表提議無限期擱置對原子生產最爲危險的最後階段實行管制，在這一方面，美國目前認爲它是一個獨佔者。同時，他們堅持立即實行對最初階段——提煉原料的階段——的管制。這是十分明顯的，美國的態度應被解釋爲目的在阻止擴大對美國的管制，而所有其它的國家現在就應該服從國際管制的一種態度。

這就是關於原子問題的真情實況。當然，我們不能期望一種某些代表表示無意於合作，以達到聯合國大會去年十二月十四日的決議中所規定之目標的計劃可以成功。我們不能容忍這種局勢，或是安於爲集體毀滅并殺害和平人民而利用原子能的威脅尚未消除這一事實。各國人的良心，不能安於這種局勢，即：儘管聯合國呼籲消滅原子武器及其它具有集體毀滅人類性質的重要武器，而具有集體毀滅性的武器的生產，不但在繼續，而且還在不斷的擴大。

四、杜魯門——馬歇爾計劃違反聯合國組織原則

美國違背聯合國原則及蔑視聯合國機構的特別顯明的例證，便是所謂「杜魯門主義」及「馬歇爾計劃」。正如最近幾個月的經驗所證明的，這個主義的宣佈就表明：美國政府明白地廢棄了國際合作以及大強國一致行動的原則，而且着手試圖并強迫其它獨立國家接受它的意志。同時，顯已應用經濟的手段作爲政治的壓力，而把援助某些貧困國家的事丟在一邊。關於這一點顯著的證明，已由美國政府在聯合國

之外並在它之上，在希臘和土耳其實施中的措置，以及根據馬歇爾計劃在歐洲規劃中的措置提供出來了。這個政策，是與聯合國大會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決議中所宣佈的則正相矛盾的，那個原則是：對於其他國家的援助，絕不能用來作為政治的武器。

現已明顯，馬歇爾計劃不過是適應戰後歐洲環境的杜魯門主義的翻版而已。當提出這計劃的時候，美國政府顯然企圖，藉英國和法國政府的幫助，使歐洲各國得到急需的援助，就必需放棄它們不可讓與的，暴露它們經濟的資源，根據他們自己的意志來計劃國民經濟的權利，而且企圖：使所有這些國家直接依附著美國獨佔資本家的利益，他們力求以加緊對歐洲輸出商品與資本的方法，來避免迫在眉睫的危機。

大家都知道，並不是所有歐洲的國家，儘管它們貧困而且有戰後經濟復興的困難，都同意這種對它們主權的侵害，這種對它們內政的干涉的，而是會參與關於這個問題的著名的巴黎談判的國家，都格外明白地理解這種援助的真正意義。現在每一個人都愈益明瞭，馬歇爾計劃的實現，就將意味着歐洲各國服從美國的經濟與政治的控制，以及美國直接干涉這些國家的內政。同時，這個計劃代表著一種企圖，想把歐洲分裂為兩個營，藉英國與法國的幫助，完成若干歐洲國家之集團的組織，反對東歐各民主國家的利益，首先是蘇聯的利益。這個計劃的重要的特點乃是：想把東歐國家和若干西歐國家集團，包括西部德國在內，對立起來，這就看出了西部德國和魯爾區的德國重工業，在被利用來作為在歐洲實行擴張的最重要基地之一，違背那些會為德國侵略之犧牲的各國的民族利益。不消說得，為着證明美國的以及支持它的英國和法國政府的這種政策對聯合國基本原則完全矛盾，祇要回憶一下這些事實就夠了。

五、破壞聯合國組織的決議

同樣，人們不能認為這種關於聯合國會員國間之關係的局勢是正常的，在這種局勢中，外國軍隊依然留駐在聯合國會員國的領土內，作爲在政治上干涉它們內政的工具。這就產生了一種以不平等和依賴爲特徵的國與國的關係，而且與聯合國的憲章相抵觸。

英國軍隊依然留駐在埃及，違反埃及的意志，留駐在希臘，破壞她國家憲法，留駐在曾經聲請加入同盟國的外約旦。美國的軍隊依然留駐在中國，對於建立該國的國內和平與安靜毫無裨益。

外國軍隊留駐於非敵國境內，如果不是與在佔領期間保護與前敵國領土的交通線有關，是不應該允許的。普遍和平的鞏固與各國相互的信任，要求早日而且積極地解決不是用來保護與前國之交通線的外國軍隊自非敵國撤退的問題。

我們也應該注意到聯合國的某些會員國沒有能够履行大會關於西班牙問題（阿根廷），關於歧視南非之印度人，關於以前西非洲委託統治地之託管（南非聯邦）的重要決議。大會不能忽視某些會員國的這種行動，這些行動破壞了決議中所規定的目的，並且暗害了聯合國機構的威信。

在這一點，我們也不禁要談到印度尼西亞局勢的發展，這些發展祇有被認爲一個聯合國會員國對於印度尼西亞人民所作的侵略舉動。荷蘭對於印度尼西亞共和國所進行的挑釁的武裝攻擊，引起了全世界一切誠實的人合法的憤慨。然而，聯合機構可會給予印度尼西亞人民適當的保護嗎？我們大家都知道，并不會有過這樣的事。由於安全理事會檢討印度尼西亞問題的結果，某些國家會盡極大的努力縮小印度尼西亞局勢發展的意義，并且強迫安全理事會接受關於這一問題的這樣一種決議，這一種決議，決不能

被認為對於保護已經成爲武裝進攻之犧牲的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的合法利益是適當的顯而易見，這樣的決議，勢必要暗害爲了確保維持各國間和平而組織的聯合機構的威信。

值得注意的是：當某些有勢力的強國未能適當關心來消除關於解決西班牙的，以及上述其他問題不能令人滿意的情形時，他們却對伊朗問題表示特別的關心，這個問題，在它最後解決以及伊朗本身請求將這一問題自安全理事會議程上撤消一年半以後，至今依然保留在安全理事會的議程之上。也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和英國的代表，顯然爲着某種特殊的目的，頑強地想不惜任何犧牲并且違反常識地把伊朗問題保持在安全理事會議程之上的願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祕書長頗有理由解釋說：安理會沒有理由處理所謂伊朗問題，這甚至不能動搖安全理事會中英美理事在這件事上所表示的過度的頑強。

至於託管理事會，蘇聯代表團認爲必須注意下列一點：在大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的會議上，蘇聯代表團會批評提交大會批准的關於託管，以前委任統治地的協定，因爲籌備這個協定的程序以及協定中的某些條款，都不符合聯合國的憲章的帶有上述缺點的這個協定，乃是組織託管理事會的基礎，這個事實勢必影響蘇聯代表團對於選舉基於這個協定而組織的理事會理事的態度。蘇聯代表團，現在依然抱着他在大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會議上就這個問題所表示的觀點。作爲託管理事會常任理事的蘇聯代表團，希望在簽訂託管協定方面所發生的違背憲章的行動，將予以矯正，這將幫助託管理事會立即完成任務。這是不言自明，的這將符合整個聯合國機構的利益，以及被託管地區人民的利益。

聯合國機構中令人不滿意的情形，並不是偶然的，而是若干會員國，尤其是美國與英國方面對於聯合國機構所採取之態度的結果。這種態度，對於加強這個機構或是對於促進國際合作的事業，都沒有裨益。相反，它却削弱而且暗中破壞了聯合國，毫無疑問，這是符合這些國家中反動人士的計劃和意圖的

，而這種政策就是在它們的影響之實行的。

在朝鮮舉行的蘇美談判中，美國態度，很明顯地顯示出：美國的態度中有一種傾向，要破壞那兒的蘇美混合委員會的工作。

蘇聯駐朝鮮代表團團長，什台科夫將軍，曾於九月十五日在混合委員會的會議中發表聲明，他在聲明中力主該委員會應立刻着手貫徹八月十二日美國代表建議案中以及八月二十六日蘇聯代表團建議案中兩國代表團的觀點已經接近的各點。

什台科夫將軍所發表的聲明，曾於九月十七日發交朝鮮記者及外籍記者發表，全文如下：

混合委員會的工作陷於停頓狀態，已經歷時頗久。蘇聯代表團引爲遺憾地指陳：近來已顯然發覺美國代表團實不願在混合委員會中工作以謀解決關於成立一個單一的朝鮮臨時民主政府的諸問題。

美國代表團不力求克服在混合委員會內部已經發生的困難，也不力求達成大家協議的決定，却採取了這樣的路線，故意使該混合委員會的工作趨於複雜而且拖延不決，故意強調並誇張兩國代表團之間的爭論，蓄意要表明委員會面向着的問題不能解決。

當混合委員會起草聯合報告書時，這一點就表現得特別明顯。甚至在兩國代表團所提出的聯合報告書草案開始討論之前，美國代表團就已建議說：該混合委員會，不得編製聯合報告書，只可將蘇美兩國代表團所提出的報告書的草案，呈交各自政府，並附一公函，聲明兩國代表團未能就聯合報告書一節達成協議。

美國代表團，不啻着手討論所提出的草案，以編製一份可以接受的聯合報告書，却採取了吹毛求疵的路線，強調兩種提案之間不相同的地方極力阻撓編製一份聯合報告書的一切可能性，並且極力想由這

一個實例來證明在混合委員會中是不能達成協議的。

在混合委員會內以及會外，最近局勢的發展，已充分證實美國代表團實際上對於混合委員會的工作所抱的態度，令人憂慮，對於蘇聯代表團以加速混合委員會的工作爲目的而提出的提案，美國代表團的態度，在先前就已很自然地使人發生這種憂慮。

衆所周知：由於兩國代表團對擬具朝鮮各民主政黨及社會公團的名單以便邀請協商一節意見懸殊，混合委員會的工作因而延擱。蘇聯代表團努力加速解決關於擬具邀請協商的名單問題，會一再提議：責成第一小組委員會審議要參與協商的各政黨與各公團的申請書，並立刻着手與那些依照莫斯科決議，莫洛托夫—馬歇爾協議及混合委員會第十二號決議，其參與協商的資格都毫無疑問的各政黨及各公團，先行舉行口頭協商，然後再繼續討論並審核其他的申請書。

關於參加了爲反對莫斯科託管決定而鬥爭的委員會的各政黨與各公團，蘇聯代表團，曾提出若干建議，其目的在於遵照莫洛托夫—馬歇爾協議，來解決這個問題。

如果美國代表團會表示充分願望加速解決發生爭論的諸問題，那麼，混合委員會的工作在七月間本來就會表現頗大之進展了。然而，蘇聯代表團的這些提案，竟爲美國代表團所拒絕，美國代表團甯願繼續作籠統的討論，極力避免實際考慮各政黨和各公團所提出的關於要參加協商的申請書，因而，就把混合委員會的工作延擱下來。

鑒於事實上美國代表團對於擬具這種名單一節的態度，延誤了混合委員會的整個工作，蘇聯代表團早在八月五日就已提議着手草擬朝鮮臨時政府的機構及其施政綱領，以及關於該政府組成人選，關於由臨時政府接收政權的程序，關於全體人員的遴選等提案。

蘇聯代表團考慮到混合委員會向着廣泛的工作，要草擬上述各提案，並且考慮到這類工作應從早開始。蘇聯代表團就是以這類考慮為指針的。然而，蘇聯代表團的這種建議，也為美國代表團所拒絕，美國代表團，在關於邀請協商的各政黨與各公團的名單問題獲得解決以前，不肯討論混合委員會的工作大綱中的其他各項。

八月廿六日蘇聯代表團提出建議案，以答覆美國代表團八月十二日的建議案，蘇聯代表團接受美國代表團建議案中的第一節——不舉行口頭協商，而改由朝鮮各政黨與各公團向混合委員會提出書面建議，以解答所徵詢的諸問題。因此，兩代表團已就這一點達成了協議。

蘇聯代表團提議：應訓令第二與第三小組委員會，着手研究各民主政黨和社會團體為答覆各項問題用書面向混合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並且就有關各點向混合委員會提出議案的草案。這些提案，是因為混合委員會五月二十三日會議上所通過的工作計劃而發生的，按照這個計劃，混合委員會工作的第一階段，包括下列各項，第一、擬訂與各民主政黨和社會團體進行協商的條件與程序。第二、草擬關於組織臨時朝鮮民主政府和地方政權機構（臨時規程）的結構與原則的建議。第三、草擬未來臨時朝鮮民主政府的政綱和其他相應的措施。第四、準備關於臨時朝鮮民主政府人事成份的建議。第五、規畫臨時朝鮮民主政府接受政權的程序，以及為臨時朝鮮民主政府徵選僚屬的程序。

蘇聯代表團八月二十六日關於第二和第三小組委員會工作的提案，在若干點上，是與美國代表團八月十二日的提案相符合的。蘇聯代表團八月二十六日的提案，也曾規定應立由各民主政黨和社會團體的代表所組成的臨時全朝鮮人民會議。這個顧問的機構必須建立起來，以便現在就請朝鮮人直接參加研究有關組織朝鮮政府的問題。

在混合委員會九月三日的會議上，美國雖反對蘇聯代表團八月二十六日的整個提案，但是在本質上，它祇是反對關於組織臨時全朝鮮人民會議的建議。美國代表團在本質上并不反對蘇聯八月二十六日提案中的其他各點。鑒於上述情形，蘇聯代表團，力求迅速組織臨時政府，遂主張實施美國代表團八月十二日提案中和蘇聯代表團八月二十六日提案中那些兩方觀點接近的，并且符合上引混合委員會五月二十二日決議的各點，并且提議訓令：第二小組委員會立即着手研究各民主政黨和社會團體，爲答覆混合委員會所分發之各個問題，用書面向混合委員會所提出的建議，并且向混合委員會提出關於臨時朝鮮民主政府和地方政權機構（臨時規程）之結構以及政綱的草案；第三小組委員會向混合委員會提出關於臨時政府之人事成份以及臨時政府接收政權之程序的建議。至於臨時全朝鮮人民大會的成立，蘇聯代表團認爲：美國代表團於其九月三日聲明中關於這一點所提出的反對是前後不一致的，并且認爲：關於此點的討論應該予以繼續，以便達成協議。如果美國代表團接受了這個建議，混合委員會就能夠馬上着手擬訂關於涉及組織臨時朝鮮民主政府問題的建議，按照莫斯科決議，這個建議必須送交各有關的政府。

蘇聯代表團認爲必須再說一句，混合委員會爲成立臨時朝鮮民主政府的順利工作，祇有在這種條件下才有可能，即：取消對南朝鮮各民主政黨和社會團體所採取一切的報復手段，釋放被捕的這些團體領袖和成員，并且保證這些政黨和團體能夠自由而且毫無阻礙地活動。蘇聯代表自這種假定出發，即：一切的努力，應該針對着成立單一的全朝鮮的政權機關——臨時朝鮮民主政府，并且認爲：最近所提出的，實際上趨向保持將國家分爲兩區的現狀的計劃，對朝鮮人民是充滿着嚴重危險的。蘇聯代表團像以前一這，認爲：假定兩方代表團都有確實而且全部實現莫斯科會議關於朝鮮的決議及莫洛托夫和馬歇爾的協定的願望，混合委員會就能夠有效地完成它組織朝鮮人民所那樣不耐煩期待的單一的臨時朝鮮民主

政府的任務。在混合委員會的會議上美國代表團團長布朗將軍宣稱：美國代表團將研究蘇聯代表團上述的聲明。

六、蘇聯贊成鞏固聯合國組織

至於蘇聯，它對聯合國機構的政策，乃是加強這個機構的政策，擴大并鞏固國際合作的政策，堅定而一貫遵守憲章并實施其原則的政策。加強聯合國，祇有在這種基礎上才有可能，即：尊重國家政治與經濟的獨立，尊重各民族主權的平等，以及首尾一貫而且毫無保留地遵守聯合國機構最重要的原則之一。

在通過有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最重要問題的決議時，大強國同意與一致性的原則。這是完全符合這些強國對維持普遍和平所負有的特殊責任的，并且是保護聯合國一切大小國家利益的一個保證。蘇聯認為這是它的責任，即：堅決打擊任何想動搖這個原則的企圖，不論這些企圖是用着什麼的動機來加以掩護。

關於美國國務卿馬歇爾先生的演說，我還要說幾句話。

在他的演說詞中。他會談到已經不止一次成爲討論之主題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大多數，已經作爲個別的項目在大會議程上出現。以後，在適當的場所以及在適當的時候，我們將會說明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意见。馬歇爾先生在他的演說中，也會提出若干新的問題，其中有一些，蘇聯代表團認爲必須現在就要加以討論。

第一個就是希臘的獨立和領土完整遭受威脅的問題。關於這個問題之適當規模的討論，且留待大會

按照既定程序討論它的時候再說，蘇聯代表團認爲現在必須指出：這個問題的提出是毫無任何基礎的。美國代表團所提出的對於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控訴，完全是武斷的，而且沒有任何的證據來加以證明，這些控訴遠甚於調查團中大多數的結論，這個結論沒有得到這個調查團中將近一半團員的支持，而且，如果我們稍微認真地考慮一下這些結論所依據的材料，這些結論是經不起批評的。不難證明，所謂希臘局勢調查團大多數的報告書充滿了矛盾生硬的曲解，這就使這些大多數人的結論失却一切的意義。

至於朝鮮，馬歇爾先生十分武斷而且錯誤地把事情說成這樣，將朝鮮的蘇美混合委員會工作的徒然無效歸罪於蘇聯的一方，並且提出顯然違背三國外長於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十九日就朝鮮問題所達成的莫斯科協定的提案，根據這個協定，美國和蘇聯共同負責擬訂解決將朝鮮團結爲一個獨立民主國家問題的辦法。馬歇爾先生的新提案，違背美國所担负的義務，所以是錯誤的，而且是不能接受的。不遵守莫斯科會議關於朝鮮問題的協定，也不採取步驟，擬定這個協定所規定的措施，并把這些分交美、蘇、英、中四國政府以便共同討論，美國政府却寧願違背它所負的義務，并企圖利用聯合國大會的威信來保護它片面的而且絕對不正當的行動。蘇聯政府不能同意這樣違背上述關於朝鮮的協定，并將堅持反對馬歇爾先生的提案的因爲它違反根據三國關於朝鮮的協定所負的義務。

其次是成立臨時委員會以便「經常注意大會之工作」，并決定具有「永久性」事務的問題。馬歇爾先生提議：在「和平與安全臨時委員會」的名義之下，成立一個聯合國大會的常駐委員會。儘管美國的提案中附有保留，大意說：這個委員會將要涉及安全理事會及各種委員會應負主要責任的問題，這個提案無疑地表示出：成立臨時委員會的企圖，不過是一種偽裝拙劣的想代替并改變安全理事會的企圖而已。

。這個委員會檢討有害於友好關係的局勢和爭論的職權，不是別的，不過是由憲章第三十四條所特別規定的安全理事的職權罷了。單是因爲這個理由，這是職權轉移給任何別的機構，不管這個機構取的什麼名稱，就不會不顯然而且直接違背聯合國憲章。對於這一點，蘇聯是一定不會同意的，而且也將堅決反對的。我再說一句，美國政府如果提出上述的新提案，以及換上新裝的舊提案，以供大會考慮的話，蘇聯代表團則保留它當在本質上討論這些問題時，更充分分析這些提案的權利，並將堅持反對這些提案，因爲它們違背聯合國機構的原則，目標和任務，因爲接受這樣的提案，惟有破壞了聯合國機構的根本基礎。

七、新戰爭的宣傳與美國

蘇聯代表團認爲在大會的面前必須提出一個具有極大重要性的問題，就是：如何採取步驟，去制止在一些國家中不斷加緊的關於新戰爭的宣傳。

自從聯合國憲章在舊金山簽字，隨後又經五十二個國家批准以來，已經過去兩年多了。這意味着一種新的國際聯合會活動的開端，它的任務是保障各國和平與安全，發展和加強國際合作，以幫助各國在經濟上和社會上的進步。

聯合國機構的創立，是早在民主國家的主要的敵人——希特勒德國——已經崩潰，而日本的失敗就在眼前的時候由於英蘇美三國共同領導的民主國家取得具有歷史性的勝利的結果的，這些人類的敵人們妄想建立世界霸權的企圖已遭遇到全部的失敗。

兩個傳統的戰爭溫床已經被消滅。我們希望：他們的確已永遠被消滅，使德日兩國完全解除武裝的

任務必將全部完成，而這些國家必將永遠不再用戰爭和侵略來威脅愛好自由的國家。

我們希望：侵略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得到的嚴酷的教訓，確已證明並不是徒然的，而在這一次戰爭中受到嚴厲懲罰的侵略者們，對於不願自身所擔負的關於發展各國友好邦交並加強全世界的和平與安全的義務，而在半明半暗的準備新戰爭的人們，必將成爲一個可怕的警告。

在某些國家，主要在美國，黷武主義者和擴張主義者的階層中所極力煽動的戰爭的歇斯底里亞病，正在繼續擴大中，而且具有日甚一日的威脅的性質。

大部分美國報紙，以及服從美國的命令的國家，例如土耳其的報紙，久已發動瘋狂的宣傳運動，目的在使世界輿論界贊成新的戰爭。

所有一切心理的壓迫手段，例如報紙，雜誌，廣播和電影，都爲這一個目的而使用。這種關於新戰爭的宣傳，正在各種不同的口號和藉口之下推動着。然而，不管這些口號和藉口是如何的紛歧，全部宣傳的要點只有一個，就是：證明包括原子武器在內的美國瘋狂的軍備競賽是合理的，證明美國有力人士無限制的主張執行滲透着具有世界霸權的同樣「觀念」的擴張計劃是合理的。

美國報紙最激烈的宣傳新戰爭，號召人民儘可能有效地從早去準備。大量的報紙和雜誌，大多數是美國的，日日夜夜嚷着新的戰爭。有計劃的使他們國家的輿論界受着敗壞性的心理的壓迫。

戰爭販子們，假裝着大聲疾呼的進行他們加強國防的宣傳，並且硬說其他國家用戰爭的危險去威脅他們，所以必須戰爭。宣傳家們和戰爭販子們，極力採取一切的方法，捏造出關於蘇聯準備進攻美國的荒唐奇譚和惡毒謾言，去恐嚇政治消息不靈通的人們。

自然他們完全知道他們是在說謊，他們知道蘇聯決不想去進攻任何國家，他們知道蘇聯正在用全力

去復興被戰爭所蹂躪的區域和一般受到戰爭的損害的領土，在復興和進一步發展本國的國民經濟。

美國及英國，土耳其，希臘和若干其他國家中活躍的宣傳家們和戰爭販子們，充分明白一件事實，就是：在蘇聯，全體的人民——工人們，農人們，知識份子們——都一致的譴責要燃起新戰爭的企圖。當然，在蘇聯這樣一個國家中，是不會有這樣一種企圖的，在蘇聯。正在從事於和平建設的工作，專心傾注取之不盡的和平勞動，復興被戰爭所破壞的區域。進一步加強和發展由希特勒匪徒們加於蘇聯的嚴重的打擊而受過損害的國民經濟。

在蘇聯，在一個社會主義民主的國家，在一個和平建設新的生活的國家中，既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絲毫的跡象，類似於在某些國家所發生的情形，那些國家一方面自以為民主和進步，而同時又容許如此可恥的行動，例如宣傳戰爭，向人民的腦子裏灌輸對於人類仇恨的毒液，和對於其他國家敵視的行爲。

在蘇聯，如果有人竟發出甚至些微類似於上述的言論，滲透着犯罪的慾望，要再來一次大屠殺，這樣一種言論一定要受到嚴厲的駁斥，和公開的譴責，被人認爲是一種嚴重危害社會的行動。

然而，那些以中傷蘇聯和東歐的其他各民主國家，以及其他國家中一貫反對新戰爭的民主人士爲職業的紳士們，正不惜使用虛妄的誹謗的讒言，由這些挑撥專家和戰爭販子們捏造出來，經過無數的門路，散佈在全世界。

他們硬說必須制止蘇聯和東歐各國的侵略政策，而以此爲藉口，一貫地傳播戰爭不但是不可避免的，甚至還是必要的。自然，這又是嫁罪在他人的身上，正如俄國的諺語所說：「熊在吃牛，又在喊救命」。

實際上在全世界人士的眼前，新戰爭的準備正在進行中。宣傳家們和戰爭販子們，甚至不打算掩飾了。他們公開的用戰爭去恫嚇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同時又想把發動新戰爭的責任推諉到那些國家的身上去。從許多跡象中可以看出，對於新戰爭的準備，已經從單純的宣傳，心理的壓迫和神經戰的階段突然着手了。

在某些國家——特別指的是美國——中，無數的事實證明戰爭的歇斯底里亞病，正由具有軍事戰略性質的實際方案在擴大中，這些方案配合着組織上的和技術上的方案，例如建設和組織軍事根據地，依照將來軍事行動的計劃重新配置武力，加緊製造新武器，和進行瘋狂的工作使軍備精益求精。

同時，軍事集團正在組織，締結所謂聯防的協定，採取措置統一軍備，並統一出總參謀部所擬訂的新戰爭的計劃，著名的廣播評論員，皮爾遜，在他最近的廣播中，也不得不承認，美國軍官們正在慢慢的然而澈底的準備以蘇聯為敵人的下一次世界大戰，他這樣承認不是沒有理由的。

新的世界大戰的宣傳家們與煽動家們，便是這樣子扮演的，他們生怕發生新的經濟恐慌，他們就要煽起一種新戰爭，一心希望這樣子來消除迫於眉睫的崩潰和他們的利潤的損失。

新戰爭的鼓動家們，懷着一種天真的計劃，要憑藉武力，來使為獨立而戰的，並否認他國有權干涉其內政的那些國家屈服。戰爭販子們，正拚命要迫使那些國家對外政策與對內政策方面，都接受他們的標準。存心想要燃起另一次戰爭烽火的那些人士，在煽動新戰爭，並從自己的黨徒們去對某些國家鬥爭的時候，一心期望憑藉地方性的戰爭，以達成他們的目的。

他們顯然忽視了過去戰爭的教訓，過去的戰爭教導世人：處於目前的時代，每一次地方性的新戰爭，不可避免地要轉化為新的世界大戰。他們忘記了：一種新的世界大戰，及其毫無意義的破壞夷平許許

多多城市，滅絕千百萬人民，以及由人類的勞動蓄集起來的無限的物質財寶，那就意味着人類全體遭逢又一次極大的災難。

戰爭——美國獨佔資本家利潤的源泉

在這種新戰爭的宣傳方面担任最積極的角色的，就是美國資本獨佔事業的代表們，美國最大企業的和美國主要工業的代表們。這些方面人士，由於戰爭的結果，曾獲得大利，累積了鉅額的財富，不久以前，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也曾發生過這種情形。

如果我們試將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九年即戰前的五年，與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四年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五年的統計數字，比較一下，我們就會發現：戰爭前的五年中，美國所以各大公司的利潤，除去捐稅後，共為一百五十三億美元，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五年間，這些大公司的利潤除去捐稅後，達四百二十三億美元。

據美國商務部的統計數字，在從一九四〇年到一九四五年的戰爭六年間，這些大公司的純利達五百二十億。

美國產業工人大會發行的『經濟評論』雜誌，在一九四六年第一期中，引用很有趣味的數字，表明一九四五年和一九四六年五十家大公司的利潤（除去捐稅後）的增加情形。這些數字表明了：有些獨佔企業，發了戰爭財，超利潤達百分之二百，三百以上，而在有些場合，這些利潤達百分之五百，乃至將近百分之八百，例如，大西洋砂糖公司的情形就是這樣。

據這個雜誌說：這些利潤，超過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九年的期間的平均利潤四倍之多。至於貿易方面的利潤，據經濟平穩局局長史蒂爾曼說，在一九四六年十月間，已達到空前的高度。

由此可見，戰爭對於某些國家中那些社會集團已表明了並不怎麼可惡，那些社會集團有能力利用戰爭的災難，來使自己致富。所以，決不是偶然的，詹姆士·阿倫，在他所著「國際獨佔資本與和平」一書中，就指出：在資本主義各國的經濟生活中，可以看出已失去平衡，並有根本脫節的現象，並摘錄研究這個問題的一個政府機關的報告，其中的斷定，使我們有理由可以下一結論：祇有在戰爭的情況中，現代的經濟制度才足以保證大致全部就業。

這種坦白的自供，大概無需再加以什麼評論了：它已極其雄辯地使人不言自明。應該指出：在戰爭期間會獲得決定性的勢力的資本家獨佔事業，即使到了戰後，也還保持住這種勢力，很巧妙地利用那些達百十億金元的政府貼補，以及他們會始終享受到的而且繼續享受到的種種政府組織和機關方面的保護。由於獨佔企業與參議員們及政府委員們都保持着密切的勾結，這就更方便了，而參議員們和政府委員們，本人也往往總是屬於獨佔企業的主管人或參加者的圈子裏。

這些情況，對於集中在各大工廠，各股份公司，各托辣斯和各大公司的實驗室中的工業科學研究工作，也發生影響。

如杜邦化學托辣斯，蒙桑多化學公司，衛斯丁豪斯公司，中央電氣公司，美孚油公司等等這類資本獨佔企業，都和這方面的工作有着最機密的聯繫，並且是這方面的全權主人。在戰前，他們就經由卡特爾，與德國各托辣斯保持着最機密的聯繫，而且許多卡特爾合同，都特別規定：戰後就恢復情報方面的交換。

所有這一切事實，提供出適當的解釋，足以說明種種資本獨佔企業，爲什麼對於原子武器的製造感到特別興趣。這些事實，可以說明爲什麼有人頑強地反對關於禁用原子武器以及關於消滅儲藏的原子彈

一節的正當要求，製造這種東西是要花費鉅款的。

資本家獨佔企業，追求利潤，他們拚命努力要不惜任何代價以保持並進一步發展那確保高額利潤的軍事工業，他們的這種努力，不能不影響到外交政策的方針，加重了這種政策方面的軍用主義的擴張主義的，和侵略的傾向，以便滿足有勢力的獨佔資本家方面的不斷擴大的胃口。

誰在煽動新的戰爭？

這便是在美國培養關於新戰爭的宣傳的一種根據，在美國，這種宣傳的煽動家們不僅是有勢力的美國工業界與軍界的顯著代表人物，有勢力的出版家和重要的政客們，而且更有美國政府的正式代表們。在他們之中，關於新戰爭的特別狂熱的煽動家，就是與貿易，工業，及金融托辣斯，大公司及其他獨佔企業有着密切勾結的那些人士，這決不是偶然的。

我看，無需舉出其中的許多姓名來。只要談論一些就夠了，自然不是來談論他們的個人的性格，個人的見解，個人的品質等等，而主要地是要來談論由這些人物代表其見解與利益的那些社會集團，機關，工業的，技術的，和科學的團體。

一——衆院議員道恩，五月七日，當衆院正在討論關於撥款「援助」希臘和土耳其兩國政府的提案時，曾以市儈口吻發表戰爭販子的言論，大意說：蘇聯不是用四億美元就能夠拘束住的，而藉助龐大的空軍，去轟炸蘇聯潛在工業中心，烏拉爾山脈的工業區以及其他生存攸關的地區，這才能夠辦到。

二——全國工業會議主席，約坦，誹謗蘇聯。據這位蠻橫無禮的人說：美國應該製造許多原子彈，並且主張迅速投擲出去，而不管有沒有任何根據就以爲某一國家在製造軍備。

三——前任美國駐保公使厄爾，向衆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發表挑撥性的言論，大意說，美國應該立刻用原子彈來對付那個不肯接受美國視察方案的國家，他用蘇聯「從潛艦發出的噴射式炸彈」，來恐嚇他的聽衆，他力主發展最恐怖的武器，並力主正告俄國人。第一枚原子彈落在美國的時候，美國人就要去毀滅俄國的每一鄉村，他力主使用原子彈去對付蘇聯。

四——衆院外交委員會主義，伊頓，在「美利堅雜誌」上發表一篇論文說：「我們還可以在心理上封鎖蘇聯。如果不能成功，我們就該用武力去消滅他。」

五——前任美國國會原子能委員會委員，參議員，麥克馬洪，在國會中聲稱：如果原子戰爭不能避免，義國必須是首先丟下原子彈的國家。在另一次演說中，他又說：如果關於國際管制原子能一節，不能達成協議，美國就有四條路可走：第一、儲存大量的原子彈；第二、立刻發動戰爭；第三、設立一個把蘇聯除外的國際管制的機構；第四、規定國際管制生效的日期，並聲明不服從國際管制的任何國家，都犯了侵略的罪。

六——伊利諾斯州的參議員，布魯克斯，今年三月十二日在參院演說時，竟不知羞恥地用市儈的口吻說：戰前如果美國留心共和黨的忠告，讓德國人把俄國消滅，杜魯門的目前的計劃也沒有必要了。他又補充一句說：在戰時美國幫助蘇聯，而現在美國也許要被迫對蘇聯作戰了。

七——前任美國駐蘇軍事代表團團長，狄恩將軍，在他所著的一本書中說：美國的作戰計劃，必須估計到如何應付由於對蘇作戰的結果會造成的特殊局勢。

八——據「集納」報的消息，克特勒·哈默工業公司副董事，哈伍德，宣稱：原子彈是一種沒有效力的東西，因為她毀滅大量的財產，而不能祇是把人類毀滅掉。在密窩基市美國就業研究所的一次會議

上，這個哈伍德，又以市儈口吻說出下面的話來，他說：雖然似乎是很殘忍，但是如果我們不得不作戰，我們就必須握有一種只會把人類殺死的武器。有了這樣一種武器，將來的戰爭中，就可以不需要用這樣龐大而廣泛的規模去復興國家和財產了。

九——杜爾斯，於今年二月十日，在芝加哥發表演說：要求對蘇聯取強硬的外交途徑，他說如果美國放棄這一種途徑，而指望着對蘇聯達成某種妥協的可能性，那麼戰爭就是不可避免的。在這次演說中，他誇口說：自從羅馬帝國崩潰以後，沒有一個國家像美國擁有這樣雄厚的物質上的優勢，他要求美國利用這一種力量去達到她的目標。

這些言論的含意是很清楚的。有時候彰明昭著的說出來，有時候全然隱蔽着去挑撥反蘇的戰爭。這是一種挑撥性的企圖，要轉移人民對於真正戰爭販子們注意，用「全世界社會革命」一類奸雄煽動的謠言，去掩飾他們的煽動性的活動，以爲腦筋簡單的聽衆是容易上當的。這些人們便是美國一般政客中間關於新戰爭的煽動家，他們不僅毫不躊躇的對蘇聯發出故意誹謗的咆哮，惹起蘇聯的憤怒，而且有計劃地灌輸關於新戰爭不可避免性和必要性的觀念，有計劃地以新戰爭的宣傳者和煽動者的姿態出現。

他們的言論，在頑固的反動份子的有組織的言論中得到了反應，例如臭名昭著的「美國外籍軍團」在最近一次的會議中，若干與會者們，陶醉在戰爭的瘋狂狀態中，大聲喊出「任何人都不應該幻想着，以爲一旦環境許可，美國不會拿起刀劍來。」

掌握在報業巨頭如摩爾根、洛克菲勒、福特、赫斯特，瑪克柯密克等人的手中的，美國反動派無數的機關報，在煽動戰爭方面，也決不落反動政客們的後面。

摩爾根控制着由著名的時代出版公司所發行的「時代」、「生活」、「幸福」三種雜誌，這一公司

的最大的股東之中，有「布朗兄弟哈立曼公司」。衆所週知，美國的最大的資本家們都是大出版物——雜誌，報紙和公報——的所有者和控制者，他們有他們自己的印刷廠，用相應的著作物侵入書業的市場。整個的報界，在老板的命令之下，進行發動新戰爭的猛烈的宣傳，採取一切可能的籠絡手段，以及用相應的精神捏造的謊話，去引起蘇聯和東歐的新民主國家的憤恨。

日日夜夜，這些報紙和雜誌的篇幅上，充滿了挑撥性的控訴，要求進攻爲他們硬說危害美國安全的其他國家，雖然這些報紙和雜誌機關中的人，也充分的知道並沒有人在計劃着去進攻美國，美國在這一方面並沒有面臨着什麼危險。

我們不得不舉一個例子，如「紐約先鋒論壇報」和主要屬於赫斯特系的許多類似的其他機關報這樣的出版物，有計劃的儘量發表一切挑撥的文章，在讀者們的腦筋中，灌入一種觀念，以「如果歐洲崩潰，或者如果歸蘇聯控制」，則「軍事行動」便是必要的了。

這一類言論在數量上是不不少的但是我們必須指出的一件主要事情，不是製造這種言論，而且這種言論沒有受到應有的駁斥，這就更鼓勵着他們從事新的挑撥了。

整個報紙是在各種新聞企業的所有者的手中，照着他們的指使去做，把學術的習作說成輿論的表示，並且假裝着是表白美國人民的感情，願望和抱責的代言人。

然而，我們可以負責說，美國的人民，以及其他民主國家的人民，都在戒懼着他們身上還沒有痊愈的戰爭創傷，都反對新戰爭，然而，在大多數的場合，人民不可能在數百萬份的書籍，雜誌和報紙的上面，說出自己的需要和願望。這自然是只有利於新戰爭的宣傳家們和煽動家們，他們利用他們有利的地位去損害愛好和平的各國人民的利益。

關於由各種科學機關和各大學所推動的關於新戰爭的宣傳，應就這一方面說幾句話，來補充上述各節。在這裏應該提到最近在耶魯大學出版的以「絕對的武器」為名的一本論文集，在那本書裏，一羣有學問的作者們，說到原子武器和管制原子能的應用的時候，沒有得到任何較好的結論，他們唯一的結論，就是說：「現在防止戰爭的最有效的一個方法，在於片刻之間就能發動原子戰爭的那種能力。」

這一本書，以科學的客觀性做幌子，敘述原子戰爭的各種不同的類型，並且說，如果美國的空軍「能够有效利用加拿大北部的基地，那麼蘇聯的城鎮，就會處於更短的距離以內了」。因此「我們便可以使用我們的基地去毀滅一個其他大國的大部分的大城市」。

在這本討論所謂「絕對的武器」（原子彈）的書中，一羣美國的作者們，恣意於不切實的談論，說：「如果我們（美國人）不能去首先打擊敵人，以便在威脅還沒有成爲事實以前就把威脅消除，就是說如果我們不能不做我們的憲法明確地禁止我們去做的事情，那麼我們就要注定滅亡在原子彈的襲擊之下！」

這一本書，在各種「科學的」評論的偽裝之下，說到「任何一個大國的片面行動」的危險，並且說如果將來有任何一方面的「片面的行動」，那麼，這一種行動，很可能是來自蘇聯。這一種說法，就引出挑撥性的結論，說「美國嚴重的危險，在於我們（美國）如果不提出適當的警告，蘇聯就可能在一個明朗的日子開始對我們戰爭。」

上面從這一本書上所摘錄的話，充分地說明了美國所進行的首先是針對蘇聯的新戰爭的宣傳，是具何等花樣百出的形式和手法。這種關於新戰爭的宣傳，連帶着要求製造殺人最厲害的武器，已進行到什麼程度，這從「化學與工程新聞」雜誌中所發表的報告中，可以看得出來，在那個雜誌的「科學與文明」的一欄中，關於細菌戰的一切殺人的利器，已經在公開的宣傳着了。

針對着這同一個目標的，還有「陸軍武庫」雜誌中登載的關於一種新毒素的文章，根據該雜誌的報導，研究這一種毒素所使用的經費，已經有五千萬美元，用作者自己的話說，這筆經費是用的「充分正當」的，因為一盎斯的這種毒素，就足夠殺死一億八千萬人。

當我們讀到這一切所謂科學的著作，我們感覺到新戰爭的煽動者和宣傳者們正在發展什麼一種惡魔似的活動，竟想造成一種空氣，用戰爭狂去迷惑住人民的腦筋。反動份子動們在全世界散佈的，特別在美國人的勢力範圍內所明白感覺到的，這一種宣傳，在社會人士中所造成的心理狀態，從英國記者巴雷特於今年八月初在倫敦「新聞紀事報」上發表的一篇專文中，可以看得出。

這一篇專文中，有着意味深長的幾行：「當一個人到達麥克阿瑟將軍所控制的地區，在往日本去的途中，不覺到了沖繩島的時候，立刻就要被美國報紙上提到蘇聯的論調所嚇倒，如果一個美國士兵讀到這些報紙以後而判斷幾個月之內就要發生對蘇的戰爭，自然是難怪的。如果日本人不注意這種近於歇斯里的亞的心理狀態，他們才是呆子哩。」

這一種報告，和「新聞週刊」上所發表的該刊外國新聞版的編輯克恩所發的一篇專文，是符合的。克恩是最近從日本回來的一個人，他說，在日本，美國將領們有計劃地去左右日本軍人們，使他們相信對蘇戰爭的迫切和必要。克恩報導說，來到美國飛機場的大批的日本神風自殺飛行員，都宣稱他們準備參加對蘇的新戰爭，這一種戰爭，他們聽說已經開始了。克恩指出，日本人總會歡迎對俄作戰的可能性，由美國保留的日本軍隊，大概能够在貝加爾湖以東「奪取俄國的亞洲部分」。

克恩又說：「美國在海上的霸權，就會使差不多任何地方的登陸，都是可能的了，而日本本土，既在優勢的美國航空隊與海軍的保護下也會感到安全無慮，「這些具有威脅性的戰略事實，說明了爲什麼

在對日和會中如沒有俄國參加，決不會引起麼什感覺。」

由此可見，在美國有系統地進行着戰爭的宣傳已經很長遠了，這種宣傳的主要方針如下：

一——無恥地運用反蘇的種種誹謗性的杜撰和挑撥的咆哮，以一切可能的方式宣傳，教人對蘇聯恐懼，硬說蘇聯是一個以奪取世界霸權爲目的並準備着向美國進攻的一個強國。

二——公開宣傳擴張軍備，宣傳進一步改進原子武器，而決不嘗試限制，更不嘗試禁止原子武器的運用。

三——公然呼籲要立刻進攻蘇聯，一方面伴隨着挑撥性企圖，用蘇聯的軍事實力來嚇人，另一方面又要使人確信，必須利用目前的局勢，照戰爭的煽動家們的意見，以爲目前蘇聯在軍事方面是脆弱，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還沒有完全恢復元氣。

四——以所有一切可能的手段，在美國社會中保持着由美國的軍國主義和擴張主義方面人士所惹起，所煽動的戰爭心理狀態。

美國的進步人士，都看出這一點，努力揭發美國目前正在進行的備戰情形，並且努力使那些爲戰爭狂所支配的人士清醒過來。

美國的這些進步人士，以及一部分進步的美國報紙，都在揭發受了軍事集團和種種反動組織的慫恿而在美國進行的備戰情形。

例如「美國進步公民」協會主席，金登，在「紐約時報」中論到這一點寫道：「在所有這一切宣傳的中心，站着在陸軍部和海軍部担任要職的抱着軍國主義思想的人士，衆院和參院的議員，特別留意傾聽戰爭的號召的獨佔企業的領袖人物，以及牧師方面的一些代表們。」

金登繼續說：軍人方面希望能够操縱某些事件，而利用爲投擲原子彈的一種口實。

美國「水星」雜誌，在其今年二月號中，發表專文，分析正在準備第三次世界大戰的美軍的計劃。該文說：「工業上的備戰情形，在目前構成了理解華盛頓一切政府計劃的鎖鑰，在華盛頓已考慮到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可能性。」

因爲像彼得生和羅雅爾這樣的軍事權威，以及美軍的其他領袖人物，都已下過這種結論，這篇專文就具有特別意義了。

上述種種，使人完全明白了：宣傳並挑撥新戰爭的主要煽動家們，就是美國的反動人士，他們祇是追求專顧自己的利益，並且準備爲了這些利益而人類陷於新的毀滅性的世界大戰。

美國的反動派，在這些努力方面並不是孤獨的。他們博得一些其他國家中的黨羽們的支持，那些黨羽們在忙着製造軍事——政治性的，或單純政治性的西歐集團，北歐集團或其他集團。關於這一層，應該提到英國政治人物的一些言論，誠然，他們說起話來並不像他們的美國對手們這麼堅決，而且在行動上，大致是鬼鬼祟祟的，然而却具有同樣危言驚人的精神。

大家都記得邱吉爾的富爾敦演說，在那篇演說中，提到了「戰略總概念」，這位英國首相就是這樣稱呼他的主要言論，他在那篇演說中，正如斯大林大元帥很正確地所說，他作了一種「危險的行動，蓄意要在盟國間散播不和的種子，並阻撓盟國的合作，」斯大林元帥強調指出：「邱吉爾先生的路線是戰爭的路線，是反蘇戰爭的一個號召。」

我們大家都記得，邱吉爾反對作爲說種種不同言論的各國人民的一種大聯合的聯合國機構，而贊成只是把說英語的人聯合起來，這是步希特勒的後塵，希特勒開始「挑起戰爭，就是憑藉宣佈種族論，揚

言只有說德語的人構成一種優越的民族。」（斯大林語）。

我們並且記得這篇演說中的其他許多點，邱吉爾在這篇演說中訴諸反蘇的暗諷誹謗。

老邱吉爾，博得小邱吉爾的共鳴，小邱吉爾於九月三日在雪梨發表的談話中，已打破戰爭販子的記錄。邱吉爾家族的言論，本來只是對少數人有興趣，但是這些言論是關於英國某些人士爲反對和平事業而進行黑暗勾當直接走向組織一種新戰爭，或者採取把惡名昭彰的邱吉爾向俄羅斯的進軍重演一回合式，或者採取任何別的形式，那都沒有關係。

關於這一方面，並且應該提到：英美聯合參謀部直到今天還在華盛頓繼續行使職務。衆所周知，在這聯合參謀部中，英國是由摩爾根將軍率領的軍事代表團參與，美國是由李海上將率領的軍事代表團參與。這種英美聯合參謀部，本來是爲調整對德日作戰時的軍事行動而設置的，究竟爲了什麼目的而依然繼續存在，這是沒有一個人知道的，雖然戰爭在兩年前就已經結束了。

很久以來，土耳其超過一切可以允許的限度，爲着煽動對於戰爭而行的肆無忌憚的誹謗和挑撥運動的許多事實，用不着再列舉了。土耳其的反動報紙，竭力想與美國的反動報紙比肩並進，關於這種情形，俄國有一句古諺，說：「有爪的龍蝦，跟着有蹄的馬兒。」

日日夜夜散佈可惡的對蘇聯的誹謗，硬說它計劃奪取土耳其（見「亞克沙姆報」）的土耳其報紙，信口雌黃作挑撥性的預言，大意說：「聯合國國家將試由黑海岸予俄國以決定性的打擊」（見「伊赫桑民主報」）。它鼓勵土耳其人民準備戰爭，同時爲美國的軍事威力大吹大擂，說：美國不可避免地要參加對蘇的戰爭。

有一位達佛爾，在聲名狼藉的「康胡里耶報」所發表的一篇專文中，大言不慚地說：戰爭是「使莫

斯科走上正路的唯一方法」。響應他的是「烏魯斯報」，該報的主筆，下院議員阿泰伊，在該報上宣稱：「這正是美國和英國採取決定性措置的時候。」

因爲進行挑撥活動而聲名狼藉的「泰甯報」編輯雅爾辛也隨聲附和，去年九月間他寫道：「請俄國人來當面坦白地談一談，原子彈是否應該停止使用的時候已經到了。」他要求向俄國人下最後通牒，並且說：「他們如果不同意建立新的國際秩序，原子彈就要像驟雨一樣地落在他們的頭上。」也就是這個雅爾辛，最近寫道：最後通牒語言，乃是惟一可以用來對莫斯科說話的語言。他並且要求「團結全世界反對俄國」。

其他的唯利是圖之流，也發出類似的挑撥性的呼籲，例如土耳其反動的「埃爾干納康報」的亞得維茲，下院議員兼議會外交委員會委員埃里姆教授等人都是。

這種挑撥性的叫囂，得到希臘反動報紙，尤其是「埃里尼康·伊瑪報」，有力的支持，日前。它發表一篇專文說：「讓俄國人不要忘記，俄國在巴庫的主要石油源泉，距土耳其邊境僅僅不過一百公里。」

無疑的，這種煽動新戰爭的宣傳運動，受到千百萬人民嚴厲而堅決的譴責。

蘇聯的建議

蘇聯政府認爲這樣的局勢，對於肩負最近第二次世界大戰全部負擔的各國人民的良心，是不能忍受的，他們爲這一次強迫愛好和平各國人民所接受的戰爭，付出了他們的鮮血，苦難和毀壞。蘇聯代表團，代表蘇聯政府宣稱：蘇聯認爲，聯合國機構的當務之急，乃是採取措施，制止某些國家，首先是美國

，目前正在進行的新戰爭的宣傳。爲着這個目的，蘇聯代表團提議，大會應通過下列的決議。

「一、聯合國機構譴責某些國家，尤其是美國、土耳其、希臘的反動人士所進行的犯罪的新戰爭的宣傳，他們通過報紙、無線電、電影、公開演說，散佈各種謠言，公開號召進攻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

「二、聯合國機構認爲：允許甚至支持這種關於不可避免地將成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新戰爭的宣傳，乃是違背聯合國會員國所負的義務，聯合國的憲章要求：『在尊重各族人民平等權利和自決原則的基礎之上發展各國間的友好邦交，并採取其它適當措置，以加強普遍的和平，』俾使『國際安全，和平與正義不受威脅。』

「三、聯合國機構認爲：必須敦促各國政府，禁止任何形式的戰爭宣傳，違者予以刑事處分；并採取步驟，防止並壓制戰爭宣傳，因爲這是危害社會并威脅各愛好和平國家人民之重大利益和幸福的活動。

「四、聯合國機構，重申有從速實現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大會關於裁減軍備的決議，以及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大會關於原子武器以及其他一切供作大規模屠殺的基本武器不得列入國防武器之決議的必要；并且認爲，這些決議的實現，符合一切愛好和平人民的利益，并且是對於新戰爭之宣傳及挑撥者最有力的打擊。」

斯大林元帥在給莫斯科的賀電中說：莫斯科是爲持久的和平與各國人民友誼而鬥爭的先驅，是對新戰爭挑撥者們鬥爭的先驅。蘇聯各族人民領袖的這句話，在全世界所有普通、誠實、進步的人民心中獲得深切的反響。蘇聯將不遺餘力地來順利完成這個偉大的任務。

在紐約記者招待會上的聲明

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

記者招待會是在成功湖聯合國總部的大廳——在安全理事會的廳中舉行的。來到這裏的，有五百個派在聯合國大會服務的美國及外國刊物的代表。其中有評論家，外交通訊員，記者。除此之外，出席了許多代表、顧問、專家、代表團的同仁。這裏總共有七百人左右。

記者招待會開會時，維辛斯基朗朗的、優秀的、論證的聲明，受到出席者極端注意的傾聽。聽眾活躍地反應在這個聲明中所臚舉的戰爭罪惡宣傳之實例。維辛斯基所提出用立法手段來切斷戰爭煽動者罪惡宣傳之論證，產生特別的印象。蘇聯代表對許多戰爭煽動者，特別是提到無線電吹牛者溫切爾，屢次引起讚許的笑聲。

維辛斯基的聲明

聯合國大會蘇聯代表團決定請你們各位先生到今天的記者招待會，因為我們提出與戰爭煽動者作鬥爭的問題而具有特別的意義。九月十八日我們在聯合國大會上對這一點所作的聲明，喚起了許多的反響，同時與這聲明相關聯，曾經有過許多發言，並對我提出若干問題和質詢，這不能不加以解釋與回答。應當說，對我在九月十八日的演說詞所提出的若干意見和聲明，正顯示九月十八日我的聲明中所說到的那些最反動階層的代表者們躲開蘇聯代表團所提出的關於新戰爭宣傳以及與新戰爭的此種宣傳和煽動者作鬥爭之必要方法問題的明顯意圖。這些階層的代表者們，在蘇聯代表團所作的提議之面前，暴露出顯

然的忸怩不安，而且無法反駁在我的聲明中所列舉的事實，只好用通常的詞句來搪塞，並一再重覆反蘇聯，反蘇維埃政府的各種挑撥和誣蔑的攻擊罷了。

不言而喻的，對一切這些攻擊和無根據的諷刺以及頑固的反動份子的虛構捏造，我不想加以回答，對這個問題，我不想和他們討論。和這些先生們討論是不可能的，首先是因為這樣的討論完全沒有好處。抑尤有進者，蘇聯代表團在聯合國大會上關於與戰爭煽動者作鬥爭的問題，已提得够明白，準確和肯定。

今天的記者招待會之目的是另一種。這裏我打算解釋的，是與我在九月十八日的聲明有關的，需要解釋的某些問題。我看到有回答若干發言之必要，不管這些發言是如何地懷有敵意，應該對那些沒有失去冷靜，客觀，誠懇，深思地觀察事物能力的人，使他們看到事物的真相。

首先我想闡述美國各方人士對我們發言之反應，這可以根據活躍於政治舞台，報界以及國際事務方面的這些階層之代表的言論加以判斷。

(1) 第一個問題。被我列名在戰爭煽動者名筆中的某些人之反應如何呢？應當說，他們中間有些人單純地試圖否認他們教唆反對愛好和平國家，首先是反對蘇聯的新戰爭之言論。例如杜爾斯(Dulles)先生就是這樣做，他聲明他沒有說過所指出的話。可是此種無根據的聲明，也與事實不相符。我們訴諸於事實吧。我曾經指出，杜爾斯在其發言中號召對蘇聯採取強硬的外交政策，以及由這一方針要產生出的一切後果。這樣說吧，我從杜爾斯先生的這些聲明出發，如我於九月十八日在自己的發言中所已指出的，其中若干地方是引自杜爾斯於一九四七年二月十日對「內地日報協會」而作的聲明，而且是對蘇聯外交政策偏頗地批判。在杜爾斯先生的這個冗長聲明的若干地方，從中讀到如下的話：「我設想蘇聯的

動態將停留在可以忍受的限度之內，而這是因為她碰到強有力的，而不是碰到荏苒無力的……。」和平不在妥協中，而是在我們歷史政策的強化中而奠定……。」「我們應當支持強有力的軍事機構，以至利用它的意志，如果這是必要的話……。」「從羅馬帝國崩潰起，沒有一個民族如像今天的美國一樣，擁有的物資實力的這麼巨大的優勢……。」「只有利用我們的實力及威望，於達到此種的目標上，我們才能在這個世界上享受安全。」

不言而喻的，我們從杜爾斯演說中所舉出的上列片斷，無須作任何的補充解釋。

我再舉出杜爾斯的一番言論（引自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生活」雜誌）：

「在一九四六年初，伊朗，土耳其及希臘受到了威脅。但結果並不是蘇聯的成功，蘇聯的領導者們發現他們不能同時在兩個敵身中射擊。民族主義的侵略結束了理想的宣傳。此種損失沒有得到任何好處的補償，因為蘇聯的侵略性，在美國和大不列顛，引起更強烈的反抗，比蘇聯的領導者們所想像的，在這些國家中，輿論迅速地成爲更加強硬的，它支持重建軍事機構的步驟，而不許躊躇。美國在地中海示威海軍和空軍的實力。這表明如果蘇聯繼續地起初所走的路線，這甚至於可能引起大戰。」

附帶說，如果分析這些並非單一的聲明，而乃是杜爾斯逐年所宣傳的觀點之特定體系，那末就不難做出這樣的結論，如我對杜爾斯說蘇聯外政策足以增加戰爭危險性的那種外交政策之教唆所做出來的結論。這裏單純地否認拋棄自己所說的話是無濟於事的。對這些話，這些號召應當有回答的勇氣。

（2）另外一些我所提名的先生們，例如安爾（Feltz）又重覆他自己挑釁性的聲明。這也如他上一次無恥的聲明一樣，沒有遇到抗拒。新戰爭的煽動者，沒有被釘在斷頭台上，大概安爾及其類似的人今後還將重覆他自己挑撥的攻擊，力圖用各種方法——諷刺，誣蔑，惡意中傷，反對蘇聯人民——儘可

能更多地危害和平事業，各國之間合作的事業，燃起新戰爭的火焰。

我記起安爾對我的發言是如何反應，他在西林（賓夕爾凡尼亞州，費拉地菲亞）自己的家裏說：「我很興奮，而且高度的榮幸被維辛斯基先生稱爲戰爭的煽動者，如果他所了解的戰爭煽動者如像我號召利用原子彈轟炸俄羅斯那樣，那麼維辛斯基先生是絕對正確的。」

自然，自這些話的本身，就是使每一個人完全明白這位人物意識中的精神面貌。可是，顯出安爾新言論的特質，而是他公開的譏諷，不是在這位老頑固公然地以他的諷刺自詡，顯然地指望美國社會特定階層的支持。這再度證明蘇聯所提出的關於與新戰爭的一切煽動者作奮勇和忠實鬥爭之必要問題的合乎時宜與正確。這些人物的第二類，就是如此。現在我來說第三類。

(3) 如像卡德勒，漢姆，哈烏康采副經理某某碰壁之後，一笑置之，自然，一個人順着這樣的笑話，首先是與他的存心和他個人的其他品性以及胃口相符的，如所週知，這是無須爭論的。

(4) 也可以找到這樣的人，他們直接了當地用謾罵和粗暴來回答，顯然的，這是那種類型的人物之作風和本性，參議員麥克馬洪 (MacMahon) 就是這樣作法，他請人注意的認識他的演講詞，好像這可以反駁我關於把麥克馬洪作爲戰爭煽動者的斷定。我附和此種邀請。但讓麥克馬洪不要躲避回答，讓他說他的對美國的挑撥性的四個可能——囤積大量原子彈，立即開戰，成立國際管制機構，沒有蘇聯參加，宣佈不願意服務這個可以稱爲「國際」機構的每一國家爲侵略者——究竟是怎麼一回事？美國的代表奧斯汀 (Austin) 就是這樣作法，他宣稱我的九月十八日的發言，對美國的動機是完全虛構的，而且是誣蔑許多個人和團體，如果我的敵手努力提出任何是以對抗我所引徵的事實來代替粗笨的叫喊，那麼對和平與國際合作將有更公正些，更好些和更友誼些。

可是奧斯汀不舉出任何事實，他說爲着這個目的，美國代表團的其他代表也準備用這種方法。那麼就等着瞧吧，奧斯汀宣稱他「並不相信維辛斯基有煽動美國榮譽的意願」。這自然是對的，在我的發言中，並沒有半句話是有根據對這一點發生任何懷疑。但戰爭的煽動者侵犯美國人民的尊嚴，我們不僅不能把美國的人民與他們混爲一談，而且我們對這一點，堅信美國人民會把他們當作反對美國人民利益，反對一切愛好和平的各民族之利益，及對全體進步人類之利益的重大罪犯而加以醜詆與譴責。奧斯汀的指摘更加不對，他說我在自己的演說辭中，對這一點說了如下的話：「可以確信地說，美國的人民也和其他的民主國家人民一樣，反對新的戰爭，當他們身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創傷還沒有康復的時候」。

今天是九月二十六日，從我在聯合國大會發言的時候起，已過了八天。有什麼對抗我們關於與戰爭的煽動者作鬥爭的提議，有誰否認此種鬥爭的必要，並企圖轉爲進攻，歸罪蘇聯？什麼也沒有，什麼來對抗我們的事實？什麼也沒有，我說沒有什麼，是因爲謾罵，造謠與誣蔑不是證明，因爲不管任何誣蔑，如英國的諺語所說，事實是最倔强的東西，它們依然是事實。

(5) 不能忽略英國代表麥克奈爾 (Menciel) 先生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發言，他企圖賦予他自己九月廿二日的演講詞以尖刻和冷嘲熱諷的性質，言辭之間徒勞地散佈警句混合着對蘇聯的粗暴和造謠中傷，我不知道在這種演說辭中什麼產生了最奇異的印象：麥克奈爾是否擁護邱吉爾，根據麥克奈爾的話，當大轟炸時，邱吉爾泰然地漫步於倫敦街頭，或者歸咎埃及，說它對「有教養的」英國水手所給予埃及人民的恩典不加感謝，或者應當承認麥克奈爾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對國家主權的推論，是最妙的，他以專家的姿態對這一問題，突然加以推論，如像他通常在英國國會中慣於回答反對派預先準備好的問題一樣。

麥克奈爾對他自己的演說，至少化了十五分鐘，藉以證明被馬歇爾計劃所誘惑的在巴黎集會的各國，是完全自願的且保有自己的主權的全部力量，準備把軛木套在自己的頸上，如所周知，這對獨立的國家是很壞的裝飾。麥克奈爾還缺少從工黨兵工廠製造出來的武器以證實他駁斥各民族國家主權觀念的理論。在論戰方酣之時，他甚至於決定採取這樣勇敢的步驟，摘引莫斯科的「布爾什維克」雜誌及莫斯科的「真理報」，聲稱他自己對此種「絕對主權的陳舊理論」並不贊同，依照麥克奈爾的公開承認，此種理論祇有妨礙合作。麥克奈爾聲明，現在不應當重視如像「絕對的」國家主權這種討厭的歷史殘餘，應當儘快把這種觀念交到古物陳列所去。

這是值得稱贊的坦白。所遺憾的，只是他說得太匆促了，並伴來了這種混淆不清，使麥克奈爾所作的率直承認之真意在其坦白性中失掉了許多。

但這是附帶說說的。要點不在這裏。蘇聯代表團感到興趣的，主要是關於與新戰爭的煽動者，與新戰爭的宣傳作鬥爭的問題。可惜正在這裏麥克奈爾不期然地失去了他自己的一切雄辯之才，幾乎喪失了說話的天稟。

如所周知，我在九月十八日自己的發言中會特地說到邱吉爾。現在麥克奈爾回答說，提出反對我們的罪名——他說——不是反對邱吉爾，而是反對「我們」，——是虛構的，罪名是說我們（不是邱吉爾，麥克奈爾說，而是「我們」），似乎是戰爭的煽動者。這樣，麥克奈爾與邱吉爾沆瀣一氣了，這正是要說到的。麥克奈爾立即聲明，認為大不列顛業已解除武裝是可能的。他曾經這樣說過：「我們實行裁軍了」，可是接下去添上兩行，他「十分鄭重地表示，對集體安全沒有真實的基礎，要系統地裁軍是不可能的。」剩下的，自然，是一個謎，大不列顛裁軍怎樣能够成功，當發現對裁軍沒有任何真實的可能性的時

候：

麥克奈爾堅決地不同意把戰爭的煽動者鎖上鐵鍊，因為每一公民都可自由地表現其思想，因為「應當忍耐地對待自由國家的公民之觀點之自由的表現」。

我們已經不是第一次聽到關於犯罪的自由，關於發作獸性本能的自由，關於教唆大批屠殺，破壞，掠奪，毀滅人類的自由之歌曲。不明白的只有一點，爲什麼對猥褻，對婦女及兒童的販賣以及犯類似的罪行者都要坐牢，而對戰爭的煽動者，對大批屠殺人類的挑撥者和教唆者，他們是反對人類自由，進步及幸福的重犯中最重的犯罪者不可同樣地坐牢。

在美國人寫給我的信中提出一個問題：關於對戰爭的宣傳教唆以刑事程序禁止和懲罰的提議，與新聞自由如何並立？我來回答這個問題。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美國頒佈販賣白奴的禁令，在破壞此種法律的場合，罰鍰五千元或褫奪自由五年。一九一七年二月五日有一種法律也預定對各種不道德的暴力之不同處罰。在法國，大不列顛也有類似的法律。也有一種基本的原則，宣傳法律所禁止的，這就意味著教唆犯罪。這與犯罪同科。因此，新聞自由在這裏是說不上的。所以我們的提議要在刑事處分之下來禁止戰爭的宣傳及教唆，與新聞自由完全相容，也如禁止婦女及兒童販賣，奴隸販賣，傳播猥褻以及類似的不道德行爲之法律與新聞自由之相容一樣。援引新聞自由，援引，如麥克奈爾所稱「在自由國家中每一公民自由地表示其意見」，對此種意見是不能容忍的，因為它等於號召新戰爭，煽動新戰爭，教唆人類的大批新屠殺。

不，誰在戰爭的放肆的煽動者之前輾心腸，誰就應當對千百萬平民負起大責任，誰就讓這部可怕的殺人機器向平民的活生生的肉體輾去。法律在這裏不能夠，也不應當沉默；人類的良知在這裏不能夠，

也不應當讓步。

我在自己的發言中指出我所引證的事實，只是若干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反動階層所掀起的火海之小部分，他從四方八面要燃起新戰爭的火種。

我在自己的發言中只道出這些事實中的幾種。現時有人問我，爲什麼我只道出真的由我說過的這些事實，而不是別的。我每天收到不少信件，除了惡意和故意的之外，也有許多忠告，要我再指出並揭露其他戰爭煽動者，縱使沒有我的協助，他們在這裏已經得到不好的聲譽，但從自己方面來說，我們或許還應當給進一步揭露戰爭煽動者的事業以幫助，在我所提的名單中還加上幾個名字。

在此種場合，我，自然，應當布利特（Bullitt），我教唆反蘇的戰爭已經不是第一年，以蘇聯的威力及其真正雄偉的經濟來嚇人，成爲了他的專長。我也應當提到弗蘭克，海納特（Frank Hannet），他剛從遠方旅行歸來，在全國公衆關係會議的聚餐會上，誹謗地聲稱「目前俄羅斯是國際和平最大的威脅」。九月十九日「紐約時報」把這種胡說加以喧嘩的標題：「蘇聯是主要的危險——從旅行歸來的海納特說」。

刊載在華爾街「巴隆周刊」（Barron's Weekly）的「實業界人物」專欄上的一篇論文，或有特殊的趣味。在這篇文章中可以讀到如下的警句：「如果這種退出是成立的話，——專欄寫道，就是指蘇聯退出聯合國，——那末西方各國之間無論軍備或經濟合作都將以加強之速度發展起來。地球將公然地分裂爲兩個世界，而我們的世界將十分明顯地看到經常增加自己力量之必要。把這譯爲商業的用語，在此種場合我們將有軍火的景氣時期，在其進程中軍火的生產不以我們國家的要求爲限，而且預定在有利的條件之下，提供軍火給西歐和太平洋各國。可以假定，如果俄羅斯將退出聯合國，是在這種條件下，這樣

退出可以視爲反對和平的行動，政府將不會過分惋惜。政府未必願意造成一種印象，使人以爲是它故意挑撥此種撤退，因爲在後面這種場合，國內外輿論中將發生不良的反應。根據各種資料，美國公衆對聯合國極表關心。爲要迫使大衆接受聯合國組織將完全垮台的觀念，我們作爲一個民族，應當在精神上較好的準備……雖然政府可能明白這一事實，但他還不敢用語言公然表示出來。」

我於九月十八日在自己的聲明中曾經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帶給美國資本主義獨佔以巨大的利潤。我說在大戰的五年內，這些利潤的總數達五百二十億美元。這搔到某些人癢處。「每日新聞」發表社評，與其說是邏輯和健全思想，無甯是對我的謾罵。其他罵人者也不少，他們以爲謾罵無論如何對他們的論證之辯護有所幫助。在這一方面，雖然我對這個人完全缺乏任何的尊敬，也沒有任何權利不提他的姓名。事情是涉及無線電評論家溫契爾（Walter Winchell）（哄堂大笑）。這位新出現美國 Münchenhausen 伯爵，如所周知，以說謊著名，說了很多無稽之談，似乎是爲着掩飾他自己諛諂的真正動機。按照這位賢者的邏輯，當陸軍業已復員，海軍泊在港口，空軍停在地上，偃想統治的人，將不能統治任何人。這是令人驚奇不置的論證。溫切爾對此種論證並不感到奇怪。好像這樣一來，當戰爭開始時，就不能動員軍隊，駛出戰艦，而空軍也無法起飛。

但在欠缺邏輯的地方，那裏就不得不求助於無恥的說謊。無論如何要推翻各種獨佔在戰時獲利這一事實，成爲這完全造謠的基礎。溫切爾試圖履行這種定貨，如果沒有事實，他怎末辦呢？（大笑）。那個時候只有一個辦法——試造謠言。但利潤真的究竟是什末一回事？或者我真的記錯了，當我說美國的獨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五年內賺了五百二十億美元的純利放到自己的荷包裏？不，我沒有錯。我有「每月統計月報」在手，我在那裏讀到：

(a) 在大戰年份內，美國各銀行存款的總數提高到六百一十億美元。(根據聯合國統計部出版的「每月統計公報」，一九四七年五月份)。

(b) 根據美國商務部機關刊現代商業調查一九四六年四月份的一期上，美國私人企業的利潤，除了各種捐稅和國外投資的紅利之外，逐年表現在如下的數字中：

一九三四年	八六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三五年	二,一三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三六年	四,一六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三七年	四,五六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三八年	一,九五六,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三九年	四,七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四〇年	六,一一二,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四一年	九,〇六七,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四二年	九,〇九八,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四三年	九,八七五,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四四年	九,六八一,〇〇〇,〇〇〇元
一九四五年	九,〇二〇,〇〇〇,〇〇〇元

(c) 在戰爭年份內，從一九四〇年至一九四五年年，包括利潤在內，總數計達五二,八五〇,三〇〇,〇〇〇元。

(d) 當時的戰爭動員及復員局局長史蒂爾曼(Stilman)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他自己向總統及國會的(第八次)報告中，關於利潤聲稱如下：「私人企業的利潤，在納稅之後，處於歷史上最高的水準，雖然復員過程的結果，若干工業部份的利潤處於低下的水準，而這是與大批製成品之拋出相關聯的。」

溫切爾在他自己的無線電評論中，引證了許多無聊的空話之後，以下面一個問題——「閣下，你對這個問題怎麼說法？」來結束他的無線電評論。

無庸爭辯，溫切爾不得不動氣了，正是因為我觸到了他主人的利潤問題，現在我舉些事實來答覆他，同時我也願意提出一個問題：「無線電說謊家溫契爾先生，你對這個問題怎麼說法呢？」(大笑)。

我將用哈姆萊特的話來對這位先生說——這就是問題。

有人問我：如何才能打破目前的局面？

問題與答覆

蘇聯代表團提出自己的四個建議已經答覆了這個問題。

維辛斯基說完了他自己的聲明之後，就轉到回答記者招待會上多數參加者對他所提出的書面及口頭的各問題。蘇聯代表卓著的絕頂聰敏的答案，在大廳中屢次博得笑聲和讚許。

美國合衆社通訊員羅伯特·曼雷克問道：——與戰爭顧慮的增加相關聯，對於改善蘇美關係，你認為那些步驟是重要的？

——應當坦白的說——維辛斯基回答說：——蘇聯通過它自己的代表團，在聯合國大會的第二次全

體會議上提出的四點建議，——這些建議是尖對新戰爭的挑撥者和煽動者的宣傳，——是改進蘇美關係的途徑之一。破壞聯合國憲章的企圖，阻礙蘇美的合作。相反地，放棄此種企圖，對此種合作將有改善的可能，創立某種「和平與安全臨時委員會」，某種「小型聯大」，按本質來說，想用這些機穽的職能，來代替安全理事會的職能等企圖，是朝向關閉合作的道路。放棄這些企圖，將使蘇美合作成爲可能的與穩固的。當人們聲稱：應當破壞摧毀國際合作的基礎，如故總統羅斯福在當時所提議的五大強國一致的原則，那麼這自然沒有證明國際合作的意向。

維辛斯基繼續說，一般的是允許向談論合作的人提出一個問題：閣下，你們對這是這樣了解的？你們是否想把騎馬者與馬之間的關係叫做合作呢？類似的合作我們是否定的。我們不願意描寫騎士騎在它背上的馬匹。或許若干國家對此種「合作」表示愿意，或者它滿意是受所謂馬歇爾計劃所誘惑，或許它們滿意是因爲在它們的背上騎着乘馬者。這是它們的事情，我們了解的合作，完全是另一回事。我們反對基於指揮，命令的原則，而不是基於對各民族主權的屈解式合作。

通訊員麥蒂斯（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白魯斯（芝加哥日報），戈爾斯登（聖路易郵報），列日爾（「哥倫比亞」無線電公司），懷特（紐約新聞），魯博爾（泰晤士報），集體提出許多的問題，他們問：蘇聯是否參加「和平與安全臨時委員會」的會議，如果此種委員會是將召集的話。

——我拒絕回答，將要發生的，什麼時候將發生什麼之類的问题，——維辛斯基回答說。——我認爲最好是說別的，蘇聯代表團認爲此種委員會不應當有。蘇聯代表團將竭力使此種委員會沒有。

同時這些報紙的六位記者問道：蘇聯將追求何種路線？如果關於管制原子能，以及普遍裁軍談判的結果失敗的話。

——維辛斯基指出，提出這個問題的六位通信員，似乎已被悲觀主義所感染，——我不想拆散它們的夥伴。

這六位通訊員所提出的其他問題中，曾經有過這樣的問題：你在聯合國大會上責備若干機關和個人有戰爭情緒的煽動，你是否認為這是美國全體人民對蘇聯的態度？

——我應當再說一篇，六位通訊員陷入悲觀主義的泥沼，如果他們能够想到我和我們蘇聯代表團答能把戰爭的煽動者與美國人民混爲一談呢。可敬的六位新聞記者們，在你們的編輯中，放下你們的悲觀思想吧！

——在聯合國大會上調整朝鮮問題的前途怎樣？有人問維辛斯基。

我認爲，——維辛斯基回答說，——調整這個問題，必須採取一個小的措施：把這個問題從聯合國大會議程中剔出去，這將是聯合國大會上對這一方面所應當做的許多事情當中最理智和最合法的。如我在理事會上所已說過，應當由三個強國——蘇聯，美國和大不列顛自己負責準確地履行義務的方法而加以調整的問題。交給聯合國大會審察，是沒有任何根據的，美國應當誠意的履行三強關於朝鮮的協定。這樣還要補充一點，在大會上這個問題的想法，是有背於聯合國的憲章。

在今天美國的各日報上，——維辛斯基繼續說，——公布從漢城傳出的消息，說斯的考夫將軍代表蘇聯政府建議於一九四八年初美蘇軍隊同時退出朝鮮，並把組織朝鮮政府問題，交給朝鮮人民自己去決定，我想這是完全正確的建議，應當把軍隊從朝鮮撤出，——讓朝鮮人民自己解決關於自己國家命運，關於他自己命運的問題。

從記者羣中發出聲音：

——你是否責備美國政府進行戰爭的宣傳，或者責備個人？

維辛斯基回答說：

——我們說許多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反動集體，個別人物，個別機關，個別刊物，資本主義的獨佔以及美國政府個別的代表者宣傳戰爭。

——你是否把美國政府與以杜爾斯爲代表的加以區別？——繼續提出問題。

——我想杜爾斯大半鼓舞美國的外交政策，——這是維辛斯基的回答。

提出問題者沒有鎮靜下去。——這是否意傳着你歸咎美國政府？——他重新問道。

——我說得十分明白，——維辛斯基反駁道，——甚至在法庭上也沒有要求更準確的說法。……：……：
記者招待會繼續了兩個半鐘頭，弄到很晚才由維辛斯基加以結束，雖然還有許多人要求把記者招待會繼續下去。

關於希臘問題

一九四七年十月六日在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說辭

一、英美的非難者歪曲事實

蘇聯代表團從最初起，就反對美國代表團把希臘從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方面受到所謂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之威脅問題，提到聯合國大會上來檢討。一開始我們就明白美國和希臘代表團提出這個問題實際上所追求的目的，與它們建議中正式表示出來的任務，毫無共同之點。這從美國代表團的發言，以及由它提到起草委員會的美國建議之性質與內容，獲得完全的證實。

注意的研究各種資料，十分明顯的證明，反對希臘北部聯盟的覬覦和控訴，是完全破產，而且沒有根據的。在這許多國家，特別是在美國，希臘以及英國檢討這個所謂希臘問題的全程中，逐日製造敵對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的輿論。遠在調查希臘邊境事件委員會成立之前，美國以及支持它的國家的代表們，就用業已擬好的罪名而出場，他們的發言，講話和行動中，好像一切都已明白，而按本質說來，只要把那些在實際上還需加以研究和剖明的資料記錄到委員會的文件中去。他們全體——美國，大不列顛及希臘的代表們——當作這個事件的主人，在委員會中發言，好像對這個問題的決議，早已放在他們的荷包裏。他們，例如麥克奈爾先生，甚至於沒有看到檢討事實上之必要，如麥克奈爾所表示「被包圍在季節的濃霧中」。麥克奈爾假定若干說明，在第一次檢討這些問題時，是不利的；陳說的人們中，有若干是合作主義者；目擊者中，有許多人的證言在某種程度上是強迫的。如果三種證人是如

此，而不值得任何的信任，而第四種證人似乎是值得信任的，但麥克奈爾認爲最好一聲不響，那末留下給其他證人的份額，又有什麼呢？支持同樣觀點的其他人，也噤若寒蟬，但關於他們，我們却不能默不作聲，而我則力圖具體的儘可能準確的盡我力之所及明白的說到他們。

可是，英國的代表企圖證明事情完全不在於委員會所收到的這些資料之貧乏，事情完全不在於事實與證明，事情是在於麥克奈爾在這裏加以讚揚的委員會的本身，主要是因爲在這個委員會中，有他也很加稱贊的朋友。根據麥克奈爾的邏輯，這個很好的委員會似乎能够替代任何甚至於不好的證明。

美國的代表約翰生先生發表他自己的演說，要證明美國代表團在安全理事會中的行動是公正的，可是與他自己的夥伴不同，約翰生先生闡述若干邊境的事件，似乎證實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確曾給了希臘游擊隊以幫助。但約翰生先生解釋這些事件，過於隨便，患了許多錯誤和屈解。調查安基斯特隆，利帕事件帶有片面的性質，而輔助團祇傾聽希臘證人的意件，約翰生先生對這些緘口不言。他沒有說希臘的游擊隊業被解除武裝並受羈押，如保加利亞的伊夫柯甫上尉所證明，對他的陳說誰也沒有加辯駁，約翰生先生本人也在內。

至於說到希臘斷定這些游擊隊又回到希臘去，那麼關於這一點，有四位希臘的證人——阿爾凡契吉斯，楊柯斯，福梯阿吉斯以及拉哈曼尼吉斯——的證言提供輔助團。應當指出沒有這個證言的原文，而祇引徵這些證言的概要。從這些概要中應當明白上舉證人被禁閉在保加利亞的希臘逃兵集中營中，當他們被解除了武裝和羈押之後，同時也沒有指出轉到希臘去有保加利亞的任何當局參加。

關於武器的證言，是不能令人信服的。沒有任何材料斷定他們是在保加利亞的領土上獲得武器。甚至於輔助團本身也被迫記錄這些證人的供詞之分歧與不準確，例如證人阿爾凡契吉斯聲稱：他「不能說

在希臘或保加利亞領土上曾有此事」。證人楊柯斯聲稱，他不知道在希臘或保加利亞分配武器，證人拉哈曼尼吉斯說，他們在保加利亞得到武器，而證人福梯柯吉斯發表自己的證言說，武器是從保加利亞得到的，因為「武器是新的」。此類矛盾使這一切見證毫無價值。

另一方面，從保加利亞伊夫柯甫上尉的證言中應當明白，在安基斯脫隆，利帕的事件，是由希臘人挑撥出來的。他們對游擊隊施行了討伐的行徑，他們就轉移到保加利亞的領土上去。例如他聲稱：「我們看到希臘兵士在保加利亞領土上的活動，但我們沒有開鎗，因為我們無權這樣做。」

企圖推翻伊夫柯甫的這種聲明，希臘軍官西利奧普羅斯聲稱：他於四月十八日似乎遇到保加利亞的斥侯，硬說情形是相反。但是希臘軍官此種聲明，顯然地與伊夫柯甫的聲明相矛盾，而被上舉的輔助團所採納。

因此，我們有矛盾的解釋，而且沒有任何資料可以調和或者甚至於簡單地解釋此種矛盾。

約翰生說到庫卡——帕拉伊翁——突烈特涅斯。但他對最主要的——根據許多證人的證言，南斯拉夫當局解除了從希臘跑到南斯拉夫之游擊隊的武裝，且不是把他們送到希臘，而且把他們送到南斯拉夫的內地，送到逃兵的集中營去，默不作聲。

請你們注意地觀察希臘證人米海依尼吉斯的證言，你們就可以看到游擊隊在夜裏越營，而且命令他們不要說話，這使南斯拉夫的邊境哨兵不會聽到他們的沒有其他的資料，而需要的是空想非常的奔放，藉以得到這樣的結論，藉以得到伊瓦特，約翰生，麥克奈爾，柴達里斯及斯派阿克各位先生所已得到的結論。

因此，游擊隊是瞞着南斯拉夫當局而祕密地越境逃到希臘去的。難道這不充分的證明南斯拉夫當局

沒有給予游擊隊任何的幫助。指出這種「事蹟」，對約翰生先生是不利的，而他也沒有指出它們。

附帶的說，輔助團對這個事件不是「就地」而是在離南斯拉夫十公里的地方進行調查，因為這整個區域是被游擊隊所佔領。輔助團着手這事件的調查，是在希臘當局業已在這地方進行它自己反對游擊隊的討伐，因此就對所謂調查準備了相當的環境，這難道不是事實嗎？

在此種先行的警戒性的警察憲兵措施之後，「就地」進行此種調查的意義何在，這是沒有任何懷疑。

這裏也恰當地說到斯派阿克先生的意見，他對輔助團的工作表示滿意。上面所指出的，站在希臘政府方面干涉鬥爭，而事實上幫助了希臘討伐隊，輔助團的行動，難道不是證明忘記了無私與客觀機關之責任的集團之笨拙的曲解嗎？蘇聯代表團對於這個問題，是加以肯定的回答。是的，輔助團破壞了他自己聯合國組織客觀機構的責任。

美國的代表指出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十日至十二日阿爾巴尼亞邊境康尼赤區事件時，好像有八九營游擊隊人數一千左右，從阿爾巴尼亞跑到希臘，但約翰生明白，對於這個問題有三個矛盾的證言，同時這些彼此矛盾的證人似乎看到游擊隊的越境是在離邊境五——十公里的地方。相信此種證人祇有失望。並不多餘的指出一點，與希臘政府關於「國際義勇隊」神話式的侵入希臘的聲明相關聯，輔助團選擇一事已作例外的調查。如所週知，這正是胆小如鼠。但到過當地的十位證人一點也不能指出「國際義勇隊」之「侵入」。他們的全部證言，歸結到如下的聲明：游擊隊中有若干人能說斯拉夫語和阿爾巴尼亞語。

輔助團直接了當地記錄了矛盾，而自己不用工夫去確定那裏是真，那裏是虛偽。約翰生及委派阿克先生得到的結論，完全是自我犧牲的擁護他自己美國的集團，這個結論簡單得很：輔助團及委員會所

認可的結論，是安全委員會大多數在道之前所已搜到之結論。因此，如果對這加以正確的評價，可以說是把馬藏在馬車後頭。不是安全理事會根據委員會所搜集的事實作出結論，而是委員會在搜集任何資料之前，認可安全理事會大多數所作出的結論。這種承認妙極了。

這對約翰生，麥克奈爾，柴達里斯，斯派阿克諸先生也不高明，因為這整個事情是十分明顯的，委員會所搜集的文件供聯合國大會的調查已足夠而有餘——而且已經沒有什麼客氣了——在這個決議核准之前，安全理事會大多數已認為它是無可爭辯的。

現在對我們提出更簡單的樂方，出席者當中無論誰對這全部材料的採取，不管有益與否，如果表示懷疑，那麼比方如伊瓦特先生就向你們提議，閉起眼睛批准這個報告吧。事實上，委員會的大多數，是核准小組的材料，安全理事會的大多數，核准委員會的材料，現在輪到你們盲目的核准安全理事會的決定，而聯合國大會留下來做一樁事，就是批准委員會所批准的。絕妙的方法雖然並不太理智，它排除了對事實加以思索，對材料加以研究和分析，客觀地，獨立地用自己的努力得到某一邏輯結論之必要。這裏不需要邏輯，這裏只需要大多數，它能够根據伊瓦特先生的樂方面付表決。

一切這些控告者都避免牽涉事實，顯然地，他們國內被提出來反對三個政府——希臘北部的聯邦——之所謂證明，如腐爛了的紗線一樣，第一次觸它的時候，就變為灰塵了。特別是柴達里斯的演說詞，使人發生了此種印象，它不能稱為別的東西，而只好叫做對後面這種人表示感謝的讚美詞，「他們的慈悲鼓舞了杜魯門總統給希臘援助的綱領」。柴達里斯先生除了對美國的慈悲加以讚賞之外，還加添了若干冗長的話語，反對「少數的獨裁」以及反對似乎攻擊了希臘的北部鄰邦，好像希臘是真正民主原則繁榮的地方。對這個題目與柴達里斯先生辯論，徒然浪費時間。記起一些臭名遠播的事實就够：在希臘統

治着壓迫和白色恐怖，因此，那裏甚至於民主的痕跡也沒有留下來。

二、調查委員會工作中笨拙的曲解

希臘代表結束他自己的發言時，重複對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的控訴，說它仍力圖消滅希臘的政府獨立和領土完整。

三個主要的原告——美國，大不列顛及希臘的代表們——加上比利時的代表，而今天還加上阿華特先生（甚至就在以前我們也不懷疑這一點）——力圖造成一種印象：調查希臘邊境事變委員會大多數的結論，是有根據的，依據某些事實，委員會只好單純認可小組所提的建議並把它交給聯合國大會批准。這些原告們自己很好地了解並且知道在小組及輔助團方面並沒有任何事實（在這個字的真意上說），小組所搜集的材料，如俗語所說，是「信手拈來的」，因此，根據這些資料的建議，不能有價值，而且實際上不會有價值。因此，原告們頑強地躲開對這資料的審查和選擇。

研究了小組的資料，首先不能不注意到，有不少場合違反顯然的事實，當小組的大多數人強迫其他的代表接受完全與這些事實不相符的結論和推論。參加小組工作的兩位代表（哥倫比亞的和比利時的），在他們提出但書時坦白地指出「假定陳述單調」，後者之目的在使希臘所提出反對它鄰邦的控訴有所根據，這不是偶然的。

不可忽略此種但書。它證明在小組會工作中業已達成的不正常的狀態。難道還不明白，對於「假定陳述之單調」之指示，不能不看作即是這些陳述是人造的指示。我順便提醒一下，柴達里斯先生自己在委員會前面的聲明中承認，「只有預先準備好的陳述，才是單調的」。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正是此種可

疑的單調，成爲希臘政府所提出的證人之壓倒多數的陳述之特點。在上面所提起的但書中，也可斷定這些陳述之目的是在證明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之罪過。證人陳述的此種特點，促其作爲證據之意義的觀點看來，對這些陳述是致命傷。自己目的在證明罪狀的證人，無疑的，不能視作客觀的證人，不能取得應有的信任。

如所周知，也有法國代表團的但書。在小組會中，法國的代表指出，小組工作方法本身是有損會譽的，它背離堅強地基於事實的方法論分析和對問題之詳盡闡釋，無須編制任何形式結論之道路。對這不能不表同意。正是因爲小組會採取此種方法，歸結到小組會的推薦，具有裁判的方式，因爲小組會的大多數所盡力的不是調查，而乃是控訴。

小組會把自己的努力，不是針對公正地和客觀地查究事實，它的責任是在提出「判」詞，進行判決，後者並不根據事實，而且它也無權這樣做。絕不偶然，在法國代表的但書中可以談到如下的話：「調查是在這樣的條件下進行的，它容許我們從這些潛伏在健全法理原則中的任何結論裏面所得到的可能不是那種結論。如果若干代表甚至於認爲根據這些孤立的事實做出結論是可能的，那末此種方法也與極大的冒險相關聯。」

此種冒險行動的結果將是怎樣？不能不同意法國代表團在小組會的聲明「此種片面的結論，對利益有關的個別方面，難免是不公正的，而且可能使安全理事會弄錯方向」，「對獲得法律證言的機關之設立的條件，曾是不順遂的」，「如果我們通過議決從法律觀點看來沒有充份的根據，那末縱使沒有危急的狀態，也不觸到完全自然的情感之必要，將使我們陷於困難」。

從法國代表的但書中還可以引證一點：「我們調查所碰到的事物之真實情況，似乎是太複雜了；在

這個字的法律意義上說，事實確定得過分不足以輕易地得到基於明確判斷和準確及無私地規定雙方的過失究竟在那裏的決定。」

因此，可以確定地說，六人小組——又稱爲小組的大多數——之工作，無論是它們所搜集之資料或者對它們的評價，尤其小組根據這些資料所做出的結論，是完全不能令人滿意的。它沒有提供得到最後結論的任何可能，但這是美國代表團所決定做的，後者提出它自己關於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及南斯拉夫方面對希臘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的某種想像的威脅之建議。

試問自己，從上面所說的，可以得到那些結論呢？

第一個結論：小組在它自己工作中所用的方法，沒有保證客觀地對付事實，而且小組不是作爲調查機關，而乃爲控訴機關而活動。

第二個結論：如法國代表十分正確地所確定——進行調查的條件，不能得到基於「健全法理原則」的結論。換言之——在小組會的工作中沒有遵守任何誠意調查所提出的要求，此種要求是要把被準確及完全地提出來的事實，沒有曲解，也沒有政治的偏見。

第三個結論：小組會所舉的事實，沒有根據做出所謂小組的大多數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所做的結論，除此之外，它——這小組會的大多數，對揭發希臘政府在巴爾幹造成對外政治形勢的責任者的事實，故意默不作聲。這三個結論，應當使小組會的大多數得到第四個結論，即是希臘政府所提出者，以及美國·大不列顛·比利時的代表們那樣奮發地加以支持的控訴之結論，沒有認可，也沒有根據對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提出任何逾分的要求。相反地，對希臘政府提出控訴，却有充分的資料。

三、希臘內戰與美國

蘇聯和波蘭代表團得到的正是此種結論。蘇聯代表團認為，喚起希臘北部邊境緊張形勢而被希臘軍閥用去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作挑撥行動的基本因素，是希臘的內部情況，希臘人民與環繞在受若干外國反動集團支持的希臘政府周圍的反民主力量之間的尖銳化的鬥爭。以及希臘北部各區業已造成的形勢，泰半是外國干涉希臘內政的結果。此種干涉被希臘的反民主力量所利用，後者把會與法西斯佔領軍妥協合作的分子，結合在自己的周圍，這使希臘與其北部鄰邦的正常關係難以確立起來。

全世界知道的許多事實，都可以引出此種結論，希臘邊境事件調查委員會不難把這些事實提供聯合國大會，如果它真的客觀地和不偏頗地活動的話。但委員會的全部意圖是抹殺這些事實並把希臘邊境的情況，置於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不利的光照下，委員會是不能這樣做的，因為這違反了它一向對事情的態度，而且它每一步所碰到的資料，本身都說明對它加以完全的忽視，沒有任何的可能。

這些事實已成爲家知戶曉的，例如小組會在回答許多邊境事件之希臘的責難時，被迫承認這些責難是沒有根據的。小組會對這一問題的結論中說，對它「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證據，足以指明與游擊隊活動不相關聯的邊境之破壞，是由北部各國的政府或希臘政府所故意地挑撥出來的，或者每一方面都會有這有系統的挑撥政策，或者事件本身是某一國家侵略意圖的證明。」

難道小組會的此種結論沒有推翻關於邊境事件對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的責難麼？難道小組會在其工作的一切困難條件下——此種困難，主要是與它密切關聯的政治環境表徵出來——不說出對它沒有提出令人信服的資料，足以證明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好像是採取了此類挑撥措施

，從邊境發生的事件也沒有證明這些國家的侵略意圖麼？在此種場合，從廣泛宜揚責難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巴尼亞支持反對希臘某種侵略意圖中剩下來的又有什麼東西呢？什麼也沒有。

在這裏應當指出，那些壓倒多數的邊境事件是與游擊隊不相干的。例如希臘責難三個鄰邦的九十八樁邊境事件中，只有十二件似乎會與游擊隊從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越入希臘相關聯。因此，上面所指出的小組會大多數的結論，不是別的，而乃是 *Testimonium Paupertatis*，承認自己的無根據。

可是甚至於就是這些沒有政治性的事件，大半也能够加以防範，如果希臘當局曾經表示相當的興趣的話，然而這一點無論如何是說不上的。

小組會不能否定這一事實：遠於一九四六年秋季，即是差不多一年半之前，保加利亞政府表示了自己的決心，把被戰爭所打斷的一九三一年的希保邊境協定重新有效並請求希臘政府履行這個議定書，雖然帶有必要的更動。可是希臘政府藉口兩國之間沒有外交關係的存在，對這一提議置之不理。難道此種情形不是證明保加利亞政府對希臘的愛好和平的意圖，相反地，希臘對保加利亞政府的這些意圖，不大像是愛好和平的。

因此柴達里斯先生說「只當從北部來的進攻終止的時候，希臘的和平與安全才能恢復」，此種聲明與實際情形完全不相符的。反對柴達里斯政府的進攻遍及全國。希臘的內戰，在整個希臘領土上進行着，包括北部的遼遠邊區，如伯羅奔尼薩及其島嶼。此種戰爭是北部希臘沒有秩序的主要原因，可以用在這個國家裏不正常的內政來解析。

對少數民族以及反對希臘政府的在野政治派別野蠻迫害的事實是無須懷疑的。小組會也被迫承認這

一點，它指出在希臘的「殘酷性和報復性的氣氛」，這在實際上是意味着過去和現在肆虐的法西斯恐怖之放肆，在這裏應當看到希臘陷入威脅情況的真正原因。證明希臘所遭遇之內部危機的這些無可爭辯的事實，無疑的，足以說明，正是在這裏，在希臘內政關係的範圍內，來尋找解決希臘危機的工具。

無疑的，此種危機將老早而且完全地被克服，以及希臘人民將貢獻它自己的全部精神與物質力量於本國戰後復興的事業，如果外國的干涉——不列顛武力的干涉，現時由美國的武力干涉代替之——沒有阻礙它的話。

所謂希臘問題，這與邊境事件或者甚至與希臘和其北部鄰邦之間的關係相比，是更廣泛而重要的問題。希臘問題是巨大的政治問題，它與世界意義的諸問題之解決相關聯。而這主要是由於希臘現在不屬於自己，不是希臘政府，也不是站在它的肩膀上的那些社會政治集團決定希臘的政治。今年七月英國「經濟學者」雜誌在「希臘在刀鋒上」一文也得承認「支持希臘的經濟、軍備，幫助教練希臘的軍隊並在聯合國大會上擁護希臘事件，美國現時是希臘政治的主要推動者」。

目前在這種關係中的情況，成爲更加尖銳的了。從九月一日起，美國當局負責給養希臘的軍隊、憲兵和警察。希臘當局在美國和英國軍事使節團的代表和美國軍事以及其他問題的專家參加之下，舉行不斷的會商。美國專家龍孫指揮國民經濟部。他也是對外貿易問題混合委員會的主席。沒有他的允許，希臘人無權在國外進行任何採購。美國的專家們指揮國庫：羅斯曼指揮預算問題，而斯賓塞爾則指揮工資以及國家機關的用人問題。依靠美國的津貼，希臘的軍隊增加到三萬人。採取措施，預備組織所謂國民衛隊，同時美國人認可徵募五萬人到衛隊中去。制定「完全消滅叛軍」的辦法。在國防委員會中，除了

希臘的各部長之外，必須有美國及英國軍事使節團的軍官拉夫舍依，斯塔舍相，海林斯，塔爾博特，格林，威克與等人的參加。在美國的所謂專家們領導之下，準備國家機關的清洗。

這樣一來，希臘的獨立和主權什末也沒有剩下了。希臘政府的機構業已最終地轉到美國控制之下。如希臘政府的保護者們所應允，他們向全世界大聲叫囂，在美國總統援希的演說之後，在希臘撤佈了異常豐富的福祉，但它對希臘的經濟狀況和人民的物質福利有絲毫良好的影響麼？從美國前任國務卿亞契遜的演說辭中明白：美國援希總數中五千萬美元是撥歸軍隊。而其餘的則用於復興經濟和取得消費資料。但美國在希臘的使節團團長格利蘇奧特所宣佈的復興工作的草案，涉及碧利亞·薩朗尼克·瓦洛薩等港口以及若干飛機場的重新裝備。因此，事情依本質來說，是把希臘變為美國的軍事根據地，至於談到希臘經濟的復興，應當確定地說，除了少量美國的穀物之外沒有其他的幫助。但此種「援助」表現之，例如進口的糧食品零售價格的指數比一九四六年的相當價格高出百分之二十一三十五。若干種必需品從商店中越來越多地消耗出去，其價格照例提高起來，例如食米，在兩個月中漲了八倍。但這並不奇怪，因為米、糖、油、麵粉製品——這一切都操在投機家，販賣商及中介者的手裏。

四、反人民集團的保護者

我應當檢討斯派阿克先生的演說辭，他竭其全副演說家的技巧，一方面責備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滔天大罪，另一方面把柴達里斯的政府當作和平的靜穆的天使加以描寫。顯然的，爲要易於對付他自己的敵人，斯派阿克先生在這些問題的周圍展開爭論，而對這些問題的任何回答，與擺在委員會前面的基本問題沒有多大關係。例如斯派阿克先生推論說，希臘政府是否合法，並煞費苦心證明

，希臘政府是合法的，雖然也得承認存在著一種把希臘政府當作非法政府看待的傾向，而且此種傾向逐日找到更大的傳播。

這是對的。人們的思想開始愈來愈健全，承認索夫利斯——查答尼士的政府，真的是非法的。可惜斯派阿克先生不試圖分析認爲索夫利斯——柴達里斯政府是非法的愈益流行的傾向之原因所在，而且也沒有回答此種傾向，如他所表示，越來越流行應作何解釋這一問題。同時這絕對有他自己的，份量充足的根據。但我們將不停留在這個問題上面，因爲，如所周知，索夫利斯——柴達里斯的政府，對希臘內戰負有責任，可是它對希臘問題不起決定性的作用，它對這件事不是決定性的因素，因此，沒有化費很多時間來談論希臘政府之必要。

斯派阿克先生觸到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七款的問題，證明說聯合國的組織及其會員沒有權力干涉任何一個國家的內政，甚至於批評它的政策。但爲什麼在此種場合斯派阿克先生表現出這樣的不澈底，例如當要說到關於美國或者不列顛干涉希臘的事務，以及關於不列顛軍隊在希臘呢？誠然，斯派阿克先生有過幾句話闡述這一點，但他是這樣的輕鬆和謹慎。對他自己的不遜幾乎有抱歉之意，同時對於美國干涉希臘內政的若干無可否定的程度，也鬼鬼祟祟的說了一點。可是他立即補充聲明，說他此種斷定值得誇耀還遠得很，但相信這些指點，不會引起美國政府和不列顛政府的責難。對這一點，斯派阿克先生盡可放心。他對這個問題的批判之若干。「無可否定的程度」，及其以身作則的行爲，祇能引起由他提起的最高保護者之完全的贊同與誇獎。但斯派阿克先生所說的一切，無庸置疑，他是贊許美國人及英國人干涉希臘的內政，而且證明說，這與聯合國憲章之原則並不衝突。

但斯派阿克先生那樣雄辯的斷章取義的第二條第七款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耐帶可以說，在斯派阿

克生方面，好像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準備好了的。每一個政府爲着維持和平與秩序，都可以請求別政府給他以幫助。這是對的，但在這些場合，在國家的憲法中，也載明一定的程序，它在一九一一年的愛林（希臘）國家的憲法中，會有規定，而且也被一九二七年的愛林憲法所批准，在該憲法的第九十九條及第一百一十三條所規定：「外國軍隊替愛林國家服務，是不許可的，而且他們不能停留在希臘的領土上，或越過希臘的領土。」但在希臘沒有公布此種法律，而外國的軍隊駐紮在希臘領土上是非法的，不管斯派阿克先生以及柴達里斯斯政府榮譽的辯護人對這件事的感覺如何。

附帶的不能不着重指出不列顛整理希臘秩序的方法之特殊性質，關於這一點，斯派阿克先生是說到的。這一點值得特別的注意，但由於時間的不够，我不得不以對斯派阿克先生聲明之回答爲限，他說無論如何不許聲稱不列顛軍隊在希臘是內戰的原因，關於內戰的原因我往後再說。在這裏我願意引述這件事的權威者邱吉爾的證明（查看「生活雜誌」一九四七年四月廿三日），關於此種證明，南斯拉夫的代表在這裏已經提起過，也說到邱吉爾先生給斯考比將軍的電文。

「這個時候已經深夜，——邱吉爾對這一點說道，——我編好給我們的斯考比將軍的電報，他帶了三千人到了雅典，幫助趕走德國人，在希臘政黨的鬥爭中，他不應當認爲自己是中立的，而相反的，他應當支持帕潘得烈首相，而且不猶疑地射擊來攻的共產黨人。這個命令是在一九四四年十月六日早上兩點鐘左右送出的。他在恰當的時候睡下。不列顛的軍隊分成若干小組往前推進，並向進攻的共產黨人開火……」

這裏就可以看到根據不列顛首相的命令以及得到比利時首相之認可的不列顛軍隊在希臘所維持的是何種秩序？

現在讓每一個公正與無私的人來回答一句，不列顛的軍隊所謂來到希臘不是意味着這些軍隊在柴達里斯黨徒方面參加內戰麼？

斯派阿克先生把這稱爲對合法政府的合法援助，但這顯然是對希臘內政粗暴的干涉。這就告訴你們斯派阿克先生擁護幫助任何「合法」政府的原則。

但此種原則究竟是什末一回事，當得到西班牙人民支持的西班牙合法的共和政府——卡巴列洛及尼格林的政府進行反對佛朗哥將軍的法西斯反叛勢力的時候？當時這個真正合法的政府不僅沒有得到任何的支援，而且當時斯派阿克先生在那裏起了不小作用的國際聯盟努力設立一個臭名遠播的不干涉西班牙事務委員會。如所周知，事實上這一委員會變成這樣的機關，它的任務會是不妨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干涉英勇地反對以叛將佛朗哥爲首的法西斯軍閥的西班牙之內政。

歷史在重演着，雖然也帶有若干的變化。法西斯的反叛是反對合法的政府，被希特勒與墨索里尼巧妙地利用去反對民主及西班牙人民力量的不干涉的英雄們，對這一事實並沒有感到不安和憤怒。目前則對形式上的法理秩序的各種不同的理由，例如引證政府的合法性之類，稱頌不置，可是這完全不意味着這個政府的民主性和進步性，——爲着燃起反對民主力量，反對人民的火燄。現在一切辯護人都努力並號召援助，藉以證明援助查答尼士的「合法」政府與希臘的民主運動作鬥爭是公正的，藉以證明反人民的狐羆狗黨是公正的。

上帝保佑的轉變就是如此，但應當說，這被別的國家對援助西班牙及希臘政府之權利問題的各种不同態度，是有某種共同之點！這是在導向真正新民主之鞏固的社會力量難以駕駛的增長前面的惶恐。

Inde ira——這就是憤怒的源泉所在。

五、人民的國家主權妨礙了誰

關於國家主權的幾句話。在麥克奈爾所採取的反對國家主權的輕騎隊的襲擊之後，國家主權的敵人把更堅實的武器應用出來，斯派阿克先生的演說，在這裏應當起着作用。斯派阿克先生用「政治的掩蔽物」，「過時的舊觀念」，「舊的反動思想」這類的形容語來射擊國家主權的觀念。但砲兵的進攻並無所獲，雖然會有不少的喧嘩與叫喚。斯派阿克先生無論發出真正的「砲彈」或任何一種新思想都沒有成功，因為他說的一切，遠在他之前（應當坦白地說，比他更好些），已為國家主權的這些敵人所道過，如在趙格以及其他法學家像摩列爾、佐爾耶、舍爾、魯易、列肖爾之流領導之下宣揚此種可疑的原則，已有二十年了，魯易、列肖爾以後成為合作者，在其「國際法概論」中，公然擁護干涉之法則性，波利切斯、葉尼、美國人湯姆斯、辛黎切爾公然主張「超國家」組織之必要，根據他的意見，對這的頭一個步驟，應廢除國家的主權。這是國際聯盟的老歌手，演說家，領導者及其基本活動家，他們在這個死嬰還剛受胎的時候，就已推動「超國家」或「駕於國家之上」的觀念。

這自有其原因。資本主義的發展，特別是資本主義進入它自己的最高階段——帝國主義時代，帶來了稱霸及兼併的意圖。但這在民族自覺了的各民族中喚起反抗的增長。此種反抗很容易長成爲危險的動作以及反對外國資本的其他方法。民族自覺了的各民族力圖利用資本主義本身在爭取它自己霸權的過程中所給予它們的那些手段和方法，以達到自己經濟和政治的解放。提出創立統一的，民族的，獨立的，主權的國家之觀念，是要防止異國來的資本主義客人對本民族的剝削。但別國的國家主權妨礙了趨向經濟霸權，趨向自己經濟及政治勢力範圍之擴充的國家。

獨佔的意圖是與國家主權這樣的原則不相容的，後者是實現這些意圖的有力阻礙。

終止國家主權的企圖，就從這裏而來。學者們——法學家，經濟學家，外交家，政治家——蓄意反對國家主權觀念的進軍，因為已發展的，渴望和貪婪一切新而又新的市場和統治的資本主義體制不需要這種國家主權。現在國家主權的觀念作爲「舊的政治掩蔽體」作爲「過時之物」，作爲「反動的觀念」應當宣告破產了。

斯派阿克先生關於國家主權在這裏所說的一切，是與已經達到發展的這種程度的資本主義制度之要求相符合，其時別國的國家主權成爲實現擴張計劃的道路上之阻礙物，其時它本身成爲了各種擴張的道路上之梗阻。斯派阿克先生說，國家主權，這是反動的觀念。對啊！國家主權是反動的觀念，因爲它阻礙了廣闊地露出的下顎和伸展得很遠的獸掌向全世界耀武揚威的帝國主義之「進步的」運動。斯派阿克先生說，國家主權是「過時之物」。斯派阿克先生並不準確，他們願意把此種觀念失去時麼，因爲強有力的資本主義各國對它再也不需要了，這些國家需要的是相反方面：消滅主權的觀念以及其他國家的主權本身。

國家主權，這是獨立以及很多國家反對資本主義獨佔強盜貪慾鬥爭的旗幟。斯派阿克先生號召放棄「國家主權的一切標誌」，可以成爲剛剛所說過的之最佳的插圖，這是爲着幻想世界霸權的最大資本主義獨佔的利益。自然，斯派阿克先生以及與他在一起的一切人，不能同意這些國家的代表們之立場，後者否決在應有盡有的小組會和委員會幫助之下限制國家主權的任何企圖，例如希臘就需要這樣做，它離開國家主權真的所剩無幾了。當羅馬人願意知道某一事情是爲誰的利益而服役時，他們就問道：「quid Prodest?」對誰有利？

難道還不明白，如斯派阿克先生那樣拚命地否定國家主權的說教，不是爲着愛好自由的各民族之利益，它們的自由，它們的獨立，它們的幸福，——它服役於直接對立的利益。尊重它自己獨立和民族自立的任何一個國家，不能與此種敵對它的利益的說教相調協。

六、誰真的威脅希臘的獨立和領土完整

目前希臘政府的無能與腐敗，無論誰都已不加爭辯。甚至支持這個政府的人，在或種形式及或種程度上也不加以爭辯。對這一政府的嫉恨，在人民中愈益增長起來。甚至保守的階層以及反映它們意見的機關刊物也應當承認這一點，它們敲起警鐘，說希臘政府和希臘憲法的政策，希臘的緊急法令，剝奪了人民的公民權利，全國經濟狀況愈益惡化，可以解釋如我所已引證的「經濟學人」雜誌的論文所確定的廣大民衆中此種情緒的增長，「把自己的視線朝向游擊隊，作爲反對政府腐敗和暴虐的唯一希望」。

同時希臘已走到絕望的極限。美國駐希臘使節團前任團長波爾·波特爾在他自己登報於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日「柯勒斯」雜誌的「希臘需要奇蹟」的一篇論文也被迫確認這一點。自然，波特爾提供了與目前美國外交相符的方劑。但他不得不承認希臘現狀的特徵是「民族絕望的深刻情感」。波特爾要求對希臘的「奇蹟」，不外按照希臘的方劑改組希臘的行政和希臘的政府。

可是這一政府到底是什末一回事？我們試聽波特爾的說法。波特爾寫道：「據我所見，希臘政府缺乏有效的政策，祇求外援以維政權。根據我的意見，它存心利用外援來保持在希臘構成無形力量的少數銀行和商業集團的永久特權」。

波特爾不掩飾此種「希臘的無形力量」——是此種集團「十分堅決地不惜用任何代價首先防衛它自

己的財政特權而損及全國經濟的特權」，「此種集團的職員願意保持可以提供它們意料之外的好處的抽稅制度……它們從來沒有想到把這些利潤投於它們國家的復興事業」。

斯派阿克先生對這一「合法」政府非常滿意。但被派去幫助這一政府的人說了什麼，——波爾·波特爾是美國使節團的團長，他不能掩飾他在那裏親眼所看到的。

根據波特爾的話，英國人善於利用希臘現政府的這些素質，以達到他們自己的目的和利益。「英國人——波特爾寫道，——在其權限之內，對這些問題可以完全信賴，——在此種場合始終利用與當地執政階級合作的公式：即用認可他們剝削大家的權利，來收買他們的支援並倚靠他們，借助憲兵和警棒以鎮壓人民」。

這不是我的話，這不是「莫斯科的宣傳」。這是在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日一期上刊登波爾·波特爾論文的美國「柯勒斯」雜誌的宣傳。

陷於銀行及交易所業務人員之集團手裏的希臘狀況就是如此，他們以自己的國家爲買賣，準備把它批發或零售給出了較多代價的那些人，甚至如美國駐希臘使節團前任領導者波爾·波特爾那樣的官方人物，也不能不承認，這些實業家在希臘博得人民的嫉恨。

柴達里斯或約翰生，或麥克奈爾，或斯派阿克將否定這一點麼？或者他們如過去一樣，做出必態，事情不在於希臘內政的危機，——此種危機首先是由不得希臘人民信任的希臘政府所造成的，——而在於希臘北部鄰邦的奸計？當柴達里斯及其徒類親手褻瀆和侮蔑希臘的政治獨立的時候，柴達里斯及其徒類關於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方面對希臘政治獨立等等的威脅，是原因麼？此種褻瀆與侮蔑，是爲征服陷於貧乏及無權利之深淵的希臘人民之銀行及交易所實業家的利益。

如果說到希臘政治獨立的威脅，那末上面所引證的事實難道還不够確信地證明爲着自己擴張目的粗暴地干涉希臘內政的外力威脅希臘的政治獨立麼？

現在我們來討論關於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似乎威脅希臘領土完整的問題。受着美國及大不列顛政府支持的希臘政府企圖斷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政府用宣傳以及其他方法支持使馬其頓脫離希臘並把前者包括到南斯拉夫幅員中去的運動。

此種斷定可笑得簡直不可想像，他們把這一切用白線縫起，其長度及人爲的痕跡，是觸目可見的。這些斷定是依據什麼呢？他們依據：

- (一) 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政治活動家發言中的若干片段以及一兩種報紙的若干節略；
- (二) 依據關於在二十歲青年領導之下的某種神話式的「挨吉斯克委員會」以及關於馬其頓組織（VMRO）的若干陳述；

希臘政府及調查團的大多數，從南斯拉夫國民大會副主席武拉賀夫，南斯拉夫的馬其頓共和國的首相柯列舍夫斯基和鐵托元帥的發言中以及公佈在南斯拉夫「博爾巴」報及「諾瓦——馬其頓」報的論文中引證若干的片段。

鄭重指出一點，這些言論是一九四六年十月以前以及更早期之事，當時外長會議及巴黎和會曾經討論和約的草案，而且與此相關聯，當時在許多國家中曾經辯論與和平調整相關聯的領土以及其他問題的各種狀況。

但這些言論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在這些言論中表現出那些異端的觀念呢？發現一九四六年九月武拉賀夫對法國記者所作的聲明，曾經說到馬其頓人民期待它自己完全解放和政治統一，這將在包括在南

斯拉夫構成中的挨吉特馬其頓共和國之下而達到。在另一發言中，武拉賀夫聲稱，「無論從任何觀點：地理的，人種的，歷史的，政治的或經濟的，希臘對挨吉特馬其頓都沒有權利」。

柯利舍夫斯基以及巴黎和會南斯拉夫代表團副團長 M. 碧特以及幾位別的人也會表示過類似的意思。在一九四六年八月二十六日的「博爾巴」報中曾經包含如下的聲明，「南斯拉夫對消滅在希臘的我們的人民或者對它結合到南斯拉夫的它自己的同胞們方面去的自決權和要求，不許淡然處之」。

從這裏就可以看到所謂南斯拉夫謀害希臘領土完整究竟是什末一回事，爲着反對此種謀害，美國政府會要求實行聯合國憲章的第七款，如所週知，這一類是規定採用強制爲有效方法的。但聯合國憲章第一條第二款特別說到尊重民族自決的原則，作爲聯合國組織的重要目標之一，然而在上面所提及的演說辭中，並沒有包含任何不好的東西。

爲着加強南斯拉夫現有謀害希臘領土完整的意圖，希臘政府也引證一九四五年十一月鐵托元帥在斯柯普列所作的演說以及一九四六年十月十六日鐵托元帥的覺書。在這些「證明」中值得加以檢討，因爲它們是證言的實例，在法律學上稱爲「Papirierte zengen」——偽造，卽是虛構的證明。例如在十月十一日的演說辭中，被放入這樣的句子：「我們採取辦法團結「切馬其頓人」，在演說原辭中是沒有的，因爲沒有說過它這樣的話。柴達里斯十二月十二日在安全理事會上所解析的鐵托元帥的覺書，也是偽造的。柴達里斯先生借助極簡單的技倆達到此種偽造；他從覺書的原文中拿出一句話，而以別的一句話代替它，實際上這一句話在南斯拉夫首相的演辭中是沒有說的。鐵托元帥說：「至於說到我們在聯合國組織面前將採取的步驟，我不能說它們將包含什末，但顯然的，我們將採取確定的步驟」。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柴達里斯在安全理事會上所引證的原文中，把這一句話曲解了並被變成下列

這個樣子：「我不能說，我們將採取何種步驟，但，自然，我們將採取步驟，藉以終止在希臘的少數民族所受的恐怖，特別是挨吉斯馬其頓的少數民族」。偽造是顯然的。有了此種偽造的「證據」在手，小組會的大多數就敢聲稱南斯拉夫掀起在希臘的斯拉夫——馬其頓人對自治馬其頓的絕望。

拿着這樣的所謂證明，在這裏早已我們閉起眼睛認可調查團的報告，後者充滿着沒有依據任何資料的無稽的結論，同時對許多最重要的問題壓倒部份都是偽造的，而且不足置信的。相當觀點的表明以及此種願望和意圖的表現，本身不能成爲控訴擴張或侵略意圖的源泉，尤其是南斯拉夫的政治活動家不變地力稱自己願意也在聯合國組織局部的協助之下，用若干方法達到馬其頓問題之合理的解決。

南斯拉夫的代表對上舉的偽造曾經喚起調查團的注意，因此，調查團對此種插曲是週知的。可是調查團的大多數沒有賦予此種插曲以應有的意義，也沒有從這一點得出任何結論，無疑地證明調查團大多數工作的缺憾的方法，真的是片面的和偏頗的，沒有應有地反應出重要文件的顯明的魔術與偽造。

我現在轉過來來說保加利亞。這裏事情也與對南斯拉夫的問題一樣，是不能令人滿意的。例如調查團的六位委員在保加利亞總理狄米托洛夫一九四五年八月的發言中來考察保加利亞對希臘領土完整的威脅。這個聲明的相當部份說：「碧林斯基的馬其頓之選舉將在鞏固保加利亞祖國陣線並與新南斯拉夫確立最友好關係和密切合作的總原則上來進行，因爲祇有用此種方法才能達到馬其頓問題的最終解決。祖國陣線在選舉中的勝利，保加利亞，祖國陣線以及新南斯拉夫聯邦的和陸與統一，消除了整個馬其頓民族民族解放道路上的阻礙」。

甚至於最怪癖的批評家，也不能在這種言辭中看到任何擴張的意圖。抑尤有進者，保加利亞的代表在小組會上曾經聲明，保加利亞沒有對希臘的任何侵略計劃，馬其頓問題從來不是戰後兩國之間發生誤

會的原因。可以說，如果希臘的對保加利亞的誘惑不但不運用如上舉的文件那樣的此種「證明」來說保加利亞政府對希臘的侵略，那末這就可證明共謀對保加利亞政府的控訴是完全沒有根據與無稽。

七、柴達里斯及其徒類的侵略計劃

可是對希臘本身問題就兩樣了。我認爲提起正是希臘政府具有真正擴張的計劃和侵略的意圖不是多餘的。關於這一點，柴達里斯遠於去年在巴黎會議上在糾正邊界的方式下，曾經要求把保加利亞的差不多四分之一的領土歸併到希臘去。按照希臘政府的此種強求，保加利亞的疆界退到貝羅其第二大城市普洛夫志夫三十五公里，離保加利亞的首都索非亞不到九十五公里。而柴達里斯認爲這是疆界的糾正。而這不是侵略麼？那末我應當說，在我們方面有完全不同的概念，什麼是侵略，什麼不是侵略。

要求此種所謂疆界的糾正，柴達里斯的希臘政府貪婪地伸手到別人的土地去。利用國際事務上某些強心的力量之支持，它要求儘其可能往保加利亞心臟的近處推進。利用巴黎和會上的形勢，它要求奪取阿爾巴尼亞的埃庇爾，以及位於羅多普斯克山脈之陰，處於北部保加利亞的盆地。並不多餘地提醒一點，希臘政府對保加利亞的領土之強求，不以在希臘人方面曾經很多的演說辭和小冊子爲限，而且採取了十分具體的實際形式。事情弄到這步田地：柴達里斯及其流派的這些要求在巴黎的保加利亞政治及領土問題的小組會上，曾加以檢討。事情弄到投票的境地。調查團的大多數否決了柴達里斯的這些強求，只有南非聯邦一國加以贊助，同時包括英國在內的三國代表表示無恥的棄權。

值得注意的，例如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柴達里斯在薩朗尼克的演說。「我們的民族要求，——柴達里斯聲稱，——不只限於在國際法中所承認的，以及由歷史及法律觀點來看的那些領土。我們對這些領

上的權利一切人都很明白。多茲堪尼茨·北部挨庇爾以及我們邊境的安全不能滿足我們。還有在南部及北部的希臘領土，它們顯然是希臘的。我們的要求從北部開始，藉以完成我們國家的創立並解決空間問題……」（摘引自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二日「托佛斯」報）。關於空間的這些話，使我們憶起這些生存空間的尋求者的言論，這是由我們的共同努力，所給予的沒有任何界限的生存空間，——是來世的生活。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四日在雅典的希臘國會議員 G·志康莫普洛斯曾經說過：「我也沒有糾正疆界的計劃。我把自己的方案提交給主席，是要把它帶到國會的檔案中去。我們的疆界應當從伊什米河注入阿得利亞特海的入口起，沿着薩普拉聳斯克山嶺並包括瓦爾達爾河及奧爾維爾的西部在內。以後疆界應當越過斯杜姆河直達卡德林諾瓦鐵道的交叉點；它從那裏沿斯康米奧克山嶺朝向托洛揚斯克山頂以及高達一千五百七十三公尺的巴爾幹山脈。它應當沿着這個山脈達到黑海的阿埃托斯·碧爾托斯及安貝拉奧斯村區（小組會二十一次會議記錄第四頁）。

調查團的大多數豈不宜於對希臘的此種發瘋的擴張計劃提供評價，以代替不是對希臘而是對其北部鄰邦提出不加思索和毫無根據的責難？

至於希臘的報紙怎樣呢？它比柴達里斯及其黨徒自然並不落後，對這一點可以舉出很多的實例。也應當提起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巴黎會議時，柴達里斯曾向南斯拉夫的代表畢勃列洛及維爾芳諾提議，在希臘與斯拉夫之間來瓜分阿爾巴尼亞。這是希臘政府反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不斷陰謀的顯明證據，這些陰謀真正是對希臘北部鄰邦的領土完整之威脅。

在美國代表約翰生的演說辭中沒有找到一個字可以證明從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方面對希臘領土神聖不可侵犯的所發明的具有特殊目的之威脅的存在。顯然，這不是偶然的。而這是可以理解的：如我們在

上面所看到，希臘的材料富於偽造和贗品，美國代表團對這個問題要維護其立場是困難的。因此，美國的代表認為最好是沈默不言。

八、虛偽陳述強辭奪理

也不能不對證人加以檢討，調查團的六位委員企圖根據他們的陳述來證明它自己的結論和推理之信而有徵。支持控訴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威脅希臘領土完整的調查團的這些委員們，援引了若干證人的陳述。

發生一個嚴重的問題，這些證人是何許人，這些證人的陳述，可靠到何種程度。在這些證人中例如也有維利安尼志斯，關於此人的性格，可以根據下面的事實得到印象，維利安尼志斯不能道出他自己的生辰。與此相關聯，也由於這位證人的性格，喚起一般的懷疑，調查團認為對這位證人的性格進行審查是必要的。可是此種審查並沒有進行。同時這位維利安尼志斯的陳述，列為關於馬其頓 *MACEDONIA* 「民族解放陣線」組織的證明之列。

另一位證人瓦爾塔多洛斯對這一問題出來發言，聲稱他曾是馬其頓運動的參加者，有過為統一馬其頓並把它結合到南斯拉夫國家中去而奮鬥的指令。但它的陳述之最重要的部分是曖昧的，就是關於南斯拉夫政府與「民族解放陣線」聯繫的問題。但這位證人已被希臘當局判處死刑，兩個別的證人——志爾瓦斯和碧察斯——證明說，這位證人曾受到拷打，於是作了虛偽的陳述，藉以挽救自己的生命。瓦爾塔多洛斯本人承認他曾受拷打，當他被希臘警察捉住的時候。證人恰烏施斯起初提供反對民族統一陣線的陳述。但後來又承認關於這個組織他是以後從另一證人——切切洛克利斯那裏知道的，他曾受過三次盤詰

，提供了完全矛盾的陳述。希臘政府所提出的若干別的證人，帕塔吐卡斯。曼蘇拉契斯以及其他，如他們自己的指明，對馬其頓問題，一般地說，毫無所知。

證人關於民族統一陣線的陳述，一般地說，是異常紊亂的。他們常常把「民族統一陣線」與難民委員會混淆起來，後者是在畢托爾成立的，其目的給希臘的難民以幫助，其數目在南斯拉夫超過二萬人。在調查團七十一次會議上提供陳述的證人阿坦諾索夫指明關於南斯拉夫存在的「民族統一陣線」毫無所知，他只說「民族統一陣線」是於一九四三年在希臘組織的，其目的是在反對德國的佔領軍。

在調查團中的資料中也引述所謂挨吉斯克委員會反希臘的活動，但若干證人在調查團上對一問題曾經否定這個挨吉斯克委員會的存在。例如根攘希臘政府的提議，被提出作為證人的卡蘭涅夫斯基，過去似乎是斯柯普拉的挨吉斯克委員會的首領，聲稱他從來不僅不是委員會的首領，而且他從來也沒有聽到這個委員會。這位卡蘭涅夫斯基是不滿二十歲的人。是否聽到阿坦諾索夫關於在畢托爾存在挨吉斯克委員會這一問題時，他聲稱：「不，我從來沒有聽到過這個組織。我只聽到關於經濟委員會，而從來沒有聽到關於挨吉斯克委員會」（七十次會議紀錄第五頁及五A）。

可以完全確信地說，在南斯拉夫領土上從來沒有過領導馬其頓運動的挨吉斯克委員會或其他任何別的組織。沒有任何值得信任的證人，也沒有對類似斷定提供基礎的文件。若干證人的陳述可疑到這種程度（如像從證人博勃切斯方面就會如此）甚至逼迫調查團的主席烏魯切亞先生（哥倫比亞）作了這樣的聲明：「聽他是完全無益的。這一切我們都知道，而且對我們是十分顯然的。起初證人作了一種陳述，而以後他作了完全另一種陳述。若干代表認為，他是偽證。另些代表說，他們對這完全不感到興趣，因為他的陳述沒有任何的價值」（第五十七次會議紀錄，第十二頁）。但這些陳述列為資料，說是「被證

明了，「但沒有提出被什麼所證明，被誰所證明。被博勃切斯所證明麼？」

這位博勃切斯以前也被希臘當局判處死刑，顯然的，他在小組會前面的發言，也是爲着挽救自己的生命。

另外一點也是無可爭辯的，這就是法西斯的組織 V.M.R.O 於德人佔領時期在南斯拉夫公開地，而在德人被擊潰之後祕密地活動過。一九四七年二月在斯柯普列的審判中，曾經確定波維黎切的同事旺佐·米海洛夫領導了這個法西斯自治馬其頓的組織 V.M.R.O。在審判中也曾確定 V.M.R.O 與希臘的反動集團保持聯繫。因 V.M.R.O 事件被審判的證人特列普切夫，依照美國代表的建議，在柏爾格拉特的第七十一次小組會議上曾被盤詰，他聲稱：「V.M.R.O 成立於一九四一年。它的領導者是旺佐·米海洛夫……在這個組織的其他領導者中，會有柯斯塔·切爾志埃夫其人，他曾向我建議，成立隊伍並與希臘的軍隊及保加利亞的反對派建立聯繫……這些隊伍派到南斯拉夫去，反對南斯拉夫的現存制度，其目的是在他立於英國人和美國人保護之下的自治馬其頓。」

這一切都是多餘地證明說好像是南斯拉夫支持，尤其是掀起馬其頓自治運動的斷言是盲目的。此種經不起任何批判的斷定應當放棄。

在調查團方面，一般地說，對證人這一點並未如願以償。我們曾經喚起對在這裏的許多人加以注意、因此無須贅述。這裏我祇來談偽造的顯著實例，如被希臘政府提出的康托彭諾斯的陳述。希臘的證人康托彭諾斯——安尼瓦斯在其書面的陳述中誓言在希臘難民幫助的「由南斯拉夫青年所建築之勃切柯——班諾維切鐵道，「穿過達爾麥清斯克海岸朝向阿爾巴尼亞的邊境」（希臘「白皮書」茲文本第六十一頁）。

此種聲明是盲目的，而作爲偽證者的他，是富於此類盲目性，因爲這條鐵道是位於南斯拉夫的中央

，且具有地方經濟的意義——在偽證者的描寫中，把它移到達爾麥切亞去，朝着與實際情形完全相反的方向去，具有顯然目的，證明確有針對希臘的侵略。

刊載於同一「白皮書」(第七十四頁)中的同一證人之聲明，說到在布爾克西西有一所神祕的游擊隊學校，「特別注意山地戰的學習」，而「此種功課是在布爾克西本鄉及其附近村落教授的」。就中不難確定這個鄉村是廣闊的彭薩斯克平原上的巴切克，這裏地勢是平坦的，沒有任何高地，遍野盡是小麥和玉蜀黍的田場延綿幾百公里……具有十足狂想和沒有良知的人才能斷定布爾克西鄉及其附近村落能够傳授「山地戰」的課程。並不多餘地指出一點，這位證人康托彭諾夫——安尼瓦斯曾被他自己的親兄弟作為挑釁者揭露出來。

我們明白，造成這些經不起打擊，苦楚和拷問的所謂證人，在他們那裏發掘實際上並不存在的罪過之承認，並陳述對他們的劊子手所要求的一切。

這難道不是說明從希臘監獄中並於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公布於薩朗尼克斯「安哥尼斯切斯」報上的曾被希臘當局在揚尼茨判處死刑，但被赦免而現在羈押於挨吉。庫爾監獄裏的海軍上尉麥拿維斯的悲劇性的信札。在這封信中說道：「晚上就是這一位軍官(在揚尼茨的第33營的希臘諜報組長——A. 維辛斯基註)命令引來被判決死刑的柯斯姆。柏斯上倫麥耶斯，並拿他顯示其他被判刑的士兵切爾佐斯以及審問瓦爾塔多洛斯事件的其他的人，說道：「這個人以及其餘坐在牢裏的五位，因拒絕提供證言，明早將處死」。他暗示我們不提供虛偽的證言，我們這一部份中有士兵十共產黨員，我們與政治組織和游擊隊有聯絡，我們要達到馬其頓的自治」。我在這裏着重指出「麥拿維斯說，「在偵查時爲要從我們方面逼出證言，採取了最可憎的拷打，因此若士兵不得已簽字於不了解他們做何事的某些聲明上。」

「我在上面所指出的被判刑者，——麥拿維斯曾指出堪納切志斯，切爾佐夫和米海伊尼志斯，——在談話時聲稱，他們將不活命，因為他們拒絕在壓力之下低頭，如像瓦爾塔多洛斯所做的那樣，後者提供虛偽的證言，說游擊隊從希臘跑到南斯拉夫又返回來。經過兩天槍斃了他們，而像瓦爾塔多洛斯到此刻還活着……」。

可以舉出很多偽證的場合，是在希臘當局拷打之下的逼供，迫使這些證人提供對這些當局有利的證言。例如證人拍切夫相信每一個抵抗運動者在受盤詰時都被打到頭破血流而得到口供。查賀科，瓦爾塔多洛斯，賈切奧斯，伊康諾莫失，舍爾也柯夫等人的口供就是這樣得到的。

許多重要的證人是在死的威脅之後被帶到調查團去。他們也在死刑的威脅之下而提供了這些證言。上面已經指出的瓦爾塔多洛斯，是希臘政府所提出的證人之一，可以為例。在調查團第三十六次會議紀錄上載着調查團委員與克倫希上校及瓦爾塔多洛斯之間的如下對話：

問：你是否唯一的被審判者或者同時被審判的一個人？

答：和我一起還有四個人被審判。

問：他們被判處何刑？

答：他們全部被判處死刑。

問：被判處死刑的其餘四個人在什麼地方呢？

答：他們已經被處決了。

問：你能否解釋為什麼你這四位同志已被處決，而你還活着呢？

答：我不能解釋，但我想我活着是要使我能夠來到這裏並證明我們的聯邦之罪狀。我覺得調查團的

委員不願意知道我所處的環境之事實。

這些文件不僅是因爲他們保持自己的正直及愛國者的高尚而被判死刑的不幸人們之悲劇的活生生的篇頁。這些文件也是希臘以及在希臘統治的暴君鐵蹄下喘息的希臘人民悲劇的篇頁。

九、我們的結論

蘇聯代表團對調查希臘邊境事件的調查團工作有關的一切最重要文件曾加以仔細的研究與分析。我們逐步注視事變的行程，這些事變起初在安全理事會，而現時則在聯合國大會上曾被用去以提出這個問題。

我們也確信此種信念是依據牢固的基礎——事實，事實，再是事實。它們這些事實推翻了加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身上的罪狀，證明對希臘北部三個鄰邦所提出的要求是不公正的和人爲的。相反地，這些事實，無異地說明這些事變的全部罪過和責任應當落在希臘政府以及干涉希臘人民內政的那些國家的政府身上，它們支持希臘內部的反動的、反民主的力量，企圖利用造成的環境，達到自己擴張之目的。

因此，蘇聯代表團提議否決美國以及其他別的代表團所提出議決草案，它是依據虛偽的，與實際情形不相符的資料，通過此種議決，不僅不能解決放在我們面前的任務，且祇使它的解決複雜起來，而且這是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粗劣的不公正之新行動，是這些國家與希臘之間確立合作道路上的新阻礙，確立各民族和平與安全的新阻礙。

關於約翰生先生的聲明必須說幾句話。他說美國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亞以及阿爾巴尼亞同意調查團

觀察的條件下，將不堅持他自己對上述三國的責備。約翰生先生這樣做，是意圖尋找「中間路線」來解決巴爾幹問題。但可否拿這作為真理呢？難道我們都不記得幾個月來美國代表盡其一切努力要把滔天大罪加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身上，要求採取憲章第七條來反對它們。難道我們忘記了他們大敲鑼鼓，如像在所有的紐約的屋頂上麻雀逐月鼓噪希臘北部狡猾的隣邦麼？希臘問題第一委員會進行了惡鬪兩星期，美國突然聲稱，它並不堅持控訴，如果希臘的隣邦同意調查團的設立。

到底什麼一回事？這做的是什麼夢？難道還不明白，事情不在於尋找「中間路線」來解決巴爾幹問題，如約翰生先生所相信的那樣，而事情是在於，而此種結論是完全合乎邏輯和正確，美國本身則不相信它自己的控訴，美國不能證明這些粗魯的控訴之公正。當發現這整個偽造的事件要垮台的時候，以及當對美國，不列顛或希臘代表任何人無傷大雅，而這些代表自己隨意侮辱人，為更加明顯的時候，應當越快越好地改變策略並尋找任何「中間路線」。

因此在舞台上出現了一位外交運動員的選手，鼓舞約翰生先生的斯派阿克先生。可是約翰生先生在自己的聲明伴來了類似威脅叫喊的警告。

斯派阿克先生及約翰生先生在建議做生意：放棄控訴——同意設立調查團的代價。此種提議——妥協祇有助於它的著作人真意之暴露。覺得重要的不是國際法的某種破壞，重要的是調查團，重要的是想用任何代價來達到調查團的成立。這是問題的癥結之所在。

此種「中間路線」的源泉和解析就在這裏。但站在這條道路上，同志放棄它自己的控訴，美國顯示，全世界也看到這一點，這些控訴是絲毫站不住的，分解這全部歷史是具有別種目的，與確立真理，一個真理，只有真理的任務毫無共同之點。

不，我們應當明白，都已從童年長大，已到不玩小貓和小鼠的時候了，我們應當明白不是一切都可成爲買物的東西。有此道德的價值，把這些價值，當作買賣來看，這種意圖是頂可怕的。藉口事件不是關於過去，而是關於未來，這種掩飾此種提議的意圖絲毫沒有改變什麼。抑就有進者，過去的評價對將來不能沒有頗大的影響，也如文法上劃分動詞的形態一樣。

真理與正直是不可分的。真理應當勝利，而且它勝利者，不管幻想把聯合國組織變爲實現他自己計劃的人們之願意，或不願意。

蘇聯代表團對本問題的態度就是如此。蘇聯代表團確信外國軍隊立刻從希臘撤退，無論是軍事的和民事的指導員以及所謂專家都是一樣，並賦予希臘人民依據民主原則自己解決本身事務，爲着巴爾幹各民族以及全世界各民族的利益，與隣國確立和平，合作及友好的關係，是這個問題唯一正確和公正的解決。

政治委員會如何通過希臘問題的解決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一日

當維辛斯基闡明了蘇聯絕不參加所設調查團的任何工作，以及絕不担任昨天在這個調查團中，爲蘇聯留下的職位後，他就轉到美國控訴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以及英法的修正案如何解釋這些控訴的問題。

——英、美、法集團眼前的希望是，要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在這個問題上，對過去麻痺而得到幸福，所謂麻痺，就是要他們只須關心未來，而這種未來是可以給他們一切便利，以實現美國決議重要部分，包括設立美國報紙現在已公開稱爲「巴爾幹警犬」的調查團。這是很中肯的表示。

至於問題的本質，我想，不完全如他們在這裏竭力描寫的那樣。約翰生（美國）聲明說，調查團的大部分委員相信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都犯有他們在這裏所記載着的一切罪行。但是，我要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約翰生自己是否相信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犯了這些罪行？我直接回答這個問題，——他是不相信此事的，所以他現在已經沒有任何條件，——我着重指出這個，——沒有任何條件馬上放棄依靠麥克奈爾之助的自己以前的控訴。

事實上，這兩週時光中，我們看到，使人侮辱含糊不清的美國決議第一九一號，其中說得確切而又明顯，美國代表團建議大會，認爲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破壞聯合國憲章，幫助並支持反對希臘政府進行鬥爭的游擊隊一事，已經成立。難道這說得不明白？難道對於控訴者的想法企圖還有什麼

疑義嗎？這里已經直接而且明確地說出，美國代表團認爲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的罪狀是已經成立了的。可是我們現在看見什麼呢？我們現在看見，美國代表團已經不認爲這個罪狀已經成立。小組會的大多數認爲罪狀已經成立，而美國代表團自己已不負該團所得結論的責任了。關於此事，現在既不作咕咕叫，也無一點聲音。難道這不是事實？爲什麼我們要裝貓裝鼠，扮演這一套小孩子的遊戲，當大家結成一個圓圈，他一個人竭力要抓住另一個人的時候，其他的人又去妨礙他呢？但在這個遊戲上，常常是貓上當的。我想，現在正是這種危險在威脅着竭力要捉住南、保、阿這隻鼠的約翰生。這支貓是爪軟齒利，他害怕在遊戲中失敗，所以他是如此仁慈，準備以最大的人道來對待沒有捉住的老鼠。（笑聲，全場騷動）。實際上，在提作討論時，我即指出，這里是在進行着一番買賣，是用一切的稱桿來壓榨的過程中，威脅，恐嚇，壓榨，逼迫，——他們是要迫使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承認這些實際上所沒有的事實，同時要發誓受這慈悲心的約束。只要你們發誓願做善良的好孩子，像在幼稚園中一樣，你們要聽那個女保姆的話，有時她很嚴厲，有時她很親愛和親切，而且是一步也不離地跟着你們的，那麼就準備給你們大赦令。他們勸告我們——你們同意吧，遵守這個秩序吧，就會萬事如意的；「羔羊到手，豺狼——的確是豺狼——飽餐」。〔會場騷動〕。

所以，在這個美國代表團的美式遊戲中，第一步就是肯定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造成反對希臘之罪。第二步就開始作買賣——迫使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同意這個調查團的設立，同時以大赦令爲交換條件。我又一次着重指出，這里主要的，是關於設立調查團的問題；將有一個調查

團產生，——事情將要進行得很好，將是爲了美國的利益，而自然不是英國的利益，因爲英國人已經戴上了帽子，他們說「Good-bye」，并且是忙着從希臘回家去了。而帶着自己目的的美國人，恰恰打算去希臘，像在家里一樣，因此他們就說：「同意這個調查團吧，根據某種打算，我們是須要它的」。（會場騷動）。

而這裏——是第三個階段。我們在昨天已臨這個階段了，當時，委員會在急忙的，確可稱之爲救火的情形下，根據事先預備來企圖取消的哥倫比亞的修正案，舉行了如此粗陋的表決。這個表決，甚至連那個哥倫比亞代表，自己也不完全明白，所以他用手一擺說：只要你立刻表決，你想作什麼，就作什麼，因爲偏頭痛症發作了。（笑聲）。在這一場同時的閃電式的精彩把戲之後，在表決中得到了在美國代表團看來很不愉快的結果。贊同美國控訴案的票數，收集起來僅有二十九票。於是，手持寬大，人道，着眼於未來的傳單而來的第三個步驟就開始了。（會場騷動）。這是一套把戲。但他們却對我們說：我們已經有了大多數。可是，對不起，第一，這被看成爲大多數的二十九票，只是由於等一小組委員會，不把放棄表決權者歸併在內的程序規則呵。這項規則，現在正在討論程序規則的第六小組遵循了委員會中討論。即使就算你們在形式上是對的吧，——難道可以漠不關心地拋開這十六個放棄表決權的十六個代表團嗎？應當知道，這是十六個國家的代表。不能拋開他們不算，好像計算餘額的會計師一樣，撥到二十九顆算盤珠時就想，餘額是他的利益一樣。但是，也不能忘記，其餘二十八個不支持美國的控訴案而放棄表決權，或者根本不參加表決的代表團。

如果，約翰生先生以爲昨天表決的結果是勝利，那麼我也會恭賀他的這個勝利，因爲這是慘勝。「紐約前鋒論壇報」說得對，它說這是紙上的勝利。顯然的，我不知道，今天的結果如何。完全可能。美

國代表團會做到增加贊同他的決議的票數的。我準備承認有這樣的變態。一切都可能突然發生，一切都可能有變化，因為現在有強有力的天秤，好像歐基米德的天秤一樣，如果它們不能顛倒整個地球，至少也能顛倒這個地球的一大半。（笑聲，會場騷動）。可是，如果講到昨天的表決結果，那就應當考慮所謂大多數，只能說這話的意義是會計師的，是形式上的。我們應關切一些國家和民族在此地所持有的政治道德的態度。所以，不能同意約翰生先生關於大多數代表團似乎既有準備，又有約束的支持對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和保加利亞的控訴的聲明。

第二個問題。如果約翰生先生仍然相信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真正犯了罪，那末爲什麼現在他已不向他們提出自己的條件——以減輕美國的控訴條款爲交換，同意與調查團合作？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代表，曾受過一次這件事的嚴厲質問。現在却把他們忘了。什麼都不問他們了。美國代表團已不提出任何條件，而只是同意採納法國代表團所提出的，即使是法國代表團自己已經放棄了他的自己的修正案，同時也裝模作樣的贊成麥克奈爾的修正案。在這個事情上，他希望與麥克奈爾合夥，但這個自然是趣味相投的事業（笑聲）。

所以，美國代表團的態度，有過三次變化。我肯定說，所有這些變化，都是預先定好的計劃的部份——最初提出最大的要求，其次是對希臘的北隣提出條件，再其次就是表示「寬大」而推到英國或法國的修正案上去。

美國決議的第四項中，認爲聯合國大會應通知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停止更進一步援助游擊隊。這里好像是說，這一項以間接的形式肯定了對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好像是幫助過游擊隊的控訴，這樣的控訴形式，稍微輕於直接的。這就是說一些醫生們的藥方，他們叫人吃蓖麻油

，同時拌合着咖啡，或者熱酒。這一付苦學這樣就更容易下喉。但是，這付藥方仍然無助於美國代表團，——因為蓖麻油味太濃了。這樣，就出現了麥克奈爾，這是一位手藝高超的廚師，他會以最好的方法拌合各種「白蘭地」，幫助他的，還有一位資爾波，於是從這個英法的廚房中，出現了新的飲料，它對你們好像是些新的東西，雖然本質上這些「修正案」，並不異於美國的建議。

先生們，這實在是可笑的。他們想把我們當作小孩子來欺騙，想要我們承認這個以間接形式的，對希臘北隣提出的破產了的控訴。可是，已經證明了，無論是南斯拉夫，無論是保加利亞，無論是阿爾巴尼亞，都沒有做過對他們所編造的事。特別是，調查團自己在这里常常引用的材料，將此事證明了。我現在問約翰生，資爾波和麥克奈爾：你們真相信控訴希臘北隣所根據的那些證人的口供，不是捏造的吗？你們相信這些證人當中，沒有假證人嗎？爲什麼在這神情況下，你們不辯駁我在此所說的呢？爲什麼你們沉默不言，或者竭力因故而言他呢？

因爲你們不能顛倒事實。你們不能顛倒關於鐵托元帥表示馬其頓事件是笨拙的偽造，以及供給調查團有利於希臘政府的口供的聲明，而解其套索的證人的口供，不能認爲確實可靠的聲明。也許，你們要我們改變信心，不，你們却默不作答。

資爾波先生會在此地說：「我們以爲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有參加希臘內戰之嫌，援助游擊隊之嫌，因爲要沒有這些援助，他們就不能越過邊境」。怎麼能根據這一些理由，就控訴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呢？如果你們去到維持治安的法官那兒說：「我認爲就有這位市民偷了我的東西，因爲這位市民會經幫助賊，否則賊就跑不掉」，——難道他就判他的罪嗎？如果他做了這樣的裁判，那這就是不公平的裁判。

賽爾波先生，你只是假定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幫助希臘游擊隊，而你沒有舉出事實與證據。我們已經指出，希臘的局勢的真正的罪人。這種局勢，是希臘現在政治體制的行爲，是英美干涉希臘內政政策，是英國軍隊和美國「專家」留駐希臘所引起的。誰想要巴爾幹的和平登臨王位，那就應從頭，而不應從尾開始；應從前提，而不應從後果開始，前提就是英軍退出希臘，蘇聯政府早在一九四六年一月，已經向安全理事會提出這件事了。在倫敦，他們會對我鄭重發誓：「是的，我們撤退軍隊；只要環境許可的時候」。可是，環境過去怎麼也沒有許可，現在也沒有許可，我並不認爲他們會馬上許可。（會場騷動）。

賽爾波先生說，只有兩條出路：或者處罰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或者對他免除一切懲罰，否則就會徒勞無益。然而，如果你們不相信自己的控訴，如果你們只是「認爲」希臘北隣犯了罪，那麼還有一個結論，即：當法庭沒有堅決相信被告人有罪的時候，它對於不足以證明，不够確切證據的事件，裁判是可以停止的。

我們肯定，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是無罪的，控訴他們是謬誤的，我們指出，誰是真正的罪人。但如果你們只是「認爲」，而你們對他們的罪行沒有信心的話，那末，你們就可以使用這個第三種結論了。雖然你們只是「認爲」，只是覺得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犯了罪，可是你們却盡力判他們有罪。

賽爾波代替推薦一個所有民主裁判用以解決的問題的方法的，是回到中世紀的風俗，及反動中世紀的理論，當他們以烙鐵來拷問被控人的時候，他們對他說：「證明你沒有犯罪吧。如果你經得住拷打，天會證明你是對的」，這是應當驚奇的。所以，賽爾波的整個論證，是立足在腐朽的虛偽的，反動的概

念上，是在反動的原則上——當各民主國家已執行着假定無罪原則時的假定犯罪原則。

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罪行，是沒有證實的。而現在，在這樣的情況下，利用某一些代表團沒有弄清楚事情的實況說：「應當設立調查團，一切都可以不必做了」。然而，不是已經證明，希臘游擊隊的鬥爭，不是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陰謀引起的麼？這有由於外國干涉希臘內政而引起的。這不單是希臘如此，在中國，在印度尼西亞也是如是，——一切有較大的強國，干涉較小國家內政的地方，都是如此的。無論用什麼調查團，無論用什麼人道和大赦的把戲，無論用什麼一心一意着眼於未來的意向，你們都不能隱瞞此事。

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反對麥克奈爾和賓爾波所提出的「修正案」。我們認爲它之有害，并非因爲它「溫和」，而是因爲要企圖在這個已經高舉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主權之上的犀利武器上蒙上一層玫瑰色的虔誠輕紗。我們反對這個。所以我們投麥克奈爾和賓爾波的「修正案」的反對票，正和我們反對不公正的，不能成立的，甚至引起它那些不敢說堅決相信所指各國的罪行，而只說自己揣想的擁護者們自己懷疑的美國控訴案一樣。你們人多，我們人少。你們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向作決定，但真理則不會由此改變自己的面孔。它只能因爲此地對這問題而作的一切，羞得面紅耳赤。

保衛聯合國的基本原則

一九四七年十月十四日在聯合國大會政治委員會上的演說辭

我們已經聽過了美國代表杜爾斯的演講：他對美國代表團提出關於設立「大會臨時委員會」的建議有所辯護，他在此地描繪了一幅戰爭結束兩年以後，和平的悲慘圖畫。杜爾斯說：「主要勝利國之間的協調，似乎成了少見的而不是正常的。全世界的人民，都焦急地担心中國國際局勢，並為這種局勢的緊張所恐懼」。波利維亞的代表，又對這事大為嘆息。他對經濟及社會理事會的工作，表示不滿。他甚至說，在經濟及社會理事會誕生之前，不會有過如此數目的社會糾葛和罷工事件，都似乎是由於經濟理事會而產生的。波利維亞的代表，也不滿軍事參謀委員會的工作。但他最不滿的，是在安全理事會中，運用了強國一致的原則——「否決權」。

波利維亞的代表把此項規定，說為其目的在反對各弱小民族的利益，而忘記了，或者是不願了解，它的目的正是為了要保衛各弱小民族，以及直到目前為止的一切情形下，此項規定的運用，都是為了保衛弱小民族的利益。相反地，各強國所採取的一切拋棄，誑誘，取消一致原則的企圖，都為「否決權」真正地擋住了道路，——當他們背道而馳的時候，就是在追求着與聯合國的目的，原則，和任務毫不相干的自己的目的。

杜爾斯閉口不言的是什麼

無論如何，杜爾斯所描繪的，及後來又為波利維亞代表所增補的一幅圖畫，是夠確實說明它本身是什麼樣的圖畫。我只須說，在杜爾斯描繪這幅陰森森的圖畫的時候，他忘記了，或者是不願意，也許是不

敢把那些最本質的東西，添上他所使用的色彩。他忘記了，或者是不願意，也許是不敢說到杜爾斯知道非常清楚的反動集團所煽動的，放肆到不可饒恕的新戰爭宣傳，戰爭的神經病。（在家裏上吊的人，不說繩子）。戰爭販子們的活動，造成了比那幅杜爾斯開始描繪的，但在畫布上嚇人突然又停止了圖畫，更爲陰森，更爲駭人。

我再說。如所週知，做玩火的危險把戲的，不僅是各色各樣的神經病者和瘋子，而且也有在他們的社會上佔有著名地位，以及對某些國家的，首先是美國的，政治方針上有嚴重影響的人們。當感嘆聯合國軟弱無能的時候，應當回想一下這個把戲——玩火的危險把戲。在這種條件之下，必需盡最大的努力來全面鞏固聯合國，全面剷除一切可能破壞它的力量，打擊它的威信，減少它的影響的東西。因爲聯合國是爲了鞏固各民族的和平安全而設的。

同時，在這裏受到波利維亞代表如此急忙和熱烈歡迎的美國建議——關於設立「和平安全臨時委員會」的建議——，非但不能負起鞏固聯合國的任務，而且會直接走到相反的目的。此項建議的實行，不僅不能鞏固，而且也會削弱聯合國，同時也會削弱對抗戰爭販子的力量；因爲，如果聯合國軟弱了，那時就沒有阻止爲了新戰爭的利益，現在日益強大起來的叫人作嘔的一長串謠言和宣傳的障礙了。

蘇聯代表團深深相信，在這樣的條件之下，任何削弱聯合國的方法，都是戰爭販子們所鼓勵的行爲，都是新戰爭宣傳所鼓勵的行爲。杜爾斯忘記了，不願意，或者也是不敢在這裏說到此事。

美國論證的破產

美國建議案本身表現爲什麼呢？在提出此項建議的時候，美國代表團受什麼動機指使呢？美國國務

卿馬歇爾，以及美國代表杜爾斯曾經聲明說，關於設立「臨時」，或者有時他們稱之爲「實際」或「永久臨時」委員會的建議，首先引起大會應處理的問題，變得複雜和範圍廣大。因此，照美國代表們的話說，「臨時委員會」應爲減輕大會的困難，幫助它執行多方面的任務而設的。

然而，這里都是完全與他們的說法相反的情況：起初，是他們將那些不應當，照憲章規定，不能屬於大會權限之內的問題，用來加重了大會的負擔，後來他們又說，大會扭負了非常多的問題。我應當提醒：美國代表團硬要要求列入這次會議日程的朝鮮獨立問題，與大會權限的問題，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呢？尤其是，如美國代表團所知，蘇聯政府曾建議給朝鮮人民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可能性，同時必須在一九四八年初以前，美蘇軍隊應自朝鮮撤退。難道問題的這樣提出，不是解除討論美國政府硬要要求將朝鮮問題列入本屆會議的日程麼？可是爲什麼一方面感嘆大會中的事務太多，以及它不能處理它們，一方面美國代表團仍然堅持非將這個解決辦法已經十分顯明，并且絕對無可辯駁的問題，列入日程不可呢？請你們把自己的軍隊撤出朝鮮，我們也撤退自己的軍隊，讓朝鮮人民自己決定自己的命運吧！

這裏引以爲憾的，是許多各種各樣的問題，都在日程之中。自然，對於大會之工作，加重負擔和加深困難的，不是小的，不是次要的問題。它的工作之所以變得複雜，是由於那些顯得很困難和引起爭端的問題，列入日程中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這樣的例子如對義大利的和約問題便是。難道將這個問題列入大會日程，能够證明有什麼是處麼？然而他們終於將它列入，不顧任何邏輯，而波利維亞代表但勢必顧及并不顧及的法律邏輯的。

結果如何呢？一方面，使我們相信，由於它的事務太多，及由此它也無力處理應辦之事的麻痺，威脅着大會。而另一方面，大會上可以進行討論的，與若干國家和民族的幸福最有關係，和有最大成就的

問題，就會把日程連成一條無限長的線。這裏我沒有看見過邏輯。大會超負荷的口實，是人爲的。它只是用來作爲證明美國代表團提交大會討論的建議的口實。

問題根本不在擺在大會面前的問題之多寡；問題也不在，如美國代表團以前所肯定的，希望改善聯合國的工作。今天，美國代表爲自己的建議而提出補充理由的時候會說，設立「臨時委員會」或「小型大會」——有時他們又叫做委員會——，是給與重新取得社會信心，提高聯合國的權威，鞏固，挽回所謂聯合國已往的威信的可能性。

我不以爲可以挽回，或者鞏固還未建立起來，但總算形成了的新任務。同時，許多人都嚴重地湊說着，萬一這個機會失去，就再也不回來了。

美國草案目的是取消安全理事會

也應當說，美國代表在辯護自己的建議時說，聯合國的根本缺陷，是它的手續，正如他所說的並未與擺在它面前的問題，「不合拍地」進行。因此，這就是警告我們說，美國有一個關聯到安全理事會之手續的建議。這裏我們就有，揭穿美國關於設立「臨時委員會」的建議所追求的真正目的可能了。此項建議是因爲安全理事會所通過，但未能滿足某人的手續而提出的。所以這就產生了設立新機構的企圖，以便削弱，取消，及避開安全理事會。這個安全理事會，是聯合國憲章託與支持國際和平及安全的主要責任，以及受命代表聯合國全體會員國家而活動的。

自然，我的反對者們會對我說，在美國決議的草案及美國代表的聲明中，特別說明新機構有尊重安全理事會權限的義務。但我們知道諾言的價值，反對它從來就可以順利地說成事物的邏輯，事件的邏輯

。當辭藻的邏輯與事物的邏輯作決鬥的時候，勝利永遠是屬於事物的邏輯的。

在企圖限制，如果不完全是取消，安全理事會中所存在的，以「否決權」之名見稱的一致原則以後，就立刻提出設立「臨時委員會」，這不是偶然的，它碰到了憲章的銅牆鐵壁，就成爲無用之物了。

這時說得很顯然，要不對憲章加以大事破壞，——甚至射手們自己也害怕這項危險事業——一致原則就根本不能有什麼改變，於是登場提出新計劃了。現在，打算要設立一個與安全理事會平行的另一個機關，其權力不會比安全理事會小，並且除開安全理事會之外，它自己也有權解決，照聯合國憲章上規定，只能而且必須由安全理事會解決的問題。美國所提的建議，是由於避開一致原則，及在聯合國中建立損害其餘強國和整個機構中一切國家的權利與利益的一個強國集團的新權的企望所產生的普遍計劃的一部分。

誰想變安全理事會爲追求自己的，與聯合國組織目的毫無關係的，狹小集團目的的強國集團的政治工具，那末一致的原則，就是他們道路上的嚴重障礙，這已不是祕密了。

美國代表團所提出的這個委員會——的本身稱謂「和平與安全問題臨時委員會」，本質上與安全理事會的名稱并無多大區別。它已洩露出這個委員會創造人的願望和計劃的祕密想法。有幾家美國言論機關，評價美國的建議案爲比建議取消安全理事會中一致原則，更爲有效的手段，這不是徒然的。九月十九日，「紐約郵報」在社論中直接寫道，設立「臨時委員會」，可能更有把握達到那些堅持取消一致原則的人們給自己提出來的目的。九月廿六日「紐約時報」指出，「臨時委員會」担負這樣的職務，如果安全理事會失去作用的時候，希望這個委員會能採取迅速的措施。

所以，這里所說的這個新委員會，實質上必然是取安全理事會而代之的。無論用什麼美麗的口實，

——是大會超負荷的說法也罷，是必須恢復聯合國威信的考慮也罷，都不能隱蔽這種想法的。想以新機構將安全理事會取而代之的，美國建議的真正目的，在人們的眼睛中看來是如此尖銳，以至美國代表團在最後一分鐘，對它所建議的委員會，馬上取消暴露得過份顯明與安全理事會的任務相同的，和平與安全問題名稱的引用。

這個委員會的名稱改變，也是一種見機行事，這里有家紐約報紙，透露出這件事，我現在摘引一段：「國務卿馬歇爾曾在大會上聲明說，他所建議的委員會，其任務并非「干涉」安全理事會，以及其中任何小組委員會的職權，但顯然的，許多代表都不以為然。這就可想而知了，如果美國的建議不作如此改變，它就不能獲得大會所要求的三分之二票數。現在一般以為，即使有蘇聯及其擁護者的堅決反對，它也會獲得三分之二票數的。」

所以，自己改稱「臨時委員會」，取消其中和平與安全問題的引用，是為要鎮懾那些被唬住了的代表們，這般人是不可能拒絕贊同這個其醜惡的本質已暴露無餘的美國建議的。該報繼續說：「據說，困難是在「小型大會」的觀念，與企圖將比包括全體會員的大會更要廣泛的，對於和平與安全的控制權，授與這個委員會有關聯。據悉：美國建議的改變，目的就在要保證獲得所要求的票數，或者，最低限度，是使人容易了解這個建議的解釋」。這就是為什麼「和平與安全」這句話，今天不用來作為這個委員會的名稱了。

杜爾斯在不久前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他說，不必在名稱上強調那個引起批評（講到的正是這些話——「和平與安全」）的因素：實際上這個「因素」已經從名稱中立刻取消了。但是，改變的只是名稱，而專情的本質則依然如故。

杜爾斯在這次記者招待會上說，關於設立「臨時委員會」的美國建議，我的批評是，這個建議不是我所計劃的那種恰當方式的一個結果。杜爾斯在作這些聲明的時候，把許多事都放在自己身上。最好是美國代表團，事先應當想好它所提出來的建議，——也許，那時它就不必在決定名稱的過程中，改變自己關於所提設立機關之權限及職務的決議和規定了。

如果，你們拿九月十七日馬歇爾的演說和今天杜爾斯的聲明作一比較，那麼可以看出，在美國的建議中出現了許多新的暗影，和許多舊的暗影被塗抹。所有這一切，都是爲要保證支持美國建議的三分之二票數而作的。因此，從九月十七日起，我們就看出美國建議的改變，修正、迎合、渲染的過程了。這個過程不正是證明了，爲什麼杜爾斯竭力非難我？不正是證明了美國代表們的手腕考慮欠週嗎？

關於「臨時委員會」的職權

我曾經說過，接觸到討論妨礙各國友誼與合作的情勢及爭端的「臨時委員會」的職權，與特別是憲章第三十四條所規定的安全理事會的職權，并無不同之處。杜爾斯反駁這個說，這些職權的規定，是根據提及大會權力的憲章第十四條的。但是，第一，第十四條中毫未提到爭端：它們甚至沒有記載在那里，第二，杜爾斯自己曾經承認，「除此之外」，還有幾句摘自第三十四條的話，其中講到安全理事會的權力。但是，我所肯定的不正是這個麼！

在憲章第十四條中說，任何足以破壞各國間公共福利或友好關係的情勢，不管起因如何，大會有關建議和平調處的方法。關於爭端這里毫未講到。相反地，在第三十四條中會說，安全理事會有權調查足以引起國際摩擦的任何爭端，或任何情勢。

自然，我懂得，從某條條文中，摘出規定「臨時委員會」的某項規定，不是太重要的，但是，現在我們中間進行的爭論，有原則上的意義。如果，美國建議案的作者們，依據規定安全理事會權力的條文，而定「臨時委員會」的權力，那就明顯地指出他們智謀的企圖。這個建議案的作者們，以這種方式活動的時候，顯然使人了解，「臨時委員會」最重要的職權，與安全理事會的重要職權，絕無什麼區別。

杜爾斯希望，我的幾項辯駁，在想法上不是創見。我是站在我自己的立場上的，不是專把希望寄託在杜爾斯的想法上的，因為，那里是受利益、便利、利潤指揮，那里沒有客觀想法的地位。

其次杜爾斯提出一次問題，如果「臨時委員會」和安全理事會之間，產生了裁判權上的抵觸，將如何處理。這是很重要的問題。雖然，他在前面說得這樣簡單，但我應當說，杜爾斯自己在九月廿六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出的這個問題，正是證明了「臨時委員會」和安全理事會的職權交叉，重複、表現為同樣的說明。杜爾斯怎樣回答呢？他說，如果產生了這樣的抵觸，那麼，在大會與安全理事會之間，也會有同樣的抵觸產生。請注意，杜爾斯沒有除去「臨時委員會」與安全理事會之間，發生裁判爭論的可能性。但是，第一，是不知應當怎樣解決在大會與安全理事會之間的這種爭端；第二，如果按照杜爾斯的說法，那就會成爲「臨時委員會」看來之大，是大到既像大會，又像安全理事會的。在兩種場合下，這樣的結論，顯然與憲章相抵觸。

有人對我們說，大會有關設立任蔣輔助機關，因此，美國的建議案，不僅沒有破壞憲章，而且是依據於它的。然而，所有這一切杜爾斯在九月廿六日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出來的說法，都說明，這話講的不是主要和輔助的，支持的機關之間的關係，而是說，在同樣大的，我說，是獨立（雖然這話現在在此地

不受歡迎)的機關——大會，安全理事會，以及「臨時委員會」——之間的關係。

杜爾斯在今天的演說中，道出了「臨時委員會」的廣大職權。他所列舉的第一項職權，是關於維持和平與安全的問題。「臨時委員會」有權，如這個演說中所說的，調查事實，及對大會次一屆會議報告自己的觀察。如果這個委員會將調查各種因維持和平與安全問題而產生的各種事實，那麼你們應同意這是很重要的，大大超過輔助機關之外的職權。

第二項職權，杜爾斯稱之為「連續的職權」，其特性如此，如果大會的會議，作了某項關於維持國際和平，安全，以及友好關係的，要求不斷加以注意的議案，那麼，大會在具體情況下，可以將此項義務託付給「臨時委員會」。所以，可見這個委員會將控制大會議案的執行。控制的職權——重要的職權。

第三項職權，照杜爾斯的話說，是使大會可能製定關於實際維持國際和平之普遍合作原則的議案而決定工作。同時，杜爾斯引用規定大會得考慮實際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以及組織研究并製定為促進國際合作議案的憲章第十一條和第十三條。換句話說，這個「臨時委員會」的第三項職權，完全與憲章付與大會的權力一致。所以，大會與「臨時委員會」的職權，完全是一致的。

「臨時委員會」的第四項職權，不代表大多數的利益，因為這只是為委員會的自動復權的職權所需要。它的設立，是作為一種實驗，但同時又強調說，本質上說，這是永久的機構。它之所以是臨時的，由於以後它自己需申請繼續活動及變為永久機構，是否認為合乎目的，所以它才必須作為臨時機構而活動。完全顯然，美國代表團提出自己建議的時候，已經充分衡量并決定了，應當用什麼，以及如何結束這個「實驗」。毫無疑義，如馬歇爾和杜爾斯的發言所透露，「臨時委員會」的設立，是希望它成為永久

的，並且，如杜爾斯所說，使其可能利用整個聯合國的「不動財源」。

這個委員會的「基本職權」，就是如此，他們對我們說的就是這個「四項主要職權，但沒有提出除開這些基本的以外，委員會還會有些什麼職權。可以不必懷疑，還有其他的職權，不過沒有說到是本本的而已。但這些基本的職權，已够使人注意了，所以很明白，「臨時委員會」無論如何不能歸入輔助機關之列。

憲章及經過大會臨時規則規定設立的輔助機關，是這樣的機關，其任務是協助大會爲其職權的。憲章中規定設立這種輔助機關的，不僅是大會，而且也有安全理事會。但憲章所規定的一切場合下，這些機關不能有獨立的職權，只應當是大會及安全理事會的助手。

但是，假如你們注意研究美國代表團建議分與「臨時委員會」的職權，那就可以看出，這些職權大大地超出了輔助性義務的範圍。他們是有獨立意義的，並且是這種直接抵觸憲章的。美國的決議草案直接指出，「臨時委員會」應執行調查及任命負有它可以認爲有用和必須的義務及職權的委員會。所以決議的這一條，授與「臨時委員會」的權力，比憲章付與安全理事會的，還大得多。事實上，根據憲章第三十四條規定，安全理事會有權調查的，僅僅是足以引起國際摩擦或惹起爭端的那些爭端和情勢。這是一個限制。第二個限制在同條中指出：諸如此類的調查，只能有一定的目的，即是一定要這個爭端或情勢的繼續，是否會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維持。所以，屬於安全理事會權限之內的，不是國與國間的一切爭端，而只限於憲章第三十四條所明文規定的。安全理事會不能，也沒有提高自己的權力，不能，也沒有進行調查超出第三十四條所定權限之外某種事實。

但美國代表團建議的是什麼呢？它建議將毫無限制的調查職權授予「臨時委員會」。建議要「臨時

委員會」執行調查，及任命負有它可以認為有用和必須的義務及職權的調查團。這就是說，所指的不僅是足以引起某項國際摩擦的爭端，而且，這個委員會應有權處理它希望，及它認為合乎有利目的的任何問題。

這就是行將到來的「輔助機關」！說「臨時委員會」，說輔助機關都一樣，——這個機關所有的，就是這樣的權力，——就是說扮演一幕傀儡戲。

美國代表團想得到什麼

事實上，美國代表團想象中的「臨時委員會」，是比安全理事會有更強大，更有力，更廣泛職權的機關。這個機關的責任，是毫無限制的。這就是美國代表團想設立的機關。但為使那些沒有成年的聽眾安心，他們說，你們看見嗎？這不是破壞安全理事會的權限和威信；所談的不是和平與安全，而僅僅是三個卑小的職權，再加一個自動復權的職權給它。所提出的這一切，是設立一個不犯法的輔助機關！

我奇怪，當聽到諸如此類的說法時，為什麼沒有第一小組委員會的委員，——無疑這是外交紀律的效力。安全理事會——它沒有支配着如美國草案建議授與「臨時委員會」那樣廣泛的職權。這不是輔助機關，而是一個委員會頭上的委員會，是一個能作得愈好就愈不感興趣，有權或無權它都要幹的太上委員會。他們對這個委員會說：你想插足到什麼地方，你就去調查吧，那里需要，就去那一國。結果，你們知道嗎，這個委員會的獨裁，破壞了一切民主原則，——即使就去破壞憲章的情形下，也常常掛着民主的招牌。這個建議的主使者們所追求的基本目的，正是如此。

我們不知道，是否因為馬歇爾所決定的美國建議，所以「臨時委員會」就可以研究損害友好關係

的情勢和爭端。對於這個，美國代表團當時閉口不言。然而，可以不必懷疑，——即使對於這個，杜爾斯在今天保持着緘默——，美國政府一定會利用一切可能性，一切漏洞，以達到將聯合國其他機關的，首先是安全理事會的，更大的權力，授予「臨時委員會」，這是完全明顯的。

關於設立「臨時委員會」的建議，我可以說，是要根本上，原則上破壞憲章。聯合國，是根據憲章條文及規定而設的。聯合國各機關的權限、權力、及職權，在原則上都有明確的規定。在憲章第七條中，曾提到主要和輔助的機關。作為聯合國各主要機關的，是大會，安全理事會，經濟及社會理事會，託管理事會，國際法院及祕書處。憲章第二十二條和二十九條，以及通過的臨時法規第一百和一百零一項中所指的輔助機關，是如果沒有大會及安全理事會的特別委託，——其委託和執行，即變為該輔助機關的活動——，無一個支配着屬於這些主要機關權力的輔助機關。

反對破壞聯合國憲章

我們在此地聽到敘述設立和平及安全問題臨時委員會的建議，并不新奇。美國代表團甚至不想要這個思想的著作權，他承認說，設立這個委員會的意思，是根據荷蘭要求。實際上，在一九四五年十月，荷蘭代表團在預備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會上，建議設立一個包括十八個會員國，但其職權比他們目前所要授予「臨時委員會」還要小得多的永久委員會。然而，當荷蘭代表團自己認為其他大多數代表團否決其建議的時候，它就要求不必解決是否應當討論這個建議的問題。它不僅不為自己的建議辯護，並且還要求不必解決是否須要討論它的問題，——這個建議大家都是如此討厭。荷蘭代表團當時聲明說，它準備在執行委員會的報告中，對它所提出的這項建議，以簡單的說明未滿足。但荷蘭代表團的這個要求，沒

有能够滿足。

一九四五年十二月，當預備委員會召開會議的時候，荷蘭代表團又提出自己的建議。比利時代表團支持它。但第一小組委員會的大多數，當時都反對設立和平及安全委員會，并聲明說，設立這樣的一個機構，觸犯到安全理事會的特權。自然，這是正確的。拒絕兩年前所提出的荷蘭建議的第一小組委員會的決議，是無條件公正的。從前是荷蘭人提出來的機關，而現在是美國人提出來的機關，正如我已在此地指出，其結果是要設立可以把安全理事會的最重要職權，抓到自己手上的委員會上的委員會，太上委員會。諸如此類的策略，是要剝奪聯合國憲章所委託的，安全理事會担負國際和平與安全主要責任的可能性。

蘇聯代表團認為，聯合國現在想走的一步，是破壞聯合國持久性的一個新步驟，聯合國的力量，是目標一致，意見一致，行動一致。尊重實現這一切，并以這一切來活動作爲基礎的，聯合國的不能侵犯的原則，是這個機構的持久性和生存性的基本條件。

如果這個機構的憲法自己崩潰了，如果那些組織的形式自己瓦解了，而除此之外又不能有任何聯合國存在，活動，如果聯合國所依以存在與活動的原則腐蝕了和毀滅了，那麼如何說尊敬這些原則呢？

這就是爲什麼蘇聯代表團，反對美國代表團及美國政府關於設立「臨時委員會」的建議案，——這個建議案，是要對聯合國憲章的基本原則，大加破壞，以及可以使聯合國衰弱無能，崩潰，瓦解的。

論希臘問題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日在聯合國大會上的演說辭

一、希臘問題的歷史

大會準備考慮日程中威脅希臘政治獨立及領土完整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第一委員會繼續討論的對象，該會已向大會提出自己關於這個問題的報告和建議。

蘇聯代表團不能同意你們以第一委員會大多數名義討論提出的建議。蘇聯代表團認為這些建議是不正確的，沒有任何根據的，因此，完全不適於解決希臘問題的目的，和除去一方面是希臘，與另一方面的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之間的不正常現象。

聯合國機構中的希臘問題，有它自己的一段歷史。也許談談不算多餘，去年一月廿一日，蘇聯代表團受蘇聯政府之命，曾建議安全理事會考慮希臘局勢，及根據聯合國憲章第三十五條採取措施，以消除此種局勢。

當時蘇聯政府，怎樣及爲什麼要安全理事會注意希臘問題呢？當時，安全理事會的英國代表貝文先生，企圖把事情說成這樣，他說，在安全理事會中提出希臘局勢問題，蘇聯政府是別有用心的。至少，貝文在一九四六年二月一日的安全理事會會議席上，當直接聲明說：『在與蘇聯政府商議時，從來沒有發生希臘問題，但當我們考慮到羅馬尼亞，保加利亞，或波蘭問題的時候，這個問題總會產生』。以下又說：『我們無論什麼時候，涉及到有關歐洲任何其他部份，這個問題總會作爲對英國的反攻而發』。

生。」

去年貝文的這種聲明，當然是毫無根據的。事情不是什麼對英國或美國的反攻，這事從前不是反攻，現在也不是反攻。問題的癥結，在希臘的內部局勢，這種局勢已成了各民族的安全和平的危險起點，首先是希臘三北鄰——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命運的危險起點。早在一九四五年七月，蘇聯政府會根據關於解放歐洲的雅爾達宣言，在柏林會議上提出備忘錄，其中指出希臘局勢的特徵是秩序不穩，不尊重法律，對於與歐洲的德國佔領軍及希臘的希特勒匪幫進行鬥爭，肩負衆所週知的重担的民主份子，施以殘暴恐怖政策的局勢。

過了一些時候，即一九四五年九月，即是離前面所提一九四六年安全理事會的會議相當久，蘇聯政府會向倫敦外長會議第一屆會議提出關於希臘內部局勢之新備忘錄，其中的開宗明義第一章就說，來自希臘的消息證明，國內局勢非常緊張，其後果對於希臘人民及與希臘相鄰國家的和平與安全，都是同樣的萬分嚴重的。這個來自蘇聯政府方面，關於希臘不正常局勢的，當時即已指出，其後果對於希臘人民及與希臘相鄰國家的和平與安全，都同樣萬分嚴重的警號，并未獲得英國方面答覆。然而，日趨惡化的希臘政治情勢，喚起蘇聯政府在一九四五年十月十六至廿六日的三國外長會議上，重提希臘問題，同時，關於英國軍隊留駐希臘的問題，也全部提了出來。

一九四六年一月，蘇聯政府向安全理事會提出希臘局勢問題，是從四大重點出發的，其中的中心要點，是關於英國軍隊留駐希臘的考慮。蘇聯的備忘錄中指出，英國軍隊留駐希臘沒有必要，事實上這已經變成對希臘內政局勢的壓力的手段，并且這種情況，常常被希臘反動份子利用來反對國內的民主力量。由此，就得出英軍必須撤出希臘的結論，無疑地，這就會給希臘的生活帶來迫切需要的安定和秩序。

據說，英軍留駐希臘，是爲了維持秩序。但英國人在希臘不是已經維持了兩年的秩序嗎？而秩序還是沒有。維持希臘秩序，這是希臘人的內部事情。具有英雄古希臘光榮民主傳統的希臘人民，自己無需外國軍隊的幫助，有力量處理自己的內部的。希臘人民不需這樣的幫助。希臘政府所籲請的這種援助，是爲了要支持反對人民意志的政權。直到今天的這兩年多以來，希臘事件的全部過程，已確定了這件事。

二、希臘選舉的偽造

柴達里斯——蘇福里斯政府的代表們，要我們相信，他們是獲得希臘人民信任的代表政府，他們的藉口就是，一九四六年的四月選舉的其結果是柴達里斯及其夥友們掌握了政權。

可是，現在總理蘇福里斯，在去年三月的選舉前夜，不是曾經聲明說：「根據得自希臘各地的情報，除了保皇份子之外，誰也不能自由提出候選人，及自由發表意見」嗎？難道當時的副總理卡芬達里斯和曹德羅斯的辭職，不是因爲他們不能與選舉的醜劇妥協嗎？那時卡芬達里斯不是會說：「我們馬上就會變選與爲醜態畢露的抄襲，製造巨大的危機」嗎？

這個聲明是誰公開作的呢？這是當時的希臘總理和現任希臘總理蘇福里斯，以及他的兩位副總理——卡芬達里斯與曹德羅斯——作的。

當時的內政部長哈文尼斯，說艾皮爾的選舉「不外乎是藉暴力和恐怖之助，任命齊爾伐斯爾的伙伴們爲候選人」。

難道蘇福里斯不是聲明過，正如一九四六年九月七日，即是這個普選傀儡笑劇之後一星期，「BBC」報上所載的這事一樣，「只有心地險惡的人，才能說到普選，因為希臘不會有普選，即使有也是事先佈置好的機關佈景」嗎？

難道倫敦「泰晤士報」記者不會指出，「中立觀察家，都懷疑普選的真實」，而三位英國見證人——英國爭取希臘民主同盟執行委員會委員，英國議員多德、蒂芬尼、梭里，不是在「希臘悲劇」一書中，會引用過一九四六年選舉的許多笨拙偽造的事實嗎？除此以外，還可以在這本書中談到下列的句子：

「我們，希臘的社會主義者，由於他（貝文）的政策而名譽掃地，所以人民對我們說：「如果你們屬於貝文的黨，我們就不能跟着你們走」。他們都團結到更左的方面去了。英國工黨在普選中的勝利，對於希臘的我們大家，是狂歡的一天。但是，一天一天地，我們漸漸失望了。英國軍隊的留駐，在希臘惹起對英的惡感，以及最近兩百年來的友好感情，降低到最後的界線」。

同我們講到選舉的時候，前閣員蘇福里斯說：「貝文先生從得自我這兒的情報中知道，選舉結果，是極右派獲得了勝利。我也對他說，極右派所用的第一步措施，是要恢復君主制度」。

在我們訪問的時期當中，我們確認，除了極右派之外，大家都說，選舉是以欺騙，叛逆、恐怖手段、殘殺、以及一切可能賄賂的方法進行的。」

關於普選，上述三個英國作者，告訴我們和當時的希臘總理蘇福里斯一段很重要的談話，如所週知，蘇福里斯現在也領導着希臘政府。

三位作者以蘇福里斯的話告訴我們，他和貝文會有過協議，即二年以後，在一九四八年實行普選，

否則反動派就會勝利并且會有「反動國家」出現。

三位作者轉述蘇福里斯的話說：「我希望貝文是誠直的人，能遵守諾言，并且堅持執行計劃的第二部分——遵守普選日期。相反的方面，我害怕會發生內戰。我希望能轉達貝文，如果他記得我和愛希臘，他就應當實行關於普選的諾言」。

其次論及關於這些「選舉」的歷史，蘇福里斯指出據希臘內政部的報導，二、二一一、〇〇〇選民中，參加投票的有一、一一七、〇〇〇選民，棄權的有一、〇九四、〇〇〇選民。

這就是英國軍事當局，在希臘維持秩序的總結。

在外國軍隊監視之下，希臘的這種「民主」選舉經驗，現在又鼓勵馬歇爾先生用來對付朝鮮。

從奧斯汀先生致李先生關於朝鮮的信中看得出來，在朝鮮舉行選舉及組成朝鮮國民政府之後，美國政府擬撤退朝鮮駐軍。換句話說，朝鮮的選舉，美國政府企圖依照希臘的形式，在自己軍隊的庇護之下，再舉行一次。的確，壞樣子一學就會……

希臘代表，怎麼可以泰然地引用這些東西做口實，怎麼可以說這次所謂選舉是證明了柴達里斯——蘇福里斯政府產生得合法與民主呢？這個政府，現在是如此頑固地受英美政府庇護，以及希臘人民又是以如此勇敢和英雄主義地來反對他。

回到希臘問題的歷史時，就應當敘述一九四六年，貝文在安全理事會中所作的如下聲明：

在貝文先生聲明的這個文件中說：「至於希臘，我們會盡我們自己對希臘政府應盡的義務，我們的軍隊將要撤退，而我們也不會創造威脅，或擾亂某一個其他國家。」

雖然沒有說明，這些義務究竟如何，蘇聯代表團鑒於這項聲明，曾經宣佈，由於熱望合作，他同意

討論希臘問題，由主席聲明結束，無須正式決議。蘇聯代表團認為可以同意，全部事情，由安全理事會主席（當時作主席的，是澳洲代表邁庚先生）以非正式的聲明告一結束，及在這聲明中說明，鑒於英國政府答應在儘可能短的期限內，撤退自己在希臘駐軍，認為這個問題在這次會議上是圓滿告成了。當時所討論的希臘問題，大致在這種精神上結束的。

三、希臘的暴虐政體和外國軍隊

從那時到現在，已經過了一年多。英國軍隊還是留在希臘。并且又加上了美國軍隊和教官及專家之類。希臘的事情，不僅沒有改善，而且更加惡化了。內戰進入高潮。

我必須提醒大會注意，「希臘民族團結」總部今年八月寄給聯合國秘書處的信。這個呼籲，是在用恐怖政策和野蠻手段對付希臘人民優秀人物之下，要求聯合國保護希臘的愛國者，發自痛苦的內心的呼籲。「希臘民族團結」總部告訴我們，不久之前，希臘政府逮捕了二萬五千公民，把他們放逐到那里已經有七千個流放者的愛琴海上一個不毛的荒島上去。伊卡利亞及其他的島嶼（萊姆洛斯，阿那菲），也擠滿了流放者。被捕送到皮西塔里亞荒島上的人們，大批大批地餓死。從這信中可以知道，在希臘被監禁和流放的全部人員，約有五萬，同時，大半人等了兩年多，還沒有審判。

囚禁在監牢裏的人們，常常被右派匪徒殺害，這樣的事，在尼格里特，在克里特和馬其頓的許多城市曾經發生過。

總部的信上指出，根據軍事法庭的判決，有組織地大批槍殺羣衆，并且要求聯合國，對這事作人道的干涉。

第一委員會中的希臘代表，自己怎麼能有勇氣說，希臘是民主的典範，這是民主發揚光大的國家呢？這就是他們的民主：五萬流放者，以及有系統地被毒打和殺害的希臘愛國者，「希臘民族團結」總部會提到他們。

這封證明目前希臘政治制度，造成了難於形容的恐怖的信，是不能漠視的。

希臘的外交立場，更加混亂不清，必須直接指出，這事的主要責任，應由作為希臘政治上主要因素的英美負擔。我們應當重新根據美國政府的發起，來研究這個問題，但是在另一個計劃中，可惜所提出來的希臘問題，完全是顛倒是非，歪曲事實的。如果不注意事情的這一方面，那末，蘇聯代表團就是沒有在聯合國機構和全世界面前履行自己的職務。

雖然英國政府答應履行他的義務之後即從希臘撤退自己的軍隊，但這些軍隊直到現在仍留在希臘。英國所謂對希臘的義務，不過是一張空頭支票，開支票的人，過去不想兌現，現在也不打算兌現。同時，對希臘民主力量的進攻，特別加強了。國內的情勢，變得非常緊張。關於這種緊張，不久前美國駐希臘代表團前任團長波爾特曾公開聲明：其特徵是「深深感到民族的絕望」。他指出這種情勢的原因，就是由於政權握在「少數的銀行和商人集團之手，非常堅決地首先保衛自己的財政特權，不惜任何代價犧牲國家的命脈」。在這位權威的美國希臘問題專家公開發表的意見之中，可以說是說明了英國人，爲了自己的利益，多麼勇敢地利用着現在希臘政府的上述性質。我應當引用波爾特文章中的以下各點：

發表在「柯斯勒」雜誌中的波爾特的一篇文章中，我們可以讀到：「在這種場合下，英國人常常利用與當地統治階級合作的方式，以保證他們剝削羣衆的權利，收買他們的支持，以及在憲兵和鞭笞的幫

助下，依靠他們壓迫人民。」

英國對希臘政策的路線就是如此的。這個路線，是要摧毀民主運動，並鞏固在英美軍事當局支持之下奪取希臘政權的反動集團。這個路線，已經走到，其實也不能不走到，像一些美國政治家所謂，現在可以拯救希臘，不過是「奇蹟」的這種地步。

我不打算分析希臘現政府的性質，和由於他的內政活動而引起的一切事件。但也不可以漠視這些事件，在蘇聯代表團看來，就是因為在蘇福里斯——柴達里斯政府的內政活動中，正有着那一切引起大會討論希臘問題的，對外政策糾紛的基本原因。

第一委員會，也注意到問題的這一方面了。

最低限度，由挪威代表在十月七日所作的聲明中看來，可以作出這種結論：目前希臘不穩局勢的主要原因，就是希臘內部的敵對。爲要除去歐洲這一部份的和平危機，挪威代表建議實行三項條件，其中的第一項，就是有關希臘內部情況的，而第二項，是撤退希臘的外國軍隊。這第二項條件，是這樣說的：

蘭格海爾說：「我的代表團並不懷疑，如果希臘政府和有關強國能共同設法在撤退希臘國境外國軍隊的結論中，找尋一條道路，那時，一切因此而生的困難，就會大大地減輕。」

法國代表賽爾波，雖然在第一委員會中所持態度，有利於美國及希臘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提出的控訴案，而接觸到這個問題的時候，也不得不說：這應當從希臘本身，去尋求造成目前情況的那種騷動的原因。」

甚至斯派阿克，這位忘我的辯護士和美國控訴案的熱烈崇拜者，在他一九四七年十月三日的聲明中

，也不能不作如下的承認：

「我相信，希臘內部的情勢，是由於希臘人民兩大集團，在政治、社會和經濟方面的敵對而生的困難所引起的。所以，我說，我覺得這個控訴過份了些。」

請看，連斯派阿克也認為美國的控訴過份。對於斯派阿克先生所說的，那麼也可以再把他自己的話加上，他說過，希臘的情勢，除了內部的困難之外，如他在辭句上大加修飾，并且小心翼翼的說，還有「不可否認的美國干涉希臘內政政策」引起的。

上面所引的各種聲明，足以使我們看出，目前變得如此尖銳，及聯合國機構本身也加以如此嚴重注意的，發生所謂希臘問題的真正原因。

四、顛倒事實及英法美集團的「偉績」

然而，英美代表團所做的一切，是要給這個問題，加上完全歪曲的性質，并且在此地，也完全表現出顛倒是非的形式。當第一委員會討論希臘問題時所產生的一切，以及不能不使每一位公正無私的人相信這個問題是這人工的和偽裝的，就是特別顯而易見的了。我們斷言，要證明這一點，可以不費吹灰之力，想在聯合國大會上控訴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說他們威脅希臘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而佈置的一切，是一幕滑稽的傀儡戲，是表演得非常拙劣的政治滑稽戲。在第一委員會討論希臘問題的時候，我們所看見的一切，即是：美國代表團用以反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論證，判斷證據，美國代表團一次又一次改變主張的使人懷疑的態度，第一委員會中美國代表所作的和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與阿爾巴尼亞代表討價還價、對上述三國採用完全不許可的壓迫和壓力，來獲得為調查團的

更好的證據，爲要達到自己主要目的美國代表所依賴的一切行動，這個主要目的，就是建立一個調查團，——所有這一切，揭穿了全部事情的真正內幕，揭穿了美國政府目前在大會上提出希臘問題過去和現在所追求的真正目的。顯然，這個目的就是要在政治上進攻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及控訴他們破壞國際法律，以及威脅希臘的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證明美國干涉希臘內政沒有錯，更加強烈地鞏固這種干涉的基礎，扭轉世界輿論對美國「援助」希臘的看法，而在這種援助的外貌下，變她爲自己的基地。

更進一步，我願以儘可能短的時間舉出一些事實，這些事實，我希望能充分證明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提出控訴的人爲性，不公正，牽強附會，誇張，並且相反地，能够證明，對希臘提出蘇聯決議草案中所敘述的要求，有充分的理由，以及最後，能够說明，美國在對希臘態度中，配合英國，及在這些事情上他們所依賴的希臘反動集團所追求的和領導的真正動機，和目前的計劃。

所以，美國政府和希臘政府，才控訴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威脅希臘的獨立和領土完整。

他們提出什麼證據來確定這些控訴呢？第一、就是證人的口供，第二、就是一些物證：報紙的論文，報紙上關於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一些政治家演說的紀錄，以及十月十六日鐵托元帥的談話。

在第一委員會中，我們已經指出這些證據的缺點。我們已經指出，誰也不能否認，首先是控訴者（美、英、希代表）自己也不能否認的事實。這就是偽造某一些最重要的文件，這就是這些證人爲了保證生命安全，迫於暴力和拷打以及收買，而不得不作的假口供。我不想對所有這些口供以及其餘證據

分門別類，我不想重複那些已經說過的，以及在默無答覆，各主要代表團對於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政府提出的控訴無法辯駁之中已經證實了的。但是，我還是應當提出幾項關於這個問題的證明。

五、担任控訴證人的國賊，刑事犯，挑撥者

大會應當知道，希臘政府提交給調查團及輔助團體的「白皮書」中，收集了六十位見證人的宣誓口供。這六十位證人中，有二十六位列席調查團當眾報告。這是些什麼樣的證人呢？這些證人之中，有十個人（百分之三十九）已確定為假證人，他們在審問的過程中，已被自相矛盾和虛偽口供揭發出來了。其中一部份，是承認從希臘當局領取證口供的報酬（例如證人柴菲里斯），另一部份，例如鮑布柴斯，根據哥倫比亞代表烏魯齊亞先生的建議，調查團拒絕傳訊他，說了些顯然矛盾的含混其辭的話也是大家知道得很清楚的事實，或者是維里亞狄斯，他是這樣使人懷疑，甚至調查團也要特別檢查他個人。

有六人（百分之二十三）是刑事犯和挑撥者。例如：曾經刺殺過前閣員齊伏戈斯的伏拉賀斯，巴爾圖拉斯，考烏西斯，及西狄洛浦諾斯，這些人，都是伏拉賀斯的同謀者；同時西狄洛浦諾斯在發表於希臘報紙上的信中已承認，從希臘當局那兒，領取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作虛偽口供的報酬費。被自己的親弟兄揭發是挑撥離間者的康托巴諾斯；曾任德國人軍事法庭主席，以及被保加利亞法庭以叛國罪判處死刑的戈羅干諾夫。

有五人（百分之十六），是被判處死刑，或者在審問他們的時候會以死刑來威脅的，或者在他們遭受了拷打之後而招供的人物。這就是，瓦爾塔多洛斯，巴蒂斯，托賀斯，伊柯洛莫夫，謝爾巴可夫。

除了這些證人之外，希臘政府還提供得有一「白皮書」中沒有說到證人，這些證人大多數也是假證人，他們都是爲要給與調查團及輔助團體口供，而從罪犯及腐敗份子之中徵募來的。

所以，希臘政府提供出來，用以確定控訴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大多數證人，不守秩序，腐敗，及不道德的典型人物，挑撥離間者，刑事犯，以及簡直就是政府恐怖政策之下不幸的犧牲者，他們都是被迫而要反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同時，在這種劊子手的條件之下，以可怕的代表來換取他們的性命。

現在，先生們，他們建議你們，根據這些挑撥離間者，刑事犯，從套索中拖出來的不幸人們，以造謠的代表來懇求活命，出賣和背叛祖國的人們的口供，以自己的忠誠和名譽來肯定這些作爲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控訴人的口供的正確和可靠。不，你們不能做這樣的事，因爲眼前的是偽裝，因爲沒有理由來控訴。

我們斷言，所有這一切事情，都是爲要證明組織邊境調查團是必須和可能，是合理和合法的。這個調查團可以掩飾那些希臘反動集團不能見天日的事，這些傢伙們，波爾特爾先生曾在「柯勒斯」雜誌中說，是銀行和金融集團中的人，他們把自己的個人方便和利益，放得比自己祖國的幸福和利益還要高。我們知道，最近以來，報紙上會刊登過關於希臘政府的可怕事實，而所有這一切，并未見這個政府，以及前任希臘總理柴達里斯的答覆。

另一方面，調查團曾經聽取過一百多位證人的報告，這些證人都是調查團親自取自監牢和集中營里被希臘政府送到那里的政治家和社會活動者，以及取自普通的老百姓當中的。所有這一些證人，非但反駁了希臘的控訴案，而且他們自己成了希臘當局挑撥邊境事件，逼害民主運動者及少數民族，隱匿并支

持戰爭罪犯及其他從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逃往希臘的賣國賊的有力的控訴人。在這些證人當中，我們看見了希臘政黨及組織的著名代表，如格里戈里亞狄斯將軍——左翼自由黨的領導人；巴亞里加斯——希臘職工總會主席；巴基爾吉斯將軍；皮特采朱蔡斯；海爾庫列斯——全希臘民主協會聯盟主席。

所有這些人們都指出（他們絲毫沒有被毀壞過名譽，他們的道德品格誰也不會懷疑，他們的政治忠實，已由與法西斯主義及存留在希臘境內的法西斯保皇派的恐怖政治進行英勇與不屈不撓的鬥爭所證明了的），無論南斯拉夫，無論保加利亞，無論阿爾巴尼亞，都沒有犯他們所說的罪過，這件事的責任是在希臘政府身上，這個政府是武裝起來與他進行鬥爭的希臘人民，不能和他妥協的，全部責任，也在英國政府身上。麥克奈爾先生會說，他不知道有多少師英國軍隊在希臘。總而言之，他們已足夠積極參加鎮壓民主力量，現在希臘土地洒滿了民主人士的血漬。

在證人當中，有些人會指出，希臘當局派他們在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和南斯拉夫，進行反對這些國家合法政府的武裝鬥爭。

我現在說出這些證人的名字，如：謝爾巴伏夫，姆斯塔伐夫，烏魯捷夫，巴伊拉克塔利，拉茲米·艾米尼，阿則米，捷士珂夫，伊珂洛莫夫，捷西奇，珂斯他等人。

我們知道這些名字，但是我們從來沒有由我們的敵對者那兒聽到過能够使人信相和證明他們可以作為根據，而對南斯拉夫，或阿爾巴尼亞，或者保加利亞提出控訴的證人的名字。第一委員會如何辦呢？非常容易了解，第一委員會不能不關心這些事實，不能不注意這些事實，雖然，一切都是已經事先決定這種事情的作法的，英、美、法集團事先決定和安排停妥了的。

在第一委員會的會議上，曾經有過希臘當局，強迫要求證人們，說出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具有控訴性口供的駭人事實。這一事實，都公佈在調查團及輔助團體的紀錄中，但它們非但沒有爲希臘政府代表和英美政府代表所駁斥，而且在這些引起聽衆大爲恐怖的口供中，并無一點，甚至些微的修正。可是那些從套索中拖出來的，半死的，被拷打和折磨得他們的創子手要他們說什麼就說什麼的，那些人的口供，正是調查團及輔助團體的大部份據以作結論的，而這些結論，又提交第一委員會作爲控訴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的決議文件。雖然一些代表團以偏袒態度來處理這件事，這一切不能不引起許多代表們的印象，這是毫不驚奇的。這些代表團的代表們不支持希臘及英美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政府的控訴，也非突然。挪威代表的這種聲明，難道是突然的麼？他說：

「我的意見認爲，提交調查團的證據，要使我們有根據不懷疑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政府，破壞聯合國憲章直接援助和協助希臘游擊隊，是不充分的……」

很熱心擁護衆人皆知的美國控訴案的比利時代表斯派阿克先生，在說到證人口供中的矛盾時，他不得不承認，他們這些證人們，顯然不是什麼「社會棟樑」，——說得好響亮呵！——所以不能完全相信這些人的口供，而對於另一些人的口供，斯派阿克先生說，也應當認爲不可憑信。

毫不足怪，甚至那些自己看來，無論如何都要支持美國控訴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的代表們，也不能說得比他們已經說的更多，像法國的寶爾波先生一樣。我提醒，在分析了英美代表團提以反對希臘三位北隣的一切證據之後，寶爾波先生會逐字逐句地說過下面的話：

「我們以爲，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似乎有參加希臘內戰，并協助游擊隊的嫌疑，因爲，沒有他們協助，他們就不能越過邊境。」

這個具有特殊意義的聲明，證明作者不够堅決和顯然是因爲良心的呼聲與另外某種內心矛盾衝突結果而出現的懷疑。這就是爲什麼我們在竇爾波那兒，看見有這種說法，如「我們以爲」，「參加之嫌」，「協助之嫌」等等。這些話一點也不是肯定的。絲毫信心都沒有，完全是嫌疑和動搖引起的猶豫不定。自然，這是那些受調查團，輔助團體，以及第一委員會大多數人操縱的所謂證人的口供，沒有任何道德價值的直接結果。

控訴者們說：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有協助游擊隊的嫌疑，但他們沒有說，究竟是什麼樣的協助。實際上，南斯拉夫允許過游擊隊進入國境，并且給傷者以醫藥的援助。照竇爾波先生的意見，這就是破壞國際法律嗎？難道這不是每一個國家的神聖權利：讓那些在祖國作鬥爭的政府的政敵，在自己國境上，有一隱匿處所，如果他們流血，就包紮他們的創傷；如果他們饑餓，就給他們麵包；如果他們口渴，就給他們茶水。難道這就是第一委員會控訴這三個國家的破壞國際法律嗎？不是的，在說出這些話的時候，竇爾波已經證明，他有懷疑，他猶豫不決，他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罪行沒有信心，但他沒有旁的作法，正如羅馬的俗話說，因爲：「情願的人，命運引導他們，不情願人，命運拖着他們」。竇爾波不得不說：要投票，就投票吧，正如鸚鵡給貓抓住了的時候說，該怎麼辦，就怎麼辦吧！（笑聲），所以，竇爾波也只好「辦」了，於是他就投了美國決議案一票，并且更進一步提出了這樣的修正案，要說，一方面他不得不自招，而另一方面不得不承認，或者又說，利己而無愧（笑聲）。

以法國代表所依據的這樣一種判斷，并且他只是覺得，只是假定破壞國際法律，控訴者們如此馬虎對這樣一些破壞提出控訴，事實上是否能够成立控訴這些政府破壞國際法律呢？

當第一委員會，談到這些證人，所有這些奇里古怪的控訴，都是根據他們口供的時候，我們說過：「你們所舉出的證人，是不能相信的」。大部份這些人，或至少是一部份，這些控訴所依據其口供的證人，是不能相信的，其他的代表們，甚至連斯派阿克先生也承認這個事實。我們建議，要我們的論敵舉出無可非議的十個或二十個證人，或者最低限度，他們對於自己所担当的證明義務，無人大大懷疑其不誠實，像希臘政府所舉出的大多數證人那樣。但是我們非但是沒有聽到過十個，甚至連一個這樣證人的名字，也沒有聽到過，雖然我們要求已經不只一次。第一委員會，從事討論希臘問題已經兩週有多，自然，要舉出這種證人的名字，要必須審慎及必須詳細來審查這件事情，時間是足夠充分的。第一委員會的大多數，都認為最好是不要深究此事，如麥克奈爾公開承認：「不要沉入這一團迷霧」。

第一委員會的人使我們相信，我們應當信任調查團，並不是因為這個調查團很好，雖然，麥克奈爾先生要我們相信調查團很好，而是因為這個調查團中，有他的一位朋友是很好的。我高興相信他是很好的人，麥克奈爾先生。而事情却正如俗語所說：告訴我，誰是你的朋友，那末我就可以說，你是什麼樣的人了（笑聲）。

但是，我還是希望能看到些事實，我希望讀到這些證人的口供，希望知道這些證人是否不是收買而來的，不是希臘監獄中的半死半活的人？但這些資料是沒有的。他們告訴我們：安全理事會已經任命一個調查團，這個調查團已分派了一個補助團體，他已經作了一些事，已經看見了一些東西，他可以相信，第一委員會也可以相信，不必詳加研究，就採取某種決定提交大會。大會也應當相信第一委員，因為，難道大會能够詳細探究所有這一類的事麼！我們已經舉出假證人的名字，要控訴者舉出可供信憑的

真證人的名字，我們已經等了三星期時光。到現在，他們沒有做這個，如果他們有這樣可能性，那他們老早就做這個了。他至死不變地堅持自己的控訴案，而不因新的東西有所更改，正如約翰生在第一委員會中所作的一樣，也正如所有這個集團——英，美，法代表團——所作的一樣。

結果如何呢？調查團的大多數人，對於希臘的「證據」，都採取不加批判，不客觀，並且是偏袒的態度，就一直相信所提供出來的這些假證人的胡言亂語。第一委員會中的大多數，反而相信調查團大多數的所謂「結論」是中肯的。現在第一委員會的大多數，建議大會不要沉入迷霧，相信他，相信第一委員會呵！這就叫做事情的調查嗎？這時候就該想想偉大的西塞羅和他的警句：O tempora, O mores! 呵，時代，呵，道德！

控訴案和這些證人，正就是如此。蘇聯代表團，正如其他許多反對美國控訴案，及根據這些控訴而定的美國決議的代表團一樣，建議放棄這些不能由事實證明，不是品質良好，以及經不起與這種控訴相矛盾的事實反駁的控訴案。另一方面，第一委員會面前却有希臘各民主黨代表的無可非議的口供，有希臘愛國者，保持着精神堅強和勇敢的希臘人民優秀代表的口供，甚至身繫希臘圍圍，集中營，和監牢中的人們也可以無可辯駁地證明希臘當局犯有挑撥邊境事件，派遣自己的間諜，以及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政府反動政敵的間諜，到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的國境去的罪行。蘇聯代表團根據這些證據，堅持要對希臘當局的行動，定以適當之罪。雖然，蘇聯代表團的公正和有根據的態度，是建立在權威的證據上，但這却未被第一委員會的大多數通過。

我們現在就把這個問題，向大會提出。如果在這裏，我們也不會遇到必須的支持，我們爲真理和正義而辯護的聲音，決不會沉默的。我們反對偽裝和人爲控訴的聲音，全世界都能聽到，並且在全世界千

百萬平民的心中，找得到活生生的反響。無論用什麼人寫的決議，無論用大多數的選票，都不能蒙蔽真理。它不曲服於一切的歪曲，並且會勝利的。

六、偽造證明文件

除了反對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政府的證人口供之外，也動員了其他的證據。例如，平空想出來的，布爾凱斯和魯比格游擊隊營中的軍事學校。一些希臘人的口供就說出這個營盤，這當中特別的，我們在上面已經說過，現在不值得老說這個和再往下說了。在調查團大多數人員的結論中，關於這個問題說：「調查團聽過一些證人的口供，說一九四六年春天，在布爾凱斯（南斯拉夫）的難民所中，設立了一個游擊隊領導者的專門訓練班，其目的在理論和實踐方面，訓練希臘的難民參加游擊戰爭。」

「一些證人的口供」……大多數的報告，甚至沒有舉出這些證人的名字，沒有解釋這些證人有多少；二或二十二，這是些什麼證人，是可以信憑證人的嗎，這些證人所供認的究竟是什麼。關於這些一點也不能從大多數的報告中得知，第一委員會的英美控訴人，對於報告也毫無補充。同時，不能不注意供認布爾凱斯的難民所中有軍事學校的證人，例如康托斯諾巴，實際上，就是謊報口供，這些口供的虛偽程度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例如證人康托斯諾巴供認說，在這個布爾凱斯的軍事學校中，特別注意訓練山地戰，學習山地戰課程的地方，就在布爾凱斯村及其附近地方。然而，不難證明，布爾凱斯村位於廣闊的潘農盆地，那里有一百公里的平地，那里沒有任何的山，甚至也沒有可以上「山地戰爭課」的山地條件。但假證人及其擁護者們，並未為此難堪。甚至調查團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訪問該營的時候——我所引用的，是據叫做「調查團大多數結論」的著名的文件——調查團沒有找到

軍事活動，成爲達到此項目的而舉行軍事訓練的根據」，他們也不感到難堪。調查團大多數的報告，又用下列的各種事件，證明布爾凱斯有軍事學校。調查團曾說過游擊戰術訓練手冊。有些證人指出說，這個「手冊」是布爾凱斯的學校中用作教科書的。甚至有位證人——希臘的難民——，他指出說，他是這個教科書的作者之一，於一九四五年夏天，在魯比格的四十五個軍官編著的。

我們這裏沒有這個「手冊」。總之，從調查團大多數的結論看來，它只得到一本，甚至這一本也是沒有封面，沒有指出什麼地方，什麼時候，以及爲了什麼目的而出版的所謂手冊。在調查團大多數文件的一個附錄中，內容是包括六十四項的，所謂這個手冊的摘要。如果仔細研究一下這個「手冊的摘要」，那我們自己就不能不注意，這個「手冊」本身的全部內容，顯而易見，用作游擊隊的指導，是最不合理的。事實上，在這個摘要中間，我們所找到的，是下列各部分：

一、「軍隊的史的發展」。

在熱烈的游擊時期，耗費時間來研究「軍隊的史的發展」，恐怕是不大合乎目的吧。

二、「戰略與戰術」。

現代軍隊的戰略和戰術，如所週知，是對正規軍作實際鬥爭的過程當中，游擊隊才能知道的。

三、現代軍隊的裝備。

四、空軍。

六、步兵作戰的方位。

七、交火，行軍，野戰。

八、使命等等。

一一、動員的部隊。

一七、兵士在戰鬥的中任務。

二一、從班到營的組織與武裝。

五一、戰鬥時的輜重移動。

五八、砲兵等等。

所列舉的這些，凡是略知游擊戰鬥生活條件的人，還有什麼不明白的，這個「手冊」對於游擊隊并無絲毫意義，這個「手冊」是先給正規軍的指揮人員應用，要比游擊隊更適合些吧。最後，如果真有這樣的教科書，如果它真正散佈在布爾凱斯和魯比格，難道總共就只有一本在流傳嗎？最後，甚至說這本教科書，真正被拘禁在南斯拉夫營房里的游擊隊所編著的，那麼我們要問：那和南斯拉夫政府有何關係呢？難道還不知道，在營房，在監牢，在要塞，以及其他監禁地方，精力充沛的人們，隨時不都是可以避開監牢管理當局讀書，學習，教導其他的人們嗎？

然而，這個「手冊」，是用作證明南斯拉夫政府，犯了協助希臘游擊隊對希臘政府鬥爭之罪的。這樣的控訴雖如此之拙劣，但這却是事實。

只要把這些問題提出來，就足以駁斥上面所說的關於游擊隊軍事教科書，如這本教科書的「序文」中所說，它是由四十五位軍官集體草擬而成，後來，它又被轉交給根據「同志戰略訓練局」建議，從軍官中拔選五位委員的管制委員會。當然，在這個「序文」中，不只一次提到「同志」這個字，并且每次都加上括符，這并不是偶然的。顯而易見，使用這個字，是要給一切教科書加上一頂共產主義的帽子，關於此事，在這個「序文」的下面的一行就直接講到：

「上述的課程，過去教授，並且將繼續教授魯比格希臘共產黨團體的『同志們』的。」
要用來證明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援助希臘游擊隊，對希臘政府進行鬥爭，希臘當局的杜撰，不是太笨拙和太不中用的嗎？

顯然，希臘的控訴者們，弄巧成拙了……：

我現在料到威脅希臘領土完整的問題。要證明這種威脅來自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及阿爾巴尼亞，控訴人使用了一些引證，其內容是，一些個別政治家，關於在南斯拉夫羽翼下的全馬其頓人民聯盟的意見聲明，以及也引用了鐵托元帥關於此項問題的談話。

控訴威脅希臘領土完整，簡直是可笑的事。在第一委員會中已經證明，希臘政府，特別是柴達里斯對十月十六日鐵托元帥談話中所加上的話，是杜撰的，其實，鐵托元帥并未說過柴達里斯給他加上的話，他不知慚愧地對於將鐵托元帥的談話斷章取義，以及結果使這個談話完全變了質。這正是柴達里斯要達到他的控訴目的所需要的。

這個控訴的不能成立之點有如此之多，由這件事也可以看出：甚至調查團大多數都承認，除了摘自個別人物的演說和報章之外，要用來證實這個無聊控訴的東西，就甚麼都沒有了。調查團大多數都不敢斷定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政府，實際領導馬其頓的運動，唯一的藉口，就是引用共產黨的報紙「工人事業」上面的文章，這篇文章曾經表示歡迎在南斯拉夫聯邦範圍內，建立馬其頓共和國。同時確定，在南斯拉夫被德國佔領時期，曾有馬其頓的民族組織活動，這個組織在德國佔領軍被清除之後，就轉為非法的地位，並且繼續對南斯拉夫政府進行鬥爭。一九四七年二月，在斯珂貝爾的審判中，已經斷定，這個法西斯的自治的馬其頓組織，是巴維列其·萬其·米海洛夫的同人領導，斷定了這個組織與希臘的反動

集團勾結，斷定了把這些馬其頓法西斯份子的小隊從希臘到了南斯拉夫，對南斯拉夫人民陣線政府進行鬥爭，其目的是，如證人特林捷夫所供出，要建立英美羽翼下自治的馬其頓。同時又確定希臘會對這些馬其頓省的少數斯拉夫人施行殘暴的恐怖政策，這些人爲了不在希臘等死，就一定會成千成萬地逃到南斯拉夫，阿爾巴尼亞，或保加利亞去。甚至調查團的大多數，也不得不斷定，正是因爲希臘的這種暴虐政制，引起秩序不安，以及使希臘馬其頓省少數斯拉夫人不滿，同時也爲分裂運動創造了有利的基礎。

所以，所有這些說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侵犯希臘領土完整的控訴，都是沒有根據的。

然而，對於希臘強求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土地這一些不容辯駁的事實，調查團並不關心。柴達里斯政府對於保加利亞的領土要求，不只限於在希臘人那里有不少的演講和宣傳冊子，而且也完全採用了實踐的方式，當時，柴達里斯曾在巴黎會議上，以修正邊界爲藉口，要求將保加利亞約四分之一的領土，併入希臘。在第一委員會中，我曾引用過一九四六年六月十日柴達里斯在薩洛尼加的演講。現在我應當再說一次。這就是柴達里斯說的：

我們的民族要求，——柴達里斯聲稱，——不只限於在國際法中所承認的，以及由歷及法律觀點來看的那些領土。我們對這些領土的權利一切人都很明白。多茲堪尼茨，北部埃庇爾以及我們邊境的安全不能滿足我們。還有在南部及北部的希臘領土，它們顯然是希臘的。我們的要求從北部開始，藉以完成我們國家的創立並解決空間問題。……」

希臘的議員們，也起來響應他，如德雅柯武，他也主張要「修正」邊界，威脅保加利亞喪失它的大部份領土。

除此之外，這也是事實，即是柴達里斯在一九四六年六月，在巴黎會議上，曾向南斯拉夫代表建議，談判由希臘和南斯拉夫來瓜分阿爾巴尼亞。

這一些事實，是不能掩飾的。他們道出了，真正威脅保加利亞和南斯拉夫的，是幻想要瓜分阿爾巴尼亞，或者是要割取保加利亞大部份領土的希臘擴張主義者。

控訴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企圖瓜分希臘，以及割取她一部份領土的那種異想天開的想法和做作，其顯明的程度以至於此，在第一委員會的全部會議時間當中，關於這個控訴案，好像是被人忘記了，無論美國代表團，甚至是柴達里斯政府的代表們，都沒有決心堅持，或者是支持這個荒謬的控訴案了。在第一委員會的決議案中，你們已經找不到這個控訴案了。英、希、美荒謬的，不中用的，不公正的控訴的這個紙糊房子，就這樣倒塌了。

七、英美控訴案落空、美國消屍滅跡

面對着無數假證人，翻雲覆雨，偽造證明文件，荒謬絕倫的歪曲，沒有相當事實根據的抽象的結論和誇大，面對着這一切荒謬的所謂控訴，甚至毫無怨言地追隨着美國代表團的許多代表們，也弄得搖擺不定，而不支持美國，英國，和希臘代表團的提案，還覺得奇怪嗎？

挪威代表直接聲明說：「委員會認為這些證據，不足以有理由使人不懷疑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政府、破壞聯合國憲章，直接援助和協助希臘游擊隊」。尼爾絲·蘭格赫爾非常審慎，但也肯定地，反駁了美國說希臘三北隣，應負紊亂之責的議案。蘭格赫爾說：「我們有一點懷疑，調查團及

其輔助團體所提出的資料，這麼肯定的結論，特別是對於保加利亞的結論，是否能夠證實。」

法國代表賽爾波說：「我不打算說阿爾巴尼亞，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政府援助這些游擊隊，因為，在我們看來，這在法律上還沒有成立，——假定不是證據。」

即使是完全以敵對態度來對付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斯派阿克先生，也不能不退却到虛偽控訴的無法辯駁的證據面前來了。斯派阿克說出了下面一段自相矛盾的話：

「我不以為，無論什麼人都可以斷定，希臘的北隣，都是那個國家所發生的內戰的挑動者。我個人不相信，他們作這個事情，如果有人斷定旁的東西，我想，這就是誇大其詞。」

如果，嚴守英美的立場，盡其全力來加強這個立場，以及證實在這件事情上英美代表團所走的政治路線的代表們，是如此說的，那麼，難道這不是證明了控訴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完全落空了麼？英美的控訴者們，很快就感覺到這個，他們趕忙有條件地採納法國的修正案，抓住它，就像抓住救生圈一樣，否則，再要頑抗下去，就會遭受道德失敗了。事實上，赫爾賽爾，約翰生代表美國政府提出控訴狀，如在第一九一號文件中所描寫的，他同時預示說，調查團大多數委員，都相信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犯有罪行的，但美國政府準備取消自己的控訴，而採納法國的修正案，如果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政府表示願與調查團合作，這個調查團將有權監督三國履行大會的決議。一開頭就會明白，這項聲明，是機動，是做作。這是企圖壓迫上述三國的政府，迫使他們同意設立顯然是英美政府寄託了一切希望的邊界調查團。一開頭就明白，美國決議提出的，要聯大承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破壞了國際法律，協助希臘游擊隊對柴達里斯政府進行鬥爭的原先的控訴案不外乎是試探，其目的，是一方面恐嚇，另一方面爲了討價還價，以後又放鬆一點，而對控訴三國政府讓

步，以爭取反對這些控訴的，但認爲可能設立英美所建議的調查團的代表們。這是討價還價，這是施用壓力的手段，由英國代表團的行爲可以看得出來，在前一、二天，麥克奈爾曾建議一項議案（文件No. 10-11-1/207），其中并無任何控訴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內容，而只是引用了調查團大多數關於此事的意見。如果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接受約翰生所口授的條件，他就提出自己的這個修正案，以代替美國決議的控訴狀。但在次日，并未得到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答覆，麥克奈爾，就以另一個更爲苛刻的，不爲自相矛盾而爲促不安的議案，代替了他自己原先的議案。

蘇聯代表團在第一委員會中指出，這種討價還價是不能容忍的，不能容忍使用任何天秤來壓迫，威脅，恫嚇，逼迫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承認莫須有的事。答應這個比較溫和，我說，是比較怯懦的決議案，即是說，只要能拖出一個調查團就成。同時必須說，所有這一切，顯然是破壞既定的一切程序規則。例如，美國決議案，完全是在不合常軌的情形下提付表決的：開始表決的，不是這個議案的開頭，而是從這個議案中間取出幾條出來，之後，再表決這個議案的末尾，這之後，才表決議案的開頭。所有這一切，是用完全罪大惡極的，最笨拙的方法公開實行的，直接破壞聯合國憲章和表決規則，同時，在以這種快馬加鞭的方法表決美國議案的調查團的大多數中，沒有人想加以否認這種對聯合國憲章的破壞。而這位斯派阿克，則聒不知恥地聲明說，用以表決的方法，實在是不合程序規則的，甚至是與它相違的。這種方法，如斯派阿克所說，真是不符常軌的。那末怎麼辦呢？大多數代表所承認的常軌，在目前是難以達成必須目的。在這種情形下，那又何妨用不正常的方法表決！

因此，美國代表團使用出這一切的假東西，而獲得了大多數選票，同時，美國議案的個別條款，大部分以法國修正案來敷衍一番，而在六至八個代表團投反對票，多到十至十五個代表團棄權的情況下，

獲得通過。同時，也不能不注意，進一步表決其他議案的時候，投票贊成這議案的，只有六至八個代表團，棄權的代表團，則達廿六個之多。但在表決蘇聯議案草案的時候，這個議案的幾項，只是遭到不能算大多數的反對，即是在廿五至廿七個代表團的棄權的形勢下的十七對十一票。

所以，這不過是在這樣一種畸形的程序之下，而獲得通過的，當時不承認列席者們的意見，當時的景況，是投反對票者十一，棄權者廿七，總共三十八個代表團，就算議案被通過了，也只有十七張票贊成它。

蘇聯議案關於外國軍隊撤出希臘的第三部分，也是在十六個棄權的情形下，以三十三票對八票被否決，即是不到委員會全體的二分之二。

所以，大多數代表團，是不支持美國建議案的。難道這些不容辯駁的事實，不是證明英美集團在精神和政治上的大大失敗嗎？不是證明在許多代表團抨擊之下，他們不得不從原先控訴人的地位作讓步，而以這樣一種希、英、美的控訴不留絲毫痕跡的決議案爲滿足嗎？

從大聲吶喊地控訴希臘政治獨立和領土完整開始，美、英、希代表團，一退就到非以甚至沒有決心表示自己的意見，而僅僅藉口調查團大多數意見的議案爲滿足了。本來調查團的結論是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協助并支持進行反對希臘政府鬥爭的游擊隊。可是第一委員會的大多數並沒有說出意見，他們在這個專業上已經洗手不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

所以，英美集團如此聲威震天地提出來控訴，就成了虛張聲勢和以美國爲首的控訴者們，無理由的吹得過了限度的肥皂泡。

如果，安全理事會派往希臘邊境的調查團的任務，其結果應當不外是美國議案中所說的，那麼我們

就有充分的理由說：得不償失了。由於這個原故，自然，就不值設立這樣的團體。但是，這樣的調查團依然設立了，現在，即使這個調查團的全部工作都失敗，可是在說到預備控訴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時候，又順勢來了一個關於設立另一個賦有更大權力的調查團的新決定，爲了要他能干涉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的內政，就將控制他們政府活動的可能性交給他，而如此昧其天良地進行自己的事業，正如第一個調查團所作的一樣。對於這個其職權與我們聯合國憲章關於各民族主權平等原則大相矛盾的調查團，是不能同意的。這就是爲什麼蘇聯代表團投票反對這個調查團。

八、設立調查團，是大大破壞憲章關於各民族主權平等的 最重要原則

關於這個問題，蘇聯代表團已經詳細地說明了自己的觀點。蘇聯代表團已經指出，要設立這樣一個調查團，是沒有根據的，因爲早已說明，希臘外交態度不能使人滿意的基本原因，必須要在希臘內政的情況中去尋求，所以，決不能任命一個，其職權是由第一委員會所決定的調查團。蘇聯代表團曾作了進一步的指出，設立有着這種職權的調查團，是不符合聯合國憲章的原則，首先是不符合各民族主權平等的原則的。這個調查團不會使局勢改善，反而會更使它惡化。他無力使得事情緩和，相反地，他的活動，會給巴爾幹的事情，帶來更大的不滿和複雜。因此，蘇聯反對上述的這個調查團。

鑒於所討論的問題很重要，以及必須確定對於希臘與其他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會發生惡劣影響的希臘內部局勢的真正原因，蘇聯代表團作了不少的努力，要揭穿巴爾幹四個國家之間，造成不能使人滿意和動蕩局勢的真正原因。

希臘問題，使得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民主人士不安。對於企圖隱蔽會使希臘人民自己崩潰，和威脅與希臘毗鄰國家的安甯和安全，以及全世界安全的禍害及災難的真正來源，愛好和平的民族，是不能妥協的。除去了這個禍害的真正來源，就可以確保希臘邊境的安甯，以及清除威魯巴爾幹和平合作的外交上的複雜。蘇聯代表團要求第一委員會注意，以及更早——安全理事會根據許多事實，肯定希臘政府，應負希臘北境的糾紛之責。在調查團中也指出了，這些事實，但它本身大大忽視客觀態度，和自己的義務，不偏不倚地調查事實；這些事實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當局，在尋求真理是中所指出來的。調查團的活動，偏私到何種程度，從下列事實當中可以看出來：希臘方面提出調查希南邊境上的十四項糾紛，除去阿格羅斯·格爾曼羅斯的一件之外，都被調查過了。南斯拉夫代表要求調查的，只有三件糾紛——別利克里亞的，赫里西的，在多依蘭湖旁的，事件的發生是在一九四六年九月，十月，十一月，而這些事件連一件都未調查。阿爾巴尼亞政府要求調查八件糾紛，而調查了的，只有三件。阿爾巴尼亞要求三十二位證人出席報告，而出席作報告的，只有八人，即是阿爾巴尼亞政府的要求，當時只履行亞政府了一小部份，而希臘政府的要求，差不多百分之一的履行了。

調查團過去的活動就是如此的。我們不相信他們未來不會這樣活動，因為，對於這個調查團的活動，除了國務院和 Foreign Office 的鬼胎中懷着的，以及是要把希臘擺在監督之下，及在似乎將予以經濟援助的掩護下，變她為戰略基地的政治計劃之外，是沒有任何根據的。

同時，不能不注意，當調查團在南斯拉夫召開會議的時候，南斯拉夫的代表們，曾經提出關於補充調查希臘控訴布爾凱斯營的問題，並且請求扎哈里亞狄斯，及前青年隊指揮長格拉馬蒂加斯做證人，調查團都以「時間不夠」而拒絕做這件事。

如果，調查團客觀而又公正無私地處理自己的事情，那末第一委員會就有更多的事實以揭發希臘當局，企圖反對南斯拉夫，保加利亞，阿爾巴尼亞的陰謀。然而，現有的材料，已經足夠使人充分相信這個確立和提出的，關於希臘政府應負一切在希南、希保、希阿邊境上所犯罪行之責的問題。因此蘇聯代表團在自己的決議中提請承認希臘政府的責任並由此得出相應的結論來。蘇聯代表團根據許多事實，及縝密研究了希臘目前局勢之後，所得出的最重要結論，就是，掌握希臘政權的銀行和買辦集團，以及成爲全部希臘政治主要推動力量的強國政府，應負這種局勢的責任。

英美政府所支持的，服務希臘反動集團利益的希臘現政府就是希臘遭受政治和經濟痼疾的主要原因。所有這一切事實，都不容懷疑，在南斯拉夫，保加利亞和阿爾巴尼亞與希臘之間所發生的不幸與事件的一切罪過及責任，一方面應由希臘政府負擔，另一方面，應由于干涉希臘內政支持希臘內部反動的反民主力量，而因此增加造成這一部份歐洲緊張情勢的衝突和複雜的許多困難和不正常的那些外國政府負擔。

九、我們要求英軍和美國軍事教官立刻從希臘撤退

英國軍隊和無數美國軍事教官及專家留駐希臘，使事情的情況更加複雜。這就是爲什麼蘇聯政府始終堅持，并且還要繼續堅持英軍撤退希臘，及召回美國軍事代表團，教官和專家。滿足這項公正的要求，是恢復希臘秩序和社會安甯的最重要前提，同時也是確定希臘與其北部隣國正常關係的主要條件。蘇聯政府認爲重要的，是要保證所謂予以經濟援助而在希臘所使用的手段，真正本其直接意義使用，即是爲了經濟援助，而不是爲了建築軍事基地，訓練憲兵隊及壓迫游擊隊的兵團。

爲了這些目的，蘇聯政府建議設置一個專門委員會，其職權是監督所得援助，保證只能爲希臘人民的利益使用。

我現在來作結束。我結束我一開始便談過的問題。希臘問題之基本而又基本的最重要問題，就是撤退希臘外國軍隊。誰也不能否認，英軍留駐希臘，所起的是否定的作用，也是許許多多複雜事情的根源。在第一委員會中，我已經提到過工黨黨員威爾斯少將的聲明，他早在兩年前就指出，在英國軍隊和英國的政治官員看來，希臘人民的優秀人物是罪人，并且全像對付罪人一樣來對付他們，這樣的情形繼續存在的時候，希臘問題是不能解決的。

我已指出，當時另一位工黨黨員，英國國會議員格林伍德的聲明，他曾說：「要把英國軍隊，使用到現在希臘的國際爭端上去，這是不能容忍的」。他是對的。所有以後的事件，都證明了這項聲明及其他諸如此類聲明的公正。我提起英國眾議院宣布的一封信，英國航空員由薩羅尼加寄來的信，其中指述希臘愛國者的反內戰遊行示威，這封信的作者寫道，只要英國當局不把反人民的軍隊派到這些地方，無論什麼樣的內戰都不會發生了。絕非偶然的，右翼份子的領導者們，公開辯護他們自己的強盜行爲，以爲反正不會把他們怎麼樣，因爲英國人支持他們。他們利用英國武力作爲支持，就不須要對其他黨派作任何讓步。這是公開的祕密，英國軍隊留駐希臘，被利用以反對國內民主力量，并協助癱瘓這些力量，以及助長反動份子的勢力。人們就談論起希臘的困難局勢了。然而，希臘已經有足够的，無須旁人援助，無須外國軍隊援助，尤其是無須這個援助的實際結果，會使希臘人民遭受最大痛苦的，能够解除希臘困難局勢的新興力量。

這就是爲什麼，蘇聯代表團堅持自己的建議，要求立刻撤退希臘的英國軍隊，以及美國軍事教官，專家之類。外國軍隊撤出希臘疆界，是實際而又有力的手段，藉這個手段之助，希臘問題就會澈底解決，并且巴爾幹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幸福，就鞏固了。

反對新戰爭的宣傳和煽動家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在第一委員會上的演詞

一、新戰爭煽動家沒有歛跡

蘇聯代表團向大會提出了關於反對新戰爭的宣傳和煽動家應採措施的建議以供審議。

這個問題的特別重要性總不需要重新強調了吧。當然，我們知道有些人在千方百計想滅除新戰爭的危險並隱藏起輿論方面的威脅，這種威脅由於美國的那些鼓勵新戰爭宣傳的資本獨佔的大老闆集團的犯罪陰謀而加在世界和一切愛和平民族的頭上的。

他們竭力要抹殺與緩和危險，這樣才好叫人民的警覺性不致於提起，他們也好沒有任何妨礙來繼續自己的準備新的人類屠殺的黑暗勾當。因此之故，從這些集團方面對於新戰爭準備進行者的揭發以及來自關切和平與國際和平合作的國家方面對此而作的警告便傳出了虛偽的憤慨。因此之故，主要地從這些集團方面便企圖一面用自己裝聾作啞的陰謀來對付這種揭發與警告，一面當無法再裝聾作啞時，就想將這把野火撤向起來揭發戰爭販子的人們身上去，撤向要求採取手段來鎮壓這些大人先生，使他們停止他們犯罪勾當的人們身上去。爲了這些目的他們竭力把準備戰爭，把侵略與擴張的計劃的罪狀向那些恰好發出反對新戰爭煽動者的警告的國家身上推。這是試驗過的手法：當捉強盜時，強盜却使勁喊：捉強盜呀。

蘇聯對於新戰爭的威脅發出了警告，揭發了這戰爭的教唆者。作爲這些揭發和警告的反應的，人賊

並獲的戰爭煽動者從四面八方鼓噪起來，用盡力量要嫁罪給蘇聯和其他的東歐國家。蘇聯揭發了許多國家裏的和首先在美國裏的反動集團所領導的憎恨人類和敵視愛好和平的國家的運動。答覆是這些人類憎恨者和戰爭冒險的追求者向蘇聯投擲出一切野蠻的和愚蠢的極惡大罪的報告，想用謊言和侮罵的斷言來恐嚇頭腦簡單的人們，說好像蘇聯和東歐國家在準備戰爭，打算攻擊美國並建立起自己的世界霸權。

九月十八日蘇聯通過自己的代表團在大會上第一次提出了自己關於禁止煽動戰爭和宣傳新戰爭措施的建議，從那時起已經過了一個多月。我們可以說這個時期中情況並沒有改變。新戰爭的煽動者沒有斂跡。

把自己的名字列進了戰爭販子名單的美國駐莫斯科的前大使哈立曼毫不顧忌而瘋狂地宣稱：「俄國人企圖併吞世界」，說蘇聯和東歐國家決心侵略歐洲，說「蘇聯的出版事業是國家政策的工具，在最近兩年來有系統地在鼓吹憎惡與恐怖」。哈立曼意圖美國政府以自己強大的空軍來對抗哈立曼杜撰的東方的「侵略者」的突進，並且再加強本來對蘇聯和其他東歐國家的侮罵與中傷的狂妄宣傳已經登峯造極了的美國出版界的如他所謂的「雜圖」。哈立曼要求美國在一切發生「壓力」的地區採用「積極行動」。這樣便直接號召戰爭。

邱吉爾和哈立曼唱起變簧來。邱吉爾借了機會對過去的紐約市長 A·斯密特作頌揚的演說時，向蘇聯又放出了幾枝毒箭。邱吉爾在演講裏宣稱：恰在他的富爾敦演說「現在成了英美主要觀點的基礎」，說應該認清他邱吉爾才是決定美國一切目前的對外政策的杜魯門——馬歇爾的「新方針」的真正的啓示者和指導者。

這位以前的首相在關於防禦的聲稱的呼聲做幌子之下，邱吉爾關於他要防禦的究竟是誰這一點當然

沒有明言），繼續鼓吹準備着的戰爭，把希望寄托在美國和「西歐民主國家」上，說名它們保持着「堅強的戰線」。

可是我要問：對付誰呢？從邱吉爾所有的話裏明白看出這個「堅強的戰線」是築來對付蘇聯和東歐新民主國家的。當你們拜讀邱吉爾這一篇破壞性的，竭力以謾罵與他所優為的對蘇聯的誹謗來避免社會對他的侵略陰謀的注意的洋洋乎的新演說時，對於這一點是不會有任何懷疑的餘地的。

在這篇演說裏邱吉爾無法隱匿他所引領以望的聯合國組織的壽終正寢和「兩個世界」的誕生的焦灼情緒。

在這方面的熱中投機上邱吉爾大言不慚說：假如如他所說的「蘇維埃共產勢力」退出聯合國機構，大家不必過於悲傷，也不必費心挽留它們。這個機構裏，因為呀這不過使「四分之三的人類的和諧行動」弄得癱瘓罷了。

這位富爾敦的英雄，這個新的有利可圖的戰爭的週遊說教者，這個用人家的手來向火中取栗的愛好者所做的對聯合國機構的抨台和破壞的秘密計劃沒有再比他更為無恥與惡毒的了。邱吉爾無法隱蔽他自己和他同道者如怎樣把蘇聯從聯合國機構裏排除出去的願望，認為這樣便可解脫掉一切帝國主義強盜勇士們手上的束縛。一響是夫儒主義者和政界的邱吉爾毫無顧忌地拿英美軍事同盟和新戰爭來恫嚇，他宣稱：「不必懷疑，當發生牽涉到人類自由的大爭執的時候，英國政府和在美國本土上以及所有不列顛友愛民族的領土上的大多數要素都會以不久之前對抗德國，義大利和日本的鬥爭中給我們保證了勝利的同樣的團結和兄弟般的親愛精神跟美國站在一起」。這些話的意思很清楚而不必作什麼補充解釋的。可是如果有誰認為必須對邱吉爾這番演詞作註解的話，我準備着再來談它。邱吉爾再度表示了明對「世界上說

英語的民族（我強調說英語的民族，而不是說任何其他語言的民族）可以抵抗得住任何可能的風暴」的信心。這樣，他重述了自己富爾敦演說的陳腔濫調，這種調子令人總要回想到被希特勒用作與其他世界對立的說德國語言的民族的特勒老調。

在「生活」雜誌上繼續登載浦立德的軍國主義的說教，他唆使美國政府反對中國的工人和農民，瘋狂地要求加強干涉中國的內政，並加緊爲蔣介石而向中國運送美國軍火和各式的軍需品。

浦立德估計一切這些東西美國要不了十五億美元，但却挽救了……的獨立。照浦立德的說法，美國是完全要依賴於中國的獨立的。浦立德預言說：假如不這樣做，那麼「美國的獨立也不會長過中國獨立的一代的時間的」。

同時浦立德也沒有忘記用自己的蹄來蹴蘇聯，有如克雷洛夫的著名寓言中的：「我也蹴了他：叫驢蹄明白」……浦立德號召美國這樣地援助中國，使中國能够担任「蘇聯帝國在遠東的真正的平衡力量」的角色。

當然，這裏的問題不在中國的獨立，而在對蘇聯的不可恕的毀謗找新的藉口，在煽動對蘇聯的侵略戰爭呀。

爲文學功績所鼓舞而托庇於好萊塢（據說他現在以又像是法律顧問又像是藝術顧問或批評家的不很分明的身份在那裏活躍着）的前國務卿貝爾納斯就在這幾天裏開始了公開的談話。據說他這種成就並不比過去領導美國外交政策時好些。

貝爾納斯努力要打破對蘇聯的造謠本領的紀錄。美國和土耳其英雄們的桂冠叫貝爾納斯不能熟視無睹，於是他在自己的「打開天窗說亮話」一書裏向蘇聯吐出了一大堆各式各樣的蠢話，煽動的無聊話和

誹謗的造謠之後，做出好戰的姿態，大發政治的議論起來。貝爾納斯所渴望的榮譽當他在外交政策舞台上活躍那時從手裏滑走之後而感到了苦痛，他便唆使美國政府借聯合國的幫助，以戰爭來威脅蘇聯，使它的軍隊從德國東部佔領區裏撤走。

他要把戲的放肆態度，對於德國問題的未來決策大放厥辭，以「最後的手段」來恫嚇蘇聯。

貝爾納斯這種文章的習作當然有他自己的原因，而且當然也不能把它看做不知名的美國前任國務卿的一種小玩意。老實說，貝爾納斯的談話假如在相當的意義上不代表時代的徵候時，本來可以無庸注意他和他的自吹自擂的話的。可是這正好如此，這正是時代的徵候，這正是符合於對待蘇聯的那種惡毒的誹謗和煽動性的態度的，而這種態度却是目前美國有些集團（貝爾納斯也在其中，並且代表了這些集團他才突然發出了公開的戰爭宣傳）的特徵。

貝爾納斯的談話可以看做對蘇聯戰爭的號召以外的旁的東西嗎？當然不可以。當然這是戰爭的號召。這一次「每日鏡報」說得可對了，它說：「貝爾納斯先生不如閉着嘴或是把它利用作較有益的事上去的好」。這報紙這一次可對了，它說：「今天貝爾納斯以在野之身，在他的題名「打開天窗說亮話」的書裏如此露骨地公開宣傳着反蘇戰爭」。這報問道：「這是什麼——是懷恨還是自癡？或者是二者的混合物？」還是讓貝爾納斯自己來選擇他所要的罷。

可是這裏要緊的是要指出貝爾納斯的書裏除上述之外還有講德國的地方。要緊的是要指出美國對於德國的那種特別的關心，這是貝爾納斯無意中透露出來的。貝爾納斯這一本書除了它的所有否定的品質之外，但應該說也有它的肯定的方面。

這本書給美國人民可能替自己或多或少地描繪出目前美國外交政策主要的推動因素究竟是什麼的明

確概念，給他們可能清楚地確信美國和蘇聯之間發生的斷離的根本原因是在於美國反動集團所起的對於世界霸權的難遏阻的慾望，在於美國反動集團以不共戴天的侵略的態度來反對蘇聯和蘇聯真誠的民主的愛和平的政策。

「時報」在十月十七日的社論裏主張不要過份看重貝爾納斯的談論。假如說的是貝爾納斯個人，那麼這是對的。但問題並不在根本不值得注意的貝爾納斯個人。問題在於證明在有名的美國反動集團裏的危險傾向的更重現的現象；而對於這些反動集團應該採取措施來防止行將降臨的災孽的。我再說一遍，問題不在這個電影界的特別顧問的貝爾納斯，而他大概被世界範圍的專業的慾望所征服了。問題在大社會意義的事實，在於這種應該予以制止，應該消除和治療的軍事的精神病。

我們看見煽動性的歇斯的利亞，因為意識到完全沒有被懲罰而得到了鼓勵，為美國的領導集團的寬大態度和甚至明目張胆的獎勵而在繼續發展。每一天在書舖裏拋出成千累萬的充滿了對蘇仇恨和形形色色的煽動反蘇與反東歐國家的戰爭的書籍、雜誌、報紙。已經被埋葬在法西斯廢墟下的反動的景首，如惡名昭彰的哈密爾頓·費希之類似乎又還魂了。這位法西斯化美國人的陣營裏的先生感覺到節日回復到自己的街頭，於是在不久出版的書裏公開號召利用德國為反對共產主義的支柱。他這樣寫道：「一九三九年之前德國曾經做過抵抗亞洲共產主義的支柱，假如現在適當地和聰明地對待它的話，它可以重新充任抵抗亞洲共產主義的支柱的」。

這跟衆所週知的以主要希望正寄託在德國和魯爾以及它的法西斯殘餘份子之上的馬歇爾計劃和貝爾納斯的建議的精神完全符合的。從美國刊物發佈的報道中可以看出得出：在怎樣熱心地培養着德國軍閥的餘孽和為美國軍事當局端方羅致而在德國被廣泛利用的德國學者的渣滓們的反蘇的報復主義的意識。

「紐約時報」不久會轉載：這些在美國工作的各種軍事發明的德國學者「受着反蘇俄戰爭的希望鼓勵」，而「外交政策報導」雜誌公然寫道：美國在實現它的對外政策的事務上越來越信賴軍事與軍事手段了，這些話都不是偶然的。

戰爭宣傳，編如所料，也控制了跟軍事工業和軍事團體有聯繫的出版機關。這些團體按它們的職業的習慣（如果可以這樣表示的話），爲戰爭的宣傳効勞，顯然不願意隨便放過自己軍國主義宣傳演習的機會。

請看這裏的「富爾特砲兵雜誌」，這是工業家（以自己的生產品供給美國武裝力量的供應者）協會的機關報。一個患戰爭相思病的上校哈曼蓋特的，在一篇題目叫做「斯潘薩特斯克案件」的短篇小說裏，以反對「無名敵人」的新戰爭的描寫來從事煽動起讀者們的戰爭慾，而所謂無名敵人實際上却是已經有了名字的，因爲在小說裏對這個戰爭的戰場舉出了北冰洋，阿拉斯加……。作者對於軍事行動區域所杜撰的地名，爲：「克拉斯恩格勒」，「洛甫戈羅德」，「阿姆斯特克」等等充分明示了這個未來戰爭的戰場。

對於熱中從事煽動戰爭並獲得了那些本來可以使這些雜誌走上和平與光榮的正道上去的有關方面的緘默和贊許的這些軍事經濟雜誌，一般普通經濟雜誌對之自然不甘落後，於是也起軍事宣傳的寒熱病來了，譬如，在最近一期的「成功的農業雜誌」（這雜誌是專爲了農村而出版的）有這樣一篇文章：「我們的土地在另一次戰爭裏還能保證勝利嗎？」

在製造杞憂情緒的事業裏，最近連美國的國防部長傑姆士，福萊斯特爾可以說也貢獻了他的資產。按「紐約時報」的話，他給了「對於新戰爭販子的俄國控訴以詳盡的答復」。

這是什麼答復呢？不過我首先應該提一提福萊斯特爾的一些天真的議論。美國的國防部長確實是以這樣的寶貨如：拿破崙「不是爲法國前進的資本主義社會所決定的。他是革命的產物。」的論斷來充實世界學識的。

所以必須這樣說者，你們難道看不出是爲了要證明：「革命的產物」的拿破崙以自己的軍隊搖撼了歐洲二十五年。所以戰爭的源流是革命，而絕對不是資本主義，後者恰恰被描寫成天真無邪的白鴿，在它小到幾乎看不到的嘴裏啣着橄欖枝的那種樣子的。

假如福萊斯特爾在他開腔之前肯費心瀏覽一下隨便那一本歷史教科書，即使是勃努斯的或卡雷爾的法國大革命史的話，他也許會驚奇地記得拿破崙不是革命的而是反革命的產物了。

事實上，法國大革命給法國帶來了物資生產的革新，連帶着政治的與精神的革新，以及美國人民也知道的，使自己的獨立在十八世紀下半世紀解脫了英國統治的革命民主的獨裁。

法國的革命戰爭，當它抵禦反動的君主政體的歐洲時，是正義的戰爭。但法國反動勝利之後，在共和歷十月九日之後，共和歷第二月十八日之後，當法國的資本主義的布爾喬亞推舉了拿破崙上台並建立了拿破崙的反革命獨裁之後，這個如福萊斯特爾譽之爲「革命的產物」的，在實際上却是不折不扣「反革命產物」，而法國的防禦戰爭也一變而爲征服的戰爭了。一八一二年的拿破崙的向莫斯科進軍而落得失敗並使拿破崙滅亡的反蘇戰爭便是這個樣子。這是對於喜歡手裏拿了刀子或其他更爲科學完善的武器在別人的土地上溜騾的人值得好好回憶的一樁教訓。福萊斯特爾決定要賣弄他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近來在美國一般檢討馬克思主義的風氣大爲盛行：一會兒一個鄉村牧師站起來作反馬克思主義的說教，一會兒這位美國的國防部長着手修正「馬克思主義的假定」起來，決心賣弄他的馬克思主義的知識。他以

軍人的方式攻擊關於戰爭是私有財產以及其中包括他所說的業務的資本主義的產物的「馬克思主義的假定」。

爲駁破這個論點，他提到森林裏的人們遠在工業家出現之前就互用石子互相投擲。我不爭辯，在這種情況下森林裏的人們的確與美國的工業家和企業領袖們是有區別的。可是那時和現在的作戰方法的不同——用投石器，火繩鎗，現代的大砲或原子武器——還是一點沒有說明戰爭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原因，這是福萊斯特爾先生所竭力避而不談的。但恰恰是科學的研究證明了資本主義的敵對性產生了現代的戰爭，有如在先資本主義時代的階級的矛盾和利益產生交戰雙方利用石製斧頭或石頭的戰爭一般。戰爭的技術手段還是說明不了戰爭的本質。

福萊斯特爾先生企圖爲企業家團體所受到的關於他們——美國的獨佔資本家們——發戰爭財的指摘作辯護。可是我兩次引證過的數達五百二十億美元龐大利潤的事實却依然無法動搖。但這也是完全明顯的事，因爲要動搖官方的數字是辦不到的。除此之外，在資本主義之下戰爭對於人類不但一直是最大的不幸的源泉，但同時也是極少數以獨佔資本的上層份子爲代表的發財的源泉，這是衆所週知的。

因此，新戰爭的責任必須由宣傳它的人，由以自私自利爲目的而煽動它的人來負擔，即使這種煽動用各式各樣的響亮的言辭（這正是「業務的資本主義」的代表們所擅長的）作掩蔽。

可是無論如何，對於爲我們列舉的事實所證明了的美國資本主義獨佔事業的代表和領袖有系統地從事着的新戰爭宣傳，對於大家提出直接要求停止這種宣傳的答復總不能拿「馬克思主義的假定」的談話來搪塞過去的呀。

二、戰爭販子反蘇的煽動性污蔑

蘇聯代表團發言反對戰爭販子那天起迄今已過了一個多月。在這一段時間中，進行戰爭宣傳的反動力量沒有停止自己的毀滅性工作。而美國的代表們的言辭只有火上澆油。它們成了新戰爭宣傳家的日新月異的可惡的表現的一種鼓勵。

我們舉出了證據。我們指出了無數的事實。這些事實逐日增加，使全世界數百萬人民增加了恐慌與不安。

本年十月十五日發表的英國國會議員亨利·奧斯波恩在奧克利琪所作的聲明稱：按照歐洲現行的輿論，外交攻勢是這個冬季所開始的戰爭的前奏，這樣的聲明難道不值得注意的嗎？

發佈這回事的聯合通訊社繼續稱：完成了以建立世界政府而展開運動為目的的全美國演說旅行的奧斯波恩聲稱：他讀了六個月美國出版物的結果，得到的印象是：有兩種思想的傾向存在。這一種傾向我轉述如下：

(一) 和平可能用金元來購買：假如你們準備在歐洲化錢，即使所化的數額有限，那時你們却因此買到了和平的道路；

(二) 和平可能以力量的代價購買；為此美國應該以全力利用自己的力量來確立全世界的霸權，防止蘇聯這樣做的可能，那時候和平便可以保持住了。

假如拋開反蘇的污蔑中傷不談，那麼奧斯波恩的以六個月閱讀美國出版物的基礎所形成的印象難道不與事實吻合的嗎？

侈談着自己的秘密計劃——以美元或使用實力來贖買和平道路的計劃——的美國反動集團的領袖們所宣揚的難道不是這兩種「思想傾向」嗎？這是用經濟「援助」那些甘願上當的誘惑計劃，或者是用力量來使那些要保持自己民族和國家尊嚴而不受誘惑者屈伏於美元利益之下的計劃。你不會再比以建立什麼世界政府的利益而作全美演說旅行的英國國會議員說得更明白的了。

美國企圖用杜魯門——馬歇爾計劃，允諾給土耳其、希臘和爲數十六個的許多歐洲國家以援助來解決第一項任務。美國也準備依賴着自己的軍事實量和原子武器來解決第二項任務，所以它竭力反對銷燬原子彈，自恃這種武器方面的獨佔情形仍爲它所保有。這種傾向以所在這種情形中表露出來，即：美國在原子委員會裏的代表們固執地表示反對對於原子彈生產的一切階段上實施管制，並堅持着把對生產的最危險的最終階段實施管制一事拖延到沒有確切的時期，這個最終階段美國認爲在目前是它所獨享的。美國官員們直到國防部長福萊斯特的以美國武裝力量來制嚇的無數演說便說明了這一點。我所引證過的邱吉爾的聲明也說美國的武裝力量似乎足以抵擋住「任何可能的風暴的」。

然而，戰爭煽動家們，對於有一點却始終保持緘默，即威脅和平的這種暴風，是從那兒吹來的呀，醞釀着戰爭暴風雨的那雷雲，是在什麼地方聚集着呀？關於戰爭的暴風雨行將到來，應由什麼人負責任呀？

是在富爾登發表演說的英雄罷，是授意美國政策採取「新方針」的美國獨佔資本家們罷，是大瘋漢一類的頑固的殺人犯，被錯亂的觀念所迷的慢性癲狂症的患者，精神分裂的狂人罷，是那些握着唯利是圖的筆，聽着有勢力的主子和總管的吩咐，欣然願意用任何色彩塗抹，而由此領得優厚酬勞的那些下賤的文丐流氓罷？

事情已經搞到這種地步，某些部分——的確，是最有市儈氣的最目無法紀的一部分——美國報紙，刊載出這樣的消息，例如，說俄國人已發明一種細菌戰的方法，說埃及的黑死病和虎列拉，就是蘇聯舉行一種實驗的結果。散佈這些謠言的騙子們，在有些地方有些時候也說，這是不能加以肯定地證明的——然而，儘管這麼說，這班文丐流氓與騙子，依然不妨散佈挑撥性的惡謠，因為他們完全相信他們可以儘管這樣造謠，而且很容易提起新聞自由來替自家辯解的。他們拚命要激動反蘇的公憤，中傷蘇聯無所不用其極，他們這麼幹的時候，自己看不出自己所說的話是完全無聊的，徒然使明白事理的端正的人士聽了發噁罷了。例如，他們刊載出荒唐的奇譚，大意說駐在歐洲的美軍士兵們被人拐騙，自然是被「蘇聯」特務拐騙去了，說駐在蘇聯美國外交官與大使，受到侮蔑，被人凌辱，甚至在警察局裏受刑訊。最近這種報紙，如果我們可以稱之為報紙的話，報導說：幾個蘇聯技術人員，在底特律很神祕地失蹤了。關於此項報導隨即就關過謠了，然而大瘋漢們和精神上有缺陷的說謊專家們，更數見不鮮的是在美國出版界方面有所成就的那些頑固挑撥專家們，依然繼續發出所有各種無聊的謔語，大意說這幾個蘇聯技術人員在美國偵探出某些內情，並「估量」了美國共和國，以便把她裝進棺材裏去。據說，因為在美國存在着新聞自由，這就是一種完全正常的現象了，無庸引起驚奇或憤慨。

我們且不談關於新戰爭的肆無忌憚的狂妄宣傳罷。這種宣傳使美國人的心沉淪於從赫斯特報紙的字裏行間和赫斯特廣播評論員的舌舌間淌出來的污穢的濁流裏了。

三、戰爭販子的英美庇護者

蘇聯的提案，要求制裁若干國家，尤其在美國、土耳其和希臘三國中反動派人士所正進行着的關於

新戰爭的罪惡宣傳，他們經由報紙，廣播，電影及公開演說，憑藉散佈如上而所提起的那些相類似的所有種種捏造的謠言，來進行此種宣傳，其中含有公然號召準備戰爭，以進攻愛好和平的各民主國家。

蘇聯代表團建議：聯合國機構承認凡庇護和容許關於新戰爭的宣傳，就是違背聯合國機構會員國所負的義務。在聯合國機構若干會員國的領土上進行的這種戰爭宣傳，彰明昭著的違反聯合國憲章，胡亂背棄聯合國憲章的原則，應責成聯合國機構的會員國，「以尊重各國人民平等權利與自決權的原則為基礎，發展各國間友好關係，並採取其他妥當措置以鞏固普遍和平。」

我要喚起各位注意：聯合國憲章的條文之一，明白要求所有一切聯合國機構的會員國「不得危害國際和平，安全與正義。」

事實上，成為整個聯合國機構的基調的這些崇高的原則，在若干國家中遭遇有系統的破壞，而正式機關和官方人士一點也不反對。這類行動在愛好和平的各國間引起了一致憤慨，而官方對這類行動竟抱消極態度，有人強辯解釋說：以制止戰爭宣傳為目的而實行任何干涉，都是不可能的，硬說就因為在那些國家中存在著民主的環境以及言論與新聞的自由，保障每一個人享有抱着任何見解，宣揚任何思想的可能性與權利，不管其內容與含意怎麼樣。再也沒有比這種解釋與論證更虛妄，更荒謬的了。任何一種的自由決不能容許變成了專橫與濫用，變成了對於人類的最大福利——和平——的一種威脅呀。

英國的代表麥克奈爾，九月二十二日在聯合國大會中致辭時，關於這一點說過：對於蘇聯所提出的關於採取行動以制裁戰爭販子一節的提案，答辯不應該在於批評他國准許其公民自由表示他們的思想。麥克奈爾先生，看出這一方面的答辯，應該在於，用他的話來說，「鼓舞所有一切國家對於自由政府治下的公民們自由表示意見一節抱着默許態度。」

但是麥克奈爾先生，這就只是意味着一種號召，要求默許戰爭教唆犯們把他們的罪惡勾當幹成功，一直到戰爭又從四面八方爆發起來的時候。

由此可見，從麥克奈爾的這種言論來判斷，英國政府是不打算採取任何步驟以制裁戰爭教唆犯們了。英國政府關於這個問題的觀念，很明顯的，就是以為：應該讓這一種畸形怪物自由行動，對這類的宣傳應該抱默許的態度，而這一種宣傳，繼續着使和平民衆感受到比一向更加嚴重的新災難。

美國代表，奧斯汀先生於九月二十日在所謂美國聯合國之友聯合會招待的宴會席上發表的演說辭中，根本企圖對人欺瞞蘇聯代表團所提出的這個問題，他只限於作一些絕對沒有意思的聳人聽聞的冗長演說，硬說蘇聯手腕毒辣然而他却不肯麻煩說明一下這些手腕究竟毒辣在什麼地方。奧斯汀不顧蘇聯代表團只列舉出一部分來的那些完全明明白白的事實，這些事實證明了美國的確存在着肆無忌憚的戰爭宣傳，有某些官員們參加，而且美國政府熟視無睹，美國政府對於此種宣傳極端放任，奧斯汀先生還毫無顧忌地說：美國不偏不倚地固守聯合國機構的原則與政策呢。他顯然忘却了聯合國機構的主要原則，是要爲和平而奮鬥，爲反對所有一切形形色色的戰爭煽動家們而奮鬥。而正是這一個原則，在這兒最被人濫用了，成爲最被人違犯與曲解的對象了，奧斯汀先生却不曾而且也不肯指出這一層。

蘇聯的提案，就是與這樣的反動人士方面針鋒相對，蘇聯的提案就是直接針對那些人士，那些人士實感到蘇聯——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的這個忠貞而勇敢的戰士——的提案，對他們的利益，對煽動新戰爭的事業都有很大的危險。就憑空捏造所有一切的理由，來反對蘇聯的提案。例如，有人說：凡禁止任何形式的戰爭宣傳，爲阻止和遏制這類宣傳而處以刑罰，採取行動，都是和個人的基本權利及新聞自由不相容的。有人說新聞自由使人民能夠明辨是非以討論任何問題。「紐約郵報」報導說：蘇聯的提案，

必將爲美國代表團所反對，根據的理由是：對人民有益的言論決不應受檢查，而只是對那有害於公共事業的言論才應實行檢查。但是，煽動戰爭損害到人民的利益，這難道不是事實嗎？使這一個國家與那一個國家斷打，如此煽動新戰爭的言論，是對各國犯的罪行，這難道不是事實嗎？能够容許這類的言論嗎？新的人類大屠殺的煽動家們，越出一切範圍，用那硬說與個人的權利不相容的新聞檢查制度的謊話來庇護自己，這樣的煽動家們，難道能够不予以制止嗎？

提起新聞檢查制度是不許可的一節，這是謬誤的，而且是虛偽的。那是謬誤的，因爲，爲了社會的利益，爲了人民的利益，以公衆輿論的名義，實施法規以調整社會關係，是人民的神聖權利。那是虛偽的，因爲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立法的實際情形，證明了：這一種調整，我們可以隨便怎樣稱呼它——管制，檢查等等——在包括美國在內的各國中，都是盡人皆知的。

因此，我應該說一句：麥克奈爾和奧斯汀自稱忠實於和平政策一節的聲明，決不能當做是認真的聲明，而麥克奈爾且從事於教唆反和平的宣傳，他們維護自由發表惡思想的權利，維護自由散佈對其他民族與國家仇恨的毒素，並號召新的人類大屠殺的權利，這些事情都是不相容的。而且的確是如此，因爲實際上，根據國家法律禁止戰爭宣傳，制裁這類宣傳，跟新聞及言論自由是毫無關係的，而且跟任何別的自由以及民主權利也都是毫無關係的。當然，決沒有一個國家會忽然心血來潮，准許公民們自由地隨意任性去使用火，始終抱着消極的旁觀態度，這就是教唆縱火了。在所有一切文明的民主的國家中，新聞自由，爲了社會的利益，爲了社會的道德，或社會的紀律，都不杜絕加以相當限制的餘地。如果說自由的確是一種公認的必要性，而毫無疑問的確是如此，那麼我們就決不能反對新聞自由必須禁止在報紙上煽動並懲戒違反社會道德或違反那個國家法律的事情了。

四、用「出版自由」作掩護

我們聽說，美國，英國和法國，以及若干其他國家，反對蘇聯所提議的關於以刑事處分制裁任何形式的戰爭宣傳一節的提案。人家倒會以為：在那些國家中，新聞自由方面沒有什麼限制了罷。然而，這決不是真的，例如，在所有這些國家中，都禁止散佈猥褻的出版物和圖案，禁止郵寄這些東西，甚至還在無線電廣播方面禁用猥褻的言語，違者照刑事處分。關於這一方面，我們可以參考美國的法典第十八章二百三十五條內稱：凡書寫，印刷或用任何其他方式複製，屬下流，猥褻，誨淫，色情，誹謗或恫嚇等性質的任何圖樣，形象，表情或語文的一切資料（信封，明信片包皮紙等），都不准付郵，或於郵件中遞送，凡有意送出或將這類資料傳遞，或交郵寄，以及散發或幫助散發這類資料的人，處以五千元以下的罰鍰，或五年以下的徒刑，或處以兩種處分。

在法國也有類似的法律，不過犯了這類罪行所處徒刑的刑期較短，罰鍰較少吧了。

英國有類似的法律制裁猥褻的文字和形象，而且英國的法律更規定對於有猥褻行為的人施行拘禁。如所週知，在英國也存在一種特別的戲劇檢查制度，對於戲劇和電影都要執行事先的檢查特別注意取締色情的內容。各國制裁販賣婦孺和取締賣淫，都有法律規定，而英國更規定加以拘禁的處罰，這也是人所共知的。像這樣的案件，在英國如果是再犯，甚至還要施行鞭撻，唯然不是公開的。

此外還應該補充一句：關於這類罪惡活動的任何一種公開的宣傳，也是應受刑法處分的一種罪行。懲處上述的罪行，而使得在這一方面違法的那些新聞機關應負刑法上重大責任的一種法律，為什麼和新聞自由的原則不牴觸呢？在這些場合，對報紙規定適用刑法並施以嚴厲的處罰，為什麼不被人認為

違反新聞自由的原則和相應的民主權利呢？正是因爲在所有這一切場合中，我們都在論及違反公共道德的罪人，這些罪行破壞了人民的倫理生活，任何政府，凡是關心於鞏固健全的道德和社會的倫理結構的，對於這些罪行都不能熟視無睹。這似乎是一種簡單的真理，而且幾百年以前就已經寫在一切倫理法典上了。那麼，在這場合，提議用刑法處分禁止戰爭宣傳和煽動戰爭——更危險，更可怕到千倍的違反人道的罪行，爲什麼反而有人出來反對呢？對於這一個問題，不能給與一種合於邏輯的有道理的回答。舉例來說，在美國關於登載迷惑讀者的不真實的商業廣告，新聞自由就受限制。例如，據紐約州的刑法（第四百二十一條）的規定：任何個人，商號，公司或社團，代理人或雇員，凡經由報紙雜誌，或其他出版物，或以書籍的形式印行，分散，遞寄，公佈，或直接或間接參與印行，分散，遞寄或公佈，關於貨物，有價證券，業務等項的啓事，通告，刊物，信件，聲明，招貼，傳單，通知卡片，標語，或貼紙，或經由無線電台，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廣告，或任何其他方式的聲明，而含有不確實的，騙人的，或迷惑人的任何武斷之辭的，都認爲犯了應受刑法處分的罪行。

由此可見，美國的刑法禁止爲了欺騙和訛詐的目的而利用報紙，不准許在這一方面享受無限制的新聞自由。

如果說，禁止新聞機關發表欺騙的，訛詐的歪曲的，說謊的商業廣告是可能的，那麼，在這場合爲什麼就不可能禁止發表對於戰爭的號召，或硬說蘇聯與吞併全世界的一種謠言呢？爲什麼就不可能爲了同樣的理由，禁止散佈挑撥性的謠言，煽動對鄰邦人民的仇恨，煽動戰爭，和教唆進攻愛好和平的國家呢？爲什麼不可能呀？我要問：爲什麼不可能呀？這一個問題我得不到一句答覆，正如許多合法的問題，我都不會得到答覆。我要引美國紐約州的立法來作證。至少在目前請聽一聽紐約立法委員們意見罷。

，目前我們面臨着的問題，如與關於複雜的商業廣告的問題，比較起來，分明更加重要得多，利害關係更加大到不可限量，會引起的後果也更危險得多，至於商業廣告呢，由於不謹慎吃下那些在廣告上說是毫無害處而實際上含着對健康有害成分的東西，因而會引起腸胃病罷了。爲什麼你們要認爲要求禁止罪惡的宣傳乃是侵犯基本的人權呢，我說，對於這一個問題，沒有人提出一個有道理的合乎邏輯的回答。

我可以舉出許多這一類的例子來。美國最高法院的一員，荷爾美斯，在將近三十前以前，一九一九年三月三日在審問却爾斯·斯金克的案件時，毫無疑問是很正確的說過：「言論自由的最堅強的辯護人，也決不會替那在戲院裏故意大喊『失火』而造成一片驚慌的人辯護：這個辯護人甚至決不會替那種發表足以引起行使暴力等結果的言論的人的罪狀作辯護，這兩種場合之成爲問題是在於：在這些情況之下的言論是不是適應於，和以它的性質來說，是不是會造成那種可以引起爲國會有關防止的物質罪惡的明顯的和直接的危險性兩點。」

我剛舉出的荷爾美斯，最有權威的說明了什麼是自由什麼是罪惡的解釋，那麼，是參議員奧斯汀對呢？還是最高裁判長荷爾美斯對呢？究竟是參議員奧斯汀對呢？還是最高裁判長荷爾美斯對呢？在我們蘇聯人民看來，對於這一個問題，不能有兩個答案。唯一的答案便是：無論美國的參議員們現今怎麼說，荷爾美斯永遠是對的。

事實上，關於這麼一個頑固派能有什麼話好說呢，他要在空滿的戲院裏拚命大叫「失火」，後來，捉到警察局里，他還要極力強辯自己無罪，說他不過是運用了新聞自由的罷了，雖然由於他如此運用新聞自由的結果，在隨即發生的一片驚慌中，有人變成殘廢了，也許有人被擠死了。如果有一個法官竟根據這樣的理由，以爲他不該運用了新聞自由，因而把這麼一個無賴漢判決無罪開釋，赦免他應受的一

切處分，任何思想明晰的人都決不會贊成這個法官，這是不容置疑的。事實上一定相反，我們可以確信，法律一定要使這個人對於他所引起的驚慌與死傷負刑事上的責任。

由此可見，如硬說法律禁止狂暴的戰爭宣傳，會違背新聞自由的原則，這種論證事實上毫無根據的。這一類的口實，決不是由於想要保障真正的新聞自由，而是由於不肯採取行動，以制裁像宣傳新戰爭之類有失體面的表現罷了。

但是，美國也在其列的某些國家中的反動派集團，頑固地反對採取這樣的措置，這些措置在實際上會解除新戰爭的危險，至少總會使宣傳這一種戰爭感到困難，那麼就可以很滿意地這樣認定：所有一切國家的人民，都懷着深切的了解與同情，歡迎以制裁人類新的大屠殺的煽動家爲目的而提出的蘇聯的提案。蘇聯代表團所收到的許許多多的男女美國人民的歡迎蘇聯關於揭發新戰爭宣傳的犯罪運動，和以支持與鞏固和平爲指針的建議的無數函電，便是這一方面的明證。這些信件的作者顯然屬於美國社會的最不同的團體和美國人民的不同階層的。這些函件——從好萊塢和奧克蘭，加利福尼亞的洛杉磯，聖約瑟，從紐約和猶提略，從買士和丹佛（科羅拉多州），從波多利谷和辛辛那提，費城和鹽湖市，芝加哥和麻州的柏爾蒙特，從佛羅里達州的歐斯提斯和大瀨，紐約州的窩威坦，西弗吉尼亞州的摩爾根坦和明尼波立斯，而且不僅從美國，可從加拿大，哥斯達黎加，澳洲以及許多其他國家發出的所有這件函件，都陳述勞動人民對於和平的純潔的關心，陳述他們深惡痛恨形形色色的戰爭與軍事冒險，陳述他們從事最大的努力以維護和平，防止新戰爭的苦難與貧困的重演。

五、迅速裁減軍備，禁止原子武器

講到關於反對新戰爭的宣傳和煽動家應採措置的問題，我們認爲也應該注意到另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即去年聯合國大會所檢討並且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的大會決議裏有它的反映的關於裁減軍備的問題。衆所週知，這個關於規定軍備的普遍調整與裁減的原則的決議案，已於去年第六十三次全體會議中通過。聯合國大會在這個決議案中承認必須最迅速地普遍調整與裁減軍備與武裝力量。爲求達到禁止與銷燬各國軍備中的原子武器和其他在目前與將來可應用爲大規模破壞的一切基本種類的軍備這一個急迫目標上的基本步驟，並且爲求最迅速確立對於原子能和其他現代科學發明和技術改良的國際管制使它們只能用於和平目的起見，聯合國大會竭力勸告原子能委員會儘快執行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的大會決議案中第五項所規定的它的任務。

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聯合國大會的決議案的重要性可以從一大批的勸告中看得出來。聯合國大會通過的這些勸告中督促原子能委員會和安全理事會加緊審查關於設立包括禁止原子和一切其他大規模破壞的基本種類的武器，以及對於管制原子能使之只限於和平用途必需範圍內的管制與監督的國際組織的各項協定的草案。

聯合國大會也承認以監督和其他的方法作實際與有效的保證來防止履行本身義務的國家的可能的破壞和規避，對於軍備和軍力的普遍調整和裁減也是重要之舉。在這個決議案中也勸告聯合國機構的會員國家，連估領的需要以內，對於留在過去的敵國領土內的武裝力量應採取逐漸的和均等的撤退，對於留在會員國家領土內的，不得它們同意而自願地並載明在不違背聯合國憲章與國際約束的條約式協定內的武裝力量是應該作迅速的撤退。決議案也勸告各國武裝力量的相應的縮減，以及普遍地逐漸與均等地裁減國家的武裝力量。

遺憾的是這個決議到如今還是沒有執行。可是它的執行乃是極關緊要的事，因為這個決議牽涉到千百萬人的利益，他們在一切國家中至今還經驗着落在他們肩頭的軍費的重担呢。

蘇聯代表團認為這個決議案的執行是符合於所有愛好和平民族的利益的，而且也是對新戰爭的宣傳和煽動者的最有力的打擊。蘇聯代表團因此認為必須請聯合國機構重申立即執行大會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四日和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的上述決議的必要。

聯合國機構方面的這樣重申前令是一件有巨大意義的措施，而且也符合於各國和平與安全的鞏固的利益的。

一切上述的節略都編入分發給各會員的蘇聯文件中，其中的第五點列有蘇聯代表團、蘇聯政府、蘇聯國家以及所有蘇聯人民所認為遏止戰爭宣傳，為裁判這個戰爭宣傳及其唆使犯，以消除對一切國家人民的最大的災難——這災難以毫不留情的邏輯在降臨下來，所以需要聯合國機構以斷然的、堅韌的、一致的、強大的努力來預防這個大災難——所必須採取的措施。

蘇聯代表團在本屆大會裏將以一切方法堅持必須對於提供諸位採擇的文件中所提出的措施能通過相應的辦法。

在聯合國大會政治委員會會議上的演詞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四日

在政治委員會裏關於反對新戰爭宣傳和煽動者的辦法的討論中，顯示出大多數代表都認為蘇聯代表的這個問題的提出是正確而合乎時宜的。只有美國代表團起來批評蘇聯的建議。而且美國代表奧斯汀企圖證明蘇聯的對戰爭販子採取措施的建議是與聯合國機構的憲章抵觸的，因為憲章尊重人的權利和包括言論自由在內的各種基本的自由。奧斯汀宣稱：美國代表團反對任何直接或間接的限制言論自由的舉措；所以美國代表團反對整個的蘇聯議案。

這樣，假如能以奧斯汀的話來判斷，美國代表團是反對對於戰爭販子任何限制的了。這樣看來它是贊成對從事新戰爭宣傳和煽動新戰爭者予以無限制的行動自由的了。我們認為對於新戰爭販子的這種態度不過是對戰爭教唆犯和戰爭宣傳的一種鼓勵罷了。這種情形證明我們的對象還不僅是任何文明國家的刑法都知道的犯罪的坐視而已。

這更甚於犯罪的疏忽，這是教唆，這是鼓吹敵對和憎恨人類，這是教唆作戰爭的宣傳。這對於軍國主義思想在社會上佔有統治的或大的比重的國家之如過去的普魯士和其後整個希特勒德國那樣，是完全自然的事。如所週知，普魯士風正是曾作為歐洲強盜式侵略的主要支柱的那種加工精煉的軍國主義體系。那裏的一切都從屬於這一個好戰的思想：征服世界，確立世界霸權。整個的生活，從學校起直到工廠和農村領地止，那裏都是在準備可以取得為神意預示的勝利的戰爭的標誌之下作安排和發展的。

在這國家內的教育出版，宗教和教會，各式各樣的藝術方法，運動，統治階級的社會的與政治的利益：一切這些都圍繞着戰爭的思想，圍繞着征服其他國家，併吞人家的領土，奴役別的民族的計劃。如我所說過的普魯士和希特勒德國之類的那些特徵的軍國主義國家，在過去和現在都是這種樣子。在一切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生活的這種傾向之下，整個的生活便充滿了兵器的鏗鏘聲。在這種情形之下，一切對於備戰的非難，對於禁止備戰的號召，對於鞏固和平的號召，當然是格格不入，並且被軍國主義國家的統治集團看作墮落聖物，看作違背他們的社會原則的了。如所週知，在這種社會裏作優勢的物質關係，首先是生產關係的影響之下，爲這些關係所決定的思想的影響之下而形成的一切生活的心理學，便成爲好戰的和侵略的。『Qui prole proem, paxa bellum』，即『誰願意和平，誰就得準備戰爭』。這便是這種社會裏在這種時候的右支配力量的座右銘。在這種社會裏，所有一切停止準備戰爭的建議，採取鞏固和平的措施的建議，以『誰願意和平，誰就得準備和平』爲座右銘的建議，使準備新戰爭者、煽動新戰爭者、宣傳新戰爭者陷於孤立的建議，無怪乎要碰壁了。這種建議軍國主義者、軍事職業家、軍事工業家和他們的雇用人員馬上會認爲是破壞人權，破壞他們所理解的面符合於自己在社會中的地位和自己的集團與階級利益上的基本權利的。

當我努力推究奧斯汀昨天在這裏發表的演說時，我的腦筋中不免發生了這樣的意見。事實上，推究起奧斯汀演說和其他的徵候時，美國對於蘇聯所作與戰爭販子鬥爭的措施的建議的那樣激烈的反對以什麼來解釋和怎樣來理解呢？奧斯汀宣稱美國政府擁護和平，并爲他所說以國際合作的方法來保障和平。既然如此，何以又反對蘇聯的建議，甚至連作爲蘇聯建議基礎的關於斥責新戰爭宣傳的思想本身也反對呢？不但如此，這個思想本身也被認爲與聯合國機構的憲章以及基本自由和人權相抵觸的。一切這些之

何以這樣做，是爲了要拒絕蘇聯的建議，而蘇聯的建議却是完全符合於聯合國機構的憲章以及基本自由和人權的呀。

這個問題我認爲必須更詳細地，雖然也儘可能簡短地來談論它。

這裏在奧斯汀之前，還有伊瓦特演說過。伊瓦特和奧斯汀他們兩位，關於出版自由和尤其關於英美出版自由的問題再三致意過。我必須來談談這個問題。但在一切之先，對於實際的情形先有幾點意見

伊瓦特從事於蘇聯與美國出版的比較，不用說一切優點都在後者。要說他的論點有充分理由的話，這是不成功的。實際上，伊瓦特的關於美國出版優點的確信的論證是怎樣的呢？伊瓦特肯定說美國出版物登載的東西只代表個人或個別團體，而不是美國政府的意見。

因此，他說，美國的出版是自由的出版。於是他把蘇聯的出版作對比，當然把蘇聯的出版用黑暗的色彩調來描述。可是有誰會相信這樣的議論呢？

譬如，伊瓦特硬說蘇聯出版物裏事實的資料中混雜着誹謗的和片面的議論。我期待看伊瓦特起碼會化最後的五分鐘來引證他所確信的蘇聯出版中普通所應用的那些片面的和誹謗的報道的例子。我沒有期待到這個。一般地說，這裏有許多代表團慣於會沒有證據而控訴人家的罪狀，也會斥責其他站起來控訴罪狀的人，雖然受他們中斥的告發者們的手裏充滿着各式各樣的證據，這些證據他們很願意奉獻給那些只要能平心靜氣地與客觀地審察這些提出來的事實的人們。我沒有期待到答覆，正好像對於蘇聯代表團所直捷了當提出的那些問題老是得不到答覆一個樣子，這顯然由於沒有爲答覆的事實而作答覆是困難的事；而沒有什麼證據，沒有任何事實證明，而信口胡說，這當然是容易辦的事，可是也是相當危險的事

，因為類似伊瓦特那種議論本身就是誹謗的和帶着片面的性質的。

可是伊瓦特當他硬說、當他誇稱、當他馳騁於那些，譬如說，澳洲的或美國的、或英國的出版自由時，莫非他不知道那本，譬如說，出版於美國的標題爲「基本的自由」的摩里斯·歐恩斯脫的著作的嗎？

奧斯汀在他的演說中強調說言論自由、出版自由是基本的自由，說是最重要的基本自由的一種——我也完全同意這是基本自由中的一種，這本書可以作爲對奧斯汀的答覆。可是這個基本自由在有些國家，譬如在美國中，假如按照「基本的自由」一書的作者摩里斯·歐恩斯脫的證明判斷起來，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呢？在這本書裏，列舉了許許多多的事實：起初在美國有些報紙怎樣慢慢地消聲匿跡了，它們爲那些口授一切其他報紙以自己政治執行路線的大報紙托辣斯吞噬去了。例如從一九〇九年至一九四〇年間，按這些資料所說，在美國消滅了六百零二種報紙，即差不多所有報紙的四分之一。有的事實指出美國的中小城市，由於報紙數量的縮減，如歐恩斯脫所說，逐漸成了只有一種報紙的城市。例如內華達州。在一九一〇年這裏有幾種報紙的城市佔百分之八十六，但到一九三九年時，這一州甚至沒有一個城市有二種報紙了。按歐恩斯脫的話，這結果使當地的輿論——我引述他的話——集中在幾個人的手裏。人口在增多，報紙的數量却在減少起來。

伊瓦特陶醉於美國、英國和澳洲的出版，並且肯定說在這種出版物的篇幅裏，如他所說，公開地和自由地、沒有檢查地討論重大的問題，而且任何人可以在這出版的篇幅裏表達自己任何時候的意見，而任何人也可以反駁他。這話聽起來當然很悅耳，這是值得讚揚的，可是一切這些和事實相合嗎？處在爲歐恩斯脫的「基本的自由」一書所述美國出版事業的特點中可得而聞的情況之下，即當這一出版事業日

甚一日地集中在強大的康采恩、托辣斯和獨佔者的手裏而千百家報紙唯他們的命是聽時的情況之下，所謂表達自己的意見的可能。充其量不過對於崇敬的人物中之一個罷了。

在一九〇〇年，美國有九個聯合組織控制了三十二家報紙，到一九四〇年有五十六個聯合組織控制了二百九十六家報紙。在一九四〇年，有六個大聯合組織控制了幾乎所有在報紙聯合組織手中的報紙總數的三分之一，至於日報一項，它們控制了所有日報的六分之一。這裏因此歐恩斯脫不能不指出：「所有報紙的六分之一集中在六個老鬪手裏，假如這不算是不名譽的事情，那麼無論如何也是深刻不安的對象」，又補充說：「最近幾時我們聽到了太多的關於國際情報自由的議論，而且這些議論有不少出諸電報通訊社和報紙團體首腦的口中。仔細考量一下目前美國的情形，這些對於改造世界的期望的可敬的與漂亮的尊重都是從我們本國的獨佔家的嘴裏發出來，不免有些滑稽了。」

譬如我們也許能讀到過一九四四年八月的「號角」雜誌的關於這樣的報紙獨佔事實上會引上什麼路以及依賴於這獨佔與獨佔家的控制的所謂「基本自由」到底怎樣的文章。我們再讀歐恩斯脫書中所說：「當每天數百萬人讀着一個記者時，那麼散佈在報紙市場上思想的數量便會減少到最低的地步。辛迪加化的記者不管是自由主義者、是反動派或者是保守派，這並沒有任何區別。當地報紙的生活能力，從而也是美國人民的生活能力，由於採取了思想的標準組成而減少起來。」我們便可恍然大悟了。

當話說到思想的標準組成時，就很難說到基本的自由的。我覺得如果我指出這些權威報紙如「紐約時報」，「紐約先驅論壇報」，「紐約太陽報」都是跟銀行和保險公司有關係時，我沒有犯什麼錯誤的地方。我只消舉出「紐約保證信託公司」，「首都人壽保險公司」，「紐約城市國家銀行」，這些銀行和保險公司當然會關心到使這個思想的標準組成正好就是那個完全適應於那操縱美國事業的領導集團的

利益的思想組成的罷。

假如這還不够的話，我可以另外舉出喬治·賽爾特斯的「出版自由」一書，它揭開了各式的獨佔事業利益的鍋中煮出來的這個出版自由的根本自由背後的「鐵幕」。伊瓦特也許不知道賽爾特斯這本書嗎？我可以介紹，即使爲了擴展自己的眼界起見，也應該看看它。喬治·賽爾特斯說到上述幾國的出版自由時，指出給那些報紙供給廣告的大企業在出版界的方針的問題上所担任的那種特殊的角色。從大商家發出的命令，對事件的緘默，這是最常有和最特徵的現象。這些大商家都是當地最大的廣告主顧。差不多所有報紙都靠着從這類廣告的收入來維持，而這些大商家所實行的抵制常常是發行的致命傷。這些商家的老闆們並不比其他的「生意人」好些或壞些。我們在賽爾特斯書裏讀到這樣的話：「必須指出他們堅持他們所做的暴行、罪惡、醜事和敗法亂紀的事情不能在報上發表。他們的堅持平常總是成功的。」

看這些如伊瓦特和奧斯汀所說的「自由」與「公開」討論各種問題在美國如何實行一事，可以從對外政策關係（這種關係當然表現着利益的）的許多例子中作判斷。譬如說，第一件事實：關於俄國反美陰謀的事，其中墨西哥作爲行動的基地的身份而登場，而巴拿馬運河受着敵人佔領的威脅。「諸位先生——奧爾慈先生（美國副國務卿）招待新聞記者（這事在一九二六年）時對他們說，並且事先還從他們那裏取得了保持這些新聞來源的祕密的諾言，——我們認爲一切這些應該讓美國人民知道的；我們雖然沒有證據，可是關於墨西哥與莫斯科之間存在着勾結的連鎖，而且也許甚至還有着真正的互助。這一點我們是有精神上的確信的」。這便是多年以前奧爾慈關於俄國反美陰謀問題的談話。

在賽爾特斯的書中其後可以讀到如下的話：「兩年之後國會確信在上述的插曲那時，有着一種由煤油利益、探礦權、銀行家、幾家報紙和其他有力的團體與私人所製造的陰謀，這陰謀的目標在造成干涉

墨西哥的事務並且以戰爭的代價把墨西哥跟它聯結起來。」

爲避免任何誤會起見，我再聲明一次，我是在引述賽爾特斯的書，並且轉述我從這書中摘錄出來的一些事實。

這裏是第二件事實。在一九二七年「紐約時報」發表了關於羅馬尼亞邊界上流血的聾人聽聞的消息。幾天過後杜朗第從莫斯科發來一個電報，其中暴露了「紐約時報」的消息的謬言。讀這兩個消息的人必須以自己的情感作指導來作一種選擇：他是應該相信那裏真正發生了流血的報道呢，還是任何流血都不會發生的報道。他會必須相信他所願意相信的。

在一九三〇年杜朗第再度碰到了駁破「紐約時報」關於在不是什麼羅馬尼亞邊界上，而是在莫斯科發生暴動的消息的機會。據說這消息不是從俄國傳出來的：「這樣的報道打破了里加或柏林的一切消息源泉的捏造本領的紀錄和一切國外出版物和讀者的信賴的紀錄。」

這裏是關於有些國家中怎樣報道「自由的」輿論的第三件事實。我們這個時期中最大的通訊記者之一的傑姆士·克利爾曼，曾是赫斯特之星——寫作當時關於古巴戰爭報告的通訊記者——之一。克利爾曼在他的回憶錄發表了他的主人赫斯特與在軍事記者之前到達古巴的藝術家弗立特立克·雷明登兩人來往的真實的下列的電報。雷明登到了古巴，給赫斯特拍了一個電報：「『紐約雜誌』赫斯特。一切平靖。此間毫無騷亂。不致有戰爭，擬返國」。赫斯特拍了回電：「哈瓦那·雷明登。請暫留，汝工作爲保證繪圖，我則保證戰爭。」

從應有盡有的統一在獨佔者（他們口授出自己的情報給千百家報紙，並且以自己在這種事業和這種工作上的控制的權勢來責成所有這些報紙俯首貼耳地轉載這些大老闆接連不斷說出來的這種無稽之談）

）手中的出版機關裏的各式各樣的藝術家與美術家們的這種報導輿論的工作便是這麼一回事。

那麼，關於較接近伊瓦特的澳洲出版怎樣呢？可以引證另一本書（大家知道有的時候讀書是有用的），這書是一九四四年在悉尼出版的。這書屬於孟台爾的手筆，書名是「出版物——社會公敵」，是報道澳洲出版情況的書。可以看到在澳洲有六個大企業控制了每星期出版總數達一千萬份的報紙。最大的報紙——「悉尼太陽報」，「悉尼早晨先驅報」，「阿台萊城新聞報」——的老闆們都是許多工業企業、銀行、托辣斯、康采恩等等的領導者和股東。伊瓦特反對檢查，可是一切澳洲的出版物都是在獨佔資本家的嚴格檢查之下出版的。在澳洲，沒有政府的檢查，即從屬於公共的管制下的檢查，但那裏却設有私人的檢查，一種非常嚴格的檢查，凡是報紙上登載的一切——從論文至無關重要的補白和廣告都得經過檢查；它檢查到最不足道的問題而同時也檢查到於國家具有首要意義的問題。

我現在讓孟台爾和他的書來發言。看其中寫道：「一切可能觸犯登自己報紙的廣告的大主顧的東西普通都被出版者的檢查刪去。顯示有報紙的老闆，他的親戚和朋友作股東的公司的不利消息是不准報導的。報紙老闆的檢查也施之於政治。政界人員的演說，假如牽涉到其報紙老闆的利益相反的政策時，那麼演說的最重要的部分便刪掉。出版物的老闆規定報紙政策的總方針，這方針在於要支持一個而反對另一個政治措施，要拾出一個政治人物而攻擊或貶斥另一個，要對某一運動大吹特吹而對另一個都完全閉口不談，要把應該使讀者的同情轉到某一方面的一切東西刊登在顯著的地位而把可以引起相反結果的東西完全不登或者登在最後一頁的最下的地位」。這樣，如孟台爾所說的出版自由的神聖，便專指着幾十個報界豪商利用了出版自己的意思來適應自己的私人利益和企圖的權利而已。孟台爾說，事實上一切澳洲的主要的報紙在自前挑選着情報，把它施以檢查，摒棄並常常歪曲它，來影響自己的讀者的見解。

因爲一切這些報紙企業都是簡單的商業企業，所以這也是完全真實的和可理解的事。

伊瓦特在這裏說過「其他國家伸向蘇聯的和平之枝」，蘇聯出版界是視若無睹的。我不知道伊瓦特指的是什麼「和平之枝」，可是我却知道一些別的東西，老實說，這東西使我有根據說：伊瓦特所稱爲蘇聯出版界視若無睹的「和平之枝」是債口雌黃，純粹的扯淡。

我得再說說孟台爾。關於「和平之枝」一點他這樣寫道：「在整個新聞事業的歷史上，這種檢查的最可驚的典型大概無過於在二十年的時期中關於俄羅斯的一切積極的報導的經常的緘默了。在連續的二十多年裏，從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起直到一九四一年當俄國成了我們的盟國和戰爭的可靠的救星止，澳洲的報紙從事於情報的宣傳，而登載的關於蘇俄的報導只不過說些無窮盡的失敗與窮困，關於創立工業的無效的嘗試，以及關於令人回想到瘋人院政治的內政的話」。使伊瓦特如此滿意的澳洲出版界在二十年間是如此寫到蘇聯的（我可否問伊瓦特：不是因爲這而滿意的嗎？）可是爲什麼報紙的老闆們在二十四年間固執地不登載關於俄羅斯的任何積極的消息，而登載些不管愚蠢到何種地步的說俄羅斯在工業、在社會、和在道德各方面整個垮台的任何報導呢？爲什麼呢？曼台爾答道：「他們怕澳洲的人民知道一個國家沒有報紙的私人老闆，沒有商業廣告，沒有小商人的文化也能繁榮，發展而達到輝煌的成就的」。

伊瓦特指稱，這裏，你們瞧，在美國，一切的演說，甚至九月十八日維辛斯基的長長的演說也刊登出來，可是在蘇聯，其他代表團的演說什麼也不登。我願意看，明天紐約的報紙登不登我今天的演說詞。兩天以前我在這裏所說的話沒有一張紐約的報紙登過其中的任何話過。

孟台爾、塞爾特斯、歐恩斯脫關於美國和澳洲的出版自由便是這麼說的。我這可以舉出幾十個姓名

來。整批的書籍都寫滿了關於這個可怕的，沉重的，但對於出版却如此空闊地沉重的狀況的話，這種狀況證明着這裏老實說來，任何出版自由都無法說的。

這些姓名之中我想再添一個名字進去。我說的是英國的總檢察官梭烏克勞士，他在一九四六年七月三十日發表了一篇聲明。梭烏克勞士先生建議英國的每一張報紙在第一欄裏登些什麼東西呢？看這裏：「這張報紙屬於某某的。這張報紙的目的是經濟利益的引出和他老人家承諾隨時保持的私人意見的表現」。「沒有任何保證——這是梭烏克勞士說的話，而我不過恭敬地追隨着他重述一遍罷了——可以担保報上報導的事情能符合於事實的。它們可以成爲隨便什麼東西，但可不是真實的消息」。梭烏克勞士補充道：「我只怕這不見得能引人入勝」。其後又補充道：「我抗議目前大部分保守的報紙的這種事實」。即：對於事實特別的挑選和不正確的解釋以滿足輿論，以及在事實的掩蔽之下來表達某種一定的意見」。真是概乎言之。「我認爲——梭烏克勞士說——這些情形嚴重地妨礙着我們民主的政府機構的工作」。爲了現代的民主，必須使它植基於博聞週知的輿論，而這種輿論的存在，不僅要靠出版自由的實現，而且也要靠客觀的與正直的報紙的存在的」。

我所報道的梭烏克勞士的這個聲明已經有了一年之久。然而它沒有喪失掉它的新鮮性，而且往後的長時期中大概還不致喪失這種新鮮性與這一種價值的，因爲這是發自檢察官口中的真理。而且這個檢察官也不是普通的檢察官，乃是英國的總檢察官呀。

伊瓦特在他的演說中責備蘇聯出版界沒有說明出其他國家對待蘇聯的友善的行爲，而他說的非常斬釘截鐵地，態度很不公平，伊瓦特這裏發出的責備，特別對於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反對戰爭販子與新戰爭宣傳的問題的關係有什麼意義呢？這種責備不多不少地意味着這回事，即：蘇聯的出版事業，照伊瓦特

的構想來說，是處在蘇聯政府統制之下的，蘇聯政府欺騙着自己的人民，不向我們的人民——蘇聯的人民，報導若干國家方面的那些友好行動，於是這樣地隱瞞着它們的友好行動和意向時，便唆使我們的人民仇恨地反對這些國家。假如是這樣的話，這可比犯罪還更進一層了。而伊瓦特先生給了我們什麼例證呢？爲證明自己的說教不虛起見，他舉出了這種情形：葛羅米柯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六日在安全理事會中的聲明，其中說到美國的武裝力量在戰勝日本上以及美國在對日戰爭中所受的損失比任何其他國家都大的話沒有一張蘇聯報紙會登載過。你們知道他還率直地說這種話沒有讓蘇聯人民知道。可是這裏我傳送這份報紙，這份在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出版的「真理報」。這是全蘇聯共產黨（布爾什維克）的中央委員會和莫斯科委員會的機關報，我傳送這份「真理報」並且請求主席先生證明並轉告在第六版上登載着標題爲「在安全理事會中」的電報，其中一字不錯地，一個標點不錯地複印着昨天伊瓦特在這裏責備我們對蘇聯人民隱瞞這個聲明而引證的那篇東西。

這樣，伊瓦特先生，或者你是被你的居心不良的或無知無識的顧問們（他們把一切的韜略，一切的「偵探知識」，把一切無識的廢紙塞給你，爲了使你本來已經熱烘烘的脾氣更熱起來）引入了迷途；或者你是有意識地這樣做的，在這種情形下你就不牢實了。在這種樣子的事實之下，我請問：說蘇聯政府和蘇聯出版界隱瞞其他國家的友好行動的這個講題，莫非不正是伊瓦特先生於提出的議決案中第二點規定的那個最惡毒的誹謗嗎？

俄國的偉大作家哥戈里講過一個下士的寡婦怎樣鞭笞她自己。我覺得伊瓦特先生用這個例子來鞭笞了自己。可是我期待着他對於這一點他會作說明。談到這個問題，我倒願意順便指出一樁有趣的事實，當二月二十七日安全理事會中美國提出規定對日本過去的委任統治的島嶼的問題時，那時澳洲代表海慈拉

克先生便請求暫緩作決議。而那時正好是葛羅米柯他站起來指出這個問題已經完全明明白白，所以沒有任何理由來拖延這件事了。這樣，澳洲人願意這件事擱下來，或者也許完全打消它。蘇聯出來反對，於是這裏現在便搞出了這種歪曲的樣子，以便引出不利的偽造的論題。請看關於例如澳洲之類的一些國家的出版自由，和關於例如蘇聯等出版受政府統制並欺騙人民的另一些國家的這個基本論題，便是這麼一回事。

伊瓦特先生對於「文學報」上刊登的艾森豪威爾的諷刺畫一事而感到憤怒。可是如果伊瓦特注意一下那些，譬如說在紐約的對於蘇聯政府的領袖們所作的諷刺畫時，那麼這些諷刺畫大概可以代替糊壁紙而貼滿所有這些牆壁的。不但「紐約新聞與美國人」報或「紐約世界電報」，而且還有「紐約時報」，「巴爾的摩亞太陽報」，「泰晤士先驅報」和其他許多的報紙，我每天看見它們而且以極大的厭惡注視這些爲美國出版界所登載的諷刺畫，它們無恥地污蔑着蘇聯國家和蘇聯人民的領袖們。這些畫我有着很多。我們將來要出版一本畫集，來證明造謠中傷者的罪狀。

伊瓦特忘記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即蘇聯的出版開始攻擊其他國家的出版，只有在答覆攻擊之時，而這次攻擊遠在對付蘇聯出版之前，就老早在不斷地攻擊蘇聯國家的領袖了。這尤其在美國已經成了習慣的現象：如把俄羅斯當成一隻可怕的白熊，它在把整個其餘的世界撕成碎片；把我們的領袖們畫成無禮的和無賴的樣子。這已經成了如此習以如常的現象，以致這裏竟沒有一個人會覺得稀奇。可是我們的人民對這個非常憤慨，於是對於這種諷刺畫我們會以自己的諷刺畫來還報，用十張畫來還報一張畫，用一百張來還報十張，用兩倍的粗暴來答覆人家的粗暴，不考慮到什麼職位和勳章，如目前的民主所適合的那樣，也不顧到過去的功績。邱吉爾之類的戰爭販子我們就稱之爲戰爭販子，而且不但這樣地稱他，還要

作證明，雖然他們過去在反抗我們共同的敵人的鬥爭裏他們的功績是偉大的。

伊瓦特應該知道這個。當俄國的出版界，蘇聯的出版界報復時，他可不要生氣。對於諷刺畫他可也不要見怪。對於這一點我可以引述俄國的成諺：「尊容的醜陋絲毫怪不到鏡子」。原來怎樣，諷刺畫便現出怎樣，如照鏡子一般。自由的出版便是這樣的事。我們，蘇聯人民，贊成出版自由，贊成正直的、民主的出版，這出版要執行自己崇高的，高尚的使命：為社會事業，鞏固和平與民族安全的事業，反對新戰爭的宣傳與煽動者而作無情鬥爭的事業，而服務。我們贊成這一種出版而反對不執行自己這種崇高的、高尚的、神聖的責任，在為真理為進步為一切愛和平的國家與民族的幸福而鬥爭裏為自己人民作偉大的服務與社會的責任的那樣的報紙。

我不預備再談伊瓦特的其他的小意見，雖然其中的每一個都有相當的意義，我現在轉到奧斯汀先生。奧斯汀先生這裏悲嘆着杜爾斯先生被毀壞了的名譽。當我在九月十八日把杜爾斯列於戰爭販子名單的末名時，我想他要不高興，為什麼列他在最末尾？我想他將要求公道，最低限度把他改列入頭幾名裏。可是其他的人為他抱怨起來了。杜爾斯想立刻放棄為他的登記。你們知道，他聲明我所寫出來的他在報上發表的那些話他不會說過。我那時便在出版會議上詳細闡述過他說過的一切那些話。這以後杜爾斯先生已經不再作申辯了。顯然他是滿意了。我也感到了滿意，因為戰爭販子被揭發了出來。現在他找到了新的庇護者，可是這大概是老的庇護者。奧斯汀先生認為，如他自己所說，假如真正閉上了嘴——這不是我的話，這是奧斯汀的話——這些真理等的虔敬的說教者們（其中還補充了一個虔敬的老實人貝爾納斯）都閉上了嘴，那麼世界就應該陷入地獄去了。

可是事實上世界果真受不住對杜爾斯和貝爾納斯的教唆戰爭的那些責難了嗎？杜爾斯在我們眼睛裏

，在蘇聯代表團和蘇聯人民的眼睛裏，以及在許許多多（我敢於想）正直的和平的維護者的眼睛裏有什麼貽羞之處呢？杜爾斯貽羞之處在於他鼓吹與鼓勵一方面，慫恿另一方面不去跟蘇聯和其他的民主國家合作，而仗着強大的戰爭機器（這機器爲杜爾斯所述，可以遏止「蘇聯的動力學」的），以所謂強硬的方法來對付蘇聯。他說和平不是基於妥協，就是說不是基於合作，而是基於我們的（即美國的）歷史的政策之強硬。

當我們說這就是教唆仇恨與戰爭時，奧斯汀便發起歇斯的利亞來，據說甚至向聖徒保祿乞授。這引起我也轉到教會人員去的念頭，於是找到了美國新團體的機關報「證人」雜誌一九四七年一月三十日的社論，題目是「杜爾斯應該辭職」。這是有趣的一篇文章。「證人」雜誌因爲杜爾斯關於德國問題的演說而要求他辭職。爲所週知，杜爾斯在這篇演說裏，正好像在他的其他的演說一樣，贊成建立有德國參加而沒有蘇聯參加的西方集團。這是怎麼回事呢？這是組織由西歐國家，包括法國、比國、盧森堡、德國而不包括蘇聯的集團的建議。這是對蘇聯的友好行爲呢還是敵對的行爲？照我們的意見說，這是對蘇聯的敵對的行爲。而這也不僅是我們的意見。看我方才講起的新教教會人員出版的「證人」雜誌的社論裏說，杜爾斯在一九四七年一月所建議的解決德國問題的那種辦法是與三強——美國、英國、蘇聯——的協議相抵觸的；原文說，防止德國重新成爲和平威脅的中心的實在的義務是有賴於三強的有效的團結。

在這篇社論中，新教的牧師們說道：「蘇聯是被排除於對它安全有切身利益關係的事情的管制的」，他們指出杜爾斯的建議是接着由邱吉爾創立的英國的聯合歐洲委員會的一天以後，這委員會也是排斥蘇聯參加的。新教的牧師們指謫這個分割歐洲經濟的計劃說：「基督教徒和剛剛從封建的統治之下的新

民主的束歐工人們將被拒絕獲取德國工業潛力的任何利益一事現在應該發生了」。其後新教的牧師們在這雜誌中又問道：「在一切具有爲發展」能的方面的各種權利的獲得（這是我們社會的信條的一切說法的基本原則）上莫非可以拒絕束歐人民的嗎？」新教的教士們問：這些杜爾斯的計劃目標在那裏？它們的建立集中的加迪爾的霸權呢，還是在爲一切有關國家的相互的發展而作民主的計劃呢？他們問：杜爾斯的計劃將導向何處去？我們答道：這可以從這個計劃的成功主要懸於英美集團這個意見裏看得出來。至少這雜誌引證了杜爾斯的話，後者聲明美國和英國握有「在西部德國的決定的力量」。這雜誌問道：這個決定的力量是什麼？這力量是不是意味着就是那種威脅，即在杜爾斯關於美國重新獲得太平洋基地的新的軍事潛力方面的建議以後隨之而來的威脅，或是意味着那些控制着作爲青年伙伴的英國的美國財政的人們的軍事利潤所保證的新的國際霸權。

這便是新教的牧師們在新雜誌「證人」上所寫的關於杜爾斯（有參議員奧斯汀給他辯護成一個清白的處女）的話。這雜誌答覆了一切這些問題：「正是這個力量企圖在「自由企業」的招牌之下，逃避大西洋憲章與聯合國機構的憲章所闡述的原則，正是這個力量可以購買侵入德國工業以求控制我們的在財政方面較爲柔弱的西方盟國的「共同管制」。杜爾斯所想的可就是爲了「西部歐洲」的真實的利益嗎？這雜誌指出杜爾斯的「關於我們所具有力量」的談話，「乃是預防戰爭的辯護者的語言，國際大資本家的代表們的語言。這不是那些努力於公正和長久的和平的人們（他們的教會委員會是由杜爾斯主持的）的語言。社論的結語說：「國際財政家與工業家回復到對德國經濟的控制的政策可能不過重新導向戰爭罷了。這跟所有我們的教會會議對於經濟問題的意向無條件地相矛盾的。他們要求一切民族的經濟的與社會的生活的民主化」。在這種情形之下，杜爾斯提出了新教的牧師們所不同意的目的，於是他們說道

：「關於杜爾斯計劃和這些原則（即教議的原則）相抵觸這一點，我們應該要求他辭去教會聯邦會議的公正與持久和平制定委員會主席的職位，也辭卸他在國際教會會議中的領導地位」。新教的牧師們如此說。爲參議員奧斯汀列爲美國新聖人中的這個誠實人的風貌便是如此。

土耳其的代表在這裏發表了演說。我應該也談一談他的演說。沙爾必爾這裏指出過蘇聯代表團對於土耳其所作的攻擊是不公平和不正確的。關於這一點他注意於喚起我的正義感。我以適當的方式答復他的這個對我的正義感的呼喚。我只是不知道沙爾必爾先會不會滿意。他指出在土耳其沒有一個人從事於煽動戰爭。他說，然而，莫斯科電台却每天，甚至用土耳其語言——這顯然是新的罪行了——放送一種批評土耳其的社會關係，土耳其的政治等等的情報。我仔細拜讀了這篇演說。這對於其他的人在空閑時當然也辦得到的。因此我不在這裏向你們重讀它了。可是我應該說，沙爾必爾所舉的那些例子中沒有一個有一個字說到教唆戰爭的。沙爾必爾關於這方面根據這些例子在這裏所說的一切只是些推論，而且這些推論是什麼根據也沒有的。譬如他說，「消息報」說在土耳其與美國之間的協定簽字之後，土耳其的經濟發展不會再符合於土耳其的利益。這是教唆戰爭嗎？可是這個發展將被適應於美國對外政策的計劃。這是教唆戰爭嗎？又說這個協定的結果在土耳其將確立美國的控制。這是教唆戰爭嗎？這些便是沙爾必爾在這裏關於莫斯科宣傳所作的意見的全部。

他在其他的話中又說，在這種宣傳裏，關於從土耳其分裂某部分土耳其領土——所指的卡爾斯、阿爾達甘——的宣傳也佔着相當的地位，而對於這還引證了發表在莫斯科刊物上的兩個喬治亞的科學院院士的信，他們證明了土耳其代表在這裏所提到的這些領土正好是喬治亞的自古以來的土地。

這一切有如此確實的證明，所以我再度勸告沙爾必爾先生細讀這封喬治亞的科學院院士的信，他們

（這是喬治亞科學院的真正的院士查那希亞與別爾切尼希維利）以完全學院式的文體作敘述，帶着很多的史料的引證，即甚至當土耳其奪取了這些地區時，它還留着喬治亞的名稱。在一五九五年出版的文獻，它至今還保存在喬治亞的科學院裏，「喬治亞的郡縣的長篇的登記簿」其中除其他的地區之外，也登記着只居住着喬治亞人而土耳其人數量很少或根本沒有的那些地區，如：豈爾其利，包茨霍未，巴籍基（巴那），阿爾達甘。這樣，這封信的兩個作者和平地（這才符合於科學院院士——他們當然是很文雅的人——的態度），如所週知的，表達了主張依照歷史的，人種學的，政治的以及一切其他的根據，使這些土地歸返喬治亞共和國，歸返喬治亞人民。

可是在土耳其方面的領士慾怎樣呢？對於這一點我應該公佈若干文件。這裏有些文件——我可以把它們交給我們可敬的主席，使大家都可以認識它們——這裏也複印着我要公佈的若干文件的照相版。那些可以從中獲取土耳其所具有的，或者至少在戰時當它保持着所謂中立，有利地跟德國做着生意并等待着如獅子獲得成功時它也可以抓取自己的一份那時曾經有過的那些慾望的一些有趣的資料，也有着照相版。我指的是那些爲我們的軍隊在柏林的外交部的檔案裏奪獲的而爲蘇聯外交部檔案管理處以「德國外交部文件，第二冊，在土耳其的德國政策」爲名公佈的文件。譬如，這裏一件是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土耳其有名的將軍埃爾基列脫致希特勒的外交官的一封信。在這信裏我們讀到：「不久之前領得證書的人員中有兩人——繆斯結幾勃·法其爾與埃棋蓋·凱馬耳——將到你們處去。他們受命幫助在克里米亞的德國人并同時對克里米亞的土耳其人有用的。關於這件事我已經寫信給伊特里斯教授先生，並且請他把我寫給他們一切話轉達給你。……他們兩人都是克里米亞出身的人而且很可靠。我請求把他們兩人送到克里米亞去並在那裏爲德土雙方的利益而利用他們。」

另外一個文件。這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二日爲希特勒的將軍瓦爾蒙特所作的日記，其中說到土耳其的「在克里米亞、北高加索、俄國的阿塞爾拜然成立獨立的，或最低限度對外獨立的土耳其的國家形成，而且後面兩處地方也作爲高加索國家以及裏海以東類似的國家形成的一部份的思想」的說教。

有一件我說過的亨幾加與土耳其助教加羅恩談話筆記的文件。這個加羅恩宣稱事情的以後的發展在他看來將造成類似俾斯麥帝國那樣的聯合國家。

「除安那托利亞、高加索和土耳其民族之外，其中還應該把伏爾加以東的居民加入進去」。

最後，是巴本在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六日的報告的文件。其中巴本說他跟密聶明茹格魯談話：「努曼就任新職之後，我今天第一次跟他作正式的談話」（即就任外交部長）。巴本寫道：密聶明茹格魯宣稱：「土耳其參謀本部認爲斯大林格勒的佔領是這一年的軍事行動的決定的因素。在他看來，俄羅斯問題的解決在於從斯大林格勒向北推進而切斷庫比雪夫至莫斯科的鐵路。這樣一來，俄國軍隊的中央和北方部隊只能利用一條鐵路，這就可以使這些部隊崩潰了。俄國在三個星期以前把自己的戰略後備軍以轉移敵方注意力爲目的而拋入中央與北部區域作對抗德國武力的無希望的戰鬥一事是最大的戰略錯誤。」

「跟在中央與北部區域以攻擊庫比雪夫的方法來最終殲滅俄國武裝力量比較起來，在高加索的戰鬥只有次要的意義。根據這個情形爲出發點，參謀本部確信至本年終了時，德國已經把俄國削弱到這種地步，使它不再成爲這次戰爭中的決定因素了。」其後：「土耳其相信俄羅斯問題假如在這樣的條件之下，即：假如一切這些那裏舉出的不同的民族，連同它們文化的特點，在德國管轄之下能被扶植起來時，那麼就可有成功的解決了。」

最後，也是關於巴本的文件——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七日的政治報告，他在這報告裏向希特勒的外

交部報告關於土耳其新總理薩拉布格魯關於土耳其少數民族與將來的俄國的問題的意見。我今天初次「訪問了重新受任總理的薩拉布格魯先生。

「在觸到土耳其一般的情況的談話中間，我像昨天問努曼一樣問他關於俄羅斯問題的他的觀點。

「總理答稱，對於這個問題他要作爲土耳其人和作爲總理那樣答覆我。

「作爲一個土耳其人，他竭力希望俄國的毀滅。毀滅俄國是元首的豐功偉業，類似的功績一世紀難得有一次的；這也是土耳其人民的夙願。每個土耳其人，甚至爲英國人錄事的雅爾欽對於這一點也不能和他想法不同。在他表示自己對土耳其主義思想的忠誠的最近的演說中，他想間接指出這一點來。

「只要如果最低限度殺死所有居住在俄國的俄羅斯人的半數的話，如果今後把少數民族住居的俄羅斯化的地區從俄國的影響之下分離出來的話，並且如果這些地區能獨立起來，被吸引着跟軸心強國作自願的合作並教育成斯拉夫民族的仇敵的話，俄羅斯問題可以被德國解決的。至於俄羅斯人類的潛力的重要部分的消滅這一點，那麼同盟國家在循着最正確的道路進行。元首關於居住着少數民族的地區的未來的構造怎麼決定，他是不知道的。」

主席先生！請允許把這本書轉給你認識一下。各位代表先生！請你們注意這是我們一年之前在一九四六年所公佈的。這是從被我們在柏林發現的德國希特勒外交部的真實的文件裏的抄本，它們的符合性當然不能有任何懷疑的。

看這土耳其的夙願，沙爾必爾先生，消滅俄羅斯人的潛力的半數，奪取領土，包括高加索在內，而在那邊，在伏爾加河的彼岸，形成一個在這個元首（據薩拉布格魯的話，他是能解決俄羅斯與俄羅斯民族的問題人）保護之下的什麼俾斯麥式的國家。好幸福的機會，這種機會一世紀不過一次。多麼宿命的

算盤呀？

可是這裏，關於這些文件你將怎樣說呢？而你怎麼能在這些條件之下說：實際上我們跟蘇聯之間的關係不很重要，不過，要知道，必須使莫斯科電台終止它用土耳其語言的宣傳，於是到那時一切便平安無事了。可是你們的這些老計劃怎麼辦呢？

從這種文件看來，雅爾欽要求如果蘇聯不同意建立什麼新的國際秩序時，就對它投以原子彈之雨，這種要求也就可解了。這個雅爾欽寫道，跟莫斯科只能用最後通牒的語言說話而要求全世界聯合起來抵抗俄國，——這國會議員阿泰依寫過說，美國與英國採取斷然手段以對付蘇聯的時候已經到了，——惡名昭彰的「瓊富利也特」報在某一個杜哀爾的文章裏也說到這種話，並宣稱：可以使莫斯科納上正軌以唯一的辦法就是戰爭。這些話都說得明白，準確，切實和惡毒。

這便是我們當前的許多問題中的情況，這種情況要求我們堅持着使這個犯罪的戰爭宣傳予以終止。蘇聯代表團認為：當新戰爭宣傳的鼓噪沒有碰到任何約束的障礙時，當如杜爾斯與貝爾納斯之流的這種人——雖然貝爾納斯在他的「老實話」一書中要求美國政府向蘇聯致送最後通牒，並且假如它不肯自願從自己的德國佔領區裏撤退自己的軍隊（這些軍隊在那裏是依據權利，依據國際條約，而且當然在這種權利所規定的一定時期內駐紮的）時，在這種情形之下，便對蘇聯採取斷然的手段——雖然如此，這種人依然被認為國家的偉人時。

莫非這種情形是證明愛和平嗎？這莫非不是證明那種表現在貝爾納斯關於蘇聯的這本書中——在有些情況之下是直接的威脅，在有些情況之下是隱蔽的威脅——的軍事浪人的氣分的嗎？

有人對我們說：我們的建議是與聯合國憲章抵觸的。不對，這些建議恰恰是符合於憲章的，因為憲

章要求着友好的關係，它不容許出版希望煽動起戰爭而不是號召和平的那些東西。

這裏所以蘇聯代表團堅持着自己的要求的原因。我應該重復說在這裏已經說過的話，即：任何以應該保障自由而反對蘇聯要求的藉口，因為除了用道德的鼓勵的方法而外不能限制這種自由，這些要求與判斷是不正確的與虛偽的。

我上一次在這裏引述了法官荷爾摩斯的意見，說到言論自由，如他們所解釋的，轉成了自由的濫用時，社會上是不能忍受的而且應該並可以予以限制。這裏奧斯汀先生對我提出反駁。他引證了些其他的案件，特別引證了阿勃拉阿姆斯案件，荷爾摩斯在這件案子裏似乎表示了完全不同的觀點，不容許對出版作任何限制的觀點。

我可以毫無困難地駁倒奧斯汀先生，強調出他所作的引證中的那些字句，它們沒有任何懷疑的餘地顯示着荷爾摩斯恰好在阿勃拉阿姆斯案件中，如同在斯結聶克案件所有的情形一樣，指出了當國家的利益和國家的命運本身以及人民的社會利益遭受那種嚴重的考驗與危機時，那時要限制那甚至伊瓦特與奧斯汀也承認不是絕對的那種自由的運用，是正當的與必要的事。

因此我們堅持着這一點，即：我們不僅限於以柏拉圖式的願望，道德論與說教來宣示戰爭是有害的，醜惡的，而因此需要一切人們都充滿着對它們的一切醜惡與恥辱的認識，並且也應該採取那些斷然的與有效的措施來真正消滅這種威脅地降臨到世界來的危機——新的戰爭的危機。

我們堅持着：第一，斥責各式各樣的戰爭宣傳，認定它爲恥辱的，危害社會的行動，依據憲章本身來斥責它；第二，每一個國家依據自己內部立法程序來保證採取必需的措施。因此，這直捷說明：建議的方法是憲法的方法，而不是奧斯汀所說的由什麼司法官來解決，而是依照符合於國家憲法的，符合於

它的立法原則的，符合於它的刑事政策的國家法律的規定來作解決，來制定那種程序，使之可以保障人類對於言論自由不致濫用，不致把這個言論自由，根本的自由，變作煽動戰爭、挑撥、憎惡人類、仇恨和大規模流血的工具，變作把人類墮入所能想像得到的最大的貧困的深淵的工具。這種程序是檢查或是其他任何方法，隨每個國家自行斟酌。我們的建議裏沒有一個字涉及檢查。我們只是說：爲什麼可以採取刑事程序的措置來反對把梅毒傳染給自己的鄰居的人，或散佈春畫淫書的人，或出售偽造的物品並在出版物的廣告上宣傳爲真正最好的優等貨物而威脅社會健全的人的那種國家，假如那種國家有權作如我在許多例子裏指出的事情的行爲時，爲什麼却不能限制一下出版獨佔家的專橫，以及除此外還有的政客們（他們在自己的演說裏放肆地宣揚着對愛好和平的鄰國有投擲炸彈的必要與不可避免性）的專橫呢？爲什麼對我們說，假如站在我們的地位，把杜爾斯和貝爾納斯打頭的人一股腦兒關進監牢去，是很容易辦的？是的，如果他們依照國家的法律應該如此時，他們應該坐牢的。如果他們會觸犯爲國家法律將規定的如教唆戰爭罪，他們應該受到審判並坐監牢的。如果法官與法律承認（不是我們承認，因爲我們對這個問題不相干，我們說：這是內部立法的事）了這個，那麼對於這些戰爭販子應該採取法律規定的措施。

蘇聯代表團在自己的建議裏所以堅持着：使每一個真正愛好和平而不願戰爭的國家在內部立法的程序上採取刑法的規定來禁止戰爭的宣傳。我們介紹在刑事立法程序上採取那些可以消除戰爭宣傳的措施。這不是空談，這不是文字上的遊戲。我們清楚地感覺到和平在經歷着怎樣的嚴重的時候，而因此我們如此清楚地，確切不移地和堅韌地堅持着自己的建議，因爲它們是合乎各民族的幸福的。

我們也說我們的建議跟聯合國大會關於禁止原子武器，關於必須準備把原子武器與大規模毀滅人類

的其他基本種類的武器從國家武器中剔除的措施的去年的決議是有直接的聯繫的。我們也把這事與聯合國大會十二月十四日的關於裁減軍備的決議聯繫起來。有人說這個與那個之間沒有關係的。大家都希望把這一切引到關於出版的協議上去。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問題。可是這個問題——它是有機地跟聯合國大會的十二月十四日與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四日的決議關聯的——其所以有機地關聯着，因為要反對戰爭販子，反對戰爭宣傳的措施被接受而同時却全力作軍備競爭，那就成了純粹無意義的事。這所以我們也完全明確地說，如我們的草案的第四點所表明的：本屆大會通過一項決議來再度申述迅速實施本會在去年所通過的那些決議的必要，這會對於新戰爭宣傳與煽動家的最有力的打擊，因此也會符合於一切咒戰爭，渴望和平，並向一切自覺對自己國家，對自己人民的責任的人們要求和平的一切愛好和平的民族的最重要的——生命裏再沒有這個更重要的了——利益的。

在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上的演詞

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一、南非聯邦——新法西斯主義的故鄉

我現在得答覆一整批的演說家了；從蘇聯代表團的利益的觀點來看，從確立真理的觀點來看，從駁斥這些或那些不正確的或歪曲的報道的觀點來看，從與若干我們的反對者在這裏發言反對蘇聯的號召跟新戰爭宣傳與煽動者作鬥爭的議案時所表現的那些危險的傾向作鬥爭的觀點來看，這批演說家中的每一個都是值得或多或少的注意的。

我按着次序開始。南非聯邦的司法部長勞倫斯在這裏用了應有盡有的表情演說過了。在我看來，他說得非常奇怪，不過，顯得如此奇怪的豈止他一個人。顯得奇怪的另外還有一些人，特別是我的右邊的隣座麥克奈爾先生。如此說來，我是處在奇怪的人們的包圍中了。這一個奇怪，另一個也奇怪。他們奇怪什麼呢？他們奇怪着，你們看到嗎，如勞倫斯說，我怎麼沒有把他的國家包括進戰爭販子裏去（而我並不會把任何國家籠統地包括進去，而只包括進了反動集團的確定的代表者而已）。我說到戰爭販子時，指的是那些反動集團，那些獨佔的團體和那些政治集體，它們從事於戰爭的宣傳，那些例子我已經說了不止一次。

勞倫斯奇怪着爲什麼他竟名落孫山。可是假如有說明他有資格列進這一範疇裏去的那些事實的話，我會以最誠懇的方式答應他照辦的。

麥克奈爾先生也奇怪着。我想，我的對左邊的勞倫斯的答覆也是對右邊的麥克奈爾的答覆。應該順便說一說，輪到我自己，我也是奇怪的。當我指名道姓說戰爭販子並列舉事實時，於是便開始攻擊起來，開始怪我爲什麼要這樣幹。可是當我沒有唱名到那些心地如羅馬的口頭禪所謂：「喊叫的人在沉默」的昭然若揭的人們中的某人時，那麼他們便開始怪我何以恰恰沒有提到他們了。

但這裏勞倫斯開始作了某些關於蘇聯和蘇聯內政的調查。必須說，勞倫斯謙遜太遠了。顯然這是那些關於他所說的和確定南非的外交的好例子之一。勞倫斯舉了一本書，這本書大概他還不會看完過，因爲他所說的並非是根據於對這本誹謗的書內容所得，而是根據於這書封面上說明。當然囉，引述一下封面的標題，并且把一切事情陳述得好像真正報道成那樣重要與聳人聽聞的樣子，對這個爲書中所污蔑的國家是很容易報復的。然而你，勞倫斯先生，沒有把這個爲你渴望着過自己中傷蘇聯的癮的源泉適當地看清楚呢。

這是什麼源泉呢？這是什麼書呢？這本書，實在說起來，是一切關於似乎在蘇聯存在的強制勞動的最醜惡的謠言，對蘇聯說着一切完全烏有的事情和荒誕的謊話的集成。例如，書中說在蘇聯的監獄和集中營裏有近二千萬人。當然只要舉出這一個數字，就是够明白這本誹謗性的書的編者不是十足的白癡，便是註冊的匪徒。他們從那裏得來這一切的情報呢？他們這些情報得自十來個從蘇聯逃出來的第五縱隊的代表，那第五縱隊恰巧爲我們在蘇聯成功地消滅掉了，而因此大大地幫助了擊破法西斯德國。我們消滅了這個第五縱隊，可是個別的倖免的流氓與匪徒，奸細與叛徒，希特勒的間諜，隱匿在有些國家裏，其中有幾個出現在美國，在這裏，於是這些人提出了自己污蔑蘇聯的所謂回憶錄的書。這些白衛軍現在在美國的土地上生活着，並且磨礪着刀子，以便在適當的時候把這些刀子插進蘇聯人民的背上去。而你

，司法部長先生，便利用這種污濁的源泉來作爲自己對蘇聯的污蔑的攻擊。你應該記得蘇聯，當它在希特勒德國背信進攻它的前夕，處在跟德國正面相對的地位，在它背後沒有如希特勒計劃裏，如希特勒參謀本部與探子的計劃裏應有的第五縱隊來破壞蘇聯的後方面促成希特勒的勝利，它對於世界曾貢獻了怎樣最偉大的功績。

而這裏，你顯然沒有充份考慮過在輕浮熱烈的印像之下從這個骯髒的書裏汲取的一切，便搬到這裏的第一委員會來，以便利用它來達到自己仇視蘇聯的目的。我至今沒有說到過南非聯邦，因爲我認爲南非聯邦在世界問題裏的任務已經不是那樣的，所以用不着特別來說它。可是現在我得說些話了。

我首先要請問你勞倫斯先生：請你告訴我們，貴國至今還存在着所謂猶太人區或對於印度人或黑人的界線嗎？在完全禁止移位的地方，譬如在奧朗琪，禁止黑人獲得土地與不動產嗎？不是有着一切應有的種類的限制，舉如選舉權的限制嗎？這一切你們那裏都存在着嗎？而印度人與白種人的按照財產與階級制度的區別投票呢？而剝奪一切印度人的被選舉權等等——這一切你們那裏存在着嗎？

這一切，即使僅僅爲了你們應該對於聯合國機構所要求的民族平等，尊重少數民族權利的原則表示尊重起見，本來就不應該存在的，而你們那裏却存在着。難道我們不知那些事實，例如「歐洲人開始反對印度商人的抵制運動，這個運動已經流入很激烈的形式了。不是有這種情形，例如，在彼得斯堡的歐洲人集會上決議抵制印度，商人和一切踏進印度商店門的歐洲人，以及在印度人企業與機關裏工作的歐洲婦女，塗以柏油並插以鷄毛，而以這種樣子在街頭與商場上來羞辱他們。而當這抵制的事在你們的議會裏向你的經濟發展部長提出質問時，他聲稱抵制印度商人在南非不列爲有關政府的問題之內的。

難道這不是事實嗎？在一九四九年四月一日，南非聯邦發表公報說納塔爾的市政協會編訂了一件事

令的草案，規定設立關於住宅問題與印度人團體的保健問題的印度的咨詢委員會，而後一個組織却沒有賦予在市政機構裏的任何代表權，這難道不是事實嗎？印度人團體的溫和領袖喀德齊在評論這個法令的草案時，難道沒有抗議過，並宣稱：參加市政選舉權或更壞的以諮詢委員會為基礎的第三階級的公民權使印度人的情況更為降低，而他們的生存的條件更為惡劣了嗎？而史末資元帥在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說起這一個法令時，難道沒有向杜爾朋出版社報告說使印度人享有市政代表權的輿論還沒有成熟嗎？

這是怎麼回事？這跟什麼程度的民主相像呢？而你大概認為南非聯邦是民主國家的罷？關於那些規定這種不近人情的，不公道的，非法的，反民主的，對於南非聯邦中的少數民族的差別待遇的制度的歐洲人可以說些什麼呢？

曾答應於必要時用自己的名義來作引證的某個格里芬，寄了我一封信，附着「友誼報」的剪報，其中描寫南非監獄中對待參加消極抵抗的印度人的情形。

格里芬寫道：「我本人遊歷過許多地方，在美洲與中國居住過并工作過。假如你願意，你可以舉我的姓名作引證。」我以他名義引證了。看「友誼報」的這段記事怎樣寫：

「開普敦，星期一。十一個消極抵抗運動的人員飾着鮮花，其中有三位婦女，他們在杜爾朋的禁期剛剛滿期，昨天晚上以榮譽來賓的資格出席這裏舉行的歡迎會。

主要的演說者是池。古爾夫人，是好望角州的消極抵抗運動的女領導人，她宣稱：杜爾朋的對於非歐洲人的監獄狀況跟貝爾秦集中營一樣的壞。

古爾夫人宣稱：「我看見了監獄鐵柵裏面的情形而感到戰慄。那裏對於非歐洲人的囚徒除了苦難之外沒有別的。這令人心悸。」

監獄的女看守們手裏拿着皮鞭走來走去。有一次她看到她們把一個本地的女人劈面鞭打，直打得她發起癲癩病來。於是噴以冷水使她恢復知覺，當她甦醒過來時，又把她投進單人牢裏。」

請看，勞倫斯先生，貴國裏的秩序是怎樣的。我覺得，你們的這一類的事實（這顯然是習俗的現象了）對於你南非政府司法長的業務上看來它的反應當然更爲重大的吧。我所採取的源泉並非是捏造中傷的。這是個社會團體，這是純正的源泉。而你採取的是惡濁的，不純正的源泉，爲祖國的叛徒與奸賊尼考拉也夫斯基與達林之類的這種書。

在美國出版着「讀者園地」雜誌。在它一九四六年份的有一期中，登載過某個亞爾塔·勃朗德的題目叫做：「南非——新法西斯主義的故鄉」的文章。其中敘述着某個奧斯瓦爾德·比勞烏——他在戰前曾任南非聯邦的司法部長，國防部長與鐵路運輸部長——的活動情形。這篇文章報導說，他號召西方列強在德國爲新秩序，爲反對蘇聯而繼續鬥爭。而這裏勞倫斯先生開始向我們講授民主與尊重人權的功課起來。這實在是天曉得的事。

二、英美的戰爭辯護者的手法

這裏有些人聲稱蘇聯的議案好像是一個死胎。麥克奈爾先生便抱着這樣觀點。也許，這個議案不適合於某些人，可是由蘇聯的倡導這個問題被提出大會，這一事實本身就已經有極大的意義了。雖然有參議員奧斯汀的聲明在要求斷然拒絕這個議案與它的意志，如他所稱要殺死它，伊瓦特却對它提出了修正。我重說一遍：修正，雖爲大家都明白這並不是修正，而是新的議案，因爲他說：我對蘇聯的四項建議補充以新的緣起並提出我的四項建議來代替蘇聯的四項。而他稱之爲修正。我稱之爲變戲法。然而這一類的變戲法只有當變戲法的人相當巧妙與聰明才會成功，而如果他沒有這兩種本領的話，那麼他這種變

戲法便不可能有什麼成就的。

可是，澳洲代表團認爲自己的議案有以蘇聯議案作掩護的必要，提議蘇聯的議案作一番修正，這一件事實本身就說明着在你們中間，麥克奈爾先生，在你們不列顛的共同友誼裏，並非一切都順利，因爲這個所謂死胎由你們那個所謂不列顛的共同友誼裏的成員們在收養了。

南非聯邦的代表認蘇聯的議案爲不適當的。可是爲什麼，除了澳洲代表團之外，還有加拿大代表團也提議以蘇聯代表團所辯護的那基本思想的精神爲同樣主題的議案呢？爲什麼法國代表團提出符合於蘇聯的要求制裁戰爭宣傳與戰爭教唆犯的議案的基本思想的精神的議案呢？爲什麼我們有委內瑞拉關於設立以一切所有的方案爲根據而擬訂一種共同的論題的小組委員會的建議呢？

這說明了我們在這裏處理的並不是死胎。雖然你們不高興蘇聯議案的各點，可是你們不能摒棄與新戰爭宣傳和教唆者作鬥爭的思想，因爲各民族不懂你們的這種行爲，不能以似乎難得據說確定戰爭宣傳等侵略等字眼的定義的話來把人民引入迷途。這種變戲法註定是失敗的。你們知道各民族在等待着對這個問題的直截了當的答覆，這個問題現在正激動着並煩擾着百萬的人民，蘇聯代表團與蘇聯國家首先作了答覆，它呼籲聯合國機構這樣做。在這裏所聽的各方面的那些聲明說：應該拒絕這個議案，它甚至不能作討論，它甚至任何修正案都無法修正的——這一切的話都是毫無用處的論證，不合任何邏輯的。

討論指出主要之點是聯合國機構對於這一事應該說出自己的話，以中斥戰爭販子與那些把戰爭宣傳作爲自己的職業的人。因此必須更嚴肅，更負責地來接觸這個問題，不要以簡單的與很輕浮的表面的爭論的觀點，而應以這種觀點，即：這個蘇聯代表團的建議是符合於在尋求并渴望着這個和平的全世界人

民的生死所繫的要求與利益的，來接近這個問題。

有些人說：這事將侵犯到基本的自由——出版自由。我昨天對於這一點已經說得充分詳細了。我必須重新回到這個問題上來。

那些反對蘇聯建議的人表示這些建議是趨向反對出版自由，反對言論自由的，並且是兩種力量的衝突，即：一種力量在保障言論與出版自由，而另一種力量在反對這種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若干情形便是這樣表現出來。請讀一讀奧斯汀的演說或聽一聽今天麥克奈爾的演說，便表現着這樣的思想：看我們是神聖自由的辯護者，看你們，蘇聯代表團，是這些神聖自由的摧殘者與破壞者。我不預備跟你們爭論說我們關於自由的內容的觀念和你們中間的許多人的不相同。譬如說，我們以為如果寫出一切人們都是平等的話時，那麼這就應該意味着：一切的人應該不但在形式上，也應該在物質上平等，因為法律上規定的平等權利的運用，沒有如此的物質的基礎，就不是平等。當自由應該依據於：洛克斐勒與乞丐可以同樣在橋梁底下度夜……時，這是什麼平等呢？

我們以這種方式理解平等的，即：自由依據於一定的物質的基礎。要知道我們蘇聯人民爲着這個而奮鬥，即爲了奠定這些鞏固的基礎，創造這種有力的經濟的基礎，這種基礎才是整個平等的根本的保證。當我們消除了失業——它在我們國內是不可能的；當我們沒有了經濟恐慌——它在我們國內是不可能的；當我們創造了爲那個巨大的進步（它成爲蘇聯制度與蘇聯政權的巨大的勝利品，它使我們的人民——千百萬的工人，農民與知識份子——走上幸福之路）的條件時；我們在這方面已經達到了許多的成就了。我們的全體人民建立着這種經濟。而當勞倫斯先生從那本誹謗的書的封面上向我們讀關於蘇聯的強制勞動，好像這種強制勞動創造着蘇聯的經濟時，這本來是可笑的與荒唐的。既可笑，又可羞，可笑

的是這樣的蠢話居然寫了出來；可羞的是南非聯邦的司法部長居然複述着這些蠢話。

這裏向我們唸了整篇的奧斯汀與麥克奈爾的關於什麼是言論自由的原則爲主旨的說教。這些說教者老是以我們——蘇聯代表團——好像想消滅這個聖物，并連帶着也消滅掉人權爲出發點。當然，這是澈頭澈尾的無聊話。奧斯汀在這裏悲切地高喊着蘇聯代表團好像在作着對那似乎保證美國人民的「真正自由的無上幸福」的基礎本身作直接攻擊了。這對於你們好像是無上的幸福，但我們對於這種無上幸福並不歡喜。但這是趣味的問題。這裏有人想把事情描寫成爲蘇聯在要求使每一個人，如奧斯汀所說，都同意於「過於瑣屑的政權」的意見與思想，使人家沒有自由的情報，使人家不能自由傳播意見，使法官能如奧斯汀所說「壓制人民的思想與言論」。奧斯汀如何醉心於這幅畫景的描繪，以致宣稱：那裏的法官採用鎮壓來對付實際的自由，那裏沒有法律，而在這種情形之下只賸兩條路可選擇：「起義或者革命」。

奧斯汀這樣以恐怖的字辭來恐嚇輕信的聽衆們。雖然他自己當然明白這是無關緊要的，因爲他的話並不與事實相符，因爲他十分明白在民主國家裏法律本身全權賦予法官施用懲罰，不是來對付實際的自由，而是來對付自由的濫用。當法官審問犯了罪的罪犯，並判處他以監禁時，那麼當然，他限制了罪犯的自由，可是他限制的不是自由本身，而是限制這個不會如同一切其他尊重自己祖國法律的公民所應用那樣來應用自由的罪犯的自由。

這却是大家非常明瞭的，可是在這種場合爲什麼又對我們說這些話：好像假如法官採用壓制來對付具體的自由時就沒有法律呢？所以這樣說，只是因爲想把事情描寫成這樣，即：蘇聯的建議是主張自由的限制的。對不起，諸位先生。我們主張限制運用自由時的專橫，主張抑止自由的濫用，而並不主張限制自由本身的運用。正因爲我們主張使自由的濫用得有限制，我們所以維護了真正的自由。如此看來，

我們意思中所沒有的東西，請不要派到我們身上來。不要歪曲我們的建議。

參議員奧斯汀知道這個，最低限度他應該知道沒有任何無限制的自由的存在，並且各個民主國家的立法也規定着這個所謂「具體的自由」的完全不可避免的與非常重要的限制的。

在同我的爭論裏，奧斯汀引證了美國法官荷爾摩斯的實際經驗中的例子。我又一次細心檢閱過奧斯汀在這裏所說的其餘的場合，於是我必須說我更確信我是準確地捉摸了荷爾摩斯的。因此奧斯汀在這裏提出的那個裁判的分析是經不起任何的批評的。

奧斯汀對我們說：你們想限制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可是要知道事情會弄到臨了你們將干涉人家觀察，比較、彼此的對照、思索，並且如他其後所表示的，彼此間耳語自己的真實的思想。按奧斯汀的意思，結果會弄到那樣一種不可理解的情況，即時要限制人們「與任何一個人分享自己的思想」，或者，如奧斯汀所說，甚至「耳語」某些思想的權利了。奧斯汀把事情描寫成已經非常天真的光榮，描寫得差不多成了牧歌式的圖畫。

可見，這個愛爾，他的軼出常軌的話恐怕大家都留在記憶裏的，而他再度重複了自己的對蘇聯投擲原子彈的號名，率直地對某人「耳語」自己的思想。這，你們知道，總而言之是那種有趣的牧歌式人物……艾頓也是，貝爾納斯也是，蒲立德也是，狄恩也是，勃魯克斯也是，哈爾伍特也是，邱吉爾也是——一切這些人都是牧歌式人物，那樣純樸的人，他們率真地耳語着某些無邪的東西，而人們想把他們加以烙印，號召秩序，而也許甚至處罰的確，奧斯汀在自己的演說裏聲稱，這些牧童他們缺乏自制力，禁不住要說過火的話。可是——奧斯汀安心了——這會隨了年齡，由於，如他所表示的，他們內心的信心的自然生長而俱來的。

這裏顯出了意見不同的分水嶺。蘇聯代表團說：一切戰爭宣傳應該受到制裁；決不可容許出版與其他公共情報機關在任何形式下被利用爲挑撥戰爭的目的，如此，每個國家應該用內部的程序制定與之作鬥爭的那些法律。

有人向我們答覆說：不應該有任何強迫，任何限制，自由是神聖的，它是絕對的。譬如說，在美國，他們不但在戰時准許和平主義者詛咒戰爭，詛咒那時英國對德進行的防禦戰爭，而且在戰後甚至還准許摩斯萊與他的信徒們自由地在街頭來往並宣傳法西斯思想。而這裏重複說道：沒有建議任何反對戰爭販子的強制、懲罰、內部立法的手段。必須勸導並給以時間，當「自己內部增長」的過程中這些戰爭販子自己來放棄自己的敵視的、有害的、危險的、破壞的戰爭宣傳。

如果如俄羅斯諺語所說：「他們嘴上不加封皮」時，他們當然永遠不會放棄這種宣傳的。對於戰爭宣傳家與煽動家必須強使他們閉嘴。全世界愛好和平的民族都這樣要求。蘇聯建議的基本內容便在這裏。

現在轉過來談談麥克奈爾的演說。今天麥克奈爾在他的演說裏自充土耳其代表的辯護人。我不知道他在這方面有沒有委托書，可是我很奇怪，土耳其代表自己却拒絕爲自己辯護，拒絕發言，宣稱只有如果對他攻擊時他才說話。這是他的事。可是爲什麼這時麥克奈爾自任起他的辯護人了呢？假如沙爾必爾認爲他能够爲自己辯護得了時，莫非他不會自己辯護嗎？當然，這是奇特的姿態。可是麥克奈爾怎樣爲沙爾必爾辯護呢？

麥克奈爾這裏提到某項文件，它是在德國被發現的，現由英國人保存着，想留到假如有什麼煽動時才拿出來利用。這是十分有趣的承認。當然，我們要記着它。我們知道，這個煽動應該從哪一方面來等

候。

其後麥克奈爾的話停留在我們的建議上，聲稱：蘇聯的建議，而因此以及其他代表真備戰爭宣傳，一切以鼓勵任何侵略行動爲目的的宣傳方式的建議是不能接受的，因爲據說很難確定什麼叫侵略。在這個問題的法律觀點上看，當然需要費一番工作。現在問題不在這裏，因爲我們現在不是在科學研究院裏，不是在皇家科學會社裏呀。我們是在應該解決政治問題的政治會議裏。而政治問題是這樣擺着：在有些國家內有沒有這樣的集團在每天出版着應有盡有的，挑撥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發動戰爭的報導的嗎？有這樣的集團還是沒有呢？我回答是有的。有人對我說：爲什麼你只指出美國、土耳其與希臘呢？英國代表團團長麥克奈爾因爲沒有說到他而感到委屈。好吧，既然麥克奈爾沒有把自己與邱吉爾斷絕關係（而邱吉爾我是直接稱他爲戰爭販子的），所以我想，麥克奈爾先生，你是應辯護得滿足的。

在蘇聯的議案裏說：「聯合國機構譴責在許多國家，特別在美國、土耳其、希臘國內的反動集團所領導的出版物、無線電、電影、公開演講爲工具以散佈含有公開號召對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進攻的意義的各式各樣的無稽之談爲方法的新戰爭的罪惡的宣傳」。也許你們願意要我們給你們說明這許多國家是哪些國家嗎？我們盡力照辦。因此，想以確定什麼叫做宣傳，什麼叫做侵略等等一切要求來攪亂問題的企圖都是沒有用處的。我們現在應該政治地說出：情勢怎樣，目前從這些如愛爾之類的最瘋狂的戰爭宣傳家方面有沒有威脅，爲制止戰爭的犯罪的宣傳應該怎樣辦。假如醜名四溢的愛爾呼籲美國儘快地對克里姆林投擲原子彈，這便是荒唐的與不可忍受的，這難道不明顯嗎？我純粹合乎人情地，不帶辯論的性質，請問你：這能忍受還是不能忍受？而你在答覆裏反問我道：什麼叫做戰爭宣傳？一個人掉進了土穴

，有人放一根繩索來救他，而他不去抓住繩索並從土穴裏爬出來，却發問道：繩索是什麼呀？（笑聲）我們宣稱：看你的面前是一個侵略者，他號召你們，你們的政府向蘇聯投擲原子彈。斥責這個，而你說道——尋什麼開心？我們有言論自由。這是言論自由的濫用。而我們譴責那些不願把宣傳侵略的人封住嘴的人的教唆行爲與對戰爭宣傳的鼓勵行爲。我們認爲在我們國內禁止類似的行爲是我們神聖的、道德的義務。而這些行爲在我們那裏是不可能的。你在蘇聯的出版物上找不出一行，找不出一個號召戰爭的字眼。這在我們那裏是不可思議的。我們那裏如果有人這樣說，大概會被關進瘋人院。而這裏呢？而這裏你們的宣傳家與戰爭販子在全力行動，而當我們訴諸你們的良知並且知道這個良知在你們人民中跟我們的人民中所表現的都是同一樣東西，我們要求鎮壓戰爭販子時，你們却置之不顧而反問道：戰爭宣傳是什麼，侵略又是什麼呀？一個問題不可拿另一個問題來代替的。更不可以把問題攪亂，尤其當這問題關係到和平（這個字的真義）的命運時。而這裏的政治花樣與政治投機都是有有害的事。麥克奈爾自己明瞭這個。他說：「我後悔與遺憾我說的是凌辱的話」。請看，怎樣一個悔過的麥克達琳娜（女人名，此地作悔過的罪人解——譯者註）今天在這裏與我並坐着。（笑聲）。可是他的行爲恰像真正的罪孽深重的人，後悔與犯罪，犯罪與後悔，於是又犯罪，好像他以後悔來開關犯罪的途徑似的。（笑聲）。

麥克奈爾講述在英國如何准許和平主義者演講等等的事。我們知道各個國家裏的社會發展的歷史，我們也知道所謂寬容乃是統治階級感覺到自己相當穩固，便可允許所謂寬容這個裝飾品的結果。當統治階級看不見任何嚴重的威脅在反對自己時，他允許某種自由主義的。可是這個國家內部剛剛開始政治的動盪時，常有不滿的階級和不满的人物出現時，當他們獲得了力量，當他們爲自身的權利而開始登場時

，當他們開始鬥爭時（例如日前在智利或巴西發生的），於是馬上開始逮捕，鎮壓，加強了暴力的應用，監獄起作用了，並且當然也出現了贖罪的羔羊。是誰呢？莫斯科呀。莫斯科，假如聽聽這些大人先生的話，它是什麼罪都是有份的。你們的寬容在歷史事件發展的語言上便是這個意義。我們知道這種寬容的價值的。

假如說到對外政策關係裏的寬容，那麼，先生們，這樣的寬容已經叫我們付過很多的血了。我回溯到張伯倫與達拉第在慕尼黑對於希特勒顯示的那種寬容。那裏同樣統治着寬容的精神。這個寬容的結果叫希特勒靠了英法歐洲對外政策的指導者的幫助，吞下了捷克。這個結果使他後來流了全世界的血。我們，蘇聯人民，對於這個比任誰都知道得更清楚，因為我們國家的大部份遭受到了希特勒匪幫的炮火與干戈。請把這種寬容東置高閣去教訓後代吧，對於作爲和平威脅的人，起初宣傳戰爭，到後來就實現這個戰爭的人，也是用不着寬容的。

你們不要對我們說關於寬容的話吧。好精神的言辭漂亮的自由主義的時代是過去了。自由主義擺動在兩種相反的力量之間——反動與真正的民主之間，後者具有磁石的威力來吸引人民的民主力量。應該把你這個聲名狼藉的虛偽的寬容拋在一旁，它在對外政策的事務上從來不會有過幫助，關於這一點有人們從最近十年來在侵略者方面以及在希特勒德國方面所得到的教訓可以作證。因此我們反對這樣的寬容。

三、麥克奈爾怎樣企圖粗暴地偽造歷史

麥克奈爾說到過斯大林在聯共（布）第十八次大會上的演說。麥克奈爾聲稱：斯大林在聯共（布）

第十八次大會上說英國、法國與美國（這是在一九三九年三月裏的事）是非侵略國，而其後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九年八月裏已經說到戰爭的帝國主義的性質，並且還說到那些恐怕喪失自己在世界上的霸權的國家的侵略意向。這裏麥克奈爾找出了矛盾，並且同時企圖肯定在蘇聯關於什麼是侵略一點沒有清楚的觀念。他似乎忘記了一九三九年三月與八月尤其與十月間一段時間裏的那些歷史的事實。

麥克奈爾含糊而意義雙關地暗示過一九三九年八月裏蘇聯與德國間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他把這看做非常不肯定性質的樣子，說到這個時對於蘇聯也不懷好意。我也得停留一下在這個問題上，因為，我爽快地說，麥克奈爾企圖使蘇聯的外交政策蒙上一層暗影，歪曲事實並偽造歷史事件。

事實上在一九三九年底發生了什麼呢？請讓我回溯幾件事實，當然要說得儘量短。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底英國與法國的政府向蘇聯建議，在締約強國中某一國遭到直接的侵略時，規定英、法與蘇聯之間互相援助的義務。這是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可是這些關於互相援助的新的建議是以非常奇特的形式向我們提出的，這有許多文件可資證明。它們連帶着那樣的保留條件，以致實際上使它們變成毫無價值。新的建議規定着對於英法已經給了自己的保證的五個國家的蘇聯的援助，可是在那些建議裏關於與蘇聯接壤的三個波羅的海國家：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芬蘭的從英法方面的援助却絲毫沒有提到。產生了這樣的情形：侵略者（那時的潛在的侵略者當然是希特勒，而當英國、蘇聯與法國談判關於將來的侵略者時，它們那時已經認定希特勒了）可以從波羅的海諸國來威脅蘇聯，而英國與法國都沒有給蘇聯以援助的義務。請看看這幅圖景：英國與法國給羅馬尼亞與波蘭以援助的保證，可是它們不願把這樣的保證給予芬蘭、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因此，如果希特勒經過波蘭、羅馬尼亞來攻擊我們，可以指望英法方面的援助，但假如他經過芬蘭、拉脫維亞與愛沙尼亞來進攻時，我們便沒有權利指望法國與英國方面的援助。

了。在一九三八年五月裏的事情便是如此。因此蘇聯政府在答覆英法的建議時要求：第一、締結關於英國、法國與蘇聯之間的互助的有效的條約；第二、除了英法已給予援助的保證的五國，即：波蘭、羅馬尼亞、希臘、比利時、土耳其之外，在一九三九年五月裏，對於英法不願給予這些保證的波羅的海三國：愛沙尼亞、拉脫維亞與芬蘭也給予援助。蘇聯要求的正當可以從「每日電報與晨郵報」七月八日所登載的邱吉爾的長文裏看得出來，他在文中要求迅速成立有蘇聯參加的抵抗希特勒德國的三國條約。那時邱吉爾這樣寫道：「現在事情發展得如此遠，甚至很難想像得到：使三國政府中的那一個來担負那對於剝奪幾千萬勞動者的生命與進步的這個同共保證的責任了」。而結果怎樣呢？得到的結果是：英法那時在蘇聯莫斯科所進行的談判，那時算得一無所成。我即要向你們說明，爲什麼會一無所成，和實際上是怎麼一回事。

可是一九三九年五月三十一日來到，那時召開了蘇聯的最高蘇維埃第三次會議。而在這個第三次會議裏，在五月裏（麥克奈爾關於這個日期何故忘記了，但這是重要的日子），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作了外交政策的報告，並且說道（我是照自己的摘記引述的）：「假如真想建立愛和平國家反抗侵略的有效的戰線，那麼如此最低限度必須有這些條件：英、法與蘇聯締結專以防禦爲目的的反侵略的有效的互助條約；由英、法、蘇保證中歐與東歐國家，其中無例外地應包括與蘇聯毗鄰的歐洲國家，以防侵略者的攻擊；英、法、蘇之間締結關於在受到侵略者進攻時彼此間與其他被保證各國的迅速與有效的援助的形式與範圍的具體的協定。

莫洛托夫說：我們的意見是如此，這種意見我們不強求任何人接受，但我們堅持着它。我們不要求我們觀點的被採納並且也不向誰請求這樣做。可是我們認爲這個觀點的確符合於那些愛和平國家的安全

利益的」。

這就是莫洛托夫在那時所辯護的立場。它難道跟斯大林在三月的十八次黨的大會裏承認英國、美國與法國不是侵略國家的話相矛盾嗎？莫洛托夫說應當跟這些國家締結反侵略條約。可是沒有跟侵略者締結反侵略條約嗎？麥克奈爾對於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在一九三九年五月裏所說的關於外交方針的話與斯大林在一九三九年三月裏說的話之間，看出了什麼矛盾之點？這裏沒有也不可能有任何矛盾的。麥克奈爾所以需要說什麼假想的矛盾，是爲了想轉對於基本任務的注意，爲了想攪亂問題。請問：蘇聯在一九三九年那時爲了防止戰爭而提出的這些條件，它們對於民主國家是不適合的？這些條件不能作爲反抗侵略并反對侵略計劃的實現上的防禦？這些條件能不能防止那時希特勒所準備的戰爭？當然，對於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只有是肯定的。可是應該指出：符合於對侵略作鬥爭的初步原則的這些條件在英法的建議裏却沒有受到好意的反應。

當英法利用二者之間的互助條約以預防侵略者的直接攻擊，並且向波蘭保證當侵略者攻擊波蘭及羅馬尼亞時給予幫助時，他們忽略了一個對蘇聯不能不發生興趣的問題——假使希特勒的攻擊，不指向波蘭，也不指向羅馬尼亞，這些國家英國那時已和他們締結防禦同盟，而指向蘇聯境外其他國家，蘇聯是否能夠按部就班地依靠英法方面的援助呢？這個問題那時依然成爲問題。但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當然不可能認爲英法嚴峻地進行這些關於防禦條約的商議，是懷着真正制止侵略者的目的。這兒，當然不是全部順利的。這也就是爲什麼，莫洛托夫述及英法建議時，稱它們即使在這種情形之下，也向前跨了一步，不過他強調說，就是這一步，也被這些和國際聯盟法規某幾點密切有關的保留條件所拘束，而這一步祇能算作「踏着虛構的脚步向前」而已。

我在這兒必需要對正題作一小的分離。伊瓦特先生爲了我改正他而感謝我，但是我却夢因爲他感謝我而感謝他。伊瓦特宣佈說，我對於蘇聯報紙，似乎延遲刊載有關一九四二年英蘇條約更改的報道一點也沒有說什麼。關於這一件事我真的沒有提及，因爲，雖然伊瓦特在這件事上也是不對的，假使我把他所犯的全部錯誤駁正過來，那末我必須爲了這件工作而奉獻全部出席時間，不過，我必須說，就那件事而論，伊瓦特把是也是慎重將事的，他說我們只不過把有關英蘇談判的報道延遲公佈而已。不過，我不知道爲了公佈這種報道所存在的時間究竟是多少，以及這種時間是誰規定出來的？

在蘇聯報紙上曾刊載過數篇由於貝文提議而與英國人談判延長英蘇條約的報道。就是我自己也帶着這張報，而且我也可以把它當作文件來證明這件事。就是這篇論文：「論有關新英蘇條約的問題」——是四月十九日「真理報」上一篇長篇大論，這兒是另外一篇在一月二十五日「真理報」上的論文：「論關於英蘇條約的問題」。澳洲的先生們，你們還可以有什麼來強求我們呢。開始，你們說我們一點也沒有公佈什麼，後來，在我們，婉轉地說，揭穿了他們的「不正確」以及歪曲事實之後，他們又非難我們把某些報道公佈得太遲了。

但是現在主要的不在這裏。我要利用機會說明，即使在這種談判中，英國人還依賴於他們自己特別愛好的保留條件的方法。常有許多的保留條件陪伴着重要問題的時候，這是整個談判進行的系統，這種保留條件在一九三九年也存在過並且剝奪了英法蘇在那時簽訂抵抗希特勒的防禦同盟的一切可能性，而這個同盟結果沒有組織成功。當然，首先不但是這些保留條件阻礙了簽訂同盟，而那時許多條件的不被接受也是原因之一，那些條件是眞能保證蘇聯不被希特勒所攻擊，且和那些英波，英羅，英土間締結的防禦條約上寫着的具有同等效用。

在這樣的情況下爲了談判的代表團到來了莫斯科。它走了整整的六天，假使遵照我們的建議乘飛機而不乘每小時速率十三海里的兼載貨客的商船的話，祇要數小時就行了。再者，這些英法代表乃係二等官員，他們對於和蘇聯談判以及締結防禦同盟並無相當的全部權力。這會有什麼結果呢？什麼也不會有。並且，當蘇聯代表團主席伏洛希羅夫元帥被詢問及此時，他率直說，這些和英法軍事代表團的談判所以結果失敗的原因，乃在於蘇聯軍事代表團認爲，蘇聯因與侵略者並無公共邊界，故祇有在允許蘇聯軍隊通過波蘭領土的條件之下才能援助英法與波蘭。但是波蘭政府宣佈說，假使希特勒進行侵略時，她不能同意准許蘇聯軍隊穿過她自己的領土，且一般而論，她也不需要蘇聯的援助，而也不接受任何蘇聯的援助。在這種條件之下什麼東西能作出來呢？在這種條件之下從談判中什麼東西也得不出來，而且由此可以明白，這些談判失敗地被結束了。同時，這顯示出了事件的進一步的發展，希特勒並沒有打瞌睡。同時，在英國的報紙上，關於正在進行中的英德借款以及共同開發非洲殖民地的談判，發佈出許多報道。我們清楚和明確地說：根據全部這些事實，那時對於我們的政府以及全體蘇聯人民產生了這樣明晰的觀念，就是這種與蘇聯談判的猶疑不決的態度，乃係張伯倫政府與達拉第政府所狡猾地企圖着的，而張伯倫與達拉第及其外交手腕却在玩着兩面把戲。在一方面，他們假裝將要與蘇聯締結防希條約，但是在另一方面，他們却在蘇聯背後與希特勒進行談判，在慕尼黑把歐洲出賣給了希特勒，並且準備了那樣的環境以保證希特勒侵略的成功。我們感覺到在這兒正在玩着兩面把戲，正在玩着偽造的牌戲。就在那時，在這種狀態之下，希特勒向我們提議締結和平條約。我們簽訂了這個條約，因爲我們極端需要這個條約。這個引起了整個反對蘇聯的暴風雨。但是蘇聯是對的。真像那次莫洛托夫在第三次議會上所說的一樣，蘇聯不使自己牽入對於戰爭煽動者的衝突中，這些煽動者慣於借他人之手從火中取栗。從豫防侵

犯以及延長侵犯的觀點來看，則互不侵犯條約對於蘇聯是緊急地重要的，最低限度，它延長了一個相當的時期，在這段時間裏，我們光榮地完成了加強武裝力量以及整個蘇維埃國家的力量，爲了使她有充分的準備，以便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在莫斯科城下擊潰德國人，於一九四二年在斯大林格勒擊潰德國人，並且他們屁滾尿流地從蘇維埃聯邦被驅逐出去，而終於在一九四五年的五月我們進入柏林，而勝利的蘇聯國旗也飄揚在柏林城上了。

我們記得最初幾個月的戰爭，這些侵入蘇聯邊疆的希特勒匪幫的暫時勝利的艱苦的日子，希特勒德國背信破壞互不侵犯條約。這樣日本人也援例模仿，當來栖與野村坐在華盛頓進行和平談判時，他們就攻擊珍珠港了，原來這些和平談判，是用來掩護向美國作軍事攻擊的準備的。

利用我們與德國所簽訂的和平條約，希特勒完成了進攻的準備，並且在這條約的掩護之下，最後在一九四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早晨四時，希特勒開始進攻蘇維埃國家。而就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三日，當西部俄羅斯被希特勒入侵所引起的可怕的災難的火燄所捲入的時候，我們的領袖斯大林向人民作廣播演辭說：「大家可以問蘇維埃政府怎麼會與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這像背信的人和怪物進行締結互不侵犯條約呢？這兒在蘇聯政府方面是有錯誤的嗎？當然，沒有的！互不侵犯條約就是兩個國家間維持和平的條約。而德國在一九三九年也就拿這種條約向我們提出。蘇聯政府那時能拒絕這種提議嗎？我想，沒有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會拒絕與其相鄰的強國的和平協議，假使這個強國的首領甚至像希特勒和里賓特洛甫如此的怪物和吃人者。不過這，當然，要合乎一個確定的條件——即和平的協議一點也不牽涉到愛好和平國家的領土完整，獨立與光榮。如所週知，蘇德間的互不侵犯條約就是如此的條約。

斯大林問道：「和德國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使我們贏得了些什麼呢？我們保證了在一年半中我國的和

平以及我們抵抗萬一法西斯德國不顧條約而冒險入侵我國的力量準備的可能性。對於我們來說，這是一定的勝算，而對法西斯德國來說則是輸了。」

在三月裏斯大林提出的以及在十月或八月裏被外交部長莫洛托夫提出的關於侵略的命題中，對你，麥克奈爾先生，似乎是有矛盾的事情，就是如上所述的歷史。關於這件事情，我必須如是詳細的喚起大家注意以進一步剷除那些帶有諷刺性質的暗示以及曲解真正事情進行和偽造歷史的企圖的一切基礎，它們把蘇聯描寫成和實際上完全不同的其他樣式。

四、蘇聯要求審判並鎮壓新戰爭的煽動者

就是這樣，我們還是在自己的肩膀上負起了巨大的對抗希特勒的戰爭重担。在最近的四十年中，我國經歷了三次可怕的戰爭——一九〇五年，一九一四年，以及一九四一年。最後兩次我們所忍受過來的戰爭，使我們的人民蒙受了巨大的犧牲，而我們不願重複過去的了。我們不需要戰爭，因為領土的獲得與市場，對於我們是不必需的。

麥克奈爾先生在這兒承認說，當然，資本主義制度需要擴張，而且某些人在戰爭中看到走向這個目標的道路。這兒我們當說到在美國以及其他某數國家的資本主義的反動獨佔勢力時，我們就指出這一點了。

我們和你們在這兒必需成爲同盟，因爲倘使資本主義的天性是這樣的，就是資本主義要追求擴張和市場，而某幾個像你們所說的這個社會中的反動集團用戰爭的方法尋找這些市場，那末如果你們是像你們在這兒所說的真正社會主義者，如果我們對於戰爭的源泉仍加以一瞥的話，那末我們必須爲反對這個

而鬥爭。而鬥爭的方法之一，就是我們必須反對這種戰爭的宣傳，而這種宣傳，却被資本主義獨佔以及許多看到自己在戰爭中有生存的必要條件的國家的反動集團所鼓舞着。現在講的就是這個。你們說我們所提出的方法和你們的觀念不一致，這個方式就是檢查，不過第一，你們是有檢查的。舉例說，你們有戲劇檢查。對於春宮畫你們是檢查呢，還是不檢查呢？檢查的。對於所有各種公共道德的墮落，你們是不加以懲罰呢？是的。我們要求，對於以煽動戰爭的方法使公共道德墮落必須加以定罪，但是你們注意到，就是我們在決議中沒有講到檢查，且一般的講我們沒有介紹任何懲罰的方法——我們祇要大會討論，並號召使政府與國家注意，按照其國內立法以及其國內憲法，而採取以嚴勵懲罰對付新戰爭宣傳者的措施，而其結果，則使人類不致受到這種恐怖災難的危險。爲什麼這不能採納呢？也許，因爲那是我們的提議罷？那麼把它算作你們的提議吧。但是你們一般並沒有提出任何建議。法國人說：批評是容易的，而做就困難了。我們看見了你們對於我們的提議的批評。你們不喜歡我們的提議，那末，請你們提出你們的建議來。這兒，也許將要成立編輯委員會——來提出你們的建議。請試一下，提出你們的，真正目的在於反對戰爭的煽動者的建議。我們將樂意地支持它，不管這是你們的決議，或者甚至於是任何人的決議。

澳洲的代表團提議譴責戰爭的煽動者以及同時也譴責誣告。但是難道還不明白嗎，最後你們食盡你們於開始時所說的話。難道你們不明白，當你們說：要譴責戰爭的宣傳者，以及譴責那些誣告宣傳戰爭的人，那末你們就是用這一種方法把口罩來投向揭發戰爭宣傳者的人，因爲他將害怕，在虛構以及謊言中被人控訴。這就是該點的缺陷。我們要求祇不過爲了具有一件任務與目標的建議，不要包含那些足以削弱該項決議的力量東西。我們這樣要求也因爲在各國的立法中，已有足以防制誣告及造謠中傷的規

定。爲什麼還必需提議什麼新的呢？當述及和戰爭煽動者鬥爭時，沒有的，你們不願意接受；然而當述及與造謠誹謗相鬥爭時已有的，和在立法中已有的，你們就要求把它們放入決議中。這是什麼邏輯？假使要給解釋，那末祇有一個，如此做，乃是爲了一方面在世界面前，以及如果你們不譴責戰爭宣傳時，千百萬將不明瞭但也不饒恕的普通人民之前，不要弄得面紅耳赤，但是另一方面呢，你們要把這件事如此做，而事實上一點也沒有做了什麼。這是不正確的，這是偽善的，我們要反對這個。全世界都在注意着現在這個第一委員會中進行的工作。全世界的人民期待着我們禁止並處分煽動戰爭的宣傳的言語，像期待着最大的幸福一般。假使我們決定了這件事，人民就感謝我們，但是假使我們不完成我們自己的最偉大的任務，人民就要咀咒我們，特別是在現在這樣異常重要的時刻。

在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上的演詞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五日

一、代替安全理事會的企圖

提交大會審查，並爲第一委員會現在討論對象的成立常設委員會問題，是與安全理事會問題機體相連的。當這一問題初次提出時，就毫無疑問的，美國這種提議，歸根結底，或者正確些說，首先是在於反對安全理事會通過重要問題決議時憲章所規定的一致原則。這一建議的起草人及其贊助者，自然要企圖否認這一點，但只要認識了美國、英國、法國的代表在委員會中或小組委員會中的發言，或者祇要聽了巴拿馬代表今天的演說，就可以毫無疑問的知道這些國家的代表現在支持美國的草案，企圖通過關於成立新機構的決議，正是預定要代替安全理事會的。在這裏這是沒有任何疑問的。

因此，不是偶然的，杜爾斯與蕭克羅斯在其演說中曾經企圖推翻這一論斷，雖然依我的觀點是不成功的企圖，他們企圖證明：常設委員會之建立，並不是爲了撇開或代替安全理事會，好像這一委員會之建立，並不破壞憲章，而且根據法律觀點，似乎完全是合法的，依照問題的實質說，在政治上似乎也是正確的。我想證明這些論斷的失敗，並說明辯護明顯的破壞聯合國憲章的企圖，也是不值得一駁的。

如杜爾斯所舉的憲章上的理由，想證明大會有權討論與憲章所規定的任何機構的職權有關的問題。因此，杜爾斯就反對這樣一個原則，似乎安全理事會，祇有安全理事會，才能討論有關和平與安全的問題。但是這種原則，常設委員會的反對者並沒有提出過。杜爾斯爭論這一個問題時，簡直依照自己的意

見，製定一個原則，並認爲這就是常設委員會的反對者的意見。很明顯的，他的目的是在於這樣做，才更便於他批評和推翻這一原則。

至於蘇聯代表團，那他所提議的是另一個原則，就是憲章第二十四條所規定的安全理事會負維持國際和平與各民族安全的主要責任。

連蘇聯在內的常設委員會的反對者，正是由這個憲章的原則出發的。他們過去反對，現在繼續反對成立任何名義的其他機關，不管這是暫時的常設委員會，或者如一般人所說的小型大會，或者爲了安慰頭腦簡單的人，替這一機構起任何其他的名字，祇要是具有憲章所規定的僅僅屬於安全理事會的職權。

杜爾斯及其他常設委員會的擁護者，企圖證明若干問題，首先是關於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問題，不僅屬於安全理事會權力以內。這種企圖是毫無意義的，因爲沒有那一個爭論這一點，也沒有那一個否認大會也有權討論維持和平與安全的問題。問題不在這裏，問題是在於大會在這方面的權力，是限於憲章第十四條範圍以內。因此，問題也就不在誰否認大會有權討論關於維持和平與安全的問題，而是在於大會在這方面的權力，與安全理事會在這方面的權力，是大有區別的，雖然大會與安全理事會的行爲對象是一樣的，但是權力的範圍是不同的，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法律問題，在這方面，按照憲章，大會的權力是與安全理事會的權力不相符合的。

爲了說明這一點，就要分析憲章第十一條以及憲章第六章所包括的若干其他條文。從這一分析中就可以十分明白：大會之任務是在於研討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一般合作原則，並向會員國或安全理事會提供建議，或兼向二者提供建議，以及研討任何有關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問題，惟以第十一條第二項

所規定者爲限。正是這些限制，可以稱爲大會與安全理事會的法律區別，而我們在這裏所聽到的，杜爾斯所反對的也正是這一點。

實際上，關於安全理事會正在處理之問題，大會是不能向安全理事會提供建議，或向安全理事會及有關國家同時提供建議，難道這種原則還不是法律區別嗎？大會能不能對於安全理事會正在處理之問題，向安全理事會提供任何建議呢？這是不夠的。關於這一點，憲章已經直接說過，這不能不認爲是安全理事會與大會的管轄權的區別。憲章第十一條第二項與第十二條所表明的這一原則，使安全理事會處於特殊地位，不能使它的權力與大會的權力錯綜起來，這難道還不明白嗎？

自然，大會照憲章規定可以討論任何問題。但它不能討論列在安全理事會日程上的問題，並給安全理事會某種建議。大會在這種場合無權提供任何建議，尤其照憲章規定，無權採取任何行動，因爲第十一條第二項在末尾曾有如下之規定：

「凡對於需要行動之各該項問題，應由大會於討論前或討論後提交安全理事會」。這難道還不明白嗎？不允許把大會的權限與安全理事會的權限加以混淆。

我們不能不注意到憲章對於大會的權力和安全理事會的權力所規定的實質區別。這不是偶然的，這完全適合聯合國憲章對於安全理事會所規定的性質，認爲它擔負各民族和平與定全的主要責任。

規定安全理事會權力的聯合國憲章第六章全部內容，正是充滿了這種意思，這種理想和這種精神。這就使我們有完全理由可以斷定雖然大會具有廣泛的全權和廣泛的能力，但安全理事會在某些問題方面的權力是絕對的，不可重複的。

常設委員會的擁護者又提出另外一個理由：認爲大會雖然是在常年大會和在特別大會期間才能工作

，但它有權在這些大會期間以外，實現自己的責任。爲了證明這一點，他們指出例如：大會担任經濟的文化的教育的衛生的和國際公法種種問題的責任，而且按照這些責任，大會已經成立了個別機關，如美國代表所說的，來實現大會的責任。他們又補充說道：既然時常組織像巴勒斯坦委員會，希臘邊境委員會等等的委員會，那似乎就沒有任何理由反對成立像我們現在所討論的常設委員會。

假若我們注意到第一個理由，那就不應忘記像經濟社會理事會和托管理事會，都是憲章所規定的聯合國的主要機構，這也就決定了它們的特殊地位，假若這些機構是主要的機構，那末它們也就應該有適合它們的地位與資格的權力，而這種特殊的權力是與輔助機構的權力有區別的。可是常設委員會，甚至於在決議的草案中，也曾經規定這祇是一個輔助機構。他們又引用憲章第二十二條，他們說：依照第二十二條，建議組織常設委員會爲一輔助機構。這對於第二十二條的意思，真是太開玩笑了，這真是玩弄輔助機構這一個名詞，如決議草案所做的，竟然想替常設委員會起一個名字叫輔助機構。

常設委員會並沒有在憲章中加以規定，因此它的成立，也決不能根據經濟社會理事會和托管理事會所賴以成立的那些理由。這個美國提案的起草人又企圖證明常設委員會是一個輔助機構，它完全服從大會，它的唯一目的就是研究問題，作成報告，並向大會提供建議。美國代表在其演說中直接聲稱：這一機關的唯一目的，就是幫助大會，在某一方面實現大會的職權，換言之，他逐字逐句的背誦了第二十二條。

但讓我們來看看，假若常設委員會之成立，是遵循經濟社會理事會和托管理事會所賴以成立的那些理由，那末，這就是意味常設委員會已經提高到聯合國主要機關的水準。在這種場合，就沒有任何理由說：這是輔助機構。應該區別輔助機關與主要機關。假若要我們相信常設委員會之設立，應該依照經濟

社會理事會或托管理事會這些聯合國主要機關所賴以成立的同樣理由和原則，那末這難道不是給我們理由說：已經十分明顯的揭穿了成立常設委員會，就是成立聯合國的新主要機構，它是與憲章所規定的其他主要機關立於一個水準，立於一條線上嗎？

區別僅在於經濟社會理事會與托管理事會這些主要機關都是憲章所規定的聯合國的合法產物，但你們所提議的，却是一個私生子，不合法的孩子，而你們想給它起的名字，都是不適合它的本質、性格、特點、資格、能力、意義和它在聯合國生活中所將起的作用。爲了欺騙頭腦簡單的人，就在你們的決議的第二項說：這是一個輔助機構。不是偶然的，在小組委員會的報告中，竟然十分公開的說出了那種我不能不認爲是不可允許的政治卑鄙手段。你們看一看，在決議第二項中說：「大多數的觀點都認爲委員會在這方面的責任，應該仔細加以確定，以便避免一種印象，以爲大會又成立了一個與安全理事會相競爭的機構。」

難道這不是公開的政治承認嗎？揭穿了那些人的真正動機與目的，他們想不顧憲章，以輔助機關爲名，來掩飾常設委員會。爲了這些目的，在決議草案中，曾經包括一條十分不正確的，而且故意的說常設委員會之成立，乃是大會一個輔助機關，按照憲章第二十二條，這個機構之成立，似乎是幫助大會實現其職權，難道這不是一種政治把戲嗎？企圖用這種方法蒙混社會輿論，把常設委員會叫做輔助機關，他們這種做法，就好像一個僧人，在齋戒的日子想吃美味的小豬，因此就把小豬叫做鯉魚，你們在這裏所說的，也是帶着那位僧人的虛偽，說這是一個輔助機關，說這是一條「鯉魚」，但是實際上，這是真正的「小豬」啊！你們正是想在齋戒的日子來吃這口美味呢！可是所有這些蒙混的把戲，對於那些本來準備破壞聯合國憲章的人又有什麼意義呢？

因此他們不過想對常設委員會，加一點輔助機關的醬油吧了，在這方面起首要作用的，就是美國代表團。

英國代表團對於常設委員會，採取了比較慎重的態度。這可以從蕭克羅斯的演說中判斷出來。蕭克羅斯說道：「我們認爲現在需有某種機關，以便立刻研究若干發生的問題，而爲下次常年大會和特別大會準備討論的材料。」他的立場是這樣：成立一個機關，僅僅準備材料以備下屆常年大會討論，這是很慎重的問題提法，這自然是屬於專家的特性。不僅如此，蕭克羅斯更直接認定這個委員會的權限，應該是準備材料。不過他又說：該委員會的權限，也可以包括研究那些已經擺在大會面前的問題，最好大會不要把那些有關經濟社會理事會和托管理事會的問題轉給常設委員會。但是關於安全理事會的問題，又怎麼辦呢？這依我看來，並不是不重要啊，而且在許多場合，有關安全理事會權限的問題，比較有關聯合國其他機關的問題還要更加重要，更加有責任。

至於說到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問題，如果我們指着聯合國的主要機關而言，那麼，這些問題恰恰屬於安全理事會的權限，依照蕭克羅斯的聲明，祇有當着三分之二的多數通過決定的時候，才能把這些問題轉給常設委員會。蕭克羅斯又聲明：英國代表團反對大會現在就把憲章第十一條所規定的關於維持和平的一般合作原則問題，以及如原子能委員會的問題，都委託常設委員會去處理。蕭克羅斯也反對把第十三條第一項第一段所指的問題，就是說關於大會組織研究和提供建議，以便促進國際在政治方面的合作，鼓勵國際法的進步發展，及其編纂的問題，都轉給常設委員會。

這就是蕭克羅斯代表大不列顛關於這一問題之立場的附帶聲明。雖然有這些附帶聲明，但英國代表團之立場，對於美國的提案，仍然是滿意的，而且按照實質與美國提案並無任何區別，因爲關於審查

切足以引起國際磨擦的爭執與情勢問題，英國代表團都已把它們歸入常設委員會的權限以內。此外英國的立場又同意把委員會認爲一切重要問題，都歸入常設委員會的權力以內，並且由它以三分之二的多數票來作決定。

這是完全不能瞭解的，在這種情況之下，還可以聲明：美國的提案，並沒有成立一種常設委員會與安全理事會競爭的目的。英美代表團是企圖找出一切理由來掩飾美國提案中具有十分現實形式的傾向，這就是設委員會代替安全理事會的傾向。

二、成立常設委員會就是粗暴的破壞憲章

關於組織常設委員會的決議草案，會規定可以進行調查和任命調查團進行調查，一如該決議草案第二項所規定者。我們認爲給常設委員會這種職權，就是粗暴的破壞憲章，因爲照憲章第三十四條規定，這種職權絕對屬於安全理事會。

以美國代表團爲首所提出的反對這種原則的意見，是不值一駁的。他們說：大會爲了促進政治方面的國際合作，鼓勵國際法的進步發展以及促進經濟社會等方面的國際合作，是有權組織調查的。假若大會有權在某某方面進行調查，那末它就有權把屬於它的這些權力轉給它的輔助機關。但是讓我們來看一看，這在憲章上究有什麼根據？他們引證憲章第十三條。但是你們若把憲章第十三條與憲章第三十四條比較一下，便很容易瞭解，這些論斷沒有根據，因爲它對於大會與安全理事會在這問題上的權限，沒有加以任何區別。

規定大會權限的第十三條，曾經講到研究。這在英文憲章中譯爲「研究」，但這絕不是爲憲章第三

十四條關於安全理事會的權限所作的規定，在這裏是說到調查，英文譯文也是「調查」。那裏是「研究」，這裏是「調查」。可以說：這是語言學的爭論，以爲我們想攪亂這個問題，說這是什麼完全不可瞭解的語言玄學。不是的，請原諒。這兩個名詞各有其涵義，這兩個名詞在憲章第十三條與第三十四條分別採用，絕不是偶然的。

而在實際上，蕭克羅斯也注意到這種區別，當他說到常設委員會組織調查這一建議時，似乎常設委員會由大會方面獲得此種權力，而大會也似乎有權組織調查團來進行調查。他說屬於這些研究的，似乎是學院性的研究，所包括的問題是關於間接侵略或決定召集國際大會的一般原則，或不干涉原則等等問題。蕭克羅斯所指出的問題，正是具體化了那些真正構成大會職權之一，並可轉給它的任何委員會的「研究」。

蕭克羅斯補充道：第十三條所規定的研究，即學院性質的研究，所需要的機關，是與我們現在建議成立的常設委員會有很大的區別，這些研究所需要的機關，應該在這些專門方面更加負責。他並且說：「這樣的研究有時或可採取，而且有益」。

毫無疑問的，企圖把憲章第十三條所說的研究和憲章第三十四條所說的調查混淆起來是無任何根據的。至少在憲章中對於這一點沒有任何決定性的根據。

但是美國代表正是犯了這種混淆的毛病。美國代表爲了斷定大會也如安全理事會一樣，有權進行同樣的調查和任命同樣的調查團進行調查，就引證大會曾經組織巴勒斯坦調查團及希臘邊境調查團，而且蘇聯代表團還提議過成立調查團監視對希臘的經濟援助。假若我們的反對者向我們說：我們已有若干事例，大會會成立調查團進行調查，如巴勒斯坦調查團，希臘邊境調查團，爲什麼這次你們蘇聯代表團又

反對常設委員會，也如巴勒斯坦調查團或希臘調查團一樣進行調查呢？

很明顯的，反對我們的人們所舉的這種例子，是寄其希望於其聽衆的頭腦簡單與幼稚。難道引舉這些例子的杜爾斯，忘記了怎樣及在何種基礎上組成巴勒斯坦調查團嗎？難道這是調查某種足以威脅和平與安全的爭執和情勢的調查嗎？難道這個調查團之產生，不是由於英國聲明：她不願意繼續實施過去所給她的託管權，而請求解決今後如何處理巴勒斯坦的問題嗎？難道有什麼控告提交到巴勒斯坦調查團，而且，主要的，縱或有一些控告，我自然不能完全知道，難道巴勒斯坦調查團會經加以研討嗎？巴勒斯坦調查團除了提供那些與取消托管，並將巴勒斯坦從托管狀況轉變爲一個或兩個獨立國家有關的一般原則，或組織辦法外，難道還提出過其他不同的建議嗎？難道這種完全適合憲章第十三條，真正帶着研究性質的調查團，能與那些應該調查某種事件，例如調查邊境和區域內所發生的事情的調查團作任何比較嗎？所以，關於巴勒斯坦的例子是不能說服人的，是沒有任何理由的。在巴勒斯坦調查團的組織基礎上，是有一個託管問題，這自然是屬於第十三條所規定的大會權限以內。

至於希臘邊境調查團，第一，它從前是由安全理事會任命來調查的，它曾經進行調查，這是很正確的，這是適合安全理事會權限的。但當大會通過決定任命調查團調查希臘事件時，那末，你們是記得的，蘇聯代表團就堅決反對這個決定，指出這是不合法的，這是超出大會權力以外的，因爲大會無權任命調查團查調情勢與爭執，按照憲章第三十四條，這種權柄只給予安全理事會，不是給予任何其他機關；所以蘇聯代表團反對這個決定，反對這個不合法的行動。

有些人又向我們說：「但是你們自己曾經調查團提議成立監督經濟援助之實施。」又是不能把不同的問題混淆起來。監督經濟援助之實施的調查團，並不是調查足以威脅和平與安全的爭執和情勢的委員

會。自然，由這種觀察調查團的工作中，以後可以產生建設，任命專門委員會，從事調查，但是監視經濟援助之實施的調查團本身仍然是一個監督機關，還不是現在加在常設委員會上面的那種調查調查團的精神。

我曾在一個月以前說過。可惜我現在又要重複，——我是不愛重複，而且不喜歡聽重複的，——指出：決議草案給予常設會的職權，甚至比安全理事會還要多，因而加在常設委員會上面的責任，甚至也比安全理事會要大得多。

在實際上，難道我們忘記——安全理事會並不對一切事件都進行調查，按照憲章第三十四條，安全理事會只有權調查任何足以引起國際磨擦的爭執與情勢。難道這不是有限度的權限嗎？難道關於成立常設委員會的決議草案中，曾經包括了第三十四條對於安全理事會所加的這些限制嗎？草案中說：常設委員會只要認為適當，並且願意，就有權進行調查，任命委員會在其職責範圍以內，從事考查。在這裏甚至沒有如憲章對安全理事會所規定的任何限制。

如何能在這些條件下，說這不過只是一條鯉魚呢？這一個組織究竟是什麼東西難道還不明白嗎？蕭克羅斯十分正確的說明了輔助機關的性質，他認為這些輔助機關的任務，只在於準備材料，以備大會討論，難道還可以說常設委員會只是他所說的那種機關嗎？

自然我瞭解多數的力量，多數不但始終是強大的，而且具有充分的能力（就是因為它是多數）以便進行它所想作的事情。但是反對這種多數的還有邏輯，法律與理智。你們證明這個常設委員會真正不是競爭機關。而且杜爾斯先生還說：他同意蘇聯代表所說的造成一個與安全理事會競爭的機關是不理智的。但是為什麼你現在又做出這種不理智的事情呢？難道你是想欺騙自己，說這是真正的輔助機關嗎？難

道你真想說服自己，認爲你沒有破壞憲章，認爲這只是簡單的真正的輔助機關嗎？難道你真正以爲誰會相信你常常說的和時常卑怯指出的，所謂常設委員會的反對者不過只是抵制，怠工和爭論一些抽象的東西嗎？

我們應該大聲疾呼，這裏所建議的一個步驟，對於聯合國的命運，將有極大後果與很嚴重的影響。這是應該知道和記牢的。我們應該拋棄一切政治偏見，拋棄任何政治私慾和忌恨，爲羅馬人所說的：「*Sine ira et Studio*」，來討論這個草案，來討論這個悲劇的草案，這個草案不但要招致你們這個小型聯大，或常設委員會的破產，而且對於聯合國的整個命運都充滿了巨大的政治後果。

各位先生，不要沈緬於自己的多數。你們應該知道，在國際事件中，多數並不能解決一切，並不是一切決定，只要經過簡單的多數，就可以通過和正當化。你們不要忘記了在國際事件中，重要的是合作，重要的是協議，重要的是互信，重要的是互尊，重要的是善於尊重一個組織在建立時所憑藉的及其組織者所商議好的原則。

因此，蘇聯代表團，一面反對這種常設委員會，認爲這是破壞憲章，摧毀憲章的基礎，毀壞聯合國所憑藉的和應該憑藉的原則，以便不再重複過去國聯的悲劇錯誤，同時又注意到你們通過決定成立常設委員會，打算實施的步驟所必然產生的後果。

這裏有若干代表關於這一點表示得很坦白。他們說需要取消否決權，需要取消那些奠定戰時合作基礎的原則。

難道這是偶然的嗎？不是的。巴拿馬代表表示這種意思比較坦白，不過這種意思在他很早以前就有人表示過了，而且我可以說，還有那些人用更卑鄙的方式，在這裏喊出新的外交口號，他們說：不要再

回到德黑蘭，雅爾達與波茨坦了。

這是什麼意思呢？那些不想回到德黑蘭、雅爾達、與波茨坦制度的人們，因而也就是不想回到奠定這種制度之基礎的那些原則的人們，究竟德黑蘭、雅爾達與波茨坦，對於他們有什麼可恨呢？究竟德黑蘭有什麼可恨呢，一九四三年十二月，當和可怕的敵人鬥爭正激烈的時候，而這種敵人的殘暴，我們蘇聯人在其祖國內所感受到的，比任何其他國家都要厲害，在這裏，三強領袖曾經會晤。美國的代表，杜魯門、馬歇爾新路線的代表，在這裏所喊的不再回到德黑蘭的決議，究竟這種決議有什麼可恨呢？也許是由於在三強宣言中曾經說過：「我們表示我們的決心，要使我們的國家，在以後和平時期，也如戰時一樣，共同合作。」杜爾斯先生，你是不願意回到這種原則嗎？你說不再回到德黑蘭，就是注意到這一點嗎？或者是這一個宣言中所表示的另一個原則，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三國領袖曾經說道：「在這裏我們達到的相互了解，將保證我們獲得勝利」。

你不願意回到這一個原則嗎，杜爾斯先生？或者也許你是痛恨三強宣言中所提的下面一個原則嗎？這個原則曾經是反對世界上空前未有的最可怕的敵人戰鬥的友誼的旗幟，這個原則說道：「至於和平時期，我們相信是我們之間現存的協調可以保證鞏固的和平，我們完全承認爲實現這種和平負在我們及所有聯合國家肩上的崇高責任。這種和平將獲得全球人民大多數的贊助，而且可以消除好幾代的貧困與戰爭的恐怖」。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三強的宣言又說道：「我們同我們的外交顧問一起，研討了我們將來的問題，我們希望合作，並且希望一切大小國家都積極參加合作，這些國家的人民，也像我們國家的人民一樣，竭其心智於剷除專制、奴役、壓迫、和痛苦的任務，我們將歡迎他們參加世界民主國家的大家庭，當

他們願意這樣做的時候」。

正是這些話阻礙了你們肯定和重複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三強的偉大宣言，這些話推動了你們在這裏宣言不再回到德黑蘭，就是不再回到合作，就是不再回到各民族和睦一致捍衛和平，就是不願意回到這個嗎？

或者也許你不想回到雅爾達，雅爾達曾經宣佈了堅決的目的：要消滅德國軍國主義及納粹主義，並造成保證使德國永遠不能再破壞世界的和平。也許在你們的眼前，立着這一個偉大的三強對於世界的責任，因而你們說不再回到波茨坦和雅爾達嗎？

或者，也許是另外的很重要的名言，這些名言說道：三個同盟國家決定與其他盟國一起，建立一個普遍的國際組織，來保持和平與安全，因為這種組織經過一切愛好和平國家經常密切合作的辦法，無論對於預防侵略，或者對於剷除戰爭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原因，都有很重要的意義。

因此「不再回到」的意義是什麼呢？對於美國政策不再回到德黑蘭、雅爾達與波茨坦的制度，我們蘇聯人在這些決議中找不出其他的東西，除了那種良善的號召，要求各民族友愛，並且進行自我犧牲的鬥爭，來實現聯合國旗幟上所寫的理想以外，再也找不出什麼。

試問常設委員會對於這種事業有什麼幫助呢？沒有的，我們回答是沒有幫助的。這是與真正偉大的三強在德黑蘭、雅爾達、和波茨坦所宣佈的原則完全相反的。

他們又向我們說：——這一點似乎已在決議草案中寫出——常設委員會將不研討安全理事會正在處理的任何問題。這些話的意義祇有粉飾他們的報告，替這一個決議做一個掩護，以便不致於造成一種印象，揭穿了這個建議的完全實質，而使站在聯合國憲章基礎上的國家都不能接受，除了上述的意義以外

，這些話還能其他的意義嗎？

在實際上，有些人說：——蕭克羅斯也會經證明這一點——任何以後加入安全理事會議程上的問題，縱使這種問題已在常設委員會研討之中，也將從常設委員會的議程上取消，因而這種問題的討論也將自動停止。這就是說要想常設委員會能夠討論安全理事會權限以內的問題，就需要某種條件。這些條件是什麼呢？這就是從安全理事會的議程上把某一問題取消。所以假若這個問題將從安全理事會的議程取消了，——爲此祇要以簡單的七票多數表決，取消這一問題的建議就可解決，——那麼，常設委員會就可以獲得完全的合法機會來處理這一問題了。在安全理事會中，某一集團國家具有保證的多數，將無任何困難，祇要簡單多數的表決，就可從議程上取消該集團想在常設委員會討論的問題。難道這對於誰還是祕密嗎？也許你們在這一方面還有任何疑慮嗎？你們看見了對於這有什麼阻礙呢？在安全理事會中對於簡單的多數決定問題，除了你們現在所集中火力所反對的否決權以外，難道還有什麼阻礙呢？

說常設委員會將不研討安全理事會正在處理的問題，這種解釋有什麼意義呢？我斷定這是毫無意義的，這是完全無內容的空話。這個條件很容易從兩翼，從左面，右面，擊破，這是十分很危險的。因爲我們很明白：從安全理事會的議程上取消某些問題的程序。

關於常設委員會的權限問題，便是如此。這個委員會之建立，是專門爲了把安全理事會排斥到次要地位，使它不能有所行動，以便在某種情況下取消向安全理事會——這一個担负國際和平與安全主要責任的機關——控訴的必要。十分明顯的，這是一種手段，要藉這個手段，來企圖打擊安全理事會，因爲它不合他們的要求，由於在安全理事會中，現在實行五個常任理事國完全一致協議的原則。個別的集團國家，追求與聯合國的目的，及其原則和任務不相符合的目標，自今還未能夠把安全理事會變爲自己集

國政策的工具。

三、為什麼他們反對否決權？

否決權的原則——在首先打擊安全理事會以後，現在第二個打擊正是針對着否決權——正是合作的防衛，只要多數表決的機器一開動，只要簡單的多數制度或三分之二票的多數制度一經使用，不顧及所有強國和那些對於安全理事會的決議担负同等責任的五個常任理事國的意見，那末此種合作就將無條件的破壞。要担任同等的責任，只有每個國家都有同等的權利才有可能，假若四國表決反對一國，那末，這就不是平權。爲使四國的力量都得平等估量，就須把給予四國的那些權利，也給予第五個担负同等責任的國家。

我假若更基本的發揮擁護所謂否決權的意見，那將離題太遠。我所以順便提及這個問題，只是因爲在此處委員會與小組委員會中，全部問題正是圍繞着個否決權打圈子。我希望將來還有機會專門討論這個問題，那時才更加詳盡的發揮關於這一問題的理由。但是應該指出現在打算以成立常設委員會來予安全理事會一種打擊自然就是對付一致協議原則的一種手腕。

蘇聯代表團認爲美國關於成立常設委員會的建議，正是如我上面所說的一種特殊的政治手腕。美國爲了辯護這種手腕，甚至提出駁查理論，杜爾斯先生在灣裏會經發揮關於聯合國的主導原則理論，如他所說的補救法則，他並且認爲生物學方面的職責制度與聯合國，即社會學方面的職責制度頗爲相似。

他這種比擬是什麼意思呢，是不是值得加以注意呢？把這種比擬撇開，把它當着一種辯術，認爲在實質上毫不重要，毫無價值，不是更好嗎？蘇聯代表團對於這一點却有另外一個觀點。我們認爲這種比

擬並不是偶然的，這種比擬正可以幫助那些現在努力分析常設委員會真正性質的人們，正可以說明這個機構的真正目標與預定的職責。

在實際上，美國代表指出：在生物學方面，與在社會學問題方面，尤其關於聯合國制度，補救法則是當一個機關失去效力，表示癱瘓的時候，就必須加強另一個機關的行動，藉以補救行使職權的機關系統中某一機關失去作用，而不足的力量。杜爾斯這種比擬，大有助於說明常設委員會的本質問題。假若說到聯合國，那末這種比擬，正可說明：第一、承認安全理事會已經癱瘓，已經癱瘓，它的行動應該轉移到另一機關，後者由於補救法則，就應該補救安全理事會所喪失的，不足力量。因此，這種比擬就證實常設委員會正是起着補救機關的作用，以對抗失去效用的和需要另一機關補救的安全理事會。這又是另一方面的意思。

因此，這種比擬就證實了必須分給常設委員會以這樣的職責和權柄以便補充和補救安全理事會失去的效力，所以毫不奇怪的，給予常設委員會的職權，實質上在許多方面都是屬於安全理事會的權限。

換句話說，杜爾斯所說的補救法則，正說明了美國外科醫生和英國若干外科醫生及其他國家的若干外科醫生合作，對於聯合國這一個生物機體所施的手術。這種手術就是按照生理學博士，或哲學博士，或兩者兼而有之的博士，杜爾斯先生，在這裏所申述的補救法則而實行的。這就是說常設委員會並不是我們時常所說的機構，它不是大會的輔助機關，因為它不是預定來幫助大會的，這是一個被規定為補救安全理事會缺陷的機關，這是與安全理事會對立的機關。

杜爾斯說：假若我的一隻手癱瘓了，我們沒有必要再癱瘓另外一隻手，當我的一隻手癱瘓以後，我的身體甚至於有時候還要變為更加強壯，能夠進行更多的工作。這是生物機體的定律。假若我的左手癱

痺了，那末右手，就有雙重工作，一方面是爲自己，同時還要爲左手工作。很明顯的，假若杜爾斯先生採用這一個補救法則於聯合國的制度，行動，任務，和原則上面，那末，這就是說：安全理事會已經癱瘓了。

這就是爲創立新機構辯護的動機。這種機構應該一方面担任自己的工作，另一方面担任按照補救法則，應從癱瘓機關轉移過來的工作。難道這還不明白嗎？這已經明白了美國代表團在這次所利用的並領導大批其他代表團所贊助的補救法則，應該證明：第一、安全理事會已經癱瘓了；第二、又建議一種辦法，並不是爲了幫助安全理事會，及恢復安全理事會的有效行動，能力，而是爲了割去這一個癱瘓機關，並以新的機關代替它，這一機關將發揮自己的行動，爲自己並爲癱瘓的機關工作。

在這種情況之下，難道我們還沒有權斷定常設委員會是一個聯合國的新機關，對於它的希望是補充安全理事會的缺點，並執行安全理事會似乎不能執行的任務嗎？杜爾斯說：這並不是平衡法則，而是補救法則，它是聯合國的主導原則。

假若我們撇開建立在哲學論斷上的這些比喻，那末問題的實質就明白了，它是在於以常設委員會代替安全理事會，並爲這種代替辯護，說安全理事會已經走入窮途末路，說它已經失去效用，說它已經癱瘓了。他們說聯合國不能安於這種情況，它應該從這種情況找得出路，而這個出路對於那些擁護常設委員會的人們，正是這個委員會。

四、政治路線的鬥爭與否決權問題

各位先生，假若一切是這樣的，那末，讓我問在安全理事會的工作中，這種絕路的原因，是在什麼

地方呢？我們的身體現在似乎發生了左手或者右手的癱瘓症狀，要求造成新的機構，新的右手，或者新的左手，以便補救我們的損失，試問這種癱瘓的原因，又在什麼地方呢？就假定是這樣，那末讓我來問美國代表團所提議的，英國，法國及其他國家的代表團所支持的成立常設委員會，以糾正現已造成的情況，這些辦法是否已經充分有用呢？對於這個問題，蘇聯代表團堅決給予否定的回答。因為在聯合國組織中現已造成的情況，並不是某些局部的原因可以解釋的，而且這種情況的真正原因，具有深刻的根源，並遠遠超出聯合國組織的範圍以外。

關於成立常設委員會的建議，在我們面前並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單一的，與它一起還有其他許多建議，都主張取消德黑蘭，雅爾達，與波茨坦所包括的那些原則。在這裏我們聽到一種號召，要放棄這些原則，或者至少請各位不要回到這些原則，依我的意見，這些建議都是一樣的。

作為發展國際合作事業之柱石的原則之一，就是安全理事會的五強，在決定有關和平命運的最重要問題時，要遵守一致協議的原則，在這方面，我不能不回憶在當時執行美國國務卿任務的約瑟夫格魯的聲明。他在一九四五年三月間聲明：美國政府所建議的並為舊金山大會所有召集國家所通過的安全理事會表決程序規則，乃是鄧巴頓橡樹園會議所有建議的一部份，而這些建議如格魯所說的，正是國際組織草案的基礎。

這是格魯代表美國政府關於安全理事會表決程序規則所說的話，也就是關於一致協議的原則所謂表決權的意見，這是國際組織全部草案的基礎。

在這方面，就必須少許回憶一下這個問題的歷史，雖然祇能很短的說幾句。我們認為一致協議原則具有很大的政治意義，它牽涉了聯合國組織及其全部活動的根本利益，甚至於牽涉到這一個維持和平和

保證各民族安全的國際機關的存在問題。在聯合國內擁護或反對這一個原則的鬥爭，從聯合國開始存在的日子就發生了。這也不是偶然的，這並不是由於聯合國內部所有的原因。這種鬥爭的根源，應該在聯合國組織以外去找。我們認為在聯合國內擁護或反對這一原則的鬥爭，乃是各種政治傾向或各種政治路線鬥爭的反映，而這些路線的本身，又反映了各國戰後對外政策的矛盾。我們認為圍繞一致協議原則問題的鬥爭，乃是圍繞根本問題的鬥爭，也就是圍繞這些國家或那些國家的對外政治路線或傾向之矛盾的根本問題，而這些矛盾正是存在於戰後的世界中，這些矛盾早已表露出來。

我提醒你們，還在去年，蘇聯出席大會的代表團領袖莫洛托夫就會經講到那個時候開展的反對一致協議原則的運動。他同時指出：這種運動與國際政策兩條路線的鬥爭之間是有連繫的。莫洛托夫又指出：應該公開的說，在國際生活中現在存在着各爭矛盾與主要的政治傾向，在這些傾向之間，正在聯合國內，爲了影響我們工作的基本路線而進行鬥爭。

一條政治路線是企圖鞏固國際合作，爭看見了自己的支柱，是在於鞏固聯合國組織的基本原則，它看見了自己的支柱是在於鞏固像安全理事會這樣的機關（我特別強調這一點），這個機關担负着主要責任。這是一種傾向。

另一個傾向或政治路線的行動，不在於鞏固而在於削弱聯合國組織，這是應該誠懇的和坦白的說出的。假若不是在口頭上，那就是在實際上，聯合國組織現在正受着這一條政治路線的代表，根據他們的立場向它進攻。

這種情況正是下述鬥爭的直接結果：在國際政策中，對外政策的舊路線是在於國際合作，是在於大小國家互相尊重，互相瞭解，共同的利益，是在於執行協議和團結的政策，可是現在反對舊路線的，已

經出現了一條新路線，這條新路線如杜爾斯所說的已經宣佈不再回到德黑蘭，雅爾達與波茨坦的制度。這就是意味着在國際關係中，已經放棄了合作，並且企圖以命令代替合作，以壓迫和藉各種主義與計劃予別國以壓力，來代替協議的行動——破壞這一組織的基本原則——這種路線正在聯合國的背後和側面行動。

這樣的對外政策路線，自然不是證明它的創始人對於鞏固聯合國組織有什麼興趣。

聯合國組織，尤其是像安全理事會這樣機關，時常妨礙所謂新路綫的順利執行，所以美國政府不決定把自己的馬歇爾計劃提到聯合國來討論。它很正確的恐怕這個計劃提出來，假若不破產至少也要遇到許多國家的反對，以致揭穿了這一計劃的眞正性質，及其掩飾的擴張企圖與傾向。

但是「杜魯門主義」與「馬歇爾計劃」並不是唯一的證明在對外政策的新路線下，美國政府寧願撇開聯合國。在這種對外政策之下，自然談不到尊重聯合國的基本原則，例如：各國平權與各民族主權平等的原則，相反的，我們在這裏聽到了反對主權的呼聲，例如斯派阿克先生及其他若干代表的演說。也談不到尊重已締結的協定所包涵的互惠原則與尊重這一組織所有大小會員國相互利益的原則。在這種對外政策之下，自然也談不到在決定最重要對外政策問題時，尊重各大國一致協議的原則，而這種協議正是聯合國憲章所要求的，同時關於這一點（這也是需要記着的）也是聯合國創立者在其成立，產生與萌芽時期，大家商議好了的。

當聯合國建立時，如不是一切國家，也是極大多數國家的智慧，抱定了一種理想，要找出一種國際合作的形式以便拯救人類，擺脫一切最嚴重的後果與恐怖，而這種情形正是由於過去像國聯這樣的國際組織軟弱無力與所犯的錯誤加在人類頭上來的。慕尼黑與戰爭原來就是潛存於國聯的內心，因爲在國聯

內，甚至沒有任何東西象徵什麼強國合作，而使後者能在手中握着和平與戰爭的一切現實力量，俾能推動他們的努力於一個方向來保證和平和防止戰爭，當聯合國在鄧巴頓橡樹園及舊金山成立的時候，難道不是所有國家都抱定一種理想，要避免國聯的這些錯誤與缺點嗎？正是這樣。大家都明白國聯破產的基本原因，就在於它軟弱無力，在於它不能達到協調的行動，以便保證和平與防止侵略。國聯的組織原則就是可非難的，國聯的全部行動也是錯誤重重。

你們都記得國聯會經規定所有會員國都須一致協議。這一點曾被看作真正民主主義的表現。但是在這種決定問題的方法中，包括着嚴重的危險威脅了國聯的生存，因為只要有某一國的反對，甚至於在國際關係中不起實際作用的任何小國的反對，就可以阻礙能夠滿足其餘一切國家的決議的實施。這種決定問題的方法就使得國聯無所作為以致破產。大家知道國聯的情形正是這樣。

現在國際組織，如果確定一種表決程序，只由多數票通過決議，而這種多數票又只利用來強迫少數，接受不能接受的決定，以致與個別國家的利益相衝突，違背聯合國的原則，那末這種國際組織也將遭遇同樣的破產與失敗。可是現在正有些人作這種企圖，這可以從這次大會工作與第一委員會的工作中拿出許多例子予以證明。我可以舉出許多這樣的例子。

各位先生，這對於安全理事會尤其正確。安全理事會應該行動。它不應該只是說話，它沒有權柄只是表白自己的願望，或者製定建議。它不應該如此。安全理事會應該行動，而且時常它不僅應該依照憲章第六章，而且應該依照憲章第七章有所行動，第七章會規定由安全理事會在這種或那種情況下採取強迫步驟。假若在五強之間沒有一致協議，這樣的行動是不會產生的，因為假若在五強之間不能一致協議是否需要採用，和如何採用，以及為反對誰而採用第七章所規定的步驟，那就是意味着，在這五強之間

已經存在着衝突了。假若在五強之間關於聯合國憲章第七章所規定的問題都容許衝突狀況存在，這就是聯合國的終結，這就是重複已經走過的道路，這就是國聯的陰影又復現了，這就是意味着對於一切巧妙的冒險家又敞開了道路。所以我們說：在這種情況之下，照聯合國憲章第七章的規定，就一點也談不到（對於那些鄭重處理問題的人士而說，不是對於武斷的爲了鼓動和宣傳自己的忌恨人類的觀點而說），能使這些問題不經過一致協議而決定，以三票多數反對兩票或以四票反對一票來通過決議。這是不可能的，因爲在這種秩序下面，是不可能有什麼國際組織的。

安全理事會不但是一個担负保持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的機關，而且担负須有相當權力，相當權柄，相當條件與適當行動方法方能實現的責任。現在想撇開安全理事會，因爲在這裏不能用計算票的方法通過決議，在這裏不估計到所有參加表決的國家的立場，所有決議若不在合理基礎上提出來，若不在平等商量的基礎上提出來，就通不過的。

安全理事會的表決原則正是意味着：在國際事件中是不能有未經五強全體協議的決定的，因爲後者担负着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與最實際的責任，在這些強國手裏握着保證和平與全世界安全的主要手段與最實際的力量。

常設委員會現在被規定來解決屬於安全理事會範疇的問題，不過在另一種基礎上，不是根據一致協議，而是根據另一種原則：或者根據簡單的多數或者根據三分之二或多數。

難道這不是破壞憲章嗎？難道這不是向我們的基本法律進攻嗎？難道這不是以常設委員會代替安全理事會嗎？我們回答這個問題是肯定的。我們認爲一致協議原則可以關閉個別強國私下交易的道路，而這些強國是希望根據狹隘的集體利益行動，並且企圖撇開聯合國。我試問不就是因爲這一點，以致安全

理事會與一致協議原則對於若干國家覺得不好嗎？因爲在這種原則生效的時候，是不能在安全理事會中用機械的計算票的方法，通過對於安全理事會一個常任理事國，和其他國家平等負擔一切決定之後果的責任的任何一個強國——不能接受的重要問題決議的。對於這一點，我們早已指出過，現在我們批評這種決議時，還要指出，因爲該建議要予常設委員會許多職權，甚至講到調查一切爭執與情勢，比較安全理事會的職權還要廣汎，還要強大，但是另一方面，又取消了安全理事會可採用的決定問題的那些方法。

因此很明顯的，通過關於成立常設委員會的決定，而此種決定是企圖破壞聯合國的基礎，這是充滿了實際嚴重後果的。

這將是一個取消安全理事會工作的機關，如巴拿馬代表在這裏很公開指出的，他們對於這一機關的希望，正是在於摧毀安全理事會行動的根基，假若不是完全消滅安全理事會這種機關存在的必要，也要把他削弱到最大限度。這是如我們所說過的，對於整個聯合國組織是危險的，而且充滿嚴重後果的。

應該明白所有那些珍重聯合國原則不可破壞的會員國，一切爭取強大的國際組織能在實際上，不是在口頭上，保證各民族安全與擁護世界和平事業的國家都不會走上這一條路。

强有力的國際組織，——這個組織的主導原則，應該是根據協調的決議與行動，而達到的一致與友誼合作，並且憑藉相互瞭解，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一切渴望和平，供獻力量共同爭取各民族和平合作及其堅固安全的大小國家的利益。所以現在建議實行一種破壞聯合國的步驟，通過成立常設委員會的決議，應該遇到所有真正擁護國際合作的國家的批判。

所以常設委員會不能成爲聯合國會員供獻力量的機構，對於那些堅守聯合國憲章，並認爲反對任何

破壞憲章及動搖聯合國偉大原則是自己的迫切義務的國家，是不能成爲發揮行動的場所的。

主席先生，各位代表先生，這就是蘇聯及蘇聯政府與蘇聯代表團的立場。我們將投票反對常設委員會，因爲這個舉動——成立這個委員會——明顯的與憲章衝突，破壞憲章的基本原則，威脅聯合國的生命運。在這方面，蘇聯代表團將不是那些伸出威脅之手在聯合國頭上的人們的擁護者與幫助者，而常設委員會就是聯合國的一個威脅，就是破壞聯合國存在基礎——聯合國憲章——的一個威脅。

在聯合國大會第一委員會上的發言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六日

若干代表都聲明限制自己的發言時間，我追隨他們之後，也來試試同樣地限制一下，因為注意到我已第三次發言，而且懼怕我要開始濫用第一委員會的注意。不過情況是這樣，現在是討論很嚴重的問題，是討論一個具有很大原則重要性的問題，因此，在這裏不僅不能顧到自己，而且不能顧到與會諸位的方便與否。

我想談一談在我昨天和今天發言以後，這裏所有的幾個發言。我想簡略的談一談阿根廷代表的發言，他在這裏發表了大家共知的雄辯，爲了證明常設委員會是一個輔助機關，並證明關於建立這種委員會的決定是完全合乎理智的，而且完全是合法的。

說到這種決定合乎理智，那末這依各人自己的理智，各有自己的意見，至於說到這種決定合法，那末我以爲蘇聯代表團已充分研究了這個問題，並已指出了一切理由，根據這些理由，常設委員會之建立，是不能不認爲是極橫暴的破壞了憲章，假若要說到憲章，說到根據憲章的合作，說到尊重憲章的原則，那我可以说，這是真正的歪曲。

我現在自然不能再重複那些同樣的理由。但是阿根廷代表既然只簡單的宣佈常設委員會之建立是合法的，沒有企圖利用他的雄辯來證明這是合法的，我想我們沒有必要關於這個問題和他爭論。應該說假若今天阿根廷代表傾聽了自己昨天演說的紀錄，那末，他多半很容易同意所有他所說的簡直真正是一種赫斯的里亞的朗誦。例如：他在這裏說：有一些國家現在正在反對憲章的精神與文字。他沒有指出這

是那些國家。若果他所指的例如是美國或者是他自己的代表團，那我倒不要和他爭論了，因為實在的，美國近來的全部政策是這樣——這就是那個開闢美國對外政策一個時代的新路線，稱爲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的。難道你或者你們中無論那一個能够推翻我的論斷，說這些主義和這種計劃都是在聯合國組織以外擬定的，並且這些計劃是要在聯合國以外和聯合國背後執行的嗎？難道這不是反對合作的精神和反對憲章的精神與文字的蠢動嗎？

我應該直接聲明：假若阿根廷代表認爲蘇聯也在那些反對憲章的精神與文字的國家之內，那末，這就是誹謗和橫暴的曲解事實了。假若他所指的那些破壞憲章的國家，是由於它們製定的計劃——政治的和經濟的——完全與聯合國的原則背道而馳，而且這些計劃是完全在聯合國背後和組織以外準備的，擬定的和實施的，例如現在美國和在這方面支持美國的英國，法國所做的，我們可以公開的誠實的說，而不是暗指一下——那才是真正的反對憲章的蠢動。而這種反對憲章的舉動例子之一，就是你們現在準備以多數票通過的關於建立常設委員會的決定。

我毫不奇怪，阿根廷代表攻擊一致協議原則，他已經攻擊三年了，每日每小時都在攻擊，這已成了他的習慣，很難希望他做出別的事來。但是阿根廷代表在這裏說什麼不能再在自己的屋子裏，忍受那些經常反對和妨礙的人，那我要問阿根廷代表，現在就把聯合國當作阿根廷自己的屋子，可以按照家庭方式自由處置，隨便把自己的腳放在桌子上，不是太早太自信了嗎？

阿根廷代表在發言中並未牽涉到其他更嚴重的問題，只是以威脅之口吻，提一提否決權的前途問題。我們也只提一提否決權的將來問題，而且專門提一提阿根廷關於這一問題的將來立場。但是我們應該說所有他在這裏所說的，都可以用俄國一句成語包括就是「糊塗」。

挪威的代表曾經在起草小組委員會的決議草案中找得了輔助機關的標準職權。他說這些職權就是編製報告並將報告提交大會。不過他自己又提及還有一個職權，就是進行調查。挪威代表對於這種職權的法律性質表示懷疑。

我希望在挪威代表繼續考慮這一問題後，能使他處於更堅定的立場，而不是懷疑和動搖。但很奇怪，的當挪威代表團懷疑這一極重要職權的法律性質時，即懷疑建立中之常設委員會規定有此種職權，是否破壞憲章基本原則時，也就是說常設委員會具有此種最重要職權是否有合法根據時，在這些懷疑以後，我們仍然聽到他聲明：要投票贊成此種決議。

這只可以說完全不尊重法律，不尊重憲章，因為假若已經懷疑某一規定與法律及憲章衝突，那末怎麼能投票贊成包括這種規定的決議呢？這只有在不十分尊重法律原則，合法規定，及憲章時才能這樣做。甚至於和自己有這些衝突時，仍然投票贊成決議案，這自然是挪威代表團的事情，不過這是很難瞭解的。

現在來談一談蕭克羅斯的發言。他武斷的號召我們蘇聯代表團合作。他說：你們看一看大多數都有這種精神，都向你們的所造的一樣向蘇聯代表團在全世界面前祈禱：與我們聯合一起啊，不要堅持啊，表現一點合作精神啊！

而且蕭克羅斯還認為適當的，在這裏提到——這已不是第一次了——我在過去作檢查官的事情，如他今天所說的，就是關於那些使我馳名於世的審判事實。我不知道爲了什麼要說這些話。自然，我很自傲，過去我會有保護祖國利益，反對希特勒間諜的崇高光榮，這種間諜會潛入我國，但已順利的被消滅了，同時我也希望蕭克羅斯先生對於自己的國家有所作爲，那裏有各式各樣的摩斯來正在逍遙法外，在

貴國合法保護之下聚集自己的力量，而他們聚積這些力量，是爲了反對民主與和平。不過這是貴國的內政，我因爲遵守憲章第七章第二條，不想干涉這些事情。

蕭克羅斯曾經這樣提出問題：把破壞憲章的證據拿出來。他說你們過去在審判犯人時，並不是簡單的斷定：此人有罪，我有證據，但我不把這些證據提出來，你可簡單的相信我，我有這些證據。噫克羅斯很莊重的問我；爲什麼你現在不照這樣做呢？蕭克羅斯自然是一個有經驗的檢查官；我承認他對於這種職業具有一切優點。他有權不接受我在這裏提出的證據。蕭克羅斯甚至於有權完全不承認它們是證據。他甚至於可以像許多有經驗的和巧妙的律師時常所做的，把事情描寫得這樣，把反對他的證據都變爲擁護他的證據。難道我真正的沒有提出破壞憲章的證據嗎？誰要不是狡辯，誰要不是按照昧良心的原則而說話，誰要不是在這裏簡單的發表議會演說，如馬克思所說的，從事於議會的舌劍唇槍，而是真正的實際的鄭重的討論重要問題，並且完全瞭解我們對自己的意見和決定所負的責任，那末試問誰在這裏能摸着良心說出這樣的話。

難道你能說蘇聯代表團沒有提出一個證據，來證明你們蠻橫的破壞憲章嗎？我們引了不少重要證據，連伊瓦特，甚至於杜爾斯及你自己都不得不承認，雖然你們稱這些證據是一些臆斷。你引用我沒有指出的三十五條。蕭克羅斯先生，你引用卅五條想說什麼呢？你想用這一條證明什麼呢？你引用三十五條想推翻什麼呢？你知道我實在沒有舉出這一條的號碼，但我曾經詳細的說到這一條的內容，尤其是關於這一條第三項，因爲這一次在我們的爭論中是最關重要的一部份。爲什麼你讀了標題，不思考其中所說的內容？我建議我深思我所引用的憲章第十一條，關於這一點——這是現在最重要的——曾在第三十五條第三項說及。在這一項內說道：「根據本條通知大會，而由大會解決之問題應願及第十一條及第十二

條之原則。」爲什麼這是第三十五條最重要之一部份？這一項所以成爲第三十五條最重要之一部份，是因爲它規定了我們討論常設委員會問題時所最早感到興趣的解決問題的程序。

因此我必須駁斥蕭克羅斯誹謗蘇聯代表團發言的企圖，說這是空話，說這是什麼簡單的宣言。蕭克羅斯不滿意我們的證據，但所有蕭克羅斯關於擁護自己的立場所說的話，都完全不能說服我們，而且什麼也不能推翻，什麼也不能證明。蕭克羅斯大概瞭解到這一點，所以最後又聲明：請蘇聯代表團相信關於常設委員會的決議案起草人意志中，並沒有剝奪安全理事會權力的意思。

蕭克羅斯先生，我可以說你這種宣言式的聲明，是一種空虛的宣告。事實所證明的是另一回事。你說在你們的意志中沒有爲常設委員會剝奪安全理事會職權的意思，但是你聽一聽巴拿馬代表說的什麼話，你聽一聽阿根廷代表說的什麼話，你把你的耳朵送到他們的心胸，那末你便可感覺到，他們的心正在反復跳動，等待最後結束安全理事會，及一致協議的原則。

你聲明：你承認這個原則，並不想謀害這個原則。我們知道一種方法：在口頭上承認，在實際上消滅。在國會中這種方法尤其常常採取。我認爲這樣的宣言在那個要求我提出證據的人的耳朵裏聽起來是很可笑的，似乎這樣的聲明，說在起草人的思想中沒有某種東西，這就是證據啊。我們更加有興趣的是實際，而實際就是困惑了挪威代表的決議草案，就是那個困惑了瑞典代表的草案，以致他聲明看一看它將來怎麼樣——，也就是那個困惑了埃及及表的草案。但是怎麼樣辦呢？自然，也有這樣情形，就是把送葬的車子當着結婚的車子。

蕭克羅斯重複挪威代表的理由，斷定常設委員會的職權是在於研究問題，並將研究結果提交大會，這就完了。但你忘了杜爾斯所說的，他把正義，法理與如和社會的道德裁判與德黑蘭，雅爾達及波茨坦

制度對立起來以後，他又巧言密語來掩蓋痕跡。杜爾斯的發言明白表示此一委員會之職責如何重要，遠不止於「研究」和「報告」。關於常設委員會的建議人現在還沒有給予這一委員會一切決定與行動之職權，還沒有給予那些按照憲章屬於安全理事會的採取一切強迫步驟的權力。但是壞就壞在開頭。從你開始的地方開始，以後就按照法國俗語，食慾可以在吃東西的時候發生——你自然可以找得一切新手段與方法，撇開憲章，給予這一委員會其他職權，要你認為需要，只要這是適合你們的政治傾向與利益。有些人說常設委員會沒有法律的力量，甚至沒有法律的根據來行動，所有它的職責只限於提出建議。但是不要忘記假若常設委員會沒有法律根據以便行動，那末，它至少在你們的觀念中不能不具有道德力量，這種力量現在還不知道將來與法律有根據的機關的力量相比，究竟強些還是弱些。

司法的法律權並不是始終比道德的法律權更有效更有力。我們甚至於還可以說：根據蘇聯的法學觀點，只有那些適合道德法律的司法法律才能認為公正和強有力，而這是一九三六年蘇聯憲法所解釋的社會主義的道德觀。

因此我不能接受蕭克羅斯在這裏所做的解釋，因為他企圖減少，降低，和縮小常設委員會的作用和意義。我們還可以提出另外一個問題。好吧，你可要建立新機構，你們說尊重少數的權利，而這些少數是不贊成建立這稱機關的，並認為這是破壞憲章。為什麼你不願意把這一機關歸入憲章。假若我們在正爭論這一機關的合法與否，為什麼你們不願意把這一問題轉入憲章範圍，即使它服從憲章修改的程序，因為建立這種機構無疑的就是修改憲章，讓我們把這一問題放入修改憲章的程序中，並依照憲章第一〇九條來做。你們不願意這樣做，這是為什麼呢？因為你們知道在這種場合，你們要遇到依據憲章的少數不可克服的抵抗。

尊重少數的權利，就在於憲章給予他們的權利，都應神聖的加以遵守。許多人向我們說：關於常設委員會決議草案所建議的三分之二票數解決問題的辦法，難道不是證明尊重少數權利嗎？但是三分之二的票數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委員會的三分之二委員將通過決定反對三分之一的委員。試問三分之二的票通過了三分之一票所不能接收的決議，爲何還能保護三分之一的權利呢？這是什麼詭辯？怎麼能實用這種詭辯呢？假若三分之二通過某一決定，而三分之一，即少數，反對此種決定，難道這種由三分之二通過的決定還能保護少數的三分之一的利益嗎？一點也不能保障。少數還是少數，他們的建議被推翻了多數做了自己的事情，至於這是三分之二做的，不是簡單的多數做的，這不過是一種形式，絲毫沒有改變問題的實質，假若你願意，還可以更加強調指出，少數仍然是少數，代表全組織的限定的多數是與他們的意見不相同。你們就是認爲這保護少數嗎？不是的，這是保護多數的權利，而是保護限定的多數的權利。但是這竟然認爲是保護少數權利的手段。這是奇怪的關於保護少數權利的手段的觀念啊。

有些人向我們協商並向我們熱烈的號召合作。這很好。讓我們來研討這個問題。現在我們來舉一個例子，這個事情已費了大會不少時間。這就是安全理事會的選舉問題。我們有很好的合作機會，但是這種合作是在什麼形式中進行的呢？

在憲章中有第廿三條規定不可爭執的義務，就是根據政治——地理的原則，在安全理事會中，保持代表世界這一區域或那一區域，這一部份或那一部份的代表比例，這是一開始就在舊金山會議中協議好的，而且直到最近第二次大會以前都是很誠實的執行的。蘇聯代表團，烏克蘭代表團，白俄羅斯代表團，波蘭代表團，捷克斯拉夫代表團，與南斯拉夫代表團堅持應該由他們在斯拉夫國家中選擇一個代表的接替波蘭在安全理事會中遺下的位子，難道他們的意見不確嗎？當南美國家應由南美一部份選出一國接

替辭職的巴西，蘇聯和斯拉夫國家都完全尊重第二十三條所表示的原則，都說：我們認爲巴西的位置應轉給拉丁美洲國家之一國，而且認爲選舉他們的候補人乃是拉丁美洲國家自己的事情。我們可能不同意這一個候補者，我們可以認爲他與我們的思想完全不合，但我們尊重憲章原則，我們仍將投票贊成這一國家，好像我們對於阿根廷一樣，並不計及我們政治觀點和關係如何。

又如澳洲退出安全理事會以後，由於同一原則，而且在這一條中所表現的真正的合作精神，根據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就選了另一個不列顛聯合王國之一國，以代替澳洲，難道我們不認爲是正常的嗎？當時選了加拿大，我們就投票贊成加拿大，因爲這是符合比例的，我們並不計及我們過去與加拿大有什麼不好，將來又可能有什麼不好。我們對於它只是尊重原則，尊重與列強的協議，並忠實執行我們的義務。但是你們呢？現在對於烏克蘭是怎麼樣呢？對於烏克蘭是這樣，在選舉安全理事會的理事時，雖然有許多國家對於烏克蘭已明顯表示支持，但她在十二次投票以後還不能選入安全理事會。有些人向我們說：提出另一國家。但是根據什麼你們說出這個呢？難道我們會向美國代表說：提出另一國家，不要阿根廷，雖然後者曾經暗示要使蘇聯退出聯合國。我乘機向阿根廷代表團說一句：你們的手是很短的啊！這就是合作的情形。現在實際上對於安全理事會的選舉是怎樣呢？這裏簡直成了精神病院，十二次投票，都不能獲得必要的四票多數。爲什麼？這就是因爲你，蕭克羅斯先生，英國代表團及代表美國的奧斯丁已經下了命令，不要投票贊成烏克蘭。

這樣驚人的嘲弄，違背協議，違背憲章第二十三條所表現的原則，想按照自己的意思安排，而不按照協議去做，在這些條件下還向我們說：請與我們接近，表現合作精神。他們自己破壞了現有協定，粗暴的破壞了憲章，還向我們請求並且說：接近我們到我們的懷抱中來，我們要擁抱你，緊握着你的胸膛

，但是想把你的骨頭都捏碎。蕭克羅斯說得非常巧妙。更向我們說：你是吹毛求疵，說是懷疑我們是壞的，你在一方面都看到陰謀詭計，其實並無詭計，我們並無任何隱藏的思想，我們只是渴望合作……

這就是我要向的尊敬的檢查官同業蕭克羅斯先生所說的話。我想請他想一想他在此地說了什麼。把他今天所說的與十月十六日他關於這一問題所說的比較一下。或者，他經過熟思以後可得出另外一種結論，而不是像今天他所做的，犧牲了憲章，——聯合國的基本大法，他是一個法律防衛者，應該比任何其他更尊重這種法律。我們守衛這個基本大法，每當問題牽涉到破壞聯合國憲章原則時，即破壞我們的原則立場時，我們絕不迎合你們的意思。應該像地道一樣從兩頭接近起來。爲了能够正確的打通，就須彼此認真的誠實的同時互相迎合。我們要求尊重聯合國憲章的原則。在這種基礎上合作才是有效的，才能合乎共同的利益，才能適合一切大小國家的利益，才能適合所有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利益。

在聯合國大會上關於常設委員會的發言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三日

一、對於安全理事會的討伐

蘇聯代表團認為常設委員會的問題具有異常重大的政治意義，因為他牽動了聯合國整個組織的利益，牽動了聯合國的所有行動，甚至於牽動了聯合國當着一個捍衛與維持各民族和平及安全的國際機構的存在問題。我們把這一問題看作與安全理事會密切相關的問題，並把它看作與安全理事會在聯合國組織系統中所佔之地位，及安全理事會在聯合國行動中所起之作用，有密切關係的問題。我們在常設委員會的問題提出時，就不會有，也不會有什麼懷疑，建議成立常設委員會的發起人究竟追求的真實目的是什麼。今天杜爾斯在這一講台上的發言是在於再作一次企圖來說服我們，使我們相信建立常設委員會的目的，完全不是與安全理事會對立，完全不是我們所說的——格殺安全理事會。杜爾斯說：誰也沒有這樣的兇惡計劃和企圖。

我想繼續證明關於這一問題在實際上是怎麼一回事。有沒有這些計劃，有沒有這樣一些企圖來粉飾和遮掩這些計劃，以便不致造成一種印象，以為常設委員會之組織與建立是真正爲了與安全理事會對立。

無論對於蘇聯政府，或者對於蘇聯代表團，在馬歇爾國務卿於九月十七日開始提議建立常設委員會的時候，就毫不懷疑，他所談的，正是關於取消安全理事會，及剷除安全理事會基礎的問題，而且關於

這一點，在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週年紀念日，在莫斯科街上，高舉的諷刺畫，如杜爾斯今天在這裏所說的，也是符合幾千公里以外在這裏的莫斯科人所把握的，並正確轉告蘇聯社會的，關於這一問題的整個了解。

當建立常設委員會的問題提出的時候，蘇聯代表團就指出這一委員會預定建立之目的，是在於使這個新機關，按照它的權力和職責，都將在聯合國的組織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並且獲得了處理那些絕對屬於安全理事會權限以內的問題的權柄，因此，就代替了安全理事會，常設委員會之建立，便是對於安全理事會的討伐。

我想回憶一下馬歇爾在本年九月十七日的聲明。馬歇爾在大會上敘述他的關於常設委員會的見解，他稱它是關於和平與安全問題的常設委員會。我請大家特別注意這一稱謂。他說：這是關於和平與安全問題的常設委員會。他自己更繼續解釋道：在這個委員會的職權中也包括處理各種有損各國友誼關係的爭執與情勢。他又補充道：常設委員會之成立將鞏固和平解決爭端的機關，並可提供無限的機會，在這次大會結束以後，繼續研究聯合國所應解決的問題，假若後者希望有所成就，便應如此。

因此，不是偶然的，馬歇爾把常設委員會的問題和要求修改安全理事會的特別規則聯繫在一起，就是說要求改變一致協議的原則這個原則在安全理事會解決一切重要問題時是必須遵守的。以常設委員會代替安全理事會的企圖如此明顯，以致引起了許多代表懷疑建立常設委員會的合法性，而美國政府遂不得不馬上修改這一問題，並採取一切步驟，以便儘可能掩飾自己的真正目標。所以在十天以後，在大會上就出現了美國關於組織常設委員會的建議文獻，我們就看見「關於和平與安全的常設委員會」的標題已經去掉了「和平與安全」幾個字，於是這個久經考慮的設計好的關於和平與安全問題的常設委員會就

出乎意外的變成了普通形式的不指明和平與安全問題的很小的委員會了。

這種出乎意外的改變是怎樣解釋呢？紐約時報關於這種改變的動機會有如下的報導，該報載稱：「國務卿馬歇爾在大會中聲明：在他的提案中所提及的委員會並非預定為『干涉』安全理事會的職權或任何其他委員會的職權；但很多代表團顯然不相信這一點，因此很明顯的美國的提案，假若不如此修改，便不能獲得所需要的大會三分之二的票數。現在大家認為美國的提案雖遭蘇聯及其與國的堅決反對，已能獲得三分之二的票數了。」

美國報紙這種報導是什麼意思呢？它不多不少的正是意味着從這一委員會——「關於和平與安全問題的常設委員會」——的稱謂中去掉「和平與安全問題」幾個字，此種建議的提案人是企圖掩飾自己的真實目的，更多的搜羅一些票數，吸引那些相信這不是那一個關於和平與安全問題的委員會的代表，也就是相信這不是那個和現存的關於和平與安全問題的委員會相競爭的新委員會，第二個平行的委員會，也就是相信這不是那個和合法的安理事會競爭的委員會。假若具有其他的目的，而不是掩飾，那麼爲什麼需要從常設委員會的標題中去掉「和平與安全」幾個字？我認爲美國政府竟然用了這樣粗魯的形式，我簡直可以說這樣原始的形式，是由於沒有想到他應該顧及聯合國的輿論。常設委員會的提案人在慌忙製造常設委員會的時候，沒有想到這種標題將產生什麼印象，在這個標題中曾經指明這是關於和平與安全的委員會，但同時還有另外一個關於和平與安全問題的委員會——，那就是安理事會。但當反應不佳，當這種粗魯的，我簡直可以說，這種丘八的提案激動了大部份代表，並開始表現焦慮及懷疑時，就必須動員一切政治的油漆匠來重新油漆正面，塗染舊的招牌，在舊的房子上一個新招牌，並做出一種姿態好像這是從開始就考慮好了的。我認爲這一個改變名稱的全部歷史是一部醜史。這部歷史證明

了對於大會真無禮貌，當大會從美國代表馬歇爾國務卿的口中聽到了關於組織和平與安全問題的常設委員會的建議以後，但在文件中又很快把這幾個字去掉了。

因此，這一臨時委員會名稱之改變，取消了這幾個重要文字，就是爲了安慰焦慮的代表，因爲這些代表可能拒絕投三分之二的票來贊成這樣顯然要不得的美國提案。否則，便不能了解紐約報紙在我現在引用的一文中所表現的反響了。所以，我不驚奇杜爾斯今天的演說，又完全致力於再度證明這一機關對於安全理事會毫無競爭之意，這一提案的起草人並無任何惡劣計劃，對於他，實際說來，完全不能了解爲什麼現在要這樣爭吵。這是說的普通委員會，這樣的委員會很多，這樣的委員會時常建立，關於這樣的委員會任何人也沒鬧過，可能連提也沒有提過，但是在這裏蘇聯代表團竟然吵鬧起來，並開始攻擊起來。

這種關於常設委員會名稱的歷史已經自己說明了一切。很明顯的，這個委員會是在匆忙中粗製濫造起來的。

二、政治手腕

所有這些歷史，並不像美國代表今天在這裏所描寫的那樣簡單。這是一種預定的政治手腕。不過這不是唯一的，也不是最重要的手腕。更加嚴重的手腕是企圖把常設委員會當着輔助機關，以便這種與憲章抵觸的成立常設委員會的決定，可得憲章第二十二條之掩護，因爲這一條會規定授權大會可成立爲實施大會職權而認爲必需之輔助機關。

因此，整個問題又轉到另一方面。你們向我們說：憲章第二十二條准許組織輔助機關。所以我們成

立這個委員會，這就是輔助機關。開始企圖把蘇聯的立場描寫得這樣，好像蘇聯代表團是不認大會建立輔助機關之權。我們已經推翻了這種論斷，並指出這種論斷是無根據的。我們指出：要證明這是輔助機關，只有來分析這一委員會的職權。杜爾斯在這裏曾經引舉我的關於輔助機關的定義。這自然不壞，他採用了我們的定義，但是怎樣在實際中運用這個定義呢？假若我們下了定義；這一種機關必須，應該，並可能輔助大會，只有在這些限度內，才能建立它的職權，那末就要做出以下的邏輯步驟，來看一看第一委員會多數決議所畀予的，及今天提交我們批准的常設委員會那些職權，是否符合輔助機關這一定義，及奠定這一定義之基礎的那個原則。

分析這一委員會的職權，證明了這不是輔助機關。蘇聯代表團不能同意這是一個輔助機關。美國代表斷定這一機關的一切職權只在於準備材料並把這些材料連同自己之結論提交大會。他們企圖把這種準備的性質付予常設委員會，並且說到考查各種與維持國際和平及安全有關的事實。

但是不管一切巧辨與手腕，美國代表不能不承認常設委員會成立之目的，是如他們所說的，在於補償安全理事會不足的行動。杜爾斯發揮自己的補償理論，會引了一個很標準的例子。他說：假若一隻手癱瘓了，那麼怎樣辦呢？難道也命令癱瘓另一隻手嗎？不是的，對於另一隻手，對於沒有癱瘓的健康的手，強有力的一隻手應給以補充工作。這一隻手要完成自己的工作，並扭負另一隻癱瘓手的工作。你們想一想這個補償理論把它適用到我們的組織上，那末得到什麼呢？所得到的是這樣一種情況：癱瘓的機關——就是安全理事會，它已軟弱無力不能行動，聯合國對於它已不能再忍受；必須建立另一機關代替這一機構，以便另一機構能够補償聯合國在全部所受之損失。假若左手癱瘓了，那就應該加緊右手的工作。

三、美國的補償法則

美國提案要求建立一個新機關，以執行安全理事會所不能執行的工作。這個機關就是常設委員會。這就是常設委員會乃是一種機關，將執行安全理事會所不能執行的工作。這就是美國的補償法則。這就是說把常設委員會與安全理事會擺在一個水準上。這就是說常設委員會應該代替安全理事會。大家都知道——這已在憲章第七條寫明——安全理事會是聯合國的主要機構。假若常設委員會是要用來代替主要機關，因而也就是佔着主要機關的地位，就是說自己變成了主要機關，在這種場合，怎麼還能稱它爲輔助機關呢？難道還不明白嗎？補償論的作者已經推翻了自己認爲常設委員會是輔助機關的一切理由與見解。

有些人說，當一個作坊關門了（在委員會中曾有人引舉這種例子），就要開闢另一個作坊。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又是意味着在安全理事會與常設委員會之間並無競爭，好像伊瓦特所斷定的，他在這一問題上緊決的追隨杜爾斯，雖然發明的專利權在他們之間是可以平均分配的。蕭克羅斯及其他若干代表，包括中國代表在內，也是這樣斷定。這些代表支持美國的提案，唱着和諧的調子，吹着一個笛子，斷定沒有任何競爭。他們說：當一個作坊關門了，一切都走進另一個作坊裏去了。大概，伊瓦特已準備埋葬安全理事會。但是假若安全理事會已經停止存在，變爲關閉的作坊，那末依照他的意見，就產生開辦新作坊的必需。現已開辦了常設委員會這樣的新「作坊」。難道這不是證明常設委員會，就是建立來代替安全理事會的機關嗎？

四、常設委員會的特權

這在暫時還是譬喻的論斷，但是實際上問題怎麼樣呢？如我在以後所企圖證明的，實際上問題是這樣，那些依照決議草案屬於常設委員會的一切職權，自然完全不能與那些付予普通委員會和真正輔助機關的有限職權相此擬。這自然已被若干代表，例如法國代表所看出的。巴羅第在第一委員會討論這一問題時，曾聲稱：無能如何不能談到擴大大會的權力或由大會將其權力委託其他機關。他關於這一點聲明道：依照法國代表團的意見這些程序的任何一個都是根據很可懷疑的法律。他表示懷疑大會，一般的有無權力將自己的權力委託給自己的附屬機關。這些懷疑是完全合法的。現在問題是這樣，大會有權把它的由憲章第十一條，第十二條，第十三條及第十四條所規定的權力都轉給其他某一機關。

法國代表很公正的懷疑大會有無此項權力。這樣的懷疑是完全合法的，因為大會所分得某些權力，是按照憲章而獲得的，除權力以外，它還有一定的保證，這對於任何輔助機關，假若憲章沒有畀予它，都不會有的。

而且很自然的，那些屬於大會的特權是不能轉給任何其他機關的。假若說，聯合國某一會員國，例如蘇聯，決定向大會提出某種提案，例如建議採取一切步驟反對新戰爭的宣傳與挑撥者。但是我們是向大會提出，而不是向任何甚至未經憲章規定的委員會提出。若果大會不聽取我們的建議，而把它轉給常設委員會。我們不是在這些條件下加入聯合國的，沒有一個自尊的國家能同意以這樣條件參加聯合國，就是它向大會的建議，甚至不能得大會的傾聽，簡單就轉給某一常設委員會，而後者竟受委託「研究和提供報告。」我們在這裏都是平等的聯合國會員，應該參加決定某一問題是否應由大會直接解決，還是

轉給某一委員會作預先的商討。沒有我們的參加，任何人都沒有權作主。我們不能同意其他的程序，在聯合國憲章還有效的時候，我們是不能同意的。

你想建立一個未經憲章規定的新機關嗎？在這種場合，就請依照憲章規定的程序提出修改憲章。提出重審憲章的問題，加入新的規則。那時，我們還要看一看，這些新規則能不能實施，它們能不能獲得大會三分之二多數的贊成。能不能獲得包括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同意的三分之二多數的批准。請你採取正常的合法的照憲章規定的辦法來修改憲章，假若你們認為必須修改這個憲章。但是你們無權破壞憲章，不能不遵守聯合國憲章就加入新的處理問題，決定問題的新規則，以及各種不同的建設，因為我們是國際組織，這裏不能有什麼命令或指揮，在這裏的基礎應該是協議，自願的執行決定。尊重這種原則，甚至於三分之二票的多數決定也不能動搖這種原則。

所以十分自然和正確的，巴羅第在第一委員會聲稱：所有這種歷史，若根據憲章觀點，若從聯合國的法律觀點說話，都是有疑問的。我們不能同意他這樣不堅決的談這一問題。不過這是他的事情。我在這裏也不擬予以批評。

在這方面所提出的意見都值得注意。常設委員會的贊助者提出一種意見，認為建立常設委員會可以使大會在會期以外繼續工作。這種意思無條件的是由馬歇爾領導的，他在九月十七日的報告中聲明：「建立常設委員會可使大會在下半年開會以前，由一切會員參加工作。這就鞏固了和平解決爭端的機關，並在基本上使聯合國所有會員都對這種解決担負責任」。

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說：企圖把常設委員會變為第二個大會，或者如現在所說的，變成所謂小型大會。大家非常了解誰擁護常設委員會，以及常設委員會之建立所追求的下一目的，就是想經過這一

委員會，使大會的會議與工作變成不斷的，經常的。這種企圖是由下述辦法予以達成，就是對於大會又組成一個新機關，在常設委員會的名義下繼續行使職權，一如大會，自然稍加限制。若無任何限制在這裏是通不過的。這都是一樣，是半裸着身子到這裏來的。以後我告訴你們這些限制有什麼價值。在實際上，這些限制反有很少的價值。

五、論大會建議的道德力量

我乘機會說兩句話，回答杜爾斯的聲明謂蘇聯代表團認為大會的建議並無任何意義。蘇聯代表團從來就沒有說過這句話。我們知道建議具有意義。我們曾經說過別的，指出那些常常提出的建議都與聯合國組織原則及憲章的精神相抵觸，在實際上都無道德意義。我們可以舉出希臘問題的建議為例子。差不多在整整一個月中，我們已經證明沒有任何道德上的根據責備巴爾幹三個國家——希臘的北邊鄰國——，說她們有罪。自然在直接形式中，美國代表沒有能夠通過這些譴責，但在間接形式中，在掩飾的形式中，藉賴英法兩國的修正，她已相當達到目的了。

能否斷定這些建議能具有某種道德力量呢？

不能夠，因為實際上這些建議並無任何道德上的證據。我們在研討所謂希臘問題時，已經斷定了這一點。我們將繼續向全世界斷定這些建議沒有道德力量，雖然它們具有形式上的力量。

我們不是說一切建議都無道德力量。相反的，我們斷定若干決議，例如反對戰爭宣傳的決議，雖與蘇聯原來提案不同，但仍有道德力量。如所週知，這個決議已經包括了蘇聯建議的理想。這個決議已被大會一致贊成。因為這個決議案既然包括了蘇聯代表團的理想——打擊戰爭宣傳，所以我們不管美國代

表團如何號召反對蘇聯的決議案，也不管這個決議案如何不充實，不澈底，仍然投票贊成這個決議案，並且知道它有道德力量。杜爾斯先生根據自己關於大會決議案的道德力量及價值的論斷似應不向我和蘇聯代表團說話，而應首向自己說話；因為這個決議案也反對他，並且應向「紐約時報」一類報紙說話，後者在上述決議案通過之次日就毫不忌憚的大聲急呼說這個決議破壞憲章，說它更將促起紛爭，而不是消滅爭端。因此該報就公開號召不要執行大會決議案。該報——何止一個報——批判了反對戰爭販子的決議案，公開明白的聲明這個決議已無道德價值及意義。

杜爾斯先生，你爲什麼現在又把張冠李戴。根據什麼你誣栽我們蘇聯代表團，說我們似乎否認大會所通過的一切決議和決定的道德價值？這是不對的，這不是我們說的。

杜爾斯總是喜歡爭論，把不是對手所說的話硬賴在對手方面。我們過去和現在都斷定有一些決議具有道德的和形式的力量，但是大會是一個國際工具，自然最願有道德的力量，和精神的威權。因此我們就擁護那些我們認爲正確的建議，反對那些我們認爲不正確的建議。雖然我們仍然是少數，但少數並非始終不正確，因爲那些在今天是少數，可能明天就成了多數。而我們毫不懷疑假若我們今天是少數，要求戰爭販子在實際上應被譴責與制止，那末，明天我們便可以成爲多數。民衆要求採取具體的，而不是紙上的反對新戰爭挑撥者的步驟。

杜爾斯又企圖責備我們不澈底。他斷定我們好像是反對大會討論政治問題。這簡直是明顯的撒謊。我們會經反對強迫大會討論意大利和約或韓國問題這樣的問題，因爲這些問題不屬於大會權限，也不適合憲章的要求。

在這裏，沒有任何的矛盾，也沒有什麼不澈底。重審意大利和約問題與聯合國並無任何關係，因爲

在聯合國憲章中已經規定了處理這些問題的另一種程序。此外，更不能把這個問題轉給對意戰爭及對意和約毫無關係的許多國家處理。與聯合國權限有關的經濟問題自屬另一回事。這些問題美國代表團理應提交聯合國處理，但洽洽又沒有照這樣做，例如關於馬歇爾計劃。

美國代表會在這裏向我們說：「關於道德與理智說服的強大力量。」他說似乎在聯合國組織中並無任何機械的表決。但是還讓我們坦白的說吧。難道他們不記得選舉烏克蘭共和國到安全理事會的全部歷史嗎？該國何在今天，經過十二次無結果投票以後，才算當選。但是爲什麼烏克蘭被十二次提名投票，而不能當選呢？從那時以後又有什麼變更呢？爲什麼你們要玩這套把戲呢？

在這以後；你們還向我們說：沒有自動的表決。不是的，這種表決是有的啊？有許多事實可以向全世界證明：自動主義，外交的勾結在許多場合是存在的。這種自動的多數已經明顯。在許多場合，我們在這裏既沒有看見道德的，也沒有看見智慧的說服。你們又向我們說：有許多開始提出的決議，以後又被其他的決議代替了，這又是什麼自動的表決呢？但是，第一，大家知道這也是一種外交手腕。提出一種決議案，以便產生某一種壓力，然後再經過讓步，來達到自己的真正要求。例如關於希臘問題的決議案便是如此，開始提出一種威脅性的決議，以後又通過另一個決議，而這另一個決議，又是根據預先商量好的意見，由自己方面的人提出來的，這就是會議室以外的外交。

我應該轉過來談一談蕭克羅斯在第一委員會中的聲明，他企圖證明常設委員會乃是一個真正的輔助機關，並且認爲在這裏決沒有任何破壞憲章的地方，他引證了憲章第二十二條，但並不能說服任何人，因爲簡單的背誦第二十二條的條文，這還不能算是證明，他又向我們說：大會曾經組織各種委員會，例如巴勒斯坦委員會，爲什麼它不能建立常設委員會呢？我關於這一點已經說過了，現在再告訴你：巴勒

斯坦委員會完全是在另一種情況下建立的。

巴勒斯坦委員會之建立，是由於聯合王國政府向聯合國祕書長請求把這個問題提到大會議事程上，因為英國人不願意繼續托管巴勒斯坦，憲章第十條曾經規定這樣的可能性，祕書長就把這個問題提到爲此而召集的特別大會上來處理，這一次大會決定了原則，並在憲章範圍以內，按照憲章規定，通過了相當的建議。但是難道這就是憲章第三十四條所說的問題嗎？難這樣是該條所規定的調查情勢與爭端嗎？自然不是的，這與三十四條所規定的一點也不相似。

又說大會有權任命任何委員會從事調查，我們認爲這種論斷又是不對的，大會有權任命委員會從事研究，但決不是從事調查，所以在憲章中甚至於採用了不同的字——“Study”和“Investigate”。蕭克羅斯在第一委員會中曾經注意到這種區別，他說依他的意見，一切轉給常設委員會從事研究的問題都帶着學院性質，例如什麼叫做侵略等問題。當我們按照憲章第三十四條的意見說到調查時，我們是指着調查那些足以威脅和平與安全的事件，事實，衝突和爭端。

但是在這一決議案中是說的什麼呢？難道不是說：這一常設委員會已受權從事調查，並不在彼認爲適當與必要時，任命調查委員會嗎？調查些什麼問題呢？對於這個問題——關於調查什麼問題——甚至於沒有在決議中提出來，因爲在決議草案第二次中已經說到此一委員會有權檢討任何問題，就是檢討提交大會的有關任何爭執，任何情勢的問題，而這些問題乃是根據憲章第十一條第二項，及憲章第十四條，第三十五條的規定，由聯合國某一會員國提到大會議事日程上的。

假若你注意到第三十四條，那末，便可以看到安全理事會只能處理那些足以招致國際摩擦或引起爭執的問題。這是一個很重要的限制。它可以從事調查，但只是爲了決定某一爭端或情勢是否威脅國際和

平與安全。這又是第二個重要限制。你們可以看到安全理事會的職權受到怎樣的限制。請你們把第二節「B」項及「E」項中所敘述的職權與這些職權放在一起，再來看一看，誰的職權廣大些，那些職權廣大些，——是那些按照憲章第三十四條授予安全理事會調查情勢與爭端的職權廣大些呢？還是那些由決議草案第二節「B」項或第二節「E」項，或者，更好一點說，兩者合起來現在授予常設委員會的職權廣大些呢？喂，各位先生們，假若你們已被傾向和偏見弄瞎了眼睛，想着無論如何要證明，這是白的，而不是黑的，或者這是綠的，而不是褐色的，那末，我們就沒有共同的話可說了。我們就不能夠協議了。但是假若你們沒有偏見，還能像法律家，或者甚至於像法律學校的簡單學童一樣，把這些條文比較一下，那末你們就可以看出它們彼此的區別，正如巴黎鐵塔與任何普通的桅桿假牆不同一樣啊。所以我們說，不能同意建立一個具有這些根本上改變了聯合國機構的職權的委員會。

假若你把聖水灑在它上面，說這是輔助機關，這是什麼也不能改變的。有許多獵人不以獵物自己的名字稱呼獵物，以便這樣可以更容易好些把獵得的東西送到消費者面前。我們抱着另一種意見。我們看出這些條文予常設委員會如此重要的意義，若再稱它為輔助機關，這不反是離開了何謂輔助機關的觀念，而且與公認的定義也是衝突的。我們蘇聯代表團是不能同意這一點的。

六、關於常設委員會的歷史參考

我想提醒大家，關於常設委員會這一段歷史已有它的過去。大家知道關於常設委員會問題，並不是在今天產生的，而且美國代表也不能在這方面同荷蘭爭先，如還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間就建議由十八個會員國組成這樣的委員會，不過所有的職權遠較現在給予它的職權要小。在這裏還是那些同樣的說法，

甚至於同樣的稱謂——常設委員會。經過兩年以後美國的專家從荷蘭的文件中取得了這個稱呼，又補充了「關於和平與安全問題」的幾個字，而且不很成功。

但是當時荷蘭代表團請求完全把這個問題取消，不要討論，因為所有的代表都指出建立這種機關是直接牽涉安全理事會的特權。

爲什麼在那時，一切代表都一致的承認常設委員會之建立，是牽涉安全理事會的職權，而現在又要求否認這一點呢？難道這些職權已經成了另一種嗎？

或者你們現在給予這個委員會的職權，是比荷蘭代表團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提出這一個建議，供給準備委員會的執行委員會審查時，所想給它的職權還要小些嗎？

自然不是的，當時那個委員會的職權還較微小，但是準備委員會的全體委員都承認成立常設委員會就是破壞憲章，爲什麼現在提議建立一個委員會，具有更負責任更重要的職權，反而否認這是破壞安全理事會的特權呢？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或者是我們變了，或者是我們的周圍有什麼變了。是的，各位先生，我們周圍的許多事情已經變了，而且從我們這裏發生的許多事情也變了。

七、美國的「新路線」與常設委員會

這些變化是發生在各國的國際地位中，以及若干國家現在決定執行的對外政策中，不顧及到其他國家，也不顧及到在雅爾達，德黑蘭，與波茨坦所奠定的，以及在鄧巴頓橡園和舊金山會議中所批准的協調行動的原則，這個原則已經寫在我們的憲章中，我們現在擁護這個原則，並且要求一切願意繼續與聯合國共同工作的國家，都來擁護這個原則，所有這些，現在都遭受了修改，甚至於更甚於修改，這種原

則已經棄若廢物，已經丟在歷史的廢紙堆中。荷蘭的代表團曾經在二年以前自己請求取消這個問題，大概那時他相信他所提出的建議實在是破壞了安全理事會的特權，因此這個建議就被撤銷了。

但是當着一切情況都改變了，這個蒙了灰塵的工具又從檔案中被拿出來了。把它迅速的恢復，加以革新，並多少在形式上予以改變。但是一切原則上的東西都仍舊一樣把它拿到這裏來向大會建議通過，如像一劑萬應靈藥，來醫治這個不幸，來醫治協議的原則，來醫治否決權。在當時荷蘭代表團僅使常設委員會起很小的作用，它的成份也祇限於十八個會員國，可是現在設計的委員會的成份，已有五十七個會員國了。

許多人向我們說：它不決定問題，它僅僅建議。但是大會又決定什麼呢？難道它主要的也不是建議嗎？它向各個組織建議，常設委員會又向大會建議，以便和它一起，再向各個組織建議，這在實質上什麼也沒有改變，可是在當時，在一九四五年，這個建議還是被推翻了，現在相反的，這個建議又被接受，認為是必需的重要的建議，接受這個建議自然不是偶然的，接受這個建議正是由於目下這個建議適合時代的要求，就是說這個建議適合若干國家首先是美國以及支持美國的國家——英國，法國，中國——的對外政策的利益。

這是什麼對外政策呢？這就是那一種不用協調辦法推行的，而用壓迫的辦法，以及利用自己的財力方法來推行的對外政策。可是這種方法是與不用任何經濟援助於政治目的的原則相抵觸的。在這種對外政策下，就打算使用命令壓迫的方法，以及利用自己的經濟財力和自己的組織技術與軍事力量優於其他較弱的和抵抗外來壓力較差的國家，所以推行這種對外政策的國家，不僅不想鞏固聯合國，作為一個國際合作的機關，而且要削弱這種組織，因為在相當的情況下，它可以成爲推行命令與擴張計劃的阻礙。

聯合國對於這些國家實在是一種阻礙，這對於像安全理事會這樣的機關，尤其應該如此，這個機關由於在安全理事會現行的程序規則，以及五個常任理事國一致協議的原則，至今還未要變成，祇要這個原則有效也不致於變成，美國國務院的一個簡單的辦事處。國際合作的理想在這種情況下就退居次要地位，而且日益暗淡和變成灰色了。美國所宣佈的對外政策新路線，是向着放棄這個理想前進。若干美國政治家公開的說國際合作在戰時是必需的，那時需要抵抗危險的敵人，但在和平時期，這種危險直接已無威脅，這種合作已無必要。因為這種合作要求相互的讓步，尊重彼此的利益，並要求限制自己的自私企圖。

美國對外政策的著名策動者，如杜爾斯，已經公開號召放棄「德黑蘭，雅爾達與波茨坦的制度」。在第一委員會會議上杜爾斯聲稱：

「在莫斯科，國務卿馬歇爾稱：『不再回到雅爾達。』這種聲明——杜爾斯說——繼續有效，我知道當我說我們不回到德黑蘭，雅爾達與波茨坦制度，我是代表美國人民極大多數的觀點，這種制度曾經是軍事的必需所引起的；但當和平時期，我們想澈底研究正義與合法的原則，並利用世界輿論的道德裁判，經過聯合國最重要的大會來影響這些問題。』」

在這一段引文中，我認爲必須強調指出最具進攻性的就是號召不再回到德黑蘭，雅爾達，與波茨坦制度。杜爾斯企圖解釋他這種破壞國際合作與充滿侵略情緒的破產聲明，說他所說的話不過指出美國對外政策的領導者現在反對那些在德黑蘭，雅爾達，與波茨坦締結的祕密協定而已。但這是一種虛偽的聲明，因爲大家都知道美國並未稍微放棄祕密協定，目下這樣的協定還在聯合國背後和旁邊準備着及發生起來。關於這一點我又要引舉杜魯門主義，馬歇爾計劃，或英美關於德國的協定等等。難道這不是由於

祕密談判而準備的協定嗎？然後又由法國加入，因為他已被更强的伴侶擠到牆壁上。這和德黑蘭，雅爾達，及波茨坦時代相較，情況的變化只在於代替過去三強——美，英，蘇聯——協議，前兩強在戰後兩年甯願自己協議，企圖把蘇聯放在既成事實的面前。

「不再回到德黑蘭，雅爾達，波茨坦」……這是拒絕國際合作的口號，因為正是在德黑蘭，雅爾達與波茨坦才在最嚴重的年代，當人類遭遇空前未有的最嚴重戰爭時，造成了應該合作的全世界歷史上的模範。

八、國際合作與一致協議原則

當聯合國建立時，極大多數國家的智慧都抱著一種理想，想找出一種國際合作的形式，拯救人類避免過去時常落在他們頭上的一切最嚴重的後果與恐怖，當時就找到了一條道路。這首先就是在安全理事會中所規定的一致協議原則，它的發起人就是衆所週知的美國政府，尤其是逝世的羅斯福總統。事實上在雅爾達由美國政府代表及英國，蘇聯代表所參加擬定的文件，就會經指出；在安全理事會內關於一致協議原則的兩個重要因素。

「第一，在於——在這個聲明說——爲了保持普遍和平就必需常任理事國的一致協議。

第二，在於美國人民特別重要的就是對於所有聯合國會員都必須顧到公正。

調和這兩個主要的因素——便是我們的任務。我們認爲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五日提交斯大林大元帥與邱吉爾首相的建議已經給了理智的公正的決定，已經滿意的聯合了這兩個主要見解。」

這便是當時的美國總統羅斯福所寫的。難道在那個聲明的四個月以後，由四個邀請國代表團具名在

舊金山所作之聲明，沒有強調這個原則是聯合國全部組織的基礎嗎？我只請你們回憶一下這些歷史的文獻，以便你們完全清楚一致協議原則對於像聯合國這樣的國際組織之生存與能力所具的偉大意義，這種原則乃是安全理事會行動的基礎，現在常設委員會之建立所予安全理事會之主要打擊，也就是反對一致協議原則。

當時美國國務卿斯退丁紐斯的論斷是與現任美國國務卿馬歇爾的論斷不同的。當時的政府駁斥對於一致協議原則的批評，認為這種批評之產生是因爲忘了「聯合國並非聯邦，也不是世界國家，主權會員國家的表決程序不能按照美國國會表決程序同一基礎看待。」當由代替國務卿格魯斷定在舊金山通過的當着鄧巴頓橡園會議之提案一部份的安全理事會表決程序規則，乃是國際組織的基礎。當時的美國政府認為在這些表決規則中，並無什麼足以妨礙任何國家提請安全理事會注意該國認為足以引起國際磨擦，或激起爭論的任何爭執或任何情況。

這就是當時美國現實主義的領導者對於安全理事會及所謂否決權的健全看法，並予當時規定的國際合作制度以應有的重視。當時的美國對外政策領導者看到了必須建立全權的安全理事會，依賴一致協議之原則，制止衝突，保證行動之協調，並批准一致協議的規則。當時所謂常設委員會問題是不能打算獲得成功的。

九、反對破壞憲章

今天這個問題又發生，是因爲另外一種時代來到了。各位先生們，新時代，據說是要新歌詞的。我們蘇聯並不想唱這些歌詞。我們不願唱一種歌詞，足以引起聯合國組織的基礎動搖。相反的，我們認為

應該盡全力鞏固聯合國組織的威權，昇以最大的力量，因為沒有這個就要重複國聯的悲慘記憶的教訓。但爲達到此目的僅賴聯合國所存的一種手段是不够的。應該使這個組織具有道德的力量，爲此首先就必須尊重聯合國憲章，尊重偉大的原則，尊重協議，對於最重要的問題必須共同處理，彼此在背後不要採取任何辦法，也不要彼此互相反對。我們蘇聯現在和將來都要佔在這個原則上。

所以我們要投票反對建立常設委員會，因爲這是一個危險的違法的舉動，其所以危險就是因爲它對我們團結一致及聯合國的整個將來都充滿了嚴重後果，其所以違法，就是因爲它破壞憲章，而我們是在這種憲章下面簽了字，並且莊嚴的承諾遵守它。我們堅決的向聯合國所有會員號召遵守憲章，不要破壞憲章，尊重憲章，尊重憲章的原則，不但尊重多數，而且要尊重少數，因爲在我們的組織中嚴格的說起來，並無多數和少數，有的是主權平等的國家。它們共同從事於各民族和平與安全攸關的重要事業。

這就是我們蘇聯代表團所依據的理由，並代表蘇聯聲明：我們不同意建立這樣的機關，因爲它破壞憲章及其原則，而且對鞏固聯合國組織中的合作是有危險的有害的。我們將投票反對這種決定。假若你們還是通過它——我們想你們終是要通過，因爲第一委員會既已通過了，而你們又有團結好的多數，——那末，蘇聯就不參加這一個機關。

在美蘇友好協會慶祝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週年

宴會上的演說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八日

主席先生，各位先生，各位朋友，各位同志！

昨天柏爾先生請我準備今天的書面演說詞。我已經做了，但我應將這一篇演說詞放在一邊，因為我今天在這裏的感觸是不能由昨天所寫的話來表達的（鼓掌）。首先我想對美蘇友好協會的朋友以及組織今天會議的我的朋友們表示很大的高興，滿意與感謝，這個會議是很難忘記的。今天晚上是慶祝偉大十月社會主義革命三十週年，關於這一點，我們能多少回憶一下我們的過去，那就好了。我只想關於這一點簡單的說幾句，但是現在非常要求我們不要忘了過去。

在實際上，三十年以前，當年青的蘇維埃共和國降生的時候，那時在良善的美國桌子上連一枝蠟燭也沒有點，更不必說三十枝，像你們今天所點的，依照你們的風俗來慶祝蘇維埃政權降生的三十週年，——那時起來反對蘇聯的，也像目下一樣，都是些兇惡的力量。他們說，第一，蘇維埃政權之降生是不合法的，因為——實際上在那裏，在什麼歷史書中曾經寫着可以在俄羅斯產生蘇維埃政權，即工農政權呢？這樣的書是沒有的，可是蘇維埃政權還是產生了。兇惡的力量怎麼辦呢？他們只有說：

——好吧，假若產生了，就讓它去，但是橫豎從這裏什麼也不會有結果的（笑）我們來注視着，這一個不合法產生的嬰兒怎樣長起來。

自然，其中每一個說了這些話的人都等待這個孩子很快就毀壞了自己的頸子（笑）。不僅如此，每一個這樣想的人都在那裏禱告：願上帝快些這樣做吧。（笑）但是並沒有發生這樣事情。這個小孩子一天一天的長起來，長得肥滿健康，長得兩頰紅潤（笑）並逐漸開始表現自己的青年力量。當時所有在這個小孩子的搖籃旁邊呢過他的降生的人都了解事情已經開始嚴重起來，經過若干時候，他們便決定阻止這一個孩子的生長（笑）。集合了十四個國家的大同盟。自然那裏會有一切老的大家認識的面孔。不久以前我在美國出版的「基督教徒」雜誌上讀到一篇不長的談論D. F. 杜爾斯的文章。大概杜爾斯在美國是很多的，不過D. F. 杜爾斯似乎只有一個。我讀過這篇文章才知道正是D. F. 杜爾斯在一九一九年就是封鎖當時的蘇維埃俄羅斯的計劃起草人。這已經是不折不扣的三十年以前的事了。奇怪不奇怪，D. F. 杜爾斯在現在還是表現同樣的情緒，來證明他的性質的徹底性與經常性（笑）。

但當D. F. 杜爾斯打算封鎖蘇維埃俄羅斯的時候，他並不是一個人。和他同黨的還有其他的戰爭挑撥者羣中的「英雄」。這就是W. 邱吉爾（笑），——這個集團是不大的，可是據說是很顯著的。（笑）。但無論如何，這些先生們已能吸引不少不少的十四個國家。因此我們在蘇聯領土內（當時還不是聯盟而是俄羅斯共和國）就看到外國干涉者的軍隊。又有那一個不在內呢：英國人，法國人，捷克人，當時屬於這一類的國家等等，甚至於連那些在辭典中很難找出的國家也在內。今天在這裏我們應該十分坦白的十分可惜的指出：在這些干涉軍隊中也有美國軍隊，他們曾經到過海參崴，曾經到過摩爾曼斯克，自然他們在那裏，並不是爲了跳狐步舞啊（笑）。我們關於這一點是記得很牢的，我想一切忠實的美國人——我們的朋友，關於這一點也記得很好。我想無論我們和他們都不允許任何時候在我們的土地上有了美國軍隊（鼓掌）。自然，對於英國的軍隊我也應該表示這樣的希望。不過現在我不這樣做，把這件事留

到倫敦再說罷。不過現在關於這一點我應提醒大家，以便對歷史給以應有的認識，尤其因為現在戴高樂已在呼喊英國美國共同組織十字軍的征討——法國認為她在這方面也是有用的——反對蘇聯的時候。

因此現在就可以說，對於這些經常的威脅，經常的壓迫，對於這種所謂對外強硬政策，我們不是今天才遇到。很早就恐嚇過我們，壓迫，威逼，試驗執行強硬政策。但是結果怎麼樣呢？——不過是嚴重的酒醉後的頭痛而已（笑）。在一九一九年——一九二〇年，十四國的征討結果是破產了。可是當時對於蘇聯的敵人比較現在有利得多。當時在蘇維埃俄羅斯正進行着內戰。當時有沙皇的將軍——鄧尼金，卡列金，高爾加克，與烏蘭蓋爾——從內部進攻俄羅斯。需要不需要再指出其他的將軍呢？人們說在夜裏不要提起惡鬼（笑）。但是事實是他們究竟代表一種軍事力量。他們曾經有挑選的軍官營，軍官團與軍官師。他們會有有經驗的指揮官和參謀。會有精良的武器與配備。當時還沒有租借法案，不過供給他們的武器裝備，甚至比較租借法案供給的還要好些。最後，還有一部份人民幫助他們：如資本案，貴族地主，官吏，及其他許多無固定機業的人們。這就是說外國干涉者當時的情況是很順利的，因為他們在俄國內部已有若干支點，以與蘇維埃政府及蘇維埃制度鬥爭。但是他們還是爆炸了瓦解了，因為人民——我國的工人農民知道了地主資本家的政權是什麼意思，他們親密的團結了自己的隊伍，來反對舊的統治，來反對凱倫斯基的統治，後者會想保持與鞏固地主與資本家的統治。俄國工農的團結力量打垮了將軍們及其幫助者之抵抗。他們也打垮了那些幫助俄國將軍的外國干涉者，而且勝利了。這是在蘇聯人民偉大領袖，列寧及其戰友，他的偉大學生與我們今天的導師斯大林領導之下勝利的（熱烈鼓掌）。

這就是當時各國，其中包括胡佛領導的美國，對於蘇俄所推行的所謂強硬政策的結果。

這個小孩子已經長大了。到了一九三三年，已經表明對於美國及其他國家，放棄過去美國對於俄國

所欲推行的強硬政策，而與她建立了外交關係是更加有利得多。這便是一九三三年的事情，今天我們很高興來慶祝這一個著名事件的十四週年（鼓掌）恢復外交關係自然是一個巨大的事件。無疑的，這個事件之實現是違背美國反動分子的願望的。所以他們就在現在也還是企圖破壞這種外交關係，例如赫爾斯及其他類似他的反動分子便是如此。但是他們沒有達到這個目的，我們相信是不會達到的（鼓掌）。

根據什麼我說這些分子想破壞外交關係及美國與蘇聯一般的友善關係呢？——這全是根據日下在美國所發生的一切。你們自然知道這一點。假若我在這裏又說到這一點，那僅僅是因為我相信在你們的心中可以找到我以後所說的活生生的反響（鼓掌）。

我們蘇聯怎樣看美國目下的對外政策呢？我們怎樣了解它？我們了解它，簡單的說（所以要簡單的說是因為現在已經遲了，已經是夜間十一點鐘了）就是一種破壞蘇聯及新民主國家和美國及與美國走一條路的西方國家合作的政策。我們現在來看一看最近杜爾斯代表美國政府在聯合國所發表的演說。假若杜爾斯只是代表他自己說話，那我就不麻煩你們注意，來談這一位先生了。我的翻譯者譯成「談這一位紳士」，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紳士，還是簡單的稱他爲密斯脫吧。我就這樣稱呼他。這一位密斯脫聲明：「不再回到德黑蘭，雅爾達，與波茨坦的制度」。這把我們驚倒了。因為德黑蘭，雅爾達，波茨坦是三強反對法西斯主義擁護民主的戰鬥合作的偉大的歷史榜樣（鼓掌）。德黑蘭——這就是一九四三年十二月。這個時候法西斯德國還有很大的力量，當時可怕的血腥的烏雲——希特勒德國，還籠罩着整個世界與歐洲。當時三強——美，英，蘇——的三個領袖不是簡單的簽了協定，而且莊嚴的作了偉大誓辭，要團結他們的戰鬥力量，以便瓦解可怕的，殘酷的，無情的，血腥的敵人，以便粉碎德國，永遠再不要令她爬起來（鼓掌），以便希特勒德國以及任何法西斯主義，無論逃到什麼地方，永遠再不能威脅愛好和平

的人民。

在雅爾達更加確定和鞏固了戰鬥聯盟。以後三強的領袖又在波茨坦會了面。希特勒的德國已經躺在勝利的民主國家的腳下了。這就德黑蘭，雅爾達與波茨坦的意義，而為美國在聯合國大會之代表團的代表，也就是美國政府的代表杜爾斯所聲明不再回到的。杜爾斯這種聲明就是拒絕合作。這就是意味着企圖重復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世界所已走的道路，由於這種道路之結果，世界上就白生了第二次大戰。第二次世界大戰並非突然而生。它是那些侵略國家準備的結果。這首先就是希特勒德國，它磨尖它的牙齒反對蘇聯，幻想消滅蘇聯，使她永遠不能起來。這在一九三九——一九四一年很早以前便是如此。這在希特勒統治初生產的時候就是如此。難道我們不記得希特勒是怎樣取得政權的嗎？難道我們不記得誰幫助他嗎？誰鼓勵了他，誰以友誼的姿態拍他的肩膀，誰安慰自己並秘密高興希特勒主義的成功？難道不是慕尼黑派嗎？難道不是張伯倫與達拉第？難道不是他們幫助希特勒壯大他的力量，並且自慰，以為他可以實現他們的永久的幻想——向東征討。自然，是這樣的。希特勒打算向東方征討了。於是過去那些西方國家，現在還是西方國家，自稱為民主國家，就幫助他，鼓勵他趨向東方。這一個精神病者，這一個瘋狂的伍長想像他就是拿破崙。但是斯大林大元帥還是斯大林格勒戰役之前夜，就指出希特勒之像拿破崙就好如小貓像一隻獅子一樣（笑）。希特勒曾經說，給我十年，我就可以把德國變成你們所不能認識的國家。他的確已經把德國變了一個完全不可認識的國家（笑）。可是這是你們和我們的大砲，飛機做的事，已經把德國變成廢墟了。

也許我們錯了嗎，也許不應該把德國如此懲罰，一如同盟國在戰時把它懲罰的那樣嗎？也許不應該燬壞它的重工業嗎？也許不應該破壞這隻野獸的巢穴嗎？

我們以爲不是的，那一點也沒有錯，是應該這樣做的，而我們已經這樣做了（鼓掌）。也許在其他國家內特別是在美國，有誰似乎想這是做錯了。他們自然不是這樣說，除了某一個艾爾洛夫是例外。就是他似乎也不會說，只是幻想這一點吧了。但是由於美國對外政策之結果，出現了一些傾向要恢復德國的大工業，如馬丁先生在這裏所堅決主張的那些傾向，在這種場合又是什麼意思呢？現在不但不消滅卡特爾與托辣斯，反而違反波茨坦協定所簽訂的決定，予以恢復和鞏固起來，這又是什麼意思呢？

這一切所做的自然都是簡單的。這是爲了利用德國達成自己的計劃，以便在必要時再推動它向東方進攻。這是粗魯的破壞波茨坦協定，因爲該協定會責成我們採取一切步驟根絕德國法西斯主義，可是現在相反的，竟努力於一切要把法西斯主義的殘餘保存和加強起來。杜爾斯的號召——「不再回到波茨坦」——究竟還有什麼別的意義呢？

迄在今天奠定列強關係之基礎的一切協定的基本理想，就是合作。合作是建立在民主制度上面，是建立在互相尊重，顧及雙方利益的上面。這是我們所想的真正合作，也就是蘇聯所希望的合作（鼓掌）。自然有各種不同的合作形式。例如：有馬與乘客之間的合作。但是我們不願意這樣的合作，尤其當着有人想把我們描寫成馬一樣的時候（鼓掌）。我不知道奇里庫斯先生在這裏所說的和在美國長成的那匹馬叫着什麼，不過無論如何我們應該說對於我們，這不是一件合適的事情，我們反對這樣的合作，我們不願意成爲一匹被人騎的馬，一如我們不願意成爲一個騎在別人身上的乘客一樣。我們希望真正的合作，根據平等原則，彼此平等。這就我們們所稱謂的民主（鼓掌）。

蘇聯代表團到這裏來出席聯合國大會，並且帶了一個譴責戰爭宣傳與戰爭煽動者的建議草案。我們並穿了這些煽動者，並且指出了他們。我們甚至於把他們編成了號碼，以便大家都知道這是談的誰，這

是談的什麼，因為我們知道對於簡單普通的人們，對於全世界千百萬的人們沒有比新戰爭更加不幸的了。因此我們要求譴責戰爭宣傳。有些人向我們說：這是不民主的，因為不能譴責戰爭宣傳，因為這就破壞了言論自由與出版自由。麥克奈爾甚至於簡單的聲明：在自由國家內應給每個人自由發表思想的權利。原來宣傳新戰爭就是民主的象徵，禁止宣傳戰爭，就是破壞民主。現在我們的面前坐着許多美國人，我相信你們之中沒有一個人會同意禁止宣傳戰爭就是破壞民主（鼓掌）我們說過：你們不是斷定不能禁止美國刊物載號召新戰爭的論文，因為這是破壞出版自由嗎？但是我問爲什麼你們又以法律禁止掲載任何關於出售品質不良或對消化有害之生產品和商品的廣告，並對犯者處以五年以下之監禁及五千美元以下之罰款呢？爲什麼不能刊載欺騙顧客及有害腸胃健康的廣告呢？爲什麼這不是破壞民主，爲什麼這不是破壞出版自由，而刊載號召反對蘇聯及其他真正民主國家的文章就可以呢？爲什麼呢？這是因爲問題不在於出版自由及人類的基本權利，如美國、英國、法國出席聯合國大會的若干代表所說的，而是關於別的問題。問題是在於要在理論上使人民的思想準備走上新戰爭。至於禁止宣傳新戰爭就是破壞民主的叫喊不過是虛偽的叫喊，專爲掩飾準備新戰爭而發的。美國的反動派需要說服美國人民，說蘇聯不是民主國家。難道我們目下不是每天在數十萬，數百萬份的各種報紙雜誌和書籍中看到說蘇聯是「警察國家」「極權統治」「恐怖統治」等等話語嗎？難道在六十一號街我國領事館的附近不是時常出現一些老婦人遊行隊伍拿着反蘇的標語嗎？難道我們沒有看見這個嗎？難道全美國都不知道這個嗎？自然，誰也不相信這些老婦人。我相信這些老婦人自己也不相信塗寫在她們的標語上的東西。但是誰是站在她們的背後呢？誰以這些標語來武裝她們呢？誰把她們送到六十一號街呢？我想你們知道是誰。這就是新戰爭的煽動者啊。任何戰爭之準備都不僅在於生產武器，大砲，飛機，坦克，機關槍，步槍，擲彈筒，原

子彈等等，而且在於相當的武裝人民的思想。因此，我應該說：我在這裏過了兩月半已經用自己的眼睛看到了，用自己的耳朵聽到了，現在在美國做些什麼，我應該說現在正是瘋狂的在思想上製造社會意見，以便準備反蘇意見。④

朋友們，在這些條件下，美蘇友好協會的工作便有特殊意義。這種工作所以具有意義更由於這是關於很嚴重的問題，這是關於戰爭問題，對蘇聯及蘇聯人民友好的社會力量組織實具有巨大的政治意義，我甚至可以說：具有全人類的意義，因為在這種工作中形成了忠實公正人士的隊伍，他們不願意戰爭，他們詛咒戰爭，他們渴望和平並且要促成與其他各民族發生友誼關係。所以我們歡迎你們協會的工作。我們知道你們這個協會是真正代表美國人民，而不是那些反動派叫喊他們代表美國人民，但正做着反對美國人民的黑暗勾當（鼓掌）。現在我利用在你們這裏的機會，其他由蘇聯蘇維埃烏克蘭及蘇維埃白俄羅斯來的同志們也是一樣，我要說每一次你們要鞏固我國人民與美國人民之友誼的運動，在俄羅斯人民中，在蘇聯各民族人民中，不管是什麼種族和民族都將引起極熱烈的極深刻的與極興奮的反響（熱烈鼓掌）。

我們歡迎我們的美國朋友在同一方向爲了和平，爲了我們兩國人民的友誼所做的努力。我們知道反動派無論怎樣努力，他們的事業都永遠不會勝利的。他們已被歷史注定了命運，只是應該希望很快的把他們送入歷史的廢物堆中。（鼓掌）。

我希望你們繼續成功。勇敢的展望將來，勝利是屬於你們的。（全會場的人都站起來，以熱烈的不斷的掌聲掩蓋這些話）。

在聯合國全體大會上關於一致協議原則的演說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一、對於一致協議原則（否決權）的討伐

美國代表在他的演說中剛才企圖把第一委員會通過的關於一致協議原則，或如普通所稱「否決權」問題，轉交常設委員會及其目的所在之決定描寫得很簡單。他聲明這是很簡單溫和的決議，來解決這一問題，使常設委員會與安全理事會可能指定的委員會商討，並建議由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會對此問題加以商討。所有他以後所說的，其目的不過要證明第一委員會並未通過任何具有嚴重政治意義的決議，以及這一問題實際上不過是一個普通問題，所謂司空見慣的問題，對於改善表決的技術較之解決某一原則問題尤其更大意義。

這自然完全不正確的。美國代表作這種解釋，實際上就是企圖使大會不要注意和這個問題有關的一切真正的政治問題，我不必強調，這是想縮小這些問題的意義。

但是關於一致協議原則的問題，關於所謂否決權問題，乃是聯合國的生活與行動中最重要的一中心問題之一。毫無疑問的，在這個問題上，有兩個基本政治路線，兩個基本政治方針——決定現代對外政策一切內容的方針——在那裏衝突。對於這一點，蘇聯代表團很早就有機會予以指出尤其在聯合國第一屆大會，關於一致協議權的問題，會被若干代表提出，他們表示自己是這種原則的不可調和的反對者，還在制定聯合國憲章時他們就反對它了。固然這些代表，例如阿根廷、古巴、菲律賓及其他若干國家的代

表，如所週知，還是接受了聯合國憲章及憲章第二十七條所表現的一致協議原則。因此他們就接受了憲章第二十七條及第一〇八條、第一〇九條所表現的這一原則。似乎這些代表既然參加了根據這種憲章而建立的組織，雖然在這種憲章中含有對他們不能接受的條文，曾經引起他們的反對，可是「開始就責成了這些代表和所有聯合國會員都必須對於憲章予以應有的尊重，都必須忠於這個原則。」

聯合國會員既然通過了憲章，似乎就應該放棄反對憲章及其基本原則的鬥爭，而各大國在安全理事會解決非程序問題時，所守的一致協議原則，無疑的是憲章的一個基本原則。在憲章上已經簽字的各國因而就負了憲章所規定的一切責任，現在當他們簽訂了憲章，並加入聯合國以後，又開始反對憲章，盡力企圖動搖，或消滅此種憲章的最重要原則之一，這種情況不能認為是正常的。

某個國家既已加入聯合國，而這個組織在解決政治問題時，基本原則之一已規定為一致協議原則，該國竟有系統的反對這種原則，因而動搖該國才加入的這個組織的基礎，這種情況不能認為是正常的；可是像阿根廷、古巴、菲律賓、澳洲及其他若干國家的聯合國會員正是造成了這種情況，他們逐月，現在可以這樣說——逐年進行有系統的鬥爭，反對一致協議原則，要求把它廢除。他們的一部份公開要求取消一致協議的原則，他們把這種要求做為在聯合國內全部工作的內容，我簡直可以說做為全部工作的綱領，因此便妨礙了聯合國的安聯工作，使這一個組織患了狂熱症，患着政治的間歇熱，每天都在重複同一個要求：否決權應該取消，迦太基應該被毀壞。

現代的武士如阿根廷與澳洲的代表什麼別的也不想，祇想取消一致協議的原則。阿根廷代表在第一委員會最後一次會議上聲明：他好像一個外科醫生，一定要把「否決權」割去。我們可以想像聯合國大會對於他，好似一個外科醫院或者是各科病症臨床講習所，他們每一個可以根據他們外科天才的診斷，

依照自己的意思，把聯合國憲章的這一部份或那一部份隨時割去。

比較不很公開，但同樣企圖取消這個一致協議原則的就是澳洲代表所表現的立場。他聲明阿根廷在這一問題上所執行的路線在日下是不利的。伊瓦特先生自然不反對阿根廷的建議，他也準備做這一個外科醫生在施行手術時的助手，不過他認為現在時期尚未到。果子還沒有成熟到可以把它摘掉的時候，好像過於性急的阿根廷代表現在所急於要做的，他認為在現階段，在日下，只限於比阿根廷代表所主張的割去手術較少激進的步驟也就足够了。不過，伊瓦特先生聲明：自從舊金山會議以來，澳洲代表始終認為並且繼續認為利用「否決權」乃是憲章的污點，他並且說：這不過在舊金山會議時爲了簽訂憲章所必需的一種過門。這是很奇怪的，但這是事實。原來若干代表是決定在這方面起着特洛伊馬的作用。他們同意「否決權」，同意一致協議原則只是爲了他同意憲章同意簽訂憲章及其基本原則，當着一種策略手腕，只是爲了簽訂憲章，並在暗中決定反對憲章，反對憲章中所表現的原則，不管他已經同意了這一個憲章。這自然充分證明這些代表對於憲章及其原則忠誠的程度，他們所以同意這些原則，並非由於他們相信這些原則，準備堅持這些原則，並認為這些原則對於他們在聯合國中之行動以及聯合國本身的行動是重要的，而只是爲了簽訂這一憲章，使這種憲章生效，但自己却保持反對憲章的完全可能。這一開始就揭穿了這些代表，揭穿這種立場的代表並不是憲章的擁護者，或依據這種憲章的組織的擁護者，而是這種憲章的反對者，這種組織的反對者。

阿根廷的提案——召集特別大會，以便取消「否決權」——大概也是一種策略手腕，因爲甚至於像澳洲代表、或古巴、祕魯與菲律賓代表團這樣的一致協議原則的反對者，都沒有公開決定支持阿根廷的提案。很顯然的，他們恐怕遇到聯合國其他會員的過於嚴重的抵抗，後者仍然相信聯合國的原則，並且

明了阿根廷各位先生們關於一致協議原則所策劃的騷動是什麼意思。這種騷動現在已逼使若干代表深懷戒懼。這些代表，例如埃及代表或瑞典代表，大概已經感覺到，假若這種關於所謂「否決權」或正確點說，關於五強在安全理事會的一致協議原則的吵鬧不能停止，或者這種吵鬧完全不能從我們的組織中消滅，那末這種騷動最後將會有什麼結局，以及對於聯合國可能產生何等嚴重的政治後果。

毫無疑問，在聯合國核心中正在成熟的對於該組織存在問題的恐懼，不能不引起一切忠實的國際合作擁護者，和一切忠實擁護各民族和平與安全政策人士的合法驚懼的感覺。這種政策的反對者雖然焦躁不耐，要對去「否決權」，取消一致協議原則，以便削弱聯合國，因為它妨礙他們推行與聯合國之目的及任務毫不相同的政策，但也不能不估計到這種情形。他們感覺玩弄手腕在現階段的遭失敗，甚至於荷蘭代表的聲明：或者在聯合國內存在「否決權」，或者聯合國再不存在——這個聲明在玩弄手腕以前，也是值得考慮的。

阿根廷的提案是一種策略手腕，並無任何嚴重的實際意義。我簡直可以說這是放空炮。我們已經聽慣了這些空炮。我們相信這種空炮是依照美國代表團的宿舍司令部的規定或命令而做的，這是在美國外交實踐中常做的事，當美國認為不需要自己浪費空炮的子彈時，就把這種玩藝讓給他的聽命的追隨者去做。在許多場合，美國的立場堅決反對於她不利原則或建議，結果都是破產了。結果美國不能不同意讓步，以便救救自己的面子。在這種場合，若不由自己出面冒險，況且常常有要求很低的人士願把自己的膀背供給美國用，甚至還可用互相租借的方式來做，用自己的側面力量來玩弄一切，這不是更好嗎？不就是因為這種理由才把這種可疑的光榮昇予阿根廷，讓她提出獨立的建議召集大會割去「否決權。」而且我已經說過這種提案的組織者也非常清楚這些提案不會，也不能被通過的，也不能獲得必需的大會

多數之支持，就是這種割去「否決權」的提案及爲此而召集大會的發起人也不能支持這種提案。在第一委員會最後一次爭論阿根廷提案時，所討論的完全不是關於阿根廷的建議，這種情形自然也不是偶然的，假若我未記錯，似乎除了丹麥與古巴以外，再也找不出一個代表曾經聲明準備自我犧牲。甚至於美國代表杜爾斯先生也聲明美國代表團同意蘇聯代表團的意見，認爲一致協議原則或規則實係每一個國家的保障，如他所說的，一致協議原則是保障少數的權利反對多數的任意行動。這是怎麼一回事？這種爭論究竟是爲了什麼？

關於杜爾斯先生的發言，我還要繼續特別再說幾句。我在這裏指出在這次美國也沒決定公開發言反對一致協議原則，雖然他關於這一問題的聲明已經提出了許多附帶條件，以致在實際上，已經準備了廢除一致協議原則的基礎，這在實際上就是取消一致協議原則的第一步。當阿根廷叫喊割去「否決權」時，只有古巴和另一某國支持阿根廷，但美國及英國都甯願不要過分強調這件事情，不要把反對一致協議規則的鬥爭一下子就輕率的推到深淵中。相反的，她們在口頭上似乎繼續擁護「否決權」，擁護一致協議原則，但在實際上，很謹慎很狡猾的而又很徹底很堅決的企圖割去它，縮小它，取消的不是一致協議原則——神靈注意，他們是這一原則的擁護者——他們這樣說——而是取消這種原則在許多場合之運用，可是這些場合就構成安全理事會的全部實際工作。他們自然同情阿根廷，但願行動得比較審慎安靜，希望時間對他們有利，那些在今天還堅持不願意在這一問題上和他們聯合的國家，但經過相當時期，在杜魯門主義或馬歇爾計劃的種種財政經濟的步驟壓力之下，受那些逐漸削弱各國獨立地位的事件發展之影響，就不得不改變自己的立場。

在這方面，我應該提到這個問題，馬歇爾先生最近在國會演說爲他的計劃辯護，爲他所稱的復興歐

洲計劃辯護，他企圖把事情描寫得這樣，似乎這一計劃的主要目的——是造福歐洲，或者如他所說的，造福歐洲集體，這個集體應包括西德，作為國際安全之一環。而且在這裏他不是沒有曲解事實，他把事實描寫得這樣，似乎在戰時英美軍隊與蘇軍會合線界以西的歐洲國家，解決戰後問題都未受美國或英國的壓力，但在這一線界以東的歐洲國家都受外人之手的影響。自然大家都明白，馬歇爾在這裏所說的是指那一個外人。但是祇要充分的認識了馬歇爾在十一月十日在國會中之演說以後，就可以相信實際上美國政府如何不知恥的對待在這歐洲集體。這些國家已被金元的借款津貼和借款的允諾弄昏了。馬歇爾先生現在還沒有完全談論這一點，不過他聲明美國將在歐洲執行重要的職務，為此將任命一位歐洲專使，以便調劑各種步驟。這件事已經說明了一切。這位執行馬歇爾計劃的歐洲專使將監視美國政府確實可以從歐洲相當的國家獲得保證，使它所給的援助將被有效利用，最迅速的復興歐洲，這些保證的實質，現在還沒有揭穿，這些保證的內容也還沒有說明，但是不管內容如何，保證就是保證，大家都知道對於雪依羅克的保證就是一磅人肉，因此，不是歐洲國家，而是美國的歐洲專使來決定什麼對於某一歐洲國家的復興是有效的，和什麼是無效的。迄今為止，我們認為決定某些步驟對於復興一國經濟是有效的，以及某些步驟是無效的，這是每一個國家的主權。可是現在十一月十日向我們公開聲明：這將由美國的歐洲專使決定，這可以說對於這些歐洲國家的主權，已經沒有什麼東西留下來了。這就是馬歇爾斷定歐洲之復興，將不受美國的經濟及其他壓力的意義，這就是所謂美國對歐援助的味道。

關於美國援歐，參議員范登堡十一月三日在密奇根大學的演講，也曾經專門予以說明。參議員范登堡指出美國不應該忽視一種自覺的冒險，對於這種冒險地應該不辭的。爲什麼呢？這就是爲了，如他所說的，預防「我們美國所依據的西方文明，以及我們美國的管理方法與生活方式實際消失的危險。」在

參議員范登堡這些話中，已經揭穿了那些打算給歐洲似非自私的所謂經濟援助的美國統治階層的政治企圖。正因如此，所以在參議員范登堡的演說中，就有很多地方是關於聯合國已分裂為兩個營壘，與自誇租借法案，以及提醒美國人「當我們暫且討論問題時，不管討論之聲調如何焦急，我們都不要攻擊否決權，但爲美國之福利着想，此種「否決權」似應予以限制，一如美國代表團確切遵守參議員范登堡之訓令而在大會上所要求的。最後，范氏在演說中還不負責任的順便指出，那些希望美國經濟破產，以便，如他所說的，消滅任何民主。所有這一切都揭穿了馬歇爾計劃的實際政治主義與思想，現在是比若干時以前更加確定了。既然現在所談的是東方國家攻擊馬歇爾計劃，並想消滅任何民主，那末可以說依照他的意見，美國獨佔資本，就是民主的可靠支柱。可是在這種場合，只有可惜民主了。

但是所有這些，我們都已經知道了。我們關於這一點已經聽過十次了。但是每次我們都要問：難道美國統治階層的出色代表這些推論，很明顯的預告何時不須爭論，只須攻擊的推論，在這些階層中就是叫着號召合作嗎？讓我來問這與政治的心理攻勢的威嚇和企圖又有什麼區別呢？

所有這些在討論一致協議原則問題時都是不應忽視的。我們現在看到美國代表團的聲明，事實上，就是他們目下不準備支持阿根廷的提案。他們所建議的要緩和一點：就是限制一致協議原則之使用於憲章範圍以內，但除去第六章所規定的在安全理事會內用和平方法解決一切足以威脅各民族和平與安全的爭執與情勢，以及除去關於接受新會員的問題。這就是美國建議在這方面不要在安全理事會中採用一致協議規則。但是這些步驟美國並不建議現在就去執行。杜爾斯先生向第一委員會說——他今天在這裏又重複這句話——要立刻解決這個任務未免太困難了，所以暫且還是研究這個問題比較有益。他說這一次大會不能在現在就從事這種研究，因爲這需要很多時間，因此他堅決主張把這種研究轉交常設委員會，

固然他附加一個條件，就是假若蘇聯代表團反對，他願意提交特別委員會。但是這種所謂妥協的建議不能不看作是一個策略手段，這種手段之目的是在表明似乎美國已經讓步，因為你們看一看，甚至於願意成立特別委員會了，可是如在第一委員會事變過程所表示的，美國建議這一個特別委員會，並不是想到讓步。問題在於他們事先已經相信蘇聯代表團不會參加什麼特別委員會，也不會參加任何委員會，若其最後目的在於使聯合國受我們的外科醫生——阿根廷代表阿爾塞所幻想的外科手術。

毫無疑問的常設委員會之設立並不是爲了不利用它，這一個方便多數的工具，尤其是當着蘇聯及其他若干國家不參加這個委員會的時候，若不利用它來達到像廢除一致協議規則這樣尖銳的目的，那就不是設立的原意了。

杜爾斯先生在第一委員會中——他今天也這樣做——企圖把事情描寫得這樣，好像現在所談的並不是關於改變一致協議原則，而是關於改變這一原則的使用權利，很明顯的他是想分散那些反對任何修改憲章，尤其反對廢除一致協議原則的代表們的注意力。假若聽了杜爾斯先生在第一委員會中的發言，才知道原來自舊金山會議以後，這個問題的政治面目就已經改變了。此外，如他所稱，一致協議原則並未達到自己的目的，反而造成了分歧。因此對於憲章，尤其對於第二十七條必須加以修改。杜爾斯先生要求把這一問題在更廣汎的基礎上，加以審查，估計到其他的國家立場，不過把這一問題實質的審查推延到下次大會。當我聽了他在第一委員會中的全部演說以後，我就回憶到有名的寓言中一個狐狸所發表的諂媚演說，它頌揚一個口裏啣着一塊乾酪的烏鴉。一等到烏鴉天真的張開嘴叫，並將乾酪從嘴裏吐出以後，狡猾的狐狸就馬上知道對於乾酪應該怎樣處置了。

美國英國澳洲及其他若干國家把他們對於一致協議規則的討伐描寫得並不是反對一致協議原則，而

是反對濫用這個原則。各位先生，這也不是新方法啊。這種方法是打算欺騙動搖分子，在政治上欺騙我們，把他們轉移到自己這一方面來。但是誰在實際上會堅持一切濫用呢，誰在實際上不同意應該採取辦法以避免這些濫用呢？難道這樣，用這種醫油，在這種反對濫用的口號之下，不更容易達到下面的目的嗎？開始限制一致協議規則，然後如阿根廷代表所說的就把它完全割去。施行這種手術的外科醫生已經有了。

這就是我們蘇聯代表團對於這種圖謀的全部看法，此種圖謀之結果就是第一委員會的決議案，而此項決議案就是對於一致協議原則的討伐。目下這種討伐，如我已經指出的，無論如何要企圖表明是在反對似乎濫用此種權利的旗幟下進行，而且這種濫用自然是歸於蘇聯，因為蘇聯在許多場合被迫利用它來制止安全理事會大多數會員通過不公正的不正確的決議。

二、不是濫用自己的權利而是保障公理

我想稍微詳細一點來檢討這個問題，因為這裏所包涵的責難不但是一致協議原則本身，而且包括責備那些擁護此種原則的最徹底最堅決的國家，而此種原則，如我們已經說過的，乃是各民族權利與利益的保障，乃是少數反對多數任意作爲的保障。對於這一點，甚至阿根廷代表在第一委員會中也不能不同意。實際上，我們採用「否決權」的一切情況又怎麼樣呢？——是濫用「否決權」呢？還是藉賴一致協議的規則來保障公理呢？大家都知道在過去一個時期，安全理事會曾經審查若干具有很大政治意義的問題。這些問題的大部份，安全理事會曾經審查好幾次，因為大多數安全理事會的理事都堅持要推行自己的路線，但不能得到安全理事會全體理事的支持。例如西班牙問題，柯孚海峽事件問題，都在安全理事會

中審查了兩次。關於希臘北疆狀況問題曾經審查三次，關於接受新會員到聯合國中的問題甚至於審查了十次。因此，關於三個問題，蘇聯代表團曾經利用一致協議原則，使用了「否決權」，而這種原則的反對者就機械的計算並宣佈「否決權」已被蘇聯代表團使用了十七次。可是所有這十七次都是重複開始的那三次。這裏並無任何新東西加進來。假若把這些問題如此挑釁式的提到安全理事會達一七〇次，而不是十七次，那只有「否決權」，因為這是關於蘇聯代表曾經不能同意的一些同樣的建議。

蘇聯代表在一切使用「否決權」的場合都是完全正確的，他所以不能同意安全理事會大多數理事的立場，是因為這種立場既不能符合具體實際的情況，又不能符合為大多數提議的決議之基礎的道德政治見解。我自然不能檢討所有這些情況，但讓我將其中若干情況加以分析，以便揭穿那些完全不正確的，我簡直可以說，一些譏諷的論斷，認為蘇聯沒有理由的使用一致協議規則，利用這種一致協議規則，使用屬於這種規則的和由此種規則產生的權利，以便阻礙安全理事會的工作。這是一種譏諷！蘇聯在安全理事會中繼續採用昇予她的權柄，只在那些情況十分嚴重，非採用此種權柄不可的時候。我現在對你們又指出幾個例子。

西班牙問題。大家都知道蘇聯在幾次表決這問題時，都發表意見反對多數的決議案——這些決議案實際上是替富朗哥的統治辯護，因為在安全理事會中所提議的關於西班牙問題的決議案不過只是表現對於富朗哥庇護和寬容罷了。爲了更加明白起見，我請你們注意在這次大會上所發生的現象，有若干代表簡直發言公開庇護富朗哥——這就是阿根庭代表。請你們想一想當着這種實際鼓勵富朗哥統治的決議案提出以後，蘇聯在安全理事會的代表立場應該怎麼樣呢？自然蘇聯就應一再反對，假若這個問題提出來二十二次，那末蘇聯就要使用憲章給予她的權柄二十二次。我們簽訂憲章，參加組織，並不是爲了適

應環境拋開擁護原則的政治路線鬥爭。我們參加聯合國是爲了堅持在憲章中所表現的原則，可是佛朗哥統治是能與這些原則並存的，在安全理事會所提出的，每次都被蘇聯代表所反對的那些關於西班牙問題的建議，都與憲章及聯合國賴以建立的精神和基本原則不相符合。自然蘇聯要投票反對這種決議，她這種做法是對的，這已由去年的聯合國大會予以證實，那次大會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十三日會通過一個決議案，譴責佛朗哥政權，這是安全理事會永遠不敢做的，大會並且建議把民主國家的大使和公使從佛朗哥西班牙另召來。民主國家都做了。可是若干僭稱民主的國家不但沒有這樣做，反而加強了她們與佛朗哥的關係，加強了她們與它友誼的親密關係。

在這種場合究竟誰是對的呢？

這就是蘇聯代表團，她在安全理事會中反對通過對佛朗哥政權的一種腐朽的，妥協的，可疑的，庇護的決議案，這就是蘇聯與聯合國大會，後者於去年十二月十三日曾經通過一個嚴重的，政治上很重要的，很負責任的決議案，反對佛朗哥政權，並且提出若干堅決的建議，譴責此種政權，這就是說，聯合國大會當時已經站在蘇聯代表在安全理事會中利用一致協議規則，所謂否決權，來護衛的那個立場。

再舉另一個使用「否決權」的情形。這就是關於接受新會員問題。蘇聯堅持自己的立場，我以爲是十分明白的。蘇聯一方面根據各種不同的動機反對愛爾蘭，葡萄牙，外約旦與奧國這些國家加入聯合國，另一方面，主張同時在平等原則上接受五個過去德國附庸國加入聯合國，不是把一個意大利從五個總數中提出來，而是要把五個國家——意大利，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匈牙利，及芬蘭都同時在平等基礎上予以通過。也不是一邊把意大利提出，另一邊把芬蘭提出，通過她們加入聯合國，而把其餘三國不過毫無理由的將她們沒有的性質加在這些國家上面，提出一些杜撰的理由來反對這些國家加入聯合國。

我們認爲不能接受愛爾蘭，葡萄牙這些國家參加聯合國，是因爲她們不能適合憲章第四條的要求。關於這一點我們在這裏已經說得很詳細了，自然我現在不能再把這一切重復一遍。我們認定愛爾蘭與葡萄牙在第二次大戰時期的行動，所有她們的對外政策，都不是爲了和希特勒德國鬥爭的聯合國的利益，而是爲希特勒德國幫兇。愛爾蘭——歐洲通達大西洋的門戶——會由凡勒拉政府封鎖起來，不准美國援助英國，而與希特勒德國鬥爭的武器和軍隊到達該國，而這些軍火，軍隊正是爲了瓦解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的根據地，解放歐洲，使之擺脫法西斯蒂的枷鎖而送來的，這是雅爾達會議時，由三強領袖解放歐洲的決議中所商定的，難道這不是事實嗎？在全部戰爭過程中，在都柏林會住着德國的偵探，由於愛爾蘭對於德，意的庇護，德國的偵探曾在此獲得很大的方便從事偵察不列顛各島，難道這不是事實嗎？但現在又向我們說：愛爾蘭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應該通過她加入聯合國，並因此發給她一張愛好和平的特許狀。

對於葡萄牙我們大半也看到了相似的情況。葡萄牙在所謂中立的假面具下，在戰爭時期，一直援助希特勒德國反對一切民主國家，這已充分說明了這個國家的性質。如所週知輪往希特勒集團國家的西班牙有色金屬，都是經過葡萄牙。葡萄牙幾乎在整個戰爭時期，都不允許同盟國家利用亞索爾羣島的港口，作爲空軍和海軍的基地，這在戰爭某些階段中是特別重要的。僅僅當着德國的命運已經決定，葡萄牙才同意讓同盟國利用她的港口。爲了葡萄牙對於希特勒德國的這些功績，爲了葡萄牙政府在希特勒強盜們所加於世界的戰爭中之功績，現在，很明顯的又來提議接受葡萄牙參加聯合國，並發給她一張愛好和平的特許狀了。

蘇聯代表團過去和現在不能同意這樣一種建議，因爲這是極粗魯的破壞和玩弄那些要求與一切形式的法西斯主義鬥爭的憲章原則。蘇聯代表團不能與葡萄牙坐在一起，因爲他們的手還沒有洗淨西班牙一監

色師團」在蘇聯所流的血，並與佛朗哥西班牙維持友好關係。蘇聯代表團不能夠同意這些妥協。所以麥克奈爾先生就開始真正的馬的交易。蘇聯代表團不能犧牲自己原則來交易，她過去也從來沒有這樣交易過。

現在向我們說：你濫用「否決權」。但是，各位先生，假若蘇聯的立場與關於西班牙問題以及關於接受愛爾蘭，與葡萄牙——在世界大戰中法西斯蒂的幫兇，並不是我們敵人的敵人，而是我們朋友的敵人——參加我們的組織的問題，所用的「否決權」，你們都稱爲濫用「否決權」，那末讓我來問你們什麼時候才算正當的使用否決權呢？

再舉一個例子——科孚海峽事件，當在安理事會中提出譴責阿爾巴尼亞在科孚海峽毀壞了英國的魚雷艇時，蘇聯代表團會反對這種譴責。蘇聯代表團這樣做，是因爲科孚海峽事件已被故意描寫得違反事實。英國代表忽略了真正的事實，他們企圖無論如何要違背事實譴責阿爾巴尼亞。

我們不能參加這種事情呢？

不能夠的。我們在許多場合，不同意多數的意見，都有完全形式上的法律權限，在安安全理事會中採用所謂「否決權」，但都沒有採用它。法國代表巴洛第先生在這裏指出蘇聯代表團曾經倡議解釋棄權並不是「否決」，不過這也有充分的法律根據，可使若干問題易於解決。但是蘇聯代表團只有對於那些不牽涉原則的問題才能這樣做，至於原則，那是我們的組織的工作實際，消滅了這些原則我們就消滅了我們組織的道德面目。一個在實踐中建立在一個代表團以機會主義的態度適應別一代表團之組織；也就是建立在各種會外運動妥協的基礎上，進行會議室以外的交易（這是應予公正譴責的），假若另一方面準備犧牲自己的原則，那末，這一方面也就準備犧牲自己的原則，依靠在這種政策上的組織就是一種死的組織，這就不是爭取正義與公理的戰場，而是把民主與公理的偉大原則葬在沈重的墓石之下的墓地了。蘇聯

代表團不能走上這條路，她始終是那些寫在我們組織憲章中的澈底擁護者。

現在我來談一談科孚海峽事件。我替你們帶出幾個事實，這是誰也不應否認的，因為這是不能否認的，你們應該當着蘇聯代表團在事實之前不能同意那些責備阿爾巴尼亞以未曾犯過之罪的決議案的時候，才說明蘇聯代表團是否濫用了「否決權」。

第一個事實。有一個所謂地中海掃雷委員會。在這一帶地中海掃雷委員會的任務中，曾包括掃清地中海所有領水中的魚雷。如所週知，在這些領水中，也有阿爾巴尼亞的領水。在與其他主權國家平等的基礎上，給予阿爾巴尼亞參加掃除自己領水中的魚雷的權柄，難道不是很自然的嗎？但是事實是怎樣呢？地中海掃雷委員會拒絕阿爾巴尼亞有參加委員會及掃除魚雷之權。不僅如此，地中海掃雷委員會又把阿爾巴尼亞領水中的掃雷責任加在誰的肩上呢？加在希臘肩上。這與委託貓子關心老鼠的健康與福利是一樣的。你們是知道希臘與阿爾巴尼亞的現存關係。在這些條件下，你們說希臘將掃除阿爾巴尼亞領水中的魚雷，但不是阿爾巴尼亞自己掃除。因為什麼？因為你們知道阿爾巴尼亞沒有掃雷艇。但是請你們允許阿爾巴尼亞按照她自己所認為必需的辦法來組織自己的工作。不管她向誰借用這些掃雷艇也好，還是向誰購買這些掃雷艇也好。

但是如何能取消阿爾巴尼亞在自己的領水內掃除魚雷的權利呢？

可是事實正是這樣。阿爾巴尼亞與蘇聯在地中海掃雷委員會中的代表曾有幾次要求准許阿爾巴尼亞和其他根據這一協定參加地中海掃雷委員會的國家一樣平等的掃除自己領水中的魚雷。這種要求由於英國與希臘的堅持，竟被有系統的拒絕了。

第二個事實。各種外國船隻都在阿爾巴尼亞的領水中自行其是，好像在自己國內一樣。例如一九四

七年三月十五日未得阿爾巴尼亞政府任何允許，甚至沒有預告它，就有一隻船由意大利海岸開到阿爾巴尼亞海岸。因此，阿爾巴尼亞的領水主權就經常有系統的被英，希船隻所破壞，關於這一點還有文件可以證明。在這些情況下，阿爾巴尼亞政府對其領水中，特別是在科孚海峽所生之事件，就決不能負責，這難道還不明白嗎？因此，阿爾巴尼亞對於任何可能在此發生之事件都不能負責，因而也不能對於十月二十二日兩艘英國魚雷艇在此所生之事件負責。

第三個事實。我們有一個法國專家的實驗，這個實驗充滿一切矛盾，關於這一點我的同事葛羅米柯已在安全理事會及時予以指出。我提這一事實是通知那些想知道這件事情的人們。

第四個事實。哥倫比亞代表蘇列特先生聲明沒有事實可以據以無疑的做出結論，認為正是阿爾巴尼亞放置了魚雷，或者知道了關於責備他的放置魚雷的事情。但是這種責備至今還是接受阿爾巴尼亞參加聯合國的基本阻力。

最後第五個事實，一個更加重要的關於科孚海峽的航路問題。大家知道英國當局沒有預先與阿爾巴尼亞商量，曾經多次把掃過雷的航路從一個地方移到另一個地方，濬深阿爾巴尼亞的領水，因此粗魯的破壞了阿爾巴尼亞的主權。我不能不指出這樣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兩艘英國魚雷艇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二日被炸燬的航路，與那一條被掃除魚雷的及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九日英國照會中所指出的航路是不相符合的。這個事實說明了英國的船隻不是航行到可以安全航行的水中，它們是航行在沒有指明已經掃清水雷的阿爾巴尼亞領水中，因此，它們自己是在這些水裏冒險航行。

此外難道這些情形——這是第六個理由——難道在那些已經聲明掃清水雷的水中，不是也有這樣的炸燬船隻的事情嗎？難道沒有這樣類似的被水雷炸燬的事情嗎？難道這是唯一的事件嗎？我記起在一九

四六年七月二十六日在被英國人掃雷的第埃浦區域航路上，曾經炸燬了法國的船隻「康皮安」號；我又記起在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六日在瓦爾赫倫島區域已經掃雷的航路上，而且這裏掃雷是由比利時負責的，但是荷蘭的船隻「赫尼斯金，海斯金斯」號也在這裏被水雷炸燬了，我又記起自從一九四五年五月八日起到一九四六年八月三十一日止，在歐洲的領水中，曾經不多不少的被魚雷炸燬了一九六艘各國的船隻，而且在那些已被官方宣佈掃清水雷的航線上，就是在安全航行的區域，炸燬了不少不少三十艘。

但誰也沒有一次想到關於荷蘭的船隻和法國的船隻事件和任何其他國家的船隻事件，要責備比利時政府，或者責備英國政府，說他們犯了違反人道之罪，好像在安全理事會中對於阿爾巴尼亞所說的罪狀，你們祇要注意到這些事實，你們便十分明白所有這一段歷史，關於阿爾巴尼亞似乎犯了違反人道的罪過，應該負責，這完全是人造的，這種譴責完全是由不健全的政治傾向製造的。自然蘇聯代表團和蘇聯都不能投票贊成這樣的提案。

我可以舉出許多經過安全理事會的事實，蘇聯代表團都利用了自己的權柄，反對不公正的，不合法的，無理由的，妄誕的，人造的，虛偽的責難，維護弱小民主國家，因為她們不能像強國使用「否決權」一樣來保護她們。

但是我只限於上面已說的事實。假若我們不能在投票中獲勝，至少必須舉出可以說服人的理由，如南斯拉夫在這裏說的：在少數方面是依憑理由，在多數方面是依憑票數。但是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還能說濫用第二十七條所表現的權利？例如英國首相艾德禮先生最近在下議院聲稱：在安全理事會中「否決權」之使用是損害安全理事會的，因為你們看「否決權」都是用在瑣事上，都是用在無關宏旨的問題上，結果如艾德禮所說的，就使得對安全理事會的尊敬，與權力都等於零了。難道這不是犯了粗魯的錯誤

嗎？這種錯誤不是證明關於事情的實際狀況觀念完全不正確嗎？我應該指出英美領導人士對於所謂「否決權」具有一定的傾向——這種傾向是在於破壞「否決權」。

假若聽從這般領袖的話，那末，蘇聯代表在安全理事會中使用「否決權」原來都是關於「一些瑣事」。原來鼓勵佛朗哥的法西斯帶政權也是一件瑣事；通過法西斯蒂幫兇愛爾蘭與葡萄牙參加聯合國也是一件小事；譴責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與阿爾巴尼亞具有侵略企圖，現在甚至於連這些譴責的提案人也至少不得不在公開方式中放棄此種譴責，原來這也是一件小事；譴責阿爾巴尼亞犯了違反人道之罪也是一件小事。

現在，你們可以知道，在這種意氣用事之下，就喪失了區別小事與大事的能力了。和這種立場是不能同意的，因為它是依憑虛偽的理由，自然不能不得出虛偽的結論。關於責備濫用「否決權」的事情便是這樣。任何濫用也沒有啊！假若要說濫用，那末就應指出多數方面，濫用自己的權柄進攻少數。正是多數濫用自己地位，企圖破壞少數的立場，誣賴他們的立場，似乎濫用了憲章所畀予的權利。

所有我所說的——我相信這一點——對於一切無偏見的人都可使他十分相信「否決權」實在是保障少數及任何國家的正常權利的真正工具，所有關於濫用這種權利的責備都是不公正的。在實際上這種譴責不過爲了開關一個漏洞來取消這個權柄，因為它對於在大會中佔統治地位的多數是不方便的。難道昨天關於南非問題的表決不是說明了什麼傾向在這裏佔着優勢嗎？當時在大會上竟不能獲得足夠的票數，來譴責南非對印度人的歧視政策。

你們想我們也同意這個嗎？

我們決不同意，也不能同意，因爲這已破壞了聯合國的基本原則。

三、一致協議原則是國際合作的基礎

聯合國的使命是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爲這些目的採取有效的步驟，根據民族平等與自決的原則發展各民族友誼關係，根據各民族平等與自決原則實行國際合作，並成爲各民族協調行動的中心，藉以達到共同的目的。

爲了達到這些目的，憲章已經指出應循的途徑與應有的手段。它指出應尊重聯合國所有會員的主權平等原則；並且說到應該忠實的執行自己接受的憲章規定的義務。

在這方面我們應該着重指出安全理事會所負的特別義務，根據憲章第二十四條的規定，它負着維持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主要責任，它這方面的行動不僅是一個代表十一個會員的安全理事會，而且照該條規定，是代表聯合國全體會員。這是一個崇高的義務與很大的責任。因爲認識到這種責任的全部重要性，就有必需在安全理事會中規定這樣的決定問題的程序，以便最大限度的保證安全理事會的機構能够正確的行使職權。正是這個原因引起了必需給予安全理事會以特別全權，而這些加在安全理事會上面的特別全權，就要求安全理事會的常任理事，如逝世的羅斯福總統所稱的「和平的主要保持者」負起「道德的領導，並使他們在安全理事會一切決定中都能協調行動，不使自己的生命利益受到危險」。(福斯福語)

這就是逝世的美國總統羅斯福在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寫給斯大林大元帥一封信的內容。他指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的行動無論如何對於安全理事會一切有關他們利益的決議不應破壞一致協議的基本原則，而對於強國應在藉賴力量保持和平方面予特別作用。這一立場，如所週知，在一九四五年二月七日美國在雅爾達的聲明中也曾加以確認，以及四個月以後在舊金山會議時六月七日又由四個邀請國政

府的聲明加以確認，但關於這一點，杜爾斯先生在第一委員會中說這個聲明並不是不協定，尤其不是長期的協定。杜爾斯的立場自然不是他個人的立場。美國代表團這種立場也自然不是代表自己的立場，而是美國政府立場。這種立場根據我們的觀點是絕對不正確的，因為當時羅斯福總統代表美國所負之責任，以及在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期間美國代表所正式做的一切聲明，都不是代表個人意見，而是確認美國所担负的義務。杜爾斯現在拒絕這些責任，想向我們提出「否決權」是沒有義務的，因而提出自己的冒險口號：「不再回到雅爾達，波茨坦與德黑蘭。」這是說明什麼呢，這不就是說明希望取消自己在從前所接受的義務，因為這些義務現在已經不方便，已不適合現在的新路線，因為在強硬政策下，自然不能再負這些義務，這是美國政府和蘇聯及其他民主國家尋求友誼與合作的時候所担负的義務。相反的，當美國尋找藉口拒絕合作破壞合作基礎時，拋去這些義務倒是十分自然的。

美國代表團有些什麼理由，說對這種聲明不受束縛呢？
沒有任何理由。

和杜爾斯這種聲明我們是不能同意的，因為按照一九四五年六月七日的聲明，四個邀請國家實質上已經確定了自己在雅爾達所接受的義務，就是根據一致協議規則來行動，而且表示相信，這種規則適合協議各方面的實際利益與全聯合國的實際利益。所以目前美國代表這樣輕視的六月七日協定不能看作對於誰都沒有束縛的文獻。相反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文獻，它完全指明了成立聯合國的意義，並且指明了一致協議原則是聯合國據以建立的基本原則。

我記起此種聲明的若干部份。這些部份比我們說的還要好——我不懷疑這些部份一定比我說的好，它們證明毫無理由的說這一文獻至少在相當時期對誰都無束縛作用。請你們注意這一聲明的第四點——

，那裏說，「安全理事會的決議與行動可以有很大的政治後果，甚至可以奠定一大串事變的始基，它們在最後可以要求安全理事會爲了執行自己的義務，採取第八章第三節所規定的強迫步驟」。這是適合現在第七章的規定。其次又說：「這一串事變開始於安全理事會決定進行調查或決定認爲時期已到應號召當事國家解決她們的爭執，或向當事雙方提供建議」。

在該項聲明第五點中說到：「決定提供建議，甚至在各方面請求的時候，或者號召爭執雙方執行本憲章所規定的義務，這可以是行動的第一步，安全理事會如要避免就有不能執行所負義務之危險」。

在第七點中說到：「雅爾達會議規定的表決方式，卽一致協議原則對於常任理事並未予任何新的權利，不過只是「否決權」，這是國聯理事會常任理事始終具有的。在這點中，着重指出在安全理事會中所提議的以七票多數通過決議的方式，可使安全理事會之行動，比較國聯所規定的完全一致協議規則較少抽象一點。」

你們看見了第四，第五，第七各點。你們便可以知道他們在這一聲明中把一致協議規則的問題提到如何巨大的原則高度。你們可以看見他們所規定的如何仔細和精確，此外，不僅規定了安全理事會所採取的這一步驟或那一步驟最近的目的和最近後果，而且由於安全理事會所採取的某項決定，還必然會開展起來的一大串遼遠的事件。

在一九四五年六月七日的聲明中又說到：「甚至決定任命調查任何事實——關於這一點，在我們討論常設委員會時，許多人說這似乎是設有什麼意義的職權，或者無論如何是具有很小意義的職權，並且認爲這種職權可屬於每一個輔助機關，這自然是絕對不正確的，——甚至通過決議進行某種調查，安全理事會都應估計到在以後可能發生的一切後果，對於安全理事會應該有所準備，勿使它的第一次決定就變

爲：一張白紙，如我們對於大會的建議所時常看見的。

你們可以看出四個邀請國家在決定一致協議規則時，是根據大國對於維持和平與安全所負的非常責任，這些大國對於實現上述目的，具有必需的物質手段，組織可能，及軍事力量。在這個聲明中邀請國家是從現實情況精確估計出發的。這在下面第九點中說得特別明顯，該點指出：由於常任理事所負的基本責任，在世界現存條件下，要求她們根據她們所不同意的決議，擔負起責任，來做維持和平與安全這樣嚴重的事情，是不可能的。「所以——在這一點中又說——要使安全理事會按照投票的多數通過決定成爲可能唯一的實際辦法就是對於非關程序的決議，要規定常任理事的一致協議，並至少加上兩個非常任理事的同意票」。

由此自然就做出了正確的結論。在聲明中說：「根據所有這些原因，四個邀請國政府，就同意雅爾達會議決定的方式，並提交此次大會，認爲這是必需的條件，以便建立國際組織，而使愛好和平之國家經過此種組織可以最有效的擔負維持和平與安全的一般責任」。

現在美國代表企圖否認四強協定。我們對於這種企圖不能有別的解釋，只能認爲他們想掃清道路，以便拒絕執行美國政府在從前所接受的一致協議原則的義務。十分明白的，在一九四五年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中向美國國務卿斯退丁紐斯提出下面的問題：假若五個常任理事之一利用一致協議規則制止反對自己的強迫行動，那將如何是好——當時的美國國務卿答道：

「假若這些國家之一在某時走上侵略道路，結果就是再一次大戰，不管關於安全理事會的理事和表決的規定如何，都沒有關係。憲章不能給予強國任何她們在實際中所不能具有的權柄，而且就是沒有憲章，這些國家的權就已經能夠維持或破壞和平了。」

斯退丁紐斯在他的報告中表明了美國全體代表的意見，他說五個常任理事的一致協議要求以及規定的保證，不但對於聯合國最近幾年的成功是很重要的，而且這種要求依照多數美國人的意見是承認並確定了，美國爲維持和平，必須負起巨大責任，所應該具有的權力。

因爲現在既然日益堅決的發出呼聲反對憲章所堅決規定的各國主權及各民族的主權平等，那末就更是多餘的，現在提出當時的美國國務卿對於這類傾向會予以反抗，雖然當時沒有如目下大會所有的傾向這樣堅決和肯定。在這一美國文獻中我們可以讀到以下的一段：

「大會並不是立法機關。這是主權國家代表的國際集會。所以關於重要問題的表決很難用盡普通各國談判時爲達成共同觀點而用的一切方法」。在這裏自然應該指出這種規則，這種原則與實踐的區別，這種實踐在我們這裏已經是第二年了。我們已經看到了這種實踐與這種原則在事實上的距離。

「大部份關於憲章表決規則的批評——在這一文獻中說——之發生是由於忘了聯合國並不是聯邦，也不是世界國家，主權的會員國的表決程序根據，必要的原因是不能按照各州議會和國會的表決程序來看的」。現在這種立場已經改變了，現在美國的代表在事實上正在採取一切步驟來否認兩三年前以前美國對於一致協議原則所接受的義務，雖然企圖掩飾這一點，說現在的問題並不是取消這種原則，而祇是取消在實際運用此種原則時某些不存在的濫用。

四、否決權不是特權而是義務

若干在第一委員會發言的代表關於這一問題聲明：認爲否決權是強國的特權，是破壞聯合國一切會員主權平等的原則的。他們深刻的錯誤了。他們所說的特權，在實際上並不是特權，而是按照聯合國憲

章規定，全體會員加在安全理事會尤其常任理事身上的一種特別責任。

第二次世界大戰已經證明了這種所謂「特權」對於強國的價值是什麼。這不是特權，而是一稱特別責任。關於這一點，美國政府在一九四五年曾經十分正確的說過，而在一九四七年美國政府的代表又要把它否認了。

現在支持美國建議的若干代表，自然很記得國際聯盟，自然很記得表現在每個會員都平等的那種虛偽的民主，就是不管這些國家的比重如何，不管她們是否真正彼此平等，不管她們之中每一個，根據每一國家對於維持和平與安全以及反對侵略所具的實際可能性是否與別國相等。這都是需要注意到的，不能把國家的平等與人的平等混合在一起。所以講到五個強國似乎具有某些特權，因而似乎破壞了各民族的主權平等原則，以及其他民主原則，這種說法不過祇是明顯的武斷衝動，沒有估計到什麼在實際上是民主，什麼是民主的否定。

國際聯盟是以自己的民主主義裝飾得很好的。但是實際上這是一種虛偽的民主主義。這種民主主義在抽象的平等上埋葬了一切爭取各民族和平與安全的實際可能性。這就是民主的目的與先決條件的直接否定。所以不是偶然的，反對一致協議原則的鬥爭，是與反對民主的鬥爭交相錯綜的。不是偶然的，現在的情況竟是這樣：——我們在此次大會上已經看見了這種情形，就是反對一致協議原則的那些國家，都對佛朗哥政權推行親密關係的政策，而後者和民主國家甚至於找不到一點相似之處。不是偶然者，正是那些支持佛朗哥的國家現在都是一致協議規則的主要反對者。這不是偶然的，這是因為一致協議規則乃是聯合國工作中民主主義的重要關鍵之一。不過在這一問題上，各位代表先生，主席先生，還有事情的一面，我認爲必須請你們注意，因爲這一面也是很重要的。

蘇聯是民主理想的最澈底的執行者，是澈底反對任何企圖，藉賴一切經濟財政等等的壓力，推行命令和壓迫政策，以代替健全的民主基礎上的國際合作。蘇聯是下面一種對外方針的代表；就是企圖鞏固國際合作，鞏固各民族的和平安全，不過這與若干其他國家，首先是美國的利益相衝突，牠們的對外政策都是追求擴張與世界統治的目的，這與聯合國的原則和目標相抵觸，因此聯合國已經成了這兩種子盾的對外政策方針的衝突舞台，企圖實現這些目的，就引起聯合國組織內心的鬥爭，反對這一組織的原則，反對它的憲章，因而也就反對那種非根據憲章和完全無條件尊重憲章所表現之原則而不能實現的合作。

美國代表團已經用它的全部行動，在此次大會中證明了它是輕視這些原則和這種憲章的。她已由下面的行動證明出來：她在這次大會上是許多破壞憲章行動的發起人，例如：建議成立常設委員會，並使這種機關起着聯合國主要機構的作用，但又以輔助機關為掩飾；又如通過決議，任命關於希臘問題的委員會，這是破壞憲章所規定的各民族主權平等的原則；又如破壞憲章第二十三條及選舉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的原則，以美國為首的英美集團堅決反對選舉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代表到安全理事會中來；關於朝鮮問題建議一種和大國關於朝鮮協議相衝突的建議；把否決權問題歸入議事日程，並將此問題轉交常設委員會審查；關於憲章第四條的解釋問題，任意建議提交國際法庭，這是與憲章明顯衝突的；任意抱着政治企圖向安全理事會建議，通過愛爾蘭，葡萄牙，外約旦，奧國，及其他國家加入聯合國。

這就是在这次大會上根據美國代表團的提議及其直接壓力之下所通過的一切決定，不過這遠遠沒有包括一切。這些舉動已經揭穿了破壞國際合作，及聯合國組織的真正犯人。但是美國代表，例如參議員

奧斯丁還責備蘇聯破壞聯合國憲章，聲明蘇聯拒絕參加那些破壞憲章的委員會是破壞了聯合國的基本原則及其整個機構。

這真正是張冠李戴了。

在實際上，破壞聯合國基本原則的並不是拒絕參加不合法組成的聯合國機構者而是建立這些不合法機構的國家。在方法上領導反對一致協議規則的運動，對於破壞聯合國的原則也是不少作用。我們應該記得十一月十八日杜爾斯在第一委員會中關於一致協議原則曾經聲明五強協調乃是五強聯合反對共同敵人的結果，但是現在共同敵人已不存在，這種協調大部份也不存在了。他聲明幾年以前規定作為聯合國基本原則的一致協議原則的先決條件是不正確的。

這樣的聲明，若不是號召根本修改憲章，若不是打擊憲章的基本原則，還有什麼別的意義呢？

美國現已收到若干代表，首先英國，中國，與法國代表的支持。蕭克羅斯，顧維鈞及巴格弟在第一委員會的演說已無疑問的證明他們是走向那一條路。任何贊成一致協議原則的巧妙言詞，但同時又譴責運用此種原則的實踐，企圖在事實上破壞一致協議規則，都是不能欺騙我們的。

蕭克羅斯先生說只有經過完全協議，才能保證各強國的協調，但同時他又懷疑有保證這種協調的可能性。他說應該改善國際關係及英國不想取消一致協議規則，但同時他又建議各常任理事國締結一個關於正確溫和使用否決權的君子協定。

假若依照蕭克羅斯的話，國際關係既在妨礙達到協調，那末怎樣又能說什麼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之間的君子協定呢？蕭克羅斯認為強國對於使用一致協議規則可在許多方面走到協議，爲了製定此種協議似乎就應該是常設委員會的任務。

但是剩下了一個問題：當蘇聯及其他五個不同意建立常設委員會的國家都不參加常設委員會的時候，試問常設委員會怎麼能解決這個任務呢？

另一個問題：假若如蕭克羅斯如所斷定的，問題不在一致協議原則，而在國際關係，如何又能打算在常設委員會中製定關於一致協議原則的協定呢？

還不明白嗎，所有英國代表這樣悲傷的聲明都是一些空話。在一切關於協調，關於君子協定的美麗詞句的樹後，正想隱藏黑暗企圖的森林，以便取消一致的協議規則，或如馬歇爾先生說的，爲使表決程序自由主義化，這都是一樣的。我們知道時常以自由主義的話語來掩飾反動思想及反動事業。

英國代表及其他多數代表團都是追隨美國的，後者很明顯的現在爲聯合國憲章的一致協議規則所牽制，並且認爲自從此一規則確定以後，政治面目即已改變，五強的協調亦已消失，因而這個陳腐的不時髦的一致協議原則也就成了廢話。

所以對於把一致協議原則或否決權問題轉交常設委員會一事不能不看作美國所提出的目的，乃是走上廢除和取消一致協議原則的道路。

現在向我們建議對於第六章，即對於一切與和平調劑爭端及情勢有關的問題都放棄這一原則。按照美國代表的意思這一原則例如不能使用於第卅四條所指的情況，即關於調查那些足以引起國際磨擦的爭端和情勢或此等情勢之繼續足以威脅國際和平與安全的保持。

美國政府建議在通過決議，調查第三十四條所指的爭端和情況時——我們認爲這是與解決重要問題有關的一個很重要決定——不要使用一致協議規則。換言之，就是現在的美國建議，直接打擊舊金山會議所宣佈的及定入憲章的原則，這個原則是保證強國一致行動的手段之一及保障之一。很明顯的沒有一

個自尊的和認清自己在簽訂和批准憲章時所担负的執行義務之責任的國家能同意這種建議。

五、結論

我要說完了。讓我做幾個結論。十一月十九日第一委員會通過的決議是直接謀害一致協議規則，而這個規則乃是聯合國最重要的基本原則之一，保障強國一致的有力的與實際的手段之一，同時又是各愛好和平的民族合作的基礎。這個決議完成了對於一致協議原則討伐的「一定階段」——這種討伐是在美國政府領導之下進行的，因此通過和實施這一決議而必然產生的後果就應該由美國政府完全負責。不是偶然的，在產生這一決議的文獻中，在我們議事日程的第四點上有一個阿根廷提案，即召集大會討論廢止「否決權」。不是偶然的，對於常設委員會，對於這一不合法的玩弄憲章的產兒，大會第一委員會的多數竟把安全理事會表決程序問題委託於它，並可檢討那些可以提交第二次大會或常設委員會的一切建議。這就是說假定你們通過了這個決議，那末常設委員會也要處理阿根廷的建議，即要求召集廢除「否決權」的大會。假若你們通過這個決議，那末我們便可由此斷定你真正想支持阿根廷的提案來割去一致協議原則。你們不但把這個問題轉交常設委員會。你們同時給了它一個訓令要檢討阿根廷的建議，而這個建議直接公開的說：取消「否決權」，取消一致協議原則。

蘇聯代表團認為第一委員會關於這一問題通過的建議是深刻的錯誤。蘇聯代表團曾在第一委員會投票反對這些建議。它也要在大會上，投票反對這些建議及這一決議。

現在都明白了。現在所有在這一問題中鬥爭的政治傾向都明白了。彼此鬥爭的政治企圖已經明顯，這些企圖在聯合國中的呼聲就是爭取國際合作，或者爭取世界霸權，擁護聯合國還是反對聯合國。目前提出的問題便是如此。將來可以指出誰在這一鬥爭中勝利。至於我們蘇聯人士，那我們將盡全力於保證和平與民主的原則戰勝全世界千百萬普通人們所忌恨的反動黑暗勢力。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23 0541B

